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 著

S
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
A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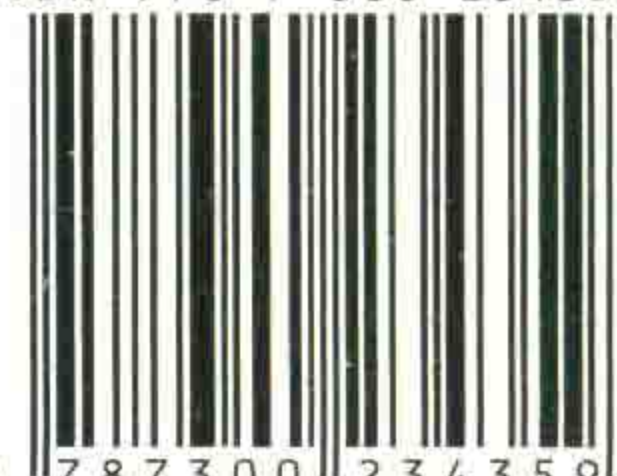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S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A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ISBN 978-7-300-23435-9



9 787300 234359 >

定价：58.00 元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SOCIOLOGICAL LIBRARY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 著

S
tructure and

Reproduction :

A Social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 赵旭东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9

(社会学文库)

ISBN 978-7-300-23435-9

I. ①结… II. ①赵… III. ①吉登斯 (Giddens, Anthony 1938—) —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8426 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社会学文库

主编 郑杭生

结构与再生产

——吉登斯的社会理论

赵旭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8.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社 会 学 文 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郑杭生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广海	王思斌	王雅琳	包智明	田毅鹏
孙立平	刘少杰	刘世定	刘祖云	关信平
庄孔韶	江立华	李培林	李 强	李路路
苏国勋	沈关宝	宋林飞	吴忠民	张 静
周晓虹	洪大用	侯钧生	郭于华	郭志刚
黄 平	景天魁	景 军	蔡 禾	潘绥铭
戴建中				

总 序

现在，文库不少，社会学文库也有几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持一套社会学文库，就不得不追问自己：这套文库只是单纯在数量上增加一个文库而已，还是应该在质量上力求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这就是本套文库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定位问题。经过考虑，本套文库的定位至少涉及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套研究性的文库。就是说，进入本套文库的著作，必须是研究性、探索性的。研究性、探索性的必备要素是与某种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即有某种创新性，因此，它们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介绍性的、编译性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重要，而是说，因为类别不同，后者应该有自己的出版渠道。

社会学研究无疑涉及诸多方面，有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对现实社会现象的研究，又有对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等等。本文库欢迎一切真正有研究价值的著作；同时，根据社会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要求，根据本国的国情，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的研究著作。

——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的研究著作。

——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的研究著作。

第二，它是一套精品性的文库。就是说，在研究性的著作中，我们更看重精品之作。所谓精品，在内容上至少要符合下述几条中的一条或同时具有：一是能够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公认有真知灼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二是能够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贡献。三是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有所推动。四是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有所促进。而在形式上，要有与内容相匹配的叙述形式，要有较好的可读性，力求深入浅出，尽可能雅俗共赏，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第三，它是一套使社会学界新生力量脱颖而出的文库。就是说，通过研究性的精品之作，使那些在社会学界没有什么知名度，或知名度不高的“无名小卒”、新生力量、后起之秀程度不同地提高知名度，把他们实实在在地介绍给学界和社会，使他们尽快成为学界名人，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库也许能够成为培养社会学人才的有效渠道之一。众所周知，没有或缺少新生力量的学科和学界，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可以忽视现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们负有提携后进的重任。我们真诚希望现有的学界名人和即将脱颖而出的学界名人，共同使本文库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文库，在学界和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它是一套供不同学派观点争鸣的文库。一个没有不同学派争鸣的学界，不能说是成熟的。我在社会学界多次强调“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因为学派之争是学术问题、学术观点的争论，用的是学术标准，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仍然是朋友；宗派之争则用非学术标准，党同伐异，大有“谁不和我们歌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气概”。因此，学派之争，与人为善，相互切磋，推进学术；宗派之争，与人为恶，相互攻击，阻碍学术。如果本文库在促成不同观点的社会学学派形成方面、在促成不同学派展开富有成果的争鸣方面，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欣慰。本文库将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一视同仁。

总之，我们真诚希望本文库能够出研究成果、出精品、出名人、出学

派。简言之，我们把“四出”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的定位。

古人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定位于“上”，可能得乎“中”；定位于“中”，可能得乎“下”。本文库这种“四出”的定位，从目标上说应该属于“上”，但结果仍有两种可能：或“上”或“中”。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最后究竟如何，当由读者和时间来鉴定。

应当指出，本文库是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候出版的。

首先，无论是就政策环境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大有可为的发展时期。现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确认。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解读，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环节。人们对社会学从不了解、不甚了解甚至误解到逐步了解；一些社会学的用语（如社区、社会化、弱势群体、社会转型、良性运行等）日益普及化、大众化，其中一些还被政府部门所采纳和使用。这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仅有了自上而下的体制条件，而且有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氛围。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该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将于2004年7月在北京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现在欧美社会学界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变化、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界如此关注中国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界来说，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本文库，应当说是正当其时。我们希望不要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其次，这种不平常性还表现在世界社会学正处在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过

程之中。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20世纪向21世纪的过渡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
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
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
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
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我们也真诚希望，本套文库能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促
进作用。

以上权且作为本文库的序言，与大家共勉。

郑杭生

2003年8月于气和文轩

自序

最初答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同意为他们的系列丛书撰写一本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学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逼迫一下自己，把以前在不同时期写下的阅读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也算是对于过去几年私下里偏好的社会理论研读做一个交代。但是在真的签约之后，我却发现，这绝非一件很容易完成的工作，所以稿子也就一拖再拖，还好编辑一直耐心等待。面对一部写成的书稿，自己总是有无限的伤感，觉得现在写东西的时间，经常会被各种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切割成碎片，因此人的思路也往往是四分五裂的，不大容易粘连起来，即便粘连起来，也总是不那么顺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下些苦功夫，自己认真地去去做一下，哪怕这段时间都耗费在这一件事情上，只要能够做成，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这部研究吉登斯社会理论思想的书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影响下写成的，前后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追随补课的指示

再细想想，之所以有如上的这些想法，是因为，在那

个时间段里，我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晚年所一直提醒我们这些学生辈的要去“补课”的“指示”。老先生不仅对别人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九十几岁仍从头开始读书写作，去请人借来英文原著耐着性子阅读，然后再一段一段地亲自写成可以发表的文字。记得这些文字先是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之间传阅，这些打印稿有个统称——“存稿”，指九十岁以后写下的文字，一年一份，比如《九十存稿》《九一存稿》之类。在我自己的书柜中还留存着当年费先生手写下来变成打印文字的那些单册印本，这也算是一份激励自己时时去问学求索的励志之源。而他晚年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成的《师承·补课·治学》^①一书，应该可以算是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读书与补课”这项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和实践成果。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是受到费先生的这种召唤或者指示而去用心读书和写作的，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时还算是年轻一辈，对社会学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于学术追求本身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我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去。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下来，我还能够在许多事并不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写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时那些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而这部原本类似命题作文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了费孝通在其学术历程晚年所提倡的“补课”精神而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再来看我要研究的这位现在已经被英国皇家封了爵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著作，前后出版过30几本书，还有那么多看都看不完的文章。面对这些文字性的东西，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对他的文字进行中文翻译的体验，但我心理上一直都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觉得在时间允

^①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

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直接去读原文而不是翻译，这至少可以减少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所带来的误解，不然真弄不清究竟是译者误解了作者，还是读译者作品的读者误解了原作者。我想这类扯不清的笔墨官司本身毫无乐趣可言，不论对于法庭上的原告还是被告而言，都似乎是一件颜面尽失，里外都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耐心地去读原著，这样也许会更加放心一些。而且读原著一方面学习了英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体会作者的本意，一举两得，确是一件快乐之事。不好之处大概就是要多花费时间，但是我想，时间的花费总是会有回报的，只有耐心读进去才能真正体验到这种回报。我后来甚至觉得，不仅我需要这样读，就连我的学生们也应该这样读，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无语言障碍的彼此之间的理解。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带着自己的学生们一起读吉登斯那些难懂的论著，其中就包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①这本书。

我有个习惯，自从有了学生之后，不管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一起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我也曾经有个和学生一起搞的读书会，要求学生定期聚会，差不多是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借用了费先生给我当年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称为“公正读书小组”，我甚至还为这个读书会每期印刷了少量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录，觉得那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于吉登斯本人的作品，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就发觉，很多人都在引述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论文^②中就频频引用此文集，这就更加引起了我去细致阅读此书的兴趣。实际上，这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② Sherry B.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1984, pp. 126 - 166.

本文集在 1979 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那时也可以说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虽然才 40 岁出头，但已经声名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了。

由此，我便专门找来这本书与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逐段逐段地讲，直到弄明白吉登斯究竟是怎么想的为止。主持并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于我自己而言确实是很有收获的，这样的安排逼着我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去阅读，每天又都会专门记录一些零散的笔记。日久天长，在方便储存与编排的电脑的帮助下也凑成了一些看起来有系统的东西，至少对于吉登斯最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的真正含义有了许多自认为心领神会的理解。可以说，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这本文集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我的很多文字和叙述都脱不开那本书的风格，这至少可以从本书的行文中看出来。

如果再往回追溯上去，我最初接触到吉登斯的作品大约是在 1997 年的早春。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正在着手组织翻译吉登斯的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就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最初是由方文教授独自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因为出版合同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便来约我一起做这件事。以前，我虽有一些翻译的练习，但是很难成什么气候。在接下这个合作翻译的任务之后，我几乎一整天都会泡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北大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机房里，一边看着英文原稿，一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汉字，困了就倒卧在办公桌或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样坚持了差不多三个多月才宣告完成。到了 2000 年，时任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马戎教授又专门委托我来主持翻译吉登斯所撰写的有着广泛读者的《社会学》教科书第三版。后来因为各种杂事的烦扰，这份大家集体的翻译工作同样是一拖再拖，结果新的英文第四版又出来了，只能再遵照出版社编辑的意思按照第四版去重新核校，那几乎可以看成是一次全新的翻译。这个故事在 2012 年翻译吉登斯那本《社会学》第六版时再次重复，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第六版的初稿翻译出来，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吉登斯英文版的第七版在 2013 年又出版了，结果又只能一切重来，依照这新的第七版重新翻译，直到 2015 年 5 月完成译稿，10 月才正式出了中文翻译

版。不过，在这耗费漫长时间的翻译校对历程中，我也渐渐揣摩出一些吉登斯所真正想要表达的那种社会学的要义，这对我后来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本科生课程大有裨益。

结识吉登斯

我很荣幸有过两次机会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那时吉登斯陪同布莱尔首相访华，他在自己的行程中顺便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他的著作的汉语翻译者进行座谈。那大约是在1999年的冬天，由于是隔着圆桌的远距离的对谈，也就没有得到多少机会去单独请教，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像徐志摩描写“康桥”的那份思绪，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恰巧吉登斯自己还是徐志摩的校友，都属于与剑桥这个地方有缘分的人，只是吉登斯显然少了徐志摩那份诗性的浪漫。另外一次见面则是我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做“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学术奖”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楼狭窄的大厅里，我不仅见到了鬓发染霜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教授——几年前刚刚故去的英国最伟大的女人人类学家之一，而且还见到了刚刚主持完我参加的这一场演讲的吉登斯教授。那个时候感觉吉登斯教授特别繁忙，他跑出演讲大厅，站在那里，似乎也只是为了换换空气，休息一下之后，接着还要去参加下一场演讲或之类的活动。因此，那时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也不过只是与其打了个照面，寒暄了几句，没有再多去叨扰。中间我因为《社会学》第四版的序言撰写曾经写邮件去咨询过他，他也曾经答应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个简短的序言，但后来也因为事情多而搁浅了，至于后来也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中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他说不必那么规矩地叫他 Anthony Giddens，只要叫他 Tony Giddens 或者 Tony 就可以了，这种称谓着实让人觉得亲近和蔼，毫无世界知名大学者的架子。再后来，在翻译吉登斯的《社会学》第七版的时候，我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他有过一些邮件往来，这些陈年往事都在我

给这本书中的中译本所写的后记中一一交代了，在这里无须赘言。^①

研究吉登斯

尽管跟吉登斯没有太多的谋面，我心里对他却一直很是崇拜。凡是他出的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见到了总要买上一册，留在案头，有时间便去翻阅，今天想来这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情。多年下来，他的书我还是认认真真看了几本的。

可以坦白地说，我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理论的，我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一个理论家，那样看起来会更加不自然，多少像个小丑了，尽管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的著作，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②，那论文里甚至还有很大部分牵涉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可以这样说，在卡尼曼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十年的1992年春季或者更早一点，我实际上已经开始拿他的实验范式在中国的被试中间加以验证了，但在那时的学术背景下，身处畿辅之地，偏安一隅，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你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与社会心理学家方文谈起这件事，他也觉得这似乎是很值得去自我炫耀一番的。后来我还真一时晕了头，当时好一阵子沉浸于一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之中，想来真是可笑。确实，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思考，平心而论，那也只不过是一份闭门造车之下没有太多自己观点的一般性的验证而已，确实也不值得再去提及了。所以已经泛黄了的蜡板打印出来的文稿就丢在了书柜的角落之中，让它尽情地变旧了。不过先前的那些对于西方心理学史中各位大家的研究经历，确实使我对于人的行为解释的各种理论都充满好奇，从来也没有对此失去兴趣，不论是在之前的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之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乃至到了现在所专注的人类

① [英] 吉登斯、萨顿：《社会学》，7版，1101~11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赵旭东：《对心理学上的两种阐释模式（行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

学研究中，这种智识的追溯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自从由心理学这个行当转到社会学中去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社会学的解释都是一开始就把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好像以前自己下功夫去阅读的心理学知识在社会学的广袤领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在细细研读吉登斯的作品后，我有了一种能够重新找回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知识之间在阅读上的连续性的那种感受。换言之，在吉登斯写下的字里行间，我多了一份亲切感。可以说，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尽管大家路数有所差别，但是一些基本问题在骨子里还是能够相通的。由于吉登斯教授自己有心理学的一些背景，因此他在谈论人的社会行为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也就是他后来所谓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作为行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在心理学中也曾经一度被抛弃，甚至被认为应该彻底铲除掉，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新、老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所占据的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一些有关人的认知现象的再发现，认知的概念才又被重新捡拾回来，由此，心理学界被认为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革命。这种认知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学科，经济学首当其冲，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隐含有一种革命的影子的，那位我早先曾经追踪过其研究的卡尼曼先生就是研究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人的认知如何会发生一种误判，也就是非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人的思考中发挥作用。^①而吉登斯的思考应该是沿袭了这样一种认知革命的新思路，只是他更多地从社会学理论的唯一理论路径上去想问题，因此他会考虑一种思维的结构如何可能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而这种结构如何又会被固化下来，出现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然后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一种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变迁之中的连续性的插曲。^②这些不同于静态功能论和结构论社会学的考察，使吉登斯真正理解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真

① See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参见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载《江海学刊》，2012（4）。

谛，即一种变动性的存在，这多少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那种意思。^①但是，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表述更加社会学化，也就是他在考虑一个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延续性背后的运行机理问题。他认为在这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之中，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他所谓的社会“控制的辩证法”。^②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得到加强。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③，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在这信任出现裂痕之处，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公共事件的，还涉及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了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今天的我们，也许并不像科学家那样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说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个悬在空中、只靠手中的一根竹竿来尽可能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会有从钢丝上跌落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了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

① 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440～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态：一方面是无处容身的漂泊感，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再融入的归属需求；一方面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疏离感；一方面是到处都充斥着专家系统的抽象社会的压迫感，而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似乎必须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做出最后抉择的不知所措感；还有我们那种逆来顺受地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无奈感，以及为了生活政治、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开展不懈的社会抵制运动的抗争和维权意识之间的那种不断摇摆……总之，如此查找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翻检出很多这方面的“社会事实”，以此来发现一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悬在空中的摇摆的对立。

我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能够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就像照亮黑夜的一盏明灯，我们可以借着这盏明灯去查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是在哪些地方体现出了这种摇摆性或风险性，而又是在哪些方面隐含着一一种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遵循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去补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的根本原由所在。

现在，我们也许已经不会再缺少什么社会研究的题目，也不缺乏大量的研究资料了，各种调查机构以及大量学术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地调查构成了中国所谓“大数据”的基础，但是我们确实缺少切近本土社会思考而又放眼世界的那样一盏明灯，以此来照亮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种种不曾被人觉知的藏金之所。因此，我一直认为，特别是曾在自己讲授过的社会学理论的课上主张，理论从来就不是摆在房间里供人欣赏和玩味的漂亮花瓶，它必须有一种影响力，特别是一种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它也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触动，至少要使其向更为适合人的善良特点的那个方向转化。这样的努力也许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一本本地阅读社会学理论大家的传世著作，当然也需要让这些理论大家为

我们沉闷的生活开启一扇更加通透的窗户。这也许是我乐于花工夫写这本依据一个西方学人的社会思想而展开的书的初衷和归宿。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

研究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必然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对于一个处在变动和转型之中的社会而言，吉登斯的理论构建充满了一种適切性，因为他所提出的社会理论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成长之中的变动与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交织的社会世界。对今日中国而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其自身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能够重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并融入到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去，而摆脱历史上的“左”和右的极端主义道路、选择一条取乎其中的发展之路，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竞争中保持自身恰当姿态的必然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在变动不居之中把握行进方向的能力，这同时也是有着一种主动意识的行动者所必然要具备的一种认知能力。对于这种能力的要求既很实际也很急迫，我们必须从那种岌岌可危的对共时性传统的维护中逃离出来，看到其为现代制度所瓦解的碎片化倾向的动力来源，否则只能看着那些思路略显简单和急躁之人随意地将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种对立可能根本解决不了对于传统的保护问题，反过来却会使传统很容易地在所谓的“文化保护”之中逐渐冰消雪融。但社会也不会完全听任那种极端对立思想的发展，它会通过处于时间序列之中的种种事件去影响那些日显极端的制度和思维，这也恰是社会不大可能会彻底极端化的原因所在。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逐渐抛弃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之后，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也并不一定是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它的内部因为种种变数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内在冲突与矛盾，所有社会的变革与转型都必然因应着此种内部矛盾和冲突而发生，并因此产生某种结构上的新逆转。由此看来，社会必然是一种成长之中的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基于文化价值转变的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发生，并随着承载文化内涵的传

媒、传输以及互动交流技术的新发展而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快速转变。^①

人类学尽管一直标榜自身的异文化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是置若罔闻的。甚至可以说，关注异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回望现代制度的种种根基如何离所谓的原始制度并没有太过遥远，或者不过是走向了原始制度的反面而已。在此意义上，今日世界秩序的构建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构建，其核心也必然是在文化差异的世界秩序中重新组合一种文化的要素以及产品的输出与引进，这些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转型的前奏。在此种转型发生之时，个体也必然凭借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强而出现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而对于这种文化自觉的理解，必然又会触及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更为重要的是还会触及在演进历程之中的道德化重塑，这些必然带动某一个社会新一轮的社会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思想的形塑之中，曾经涌现出许多各执己见、彼此竞争的思想家，由此而丰富了我们后来人对于社会以及文化构成的种种认识。在这方面，吉登斯算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前人的社会思想之后提出了有自己特点的社会学思想，这一点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最值得敬佩的。可以这样说，今日的研究者已很少有人可以发此宏愿：对人类有关社会本身的思想脉络做一详尽的梳理，而后成一家之言，运用于对实际社会的理解。在这方面，吉登斯不仅做到了，而且使之发扬光大，至少他对于自己所浸润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他也在试图将西方社会思想中那些无助于理解当下世界的内容放到一个受到质疑乃至抛弃的行列之中去，而直接去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种种转型的世界，为此他鼓动喉舌，发出声音。对于全球化、气候变暖、风险社会、亲密关系、政治与民族问题上的极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会

^① 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不惜笔墨，似刀似枪，痛陈其利弊，毫不留情，以实际行动去构造出社会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声音，实现对于世界转型发展走向的干预和影响，并且这种干预和影响所追求的是对于各种形式的过于极端化的主张的纠偏。就像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注意到国家要么借助“共意”的专制操控的极端主义，要么借助“市场幽灵”那种毫无方向性且恣意妄为的自由散漫的极端主义，他选择了在其中有着自己政治立场并捍卫自己政治权利的“第三种模式”的市民社会。^① 吉登斯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他从来都不否认他希望自己的那些思想表述可以成为一种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思想，从而使得社会世界能够在—一个更为良性的轨道上发展或延续。

在今天知识生产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里，我们可能并不缺少理论。就像机场免税店昂贵却易得的化妆品和烟酒—般，我们也在消费着同样是从那些地方转运出来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理论，但这些消费大量地体现在翻译之中，在课堂之中，或者是在各种形式有模有样的演讲和讨论之中，而并非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一个越来越由所谓自由资本所驱动的时代里，—切似乎都只有—个方向，那就是被所谓“看不见的手”——经济杠杆搅动起来的一个看似自由但却无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生存无意义的心灵状态，但他们却表达不出来。—种无意义生存状态的图景似乎已经浮现出来：人们无疑都在拼命地工作，但却不知为何而工作；人们也都在忙碌地生活，却也实在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生活。心灵无处安定下来的浮躁之感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及在那里的种种表述之中。精神分析心理学

^① 泰勒对此曾有这样的带有总结性的表述：“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并非—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是深深地贯穿于这种权力，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状态的—种力量。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确实是‘两栖的’。”在同一页，泰勒接下来说道：“我认为，较之于前两种模式，我无力掩饰我对第三种模式的偏好。我希望第—种模式现在已被放弃，却又担心第二种模式会因第—种模式的废弃而独当其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将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力量将被消解。它所具有的对抗官僚权力的作用也将被消除。并且，我们政治传统中—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政治自由的理想，也将会衰竭。”[加]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英]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3~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家对这种存在状况保持了一种敏感，霍妮（Karen Horney）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书，书名即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直指问题的要害与核心。^①理论在今天的时代中已经成为一种极为苍白的存在，很多人会认为读理论可能只是极少数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神经症般的现实应用的紧迫性，使得那些在思想上本来就排斥理论之人变得更加厌倦理论及其思想上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是远离理论，越是看不到理论，心里就似乎越是舒坦。霍妮所说的现代人对于赞许和情爱的那种过度依赖的“神经症人格”在他们身上可谓表露无遗，由此他们宁愿使自己成为没有理论作为武装的世俗之人。但吉登斯却没有这样去想，更没有这样去做，他从行动的实践当中看到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也将理论直接抛向了这个他所谓的“社会世界”之中，并不断地将其转化升腾，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理解的一体性引导。而这恰是很多人喜欢阅读吉登斯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他可能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灌注了自己的理论智慧，或者可以从所有的领域中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思考和反省空间。

直面当下社会世界

显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已经并非纯粹的自然本身，我们更多地为社会的“第二性”或曰“次起性”所装扮而无可避免地要去选择吉登斯所谓的“自然的终结”。这些在吉登斯看来，都属于现代社会晚期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确实，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的不再是生活在一种实际发生的衣食住行之中，而是生活在股市、楼市的因为言论、数字以及种种突发的生活事件而发生的符号意义的起伏涨落之中。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那么多的人进入股市，没有那么多的人为楼市所累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第一次去香港就注意到，那里的人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为乐于谈论的就是股市

^① 美国的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书中提出了现代人的五种神经症人格特征，分别为：对于他人的赞许或情爱的过分依赖，内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对于自己观念和行为的过分肯定，对于他人的过分反对、攻击、贬低和侵犯，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以及对性行为的抑制性作用的种种怪癖的同时存在。参见〔美〕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20~2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和楼市，报纸和电视报道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和消息，他们会不分阶层地为股市、楼市的起伏涨落而眉飞色舞或一脸愁苦。他们眼神中的幸福是因为股市、楼市，而不幸福也是只有这两个“市”中才会出现的“幽灵”所致。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开始出现很多人有了自己的房产、自己的股票的局面之时，人们也开始过上十五六年前香港人的日子，他们一方面在制造着关于股市、楼市的种种言论，另一方面又在为受到种种言论刺激的股市、楼市走势按照自己的预测发展而欢呼雀跃或者为其与自己的预测相悖而捶胸顿足，换言之，在生活的每一天之中，利好或者利空的消息都在不时地影响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

而社会的心态也使得人们不再可能生活在所谓的自然之中，而一定是生活在语言所制造出来的种种麻烦之中。每个人所面对和即将面对的是可以方便发布消息的种种自媒体，尽情的表达和发声充斥于人们灵活的指尖，使得这个社会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但是越来越随意和方便说出的言行，可能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个人意见的表达，而是可以在一瞬间就让虚拟人群和朋友圈产生井喷式回应和反应的有着实际社会效应的网络言语行为。对于因为种种技术的加入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而言，人们越来越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背后操弄。总之，股市和楼市乃至一般的民意都会因为这些指尖上的言论而情绪性地高升或回落。因此，今天社会秩序最为根本的问题可能并非言论是否自由的问题，而是言论如何去真正影响社会，使其不会走到极端主义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随时可以获得的海量言论已经不再是人们在传统时代的街谈巷议、见面聊天，或者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的插科打诨。在今天的一个所谓“互联网+”的时代里，人们可能在面对面时彼此漠视，却在一个巴掌大小的手机屏幕上表现出疯狂的吐槽、彼此的叫骂、围攻以及通宵达旦歌咏的狂欢场面。人们不再只为了交流而说话和应答，而是在制造着各种社会刺激，那个由各种形式的液晶屏幕连接在一起的虚拟世界着实也需要这些刺激来使之活跃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自身的热度，也使得社会更加远离了其应该有的一种自然状态，成为一种超乎一般人想象的过度社

会化的状态。如果你在某个朋友圈中，你就要做出点赞或评论的回应。当然你还可以制造出各种刺激，以期待着来自朋友圈的拟似“熟人社会”的种种反应和回应。这些都可能是一念之间不假思索的刺激、反应或回应的即刻交汇和并置，但却不用负什么约束性的责任。大家一吐为快、一笑了之可能算是最好的借口，“谨言慎行”“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三思而后行”等似乎都已经成为被抛诸脑后的圣训。随意的发声、被迫的发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错字连篇、故意歪曲、搞笑吐槽、表情卖萌以及羞辱自己乐于羞辱的任何一个公众人物，种种语言的新游戏变换着花样在朋友圈、在互联网上被“晒”并散布开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今天年轻人生活的常态并难以抑制。

而所有这些，在吉登斯奋笔疾书的时代里可能并未完全出现，但他所预言的“一个失控的世界”似乎正在向每一个并不知未来深浅的人走来，这个未来便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乃至一个举动而深陷网络的围攻之中，这个虚拟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负面刺激确实对少数人以及一些群体产生了一种缺少同情心的无端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社会理论自身的价值所在，它应该对人类社会而言是一种实际的预测和修复，而非迂腐地去做一种归纳整理以及冷冰冰的数字或现在时髦的所谓“大数据”的堆砌与罗列工作。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使我们着实感受到了在吉登斯写下《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以及《亲密关系的变革》等著作之后，我们便已经生活在了一个所谓后吉登斯的时代里。他的一些说法逐渐开始应验，但对于如何去应对新的社会境遇以及差异性的文化场景，他自己似乎也并没有过多地加以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也自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可能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加以应对和解决，需要我们直面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现象，避免走向极端的不理智的冲突和零和游戏，而以一种同理心去感受他人的存在，为自己也为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找寻到一种合理的且不那么令人焦灼的行动方向以及生活意义。

以上所有这些便可以算是活在当下互联网世界中的研究者对于社会理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期许，这种期许难以凭空实现，而需要我们真正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置于世界之中来看待，这样才可能会有一种发现与体验上的汇集和融通。我们需要知识，更需要理解，没有理解的知识，只可能是缺少心灵沟通的知识，它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到极端冷酷、残忍、过度理性、敏感以及放纵自我的地步，但实际上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不应该有那样一种凌驾于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的地位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研究社会理论，明白社会基本运行逻辑的意义所在。在这方面，文化不可或缺。

2016年3月9日上午写于京西南书房

目 录

第一章 经历与作品

- 2 第一节 思想的轨迹
- 10 第二节 理解行动者
- 14 第三节 行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
- 16 第四节 结构主义的传统
- 27 第五节 迈向结构化理论

第二章 结构化与社会再生产

- 36 第一节 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 40 第二节 吉登斯与伽达默尔
- 45 第三节 主体中心的消解与文本
- 50 第四节 社会行动与制度化
- 58 第五节 制度、再生产与社会化

第三章 结构化理论

- 72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
- 79 第二节 支配、权力与剥削
- 88 第三节 结构化理论
- 96 第四节 对结构化理论的批评的回应
- 104 第五节 结构化理论的应用

第四章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 114 第一节 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 125 第二节 现代性与自我的重构
- 128 第三节 亲密关系的转型与经验的封存
- 133 第四节 抽离化与虚空
- 142 第五节 现代性与民族国家

第五章 自然的终结与生活的政治

- 153 第一节 自我的牢笼
- 161 第二节 自我认同的精致化与存在的焦虑
- 166 第三节 经验的区隔
- 174 第四节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
- 182 第五节 晚期现代性的世界

第六章 走出极端政治

- 190 第一节 潜功能与连续的结构化
- 199 第二节 连续的插曲与蛙跳效应
- 207 第三节 拯救受伤的世界
- 214 第四节 中间道路的选择
- 219 第五节 全球化与走出极端政治

第七章 社会理论的未来

- 229 第一节 社会学的理论关怀
- 231 第二节 矛盾、权力与历史唯物主义
- 239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意识
- 249 第四节 未来的社会学
- 257 第五节 社会理论的前景
- 269 后 记

第一章 经历与作品

对于一个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学家，要想理解、研究他，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他的个人轨迹着手，从而以他的生平和作品为主线串联起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吉登斯。这正是本章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围绕着理解行动者展开陈述，原因就在于在吉登斯看来，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应该对于社会行为的起源和性质给出一种带有启蒙性意义的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人与动物之间做出一种区分是极为必要的。但行动者与社会之间又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事实，因为人在制造着引导自己行动的观念的同时，该观念又会在活动之中加以体现。这便是第三部分所阐述的主要内容。而无论如何，吉登斯的社会学，骨子里还是在延续着一种法国社会学的传统。不论是功能论，还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实际上都没有在结构与系统之间做出区分，通过对20世纪留下来的解释的社会学与功能论这两大社会理论遗产的批判与承继，吉登斯将他的结构化理论成功推出。这便是本章最后两部分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名英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社会学的领域之中，当然也不局限于英国国内，而是在整个世界的社会科学领域中，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在前后三十几年里所撰述的大量文章和著作，以及由他所独立提出的一种全新视角的结构化理论，不仅使得社会学理论自身有了一种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超越，同时也为理解当下世界的社会变革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他对于现代性及其后果的洞察，不仅使我们注意到了现代社会诸问题的真实存在，同时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如此发生和演变，而这些都只不过是吉登斯诸多理论思考中的一种而已。他的思考系统中蕴藏的理论力量是无穷的，而这一点，似乎并没有真正引起研读吉登斯著作的人的特别注意。为了了解吉登斯的思想轨迹，我们确实有必要先去了解一下他这个人及其生活经历。

第一节 思想的轨迹

1938年1月18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出生在伦敦北部埃德蒙顿的一个普通办事员的家里。在读大学之前，吉登斯也不过是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接受教育。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成立于1928年的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录取，开始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尽管这所大学在英国并非那么的著名，但在善于引导学生以及认真负责的老师的带动下，吉登斯的能力和兴趣也发挥得游刃有余，最后他以极为优异的成绩毕业。显然，这种初始的学科背景影响到了他未来的研究，因为他后来的研究明显地透露出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关怀，并由此而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能够体现这两个学科特点的独具匠心的社会分析法，即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法。

初入大学之门的吉登斯，似乎并没有其他更高的奢望。也可能，他最初并没有想要在未来成为一名学者或者什么理论家，而是私下里想着要去子承父业，当一名行政部门里的公职人员。与此同时，在英国这样一个讲

究出身和背景的国度里，他那并非书香门第的家庭，也自然使其远离了牛津和剑桥这样顶尖的名校，而在赫尔大学发展他的学术旨趣。这其中还有个插曲，一开始，他本来是想要去学习哲学的，但是哲学没有学成，结果转去了心理系，而那个心理系也很特别，除了心理学之外，还有社会学，学生要兼通这两门学科。而恰恰是这样的大学背景，成就了吉登斯独具魅力的社会理论探索之路。

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那个时候，在赫尔大学传授社会学知识的那位教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以西方以外的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他的名字叫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沃斯利本人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并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位以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著称的人类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旺伊迪家瓦的社会结构变迁》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那本著作中，你可以看到这位人类学家对于法国传统的结构社会学的质疑和否定，他基于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田野研究对原始的图腾制度的社会学解释提出了挑战。^①而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便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而著称的《号角即将吹响——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研究》（1968）。但因为政治见解上的原因，他并没有能够留在英国最好的大学教书，而是转去他的母校赫尔大学，并以教授非自己本行的社会学为业，尽管他教授的社会学课程，可能比专业的社会学更加有吸引力。在吉登斯看来，沃斯利那时除了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之外，更是一位睿智的比较社会学家。他采用了各种方式来比较各种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来教授他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学，这一点显然也影响到了吉登斯以后在理论表述中的那种社会与文化比较的视角和关怀。^②

吉登斯大学毕业之后，在沃斯利的建议下，于1959年进入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19世纪英国伦敦的体育

^① See Peter Worsley,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anindiljaugw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54.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运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据吉登斯说，那篇名为《体育运动与当代英国社会》的硕士论文，在篇幅上，差不多已经相当于一篇博士论文了。^①

吉登斯那时所选择的这个研究主题，是在后来才引起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至少在今天，有关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学科了，但是，在吉登斯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期，这门学科还是不存在的。吉登斯在自己的论文里特别提到，所谓的现代体育运动，比如足球、英式橄榄球、曲棍球以及网球等，尽管各自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但是，差不多都是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之初被社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在这一分析中，吉登斯借用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概念，那就是，通过社会逐渐容忍给予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以固定的竞技场地，随之发展出来一些比较完备的竞技规则与章程，这样，体育运动就从最初粗陋的形式，变得愈加精致化，而这个过程，恰好符合韦伯所说的一种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过程。^②

1964年，在吉登斯硕士毕业之后，他申请到了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的职位。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享誉欧洲的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这位以撰述两卷本《文明的进程》^③而声名远播的德国裔社会学家，那个时候还不为学界所熟知。不过，埃利亚斯在研究和教学上的大师风范，以及在逆境中依然坚持不懈地去探索的刚毅性格，一定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吉登斯，而埃利亚斯本人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对于吉登斯的影响，也在吉登斯后来的著述中有所体现。

在莱斯特大学教学期间，吉登斯曾经先后获得多次出国访学的机会。在1966—1969年的这段时间里，他曾经访问并任教于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些访问让他接触到了那个时期风靡北美的社会激进派的思潮，特别是1968—1969年在洛杉矶任教的那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8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9页。

③ [德]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德]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

段时间，他亲眼目睹了各种频繁发生的政治对抗与社会运动。一些嬉皮士、行为怪异的人，当然还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在那时似乎一下子都出现在了洛杉矶这座城市中，他着实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所吸引，也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思想自由的实验场所吸引，所有这些，都对其后来的社会学理论思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还是念念不忘美国洛杉矶的那些激进派的思想与行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还专门对此问题展开过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并结集出版过一本如何超越有关左派和右派政治前途的著作，书名就叫《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1994）。^①

1969年，吉登斯结束访学之旅，回到了莱斯特大学。不过，之后很快地，他便接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聘约，离开了莱斯特大学，在剑桥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师的教职。他在剑桥一待就是28年。这所老牌世界真正一流的大学，为吉登斯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吉登斯奢侈地拥有着这份难得的时间上与资源上的富足，他之前在社会理论上的长期积累和阅读，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敞亮的空间来加以释放，那是一个在他学术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同时也为他后来所获得的社会学名声，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学养基础。可以说，吉登斯自己的一些很有分量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就是在那个时期酝酿完成并得到出版的，其中就包括他的成名之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②，另外还有《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以及《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后面这两本书也是在此期间出版的。

不过，可想而知，这位并非由牛津、剑桥出身的社会学者在剑桥大学的遭遇也并非一帆风顺，不过他也在逆境中不断地磨砺着自己的理论锋芒。他自己从大师级的埃利亚斯那里所承继下来的欧洲大陆学者的那种坚忍不拔的学风，使他后来终于可以在剑桥声名鹊起。不过，他并没有很快拿到博士学位，而是延迟到1974年才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在此前，他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②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已经成为英语世界对古典社会理论加以阐释的极为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了。那本 1971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足以让他在世界社会学理论家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之后，他又经历了差不多 14 年的学术探索，在 1985 年，他正式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这是这个大学第二任社会学教授的职位。在此之后，他在剑桥大学开始了社会学新取向的创立，他首先在剑桥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系，即社会与政治科学系，自任该系的系主任。这个全新的社会学系，让他可以施展自己的理想，将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融入到这个学系的发展中来。这些努力最终没有白费，每一步都显得极为扎实，这些作为也预示了他未来可能有的影响力。1987 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学会会长，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理论这个领域的影响力。

对于吉登斯自身而言，1997 年可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在那一年，就像当初离开莱斯特大学一样，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在那里实现了自我学术价值理想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而那一年的 5 月 1 日，英国工党赢得了大选，结束了 18 年反对党的身份，成为一个执政党。而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对这个政党的执政理念，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份聘约的初衷是要在这所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在世界上极为有影响的大学里，建立起一个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通过学术的争论，为当今世界的巨变提供一些新的制定全球政策的理论依据。很显然吉登斯的社会学是入世的，他从来没有真正脱离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且他的思考范围也绝非仅是英国本土，而是整个世界。并且他也从来不隐瞒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和态度，他所参与创立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学应处的位置的一种价值判断。

与此同时，这也许也是他早年未实现的从政理想的另外一种实现方式。不过，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 1997—2003 年这 6 年中，吉登斯的名声已经远远超出了英国本土，迅速跻身世界级的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的行列，他的声音，成为当时布莱尔政府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声音。同时，他的成就也得到了英国皇家的认可，在 2004 年 5 月，他被

授予了“终身贵族”(a life peer)称号,这样,他的正式称谓就变成了“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教授”(Professor Lord Anthony Giddens)。2007年1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专门邀请画家迈克尔·诺克斯(Michael Noakes)为这位前任院长画了肖像,以此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永久珍藏并悬挂在学院墙壁上。这既体现了英国大学学术的一个传统,同时也体现了一位学术领袖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被认可。

吉登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之后,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开始全身心地凭借自己敏锐的思想和理论思维,为世界的未来和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可以说,在英国,吉登斯的成长之路,也是一种平民家庭教育的理想成长之路——一位平民英国人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努力,凭借个人的学术魅力,不仅得到了他所在社会的认可,而且影响到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当然,首先是他生活在一个让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发展的社会之中。

不言而喻,对于任何一名成功的学者而言,勤奋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吉登斯当然也不例外。这可以从吉登斯著作等身的出版物中得到一些反映。在1971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中,吉登斯亲自撰写和主编的著作就多达32本,另外还包括200多篇论文、随笔以及评论性文章。正像吉登斯的研究者所评论的,吉登斯至少在三个方面确立起自己作为世界级社会理论家的地位:首先,他是社会学理论的经典传统及其继承者的主要阐述者;其次,他明确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并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视角的著作,来使这种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并使之富有一种解释力;最后,作为后现代以及全球化的极力倡导者,他向世界政治的既有讨论框架提出了一种挑战,并明确提出了试图超越左派和右派这两种极端政治的第三条道路,即“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框架。^①

^① 参见[美]瑞泽尔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67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如果有时间细致地阅读吉登斯的文章和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吉登斯确实是一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作家。在他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中，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1988年他在加州大学的讲座，根据那次讲座结集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1990）一书^①，虽然短小，却不失精悍，对学术界极具影响力，吸引了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的注意。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都逐渐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并且该书在实际的研究中，被作为新问题研究的初始文献来加以评价和引述。而他已经出到第七版的社会学导论的教材《社会学》（2013）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翻译和使用。另外，很早就被翻译到汉语世界中来的《社会的构成》（1984）、《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以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都属于吉登斯在主持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这个时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②

除学术研究之外，吉登斯还涉足出版行业，与同道的其他两人共同创办了政体出版社，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创立，许多当代法国社会理论家的著作都借此而被翻译成了英文，他们的思想由此而远播英美。这种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同样出现在了汉语世界之中，上面所提及的吉登斯三本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以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中国三联书店作为“学术前沿”的首批书目而出版发行的。现在，吉登斯所领导的这家出版社，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科学的出版社之一，许多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包括埃利亚斯、布迪厄、贝克以及鲍西亚等都曾在这家出版社出版过他们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吉登斯集中精力研究在全球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个人生活情感与自我认同的方方面面。他跟一位心理治疗专家的长期互动，使他注意到了社会中的个人生活的自我、认同、爱和性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② 参见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见 [英]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1~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的表达，还有在这些表达背后所显露出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在这期间，他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等有影响力的书籍。

另外，正像前文所介绍的，吉登斯对于政治的话题从来都不予以回避。可以说，在吉登斯的思想脉络之中，政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讨论，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剑桥大学创办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目的之一也是使他这一持之以恒的关怀得到有的放矢的体现。除关注现代性背景下的个人生活这样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之外，他也不遗余力地探索在这种背景之下，政治权力在人的生活的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同时，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今天的世界已经转换为存在越来越多的风险的世界，这些风险不是由于所谓外在的危险而引发的，而是我们反过来自责对于外在世界的破坏，进而在寻求种种改进之策的过程中，由知识的多元呈现和多种解决途径之间的纷争而产生的。这就使得我们在今天必须去面对知识的生产以及这些被生产出来的知识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越来越陷入到一种不断试错的盲目性之中。这问题也许最早发生在英国，比如，就在英国社会中，由于有疯牛病的存在，所以舆论对于人们该不该放心地吃牛肉，存在多种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可能都来自某个可靠的科学研究与检验部门，但是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解释之间在观点上却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乃至对立之处。对此，作为普通大众而非这方面专家的“我们”，该如何在其中做出一种选择？这可能成为今天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吉登斯称上述所有这些都为“风险社会的政治”，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政治也难辞其咎。在应对风险的挑战中，一种政治涉入其中，并得到了再创造。而对于多样性知识的无所适从之感，使得我们必须在多种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一种小心谨慎的抉择。还有很多的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在今天都可能一下子转变成一种政治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金融保险、艾滋病、身体健康与保健、男性不育以及种种形式的自然灾害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开始变成不是原因明确的自

然存在的现象，而是可以有多种解释存在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领域。这使得“风险社会”的概念，成为用来概括今天社会形态的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① 同样，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奶粉、污染、疾病、生态环境以及物价等问题，这些都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将之界定为一种社会问题，然后再为之寻求解决之路，这成为当下社会问题意识中一种占据主流意识的思潮，而由此所给出的答案，却又是多样性的。并且，最令人棘手的问题是，这些答案之间又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也可以说，这或许是一种“吉登斯的预言”在中国场域下的实现。结果，时至今日，未来我们该如何生存，人们相互之间该如何相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如何保持和谐发展，这些都成为大多数人必须真实面对、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第二节 理解行动者

吉登斯本人是以社会理论研究而著称于学界的。他的思考和写作，大多也是围绕着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而展开的，这其中既有对于前人的综合，又有他在此综合过程中因灵光乍现而有的一种思想升华，由此而激发出很多有关现代社会演变轨迹的带有创新性的独立思考。在他的视界里，社会学终究是一门提供思想的学科，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且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有着一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试图研究人及其文化产物的学者，都必须去熟悉这一学科领域。在1987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一书的序言中，吉登斯就曾经这样写道：

社会学的领域并非与社会理论的领域相对应。就范围而言，后者要比前者更加宽泛，其所处理的是有关人类行动、社会制度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的一整套论题。不过，其首要的研究领域，乃是由现代性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风险社会的政治》，见 [英]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188~203 页。

的来临所招致的那个社会世界的社会学，其与社会理论有着一种特殊的以及优先性的关系。因为，现代性包括对于作为塑造以及重塑这些关系的一部分的社会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是整合进其动力特征中去的某种事物。“现代”的范围，实际上可以通过这些术语来加以界定。作为随意构成的以及反思性地应用到我们生活状况的转变上去的我们的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内在于现代社会的本质之中的。^①

社会学因为现代世界的转变而在发生着一种改变，现代世界的生活，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生活，这是任何明眼人，只要细心留意便能觉察到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中，这种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与日俱增，在每天的生活中，人们似乎都能切身地感受到。而在社会理论层面上，社会学家讨论得最多的就是关于现代世界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s）的问题。

在当下的社会变迁的考察中，社会学家越来越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活的转变。这些转变，逼迫着社会学家去寻求新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那些新现象。在解释模式上，社会学也在经历着一种改变，从建立在19世纪的内生模式（endogenous models）视角上的对于20世纪的理解模式，转变到今天世界的全球化态势。而面对这种全球化，我们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从全球的视角去重新思考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理论了。

在吉登斯看来，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其核心的研究目标就是对于“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institutions），而社会学所关心的重点就是那些由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形态的转变。^②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学家应该对于社会行为的起源和性质给出一种带有启蒙性意义的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人与动物之间做出一种区分是极为必要的。在这方面，人类学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

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之上，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与动物之间一

①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vii - viii.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1.

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在做什么”，并且还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人会形成概念，并由概念驱使他的个人行为。这些概念便构成了它们作用于其上的事物的一个构成要素。这不是那种随意的偶联性联系，而是行为作用于其上的事物的构成要素。^①

换言之，作为行动者的人，他们的行动是有理性可循的，这些理性持续地支撑着日复一日的行动，使之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行动者行动的序列。但是，并不是人的每一次行为都会受到其理性的支持，总是会有出错或者跟意图本身相左的行为发生。这就使得社会学家的工作在给出某种前后一致性解释上存在困难。一方面人们会说，我们的行为乃是受到社会压力所致，并非我们个人的意愿，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于行动的原因，根本是无法觉知的，因此，我们自认为是自由自在的行动，实际却可能受到了无法觉察到的内部强制力的驱使。在这一点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吉登斯社会学思考中的心理学底子，特别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的底子。在这一点上，他接受并转化了精神分析到社会学中来。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对于作为行动者的个人而言，表面的行为与其内在原因之间的不一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地球对于人的肉眼而言是平面的，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常识，但是，科学家们的“另一只眼睛”却告诉我们，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因此，我们的肉眼所见就是错误的了。以此类推，许多本来是常识性的东西，实际可能都是错误的。而社会学有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要去揭示此种错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由此社会学似乎就与普通人的或者外行的社会学有了分野，因为后者仅仅描述了社会是什么，而社会学家不仅要去做这种描述，而且要下一个判断说，这种描述在多大的范围内是真实可靠的，或者是虚假和不可能的。

另外，吉登斯强调，社会学还应该注意到人的行动的意图性以及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中，这一点显然受到了忽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3.

视，他所强调的意图性、感受性和认知能力，都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于社会之中的。^① 但是，吉登斯所提出的“新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更加强调人是有意图的动物，是“有意图地在进行着推理的行动者”（the purposive reasoning agents）。由此一强调所直接衍生出来的关注点，就从社会的静态原则，转向了围绕着行动者而持续进行的一种连续性的行动之流。

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而言，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持续地在发生着什么？”（what is going on?）这一点对于理解社会的构成而言，也许更加重要。对于这一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的角度来加以说明的，他所强调的是，“语言就是语言之所为”（language is what language does）；而在强调常人方法论的社会学家戈夫曼那里，便是“身体姿态”（body idiom）与“自我的连续”（continuity of self）之间持续的关联。在此意义上，即在时间的维度上，社会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尽管社会学家会关注制度稳定与变迁的长期模式，但是，社会学家追求的不是倾其全部的力量去恢复一种“过去”（pastness）的感受，而更多地在于分析过去对当下的影响，由此才有一种社会转型的发生。^②

吉登斯认为，在这种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的分析之中，所贯彻的并不是那种人为地在传统社会学的所谓理解（verstehen）与说明（erklären）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界限的原则，进而把前者归于社会科学，而将后者归于自然科学。在时间维度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中，带有阐释意味的理解以及带有描述意味的说明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在理解和说明之间进行人为区隔的做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便是一种误导，可能根本的问题不是两者之间分与合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人作为行动者在时间的社会延展中所展现出来的自身特点的问题。在这里，最为根本的是，人是使用概念来思维的，而概念的公开表达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新概念的生成，这种相互性的影

^① See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Macmillan, 1982, p. 51, in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1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14.

响一直是吉登斯分析的重点，当然，这也体现出他对于人与社会之间一种双向（two-way）过程的关注。^① 换言之，人并非孤立的社会存在，他会与他周围的所有存在物，不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保持一种持续、往复的交流和影响。当然，这中间对于一个社会人而言，最为突出的便是个人作为一个有着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往来互动。

第三节 行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

吉登斯所提出的行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前提就是：人创造出概念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而进入社会世界中的概念，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对自己原有概念的修订与更新。这一点对于理解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至关重要，即人在制造着引导自己行动的观念并在活动之中加以体现。吉登斯认为，不仅普通人的行为模式是如上所述的，而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同样遵循此一行动模式。确实，如果没有 15 世纪早期有关“公民”（citizen）、“主权”（sovereignty）以及“政府”（government）等概念的发明，或者社会中的个体没有普遍掌握并遵从于这些概念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想要真正地存在，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想象的。^② 现代的政治学如此，经济学更不例外。逐渐形成并日益深入到我们生活中去的经济学话语，不仅使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成为理解当下经济意味着什么的一个分析基础，这种分析注意到了个人与经济体之间的具有生产性的关系。

再去看社会学中的社会统计学。可以这样说，在差不多 18 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社会统计学帮助我们营造了一种新的想象社会的方式。人口的分布、出生率和死亡率、婚姻和家庭形态等统计指标，今天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想象中去，而且，一旦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1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0.

我们离开了这些社会统计学所提供的数字及其意义解释，社会结构的维持似乎都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如果某一个国家没有了这些数字，政府的预算和发展规划都不能顺利开展，我们因此发明并掌握了统计，同时也在被这种统计的载体——数字所裹挟和牵引。确实，从最初的统计方法的应用，到后来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统计学完满地体现了吉登斯所谓的使用概念的人在社会互动中的那种行动的二重性。^①因此，人既影响这个世界，同时又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没有所谓单向度的人的存在，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这个意义上，针对社会科学本身，吉登斯特别指出，社会科学发展跟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创新性”这一概念上。比如，一旦某个创新性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并进入到社会之中，社会对于这个概念的敏感度就会随之降低，当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对于这一概念的任何觉知意识了，甚至已经逐渐表现出某种对于这个概念所造成的世界的熟视无睹。曾经让我们很惊讶的互联网世界，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当它已经是连小孩子都在摆弄的东西时，我们的惊讶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了。很多年长者、很多对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拒斥者，也会跟风似地成为今天互联网+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断言，许多刚进入我们的生活时非常新鲜，之后变得习以为常的概念，都具有此种社会觉知敏感性逐渐降低的效应。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结果进入社会之中，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它所面对的世界的影响力会更为巨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天世界的形成与社会科学概念反思性地或者不断变换形态地进入到它们所对应的指涉对象中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②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延续无非是一个类似学习机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20 - 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1.

(learning machines) 的存在物，它自身通过吸收各种信息来获得一种学习的结果，但是无意后果的反常性 (perversit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或者行动结果的未预期性以及社会变迁的偶联性 (contingency of social change) 或者社会变革的不确定性，使得此种学习的过程，永远处在一种不完善或不完美的状态之中。简单来说，谁也无法凭借一种习得的技能，而不加任何改变地生活一辈子。因此，社会凭借着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而在不断地更改着自己变迁的轨迹，而社会学本身，则成为此种社会反思性能力成长的最为首要的媒介。衡量一个社会与时俱进及其开放程度的最为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社会有无一种机制去推进对未来加以种种想象的“社会学文化” (sociological culture) 的出现。^① 当然，努力推进这样一种社会学文化的建设，也成为当今社会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从社会学的文化意义上说，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是帮助这个社会构筑种种想象蓝图的初始创造者。

第四节 结构主义的传统

无论如何，吉登斯的社会学，骨子里还是在延续着一种法国社会学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因为法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的名字而享誉世界，并影响到后来世界社会学理论和研究的发展，即便今天，在社会学理论传统之中，这种影响依旧明显且占据主流。

不过，在吉登斯看来，在法国的思想传统里，由涂尔干所继承的“社会优越于个体”的观点有着两面性：一方面是为功能论的社会学所发展，进而强调了实际社会活动的那一层面；而另一方面则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 的结构主义所发展，强调的则是一种人的结构性认知能力，属于心灵结构的那一向度。^②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22.

以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为代表的美国现代社会学传统, 继承和发展了涂尔干功能论视角的社会观, 因此会特别强调能够使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道德良知 (moral consensus); 而作为结构主义者的列维-斯特劳斯, 他所遵循的却是欧洲大陆的新康德主义的哲学传统, 这当然也是涂尔干曾经沿袭并继承下来的一种传统。新康德主义的这种哲学传统, 会更加看重社会自身的理性, 这种理性对于其社会成员而言, 却往往被知之甚少, 即没有一种清晰的自觉。而功能论所谓的强制性的社会合作、强制性的规范秩序,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无非都属于“无意识的组织机制” (organizing mechanisms of the unconscious)^①, 是在一种无法觉知的状态下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集体约制, 是不知不觉中的对于规则的服从与践行, 是不为我们的意识所明确把握的连续性的行动。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 功能论者也会使用“结构”这一概念, 但是更多是用来描述, 与“固定化的模式” (fixed pattern) 有着同等的意义, 结构在这里与功能紧密相连, 就如作为骨架的结构与血肉的结合, 以此来发挥相应的整体性的功能。功能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概念, 它意味着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 有了这种关联, 功能的概念才会凸显出来。在此意义上, 功能的概念就是使得部分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的机制。可以说, 在功能论者涂尔干那里, 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区分; 而在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那里, 则是结构的分化 (differentiation of structure), 在这里, 是结构本身担当了一种解释的角色, 并且, 结构与转型的观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但是, 在吉登斯看来, 不论是功能论, 还是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 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实际上都没有在结构与系统之间做出区分, 而这一区分对于社会理论而言至关重要。^③ 在这一点上的缺失, 也构成了结构主义在解释上的缺失。在吉登斯看来,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

构主义而言，至少有下面五点局限是特别值得提出来，并需要加以深入讨论的。

首先是列维-斯特劳斯所强调的无意识的结构特性。不过，在这里，吉登斯所要与之争论的还是瑞士的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之前提出来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间的分离，这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成为心灵的无意识属性与有着自我意识的行动主体的意识之间的分离。在吉登斯看来，自索绪尔以降的结构主义者，实际上都有意地在把结构与行动对立起来，忽略了他所谓的结构二重性，特别是忽略了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种实践意识，不同于结构主义后来所强调的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它既可以是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有些行为，我们可以清晰地说出这些行为的规则，而对另外一些行为，则不能清楚地说出其中的规则，对于后者，我们一般是径直去做，不去思考和反思。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有意地将它与人的意识以及能动者分离开，分别进行解释，那么，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会无法捕捉到此类实践知识自身的重要性。而对于人类的活动而言，可能更为重要的理解是吉登斯所谓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conduct）。^① 在这里，吉登斯开始关注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社会认知能力，进而也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向了人本身，引向了人的内心世界，注意到了心灵对于外部世界的加工与转化的能力。

而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列维-斯特劳斯对于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评价上。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莫斯的理论包含一种现象学的要素，而这一点是要被抛弃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转去关注这些交换当中参与者的经验或者观念，而只需把礼物的交换看作一种“被建构的客体”，而这一客体是为互惠原则所操控的，并且是与“统计学意义上的时间”（statistical time）相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

分离的，成为跟时间要素无关的一个维度。^①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认识，法国的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却持怀疑的态度。在布迪厄看来，这样一种把交换的过程看成是一种正式结构的做法，对于理解礼物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多少帮助。^②因为，在礼物的交换之中，实际存在一个时间的序列，回赠的礼物，一定会比赠送出去的礼物延迟那么一个时间段，并且跟初始的赠礼之间在时间和内涵上都有所区分。也正是这一时间要素，才使得礼物有别于“交易”或者“贷款”之类的纯粹经济学意义的交换物。总体而言，礼物的交换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序列，即赠送礼物和回赠礼物的这种时间序列，这就使得礼物交换的全程中存在一种策略行动的可能性。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眼中，这种不可逆转的时间序列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种作为交换的符码，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种符码是不会从后来的回礼当中得到复制或重复的，彼此是有所分别的。^③

这实际上也触及了结构主义与解释学之间对立的一些问题。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能够避免直接去面对解释学的问题，因为作为纯粹形式差异的概念，配合上符号的任意性特质，使得语言成了一种关系的分离而自立的体系。但列维-斯特劳斯也深知，这样的看法实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觉得把形式在整体上从内容中分离出去是不可理解的。他处理解释学的意义语境（contextuality of meaning）和翻译的问题的方法，就是依据结构自身的“脉络”（context），从客观性上来界定结构。但是，这样的做法在拿礼物做例子时就出现了一些不足。因为，被看成是礼物的东西，无法从内部来进行结构分析，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概念，属于预先构造过的一种日常语言的概念。因此，在解释学的学者眼中，列维-斯特劳斯对于神话的结构分析，实际并没有离开“作为一种叙事的意义”（meaning as a narrative）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

② See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5 - 26.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6.

太远，这种意义是跟其再生产的背景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①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为此专门指出，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占据主导的思维方式，跟原始思维的修补匠（bricoleur）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列维-斯特劳斯多少又回到了解释学上去，也就是他认为，在所有的人类思维中，不管其所凭借的实质是什么，根本在于心灵的结构性同构（structural homology of mind）。这被吉登斯称为“社会学的康德主义”（sociological Kantianism），其并非一种清晰的认识论，而是类似于涂尔干式的原型，在表达上缺乏超越性的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

列维-斯特劳斯拒绝承认任何人类学的观察或者传承人，能够对于神话的结构达成一种认识，对他而言，不管是把我们作为媒介来构造南美印第安人的思维过程，还是我们的思维以他们的思维作为媒介而得到表达，实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可言。当然，这样的看法，是无法避开后来批评者的批评的，那就是他无意之中把西方社会的范畴强加在了其他文化之上。^②

这同时也是一种反历史的表达，这种表达建立在把所有的现象都看成是深层次认知形式的一种表面化的表达之上，因此也就对于这些现象的起源毫无兴趣，而把这些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历史产物，仅仅看成是多种符码中的一种而已，是无意识的。但是，在存在主义者萨特等人的批评中，我们了解到这样一种历史不是无意识的，恰恰相反，历史会有意识地、反思性地投射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去，即影响到社会的发展。^③

这一点进一步为吉登斯所借用，因此他强调的不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普适性的静态结构（structure），而是行动者有意识地对结构施加影响而使之发生变动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过程，这种结构化体现在人的积极主动的历史构造过程之中。^④ 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6.

② 这一批评最先是人类学家戴蒙德（Stanley Diamond）在《结构主义的神话》中提出的。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7, 264.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8.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8.

Barthes) 曾经指出, 现代社会的神话学, 有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 的实际内涵。换言之,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神话抹杀了一种阶级支配的体系。这其中有两点含义, 一方面, 由于有了神话, 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的表达, 被表征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以及“无法避免的”涌现或呈现; 而另一方面, 神话则淡化了其生产的条件, 抹去了其存在的某种背景性的或者场景性的联系。^①

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则是从结构生产的连续性角度强调了“结构的结构化”(structuring of structure) 这一特性。他一方面抛弃了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与“历时”之间的两分法, 集中关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关注差异本身, 或者说差异的生产过程。不过在这一点上, 吉登斯认为, 德里达最终又与索绪尔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只是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索绪尔的形式。在德里达看来, 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最大贡献在于, 他提出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 即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 这一点是索绪尔之前的哲学传统所不了解的。但德里达并没有彻底地对这一点加以剖析, 依旧为他的语言学保留了“符号”这一观念, 并把索绪尔的“所指”这一概念看成具有决定性的“观念”或者“意义”, 认为这是由词语和思想之间的并接关系所确定下来的意义。这就为所指可以不依赖于能指本身, 而作为“纯粹概念”或者“纯粹思想”存在找到了一种证据, 这在根本上与西方哲学传统上的理念论哲学家的思想有着一脉相承之处。^②

德里达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此类哲学的“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 这是他对西方整体的逻辑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展开彻底批判的一种延伸, 在其中他更为强调书写的重要性。在书写当中, 能指和所指有机地混淆在了一起, 在这种混淆之中, 没有一种与“超验的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s) 密切关联的哲学能够得到保留, 而所谓的意义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0.

也就无非是这样产生的，即指在意义的过程中差异的玩味（the play of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如此，书写（writing）在德里达那里就是指那些书写在纸上或者其他媒介上的文字，不是指那种具体化的物理意义上的在场，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空间化（spacing inherent）。德里达接着专门创造了“分延”（différance）这个词，用来标明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分离。“différance”这个法文词汇表明的是差异，在这种差异之中，包括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融合，也就是他所谓的“相异”（differ），或者说“延迟”（defer）。^① 即差异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延迟，是一种距离，是时空坐落的同时呈现。

在吉登斯看来，在把共时与历时之间的结构性对立抛弃之后，德里达所谓的分延，便被认为只存在于区分的时间过程（temporal process of deferring）之中，这是现在对于未来以及对于过去而言连续性的迷失（continual loss of the present to future and to past）。在这里，德里达所揭示出来的是一种“擦去”的过程，即所有的标定都处在不断的变异之中。因为所谓的当下，一旦把握住了，它就变成了过去，标记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通过“痕迹”（trace）来运行的，那是在一个标定的链条中出现的分延的瞬间。因此，在吉登斯看来，“différance 既不是一个词汇，也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否定的游戏（play of negation）；它是非，没有存在，没有‘当下的存在’”^②。在德里达看来，分延是差异中的差异，痕迹也是痕迹中的痕迹，因此分延本身就是结构，并且还是一种运动，它只能是在“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这一对立的关系中才能够得到把握。可以把分延看成是差异的系统化的操演，是差异的痕迹的系统化的表演，这是空间化过程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③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指出，历史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是一种最终会压制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1.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1.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种否定性的倾向显然被吉登斯接受了，并在他的理论表述中有所体现。

③ See Derrida, “Let Puits et la Pyramide,” in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Minuit, p. 48,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1.

差异的形而上学。对于有着内部决定论特点的事件序列的确认，终究成了“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a metaphysics of presence），一种僵化了的标志物。而德里达在这一点上，显然是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批评的。归根结底，德里达所强调的是表达，而非压制，因此在他看来，艺术与文本，并非压制时间的机器，恰恰相反，是为了表达时间，才有了艺术与文本。因此，艺术品的历史感（historicity）或者历史性，也就是艺术的时间表达，并非躺在时间那里，也不是时间的痕迹——这些都只能被用来引导出一种历时性的创造。历时性只可能在差异中得到体现，在差异中得到表演，并在这种体现与表演之中，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可能的解释空间，这成为德里达所谓分延的核心。^①

吉登斯对于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哲学的解读，显然有把既有的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现象学的解释学传统结合起来的企图。因此，他注意到了德里达的表述或者表达，并希望从德里达那里，为结构主义寻找到一种新的解释资源，或者开启一扇通往变动不居的世界的大门。

与此同时，吉登斯还特别注意到了朱利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这位符号语言学家的思想。作为闻名法国的文学杂志《现状》（*Tel Quel*）的编辑之一，克里斯蒂娃曾经对于作为生产力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她强调，符号的意义而非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对于从索绪尔到布拉格学派乃至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语义学的一种超越。在克里斯蒂娃看来，系统的语义学及其现象学的基础都需要经受一种批判，这种批判不仅要注意到意义本身，还要注意到根本是言说主体在说话，这是一种有关正在言说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的理论，是重新回到了主体本身及其意义的生产。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如果对胡塞尔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概念做一些适当的修改，就能够使我们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分，跟一种意识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即可以把意识当成“由客体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2.

构成的心理活动” (made up of object-constituting mental acts) 来对待。在这个意义上, 意识就不再是难以名状的“实质”, 而是一种“有着身份安排的”主体的预期性的活动 (the predicative activity of a “positioned” subject)。与此同时, 涉入到此类活动中去的主体的能力, 也就无须借助胡塞尔所说的现象学的还原来加以解说, 而是可以借助对语言的把握来加以说明。并且, 要以一种发生学的对于独立的意识认同的发展, 以及反映出无意识的碎片化本质的解说, 来取代胡塞尔所提出的那种抽象而超验的自我的概念。

克里斯蒂娃还进一步强调, 应该把现象学的“活着的经验” (lived experience) 及其“冲动” (impulses), 与先验于主客体之分的生产性的以及/或者破坏性的弗洛伊德语义学的“冲动”区分开来。这显然是在借用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 以此来对“主体的生产” (production of the subject) 给出一种说明。因为, 在儿童心理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种作为主体的“我” (I) 逐渐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过程, 最为重要的是主体/客体 (subject/object) 之间的分离得到了社会的固化。从发生学意义上而言, 幼儿在跟母亲的互动过程中, 有一种离开母亲而关注外部世界的驱动力, 这同时也是一种意义获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符号取代了真实的关系, 而成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意义符码。这是一个双向的意义获得, 一为纵组合的 (paradigmatic), 一为横组合的 (syntagmatic)。在吉登斯看来, 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纵组合的意义获得, 其核心是对于“正在言说的主体/外在存在” (speaking subject/outside) 的象征性关系的结构化; 而第二个结构性的意义获得指涉的是“主体/断言” (subject/predicate) 之间象征关系的结构化。^① 上述这一区分, 与吉登斯自己后来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建构中, 他更加强调行动的反思性监控, 这实际上从另外一个侧面把人的主体性又带回到社会理论的建构中来。在这种建构之中, 结构主义往往会排斥这种主体性的存在, 但是, 显然结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32 - 33.

主义并没有把社会假想成社会以外的东西，而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给予了社会以真正的社会学的定位。

吉登斯显然注意到了结构主义的一些优势，并试图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去进一步发展一种包含着自我反思性主体的社会理论，即结构化的理论。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主义至少有七个方面的优势值得社会理论在分析时加以注意。

第一，结构主义的理论注意到了，不论是在语言还是在社会的构成当中，由差异而造就的空间分化的重要性。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德里达对此都有专门的著述，如德里达的分延指涉的是一种书写的空间分化 (spacing of writing)。这种差异后来在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中被一分为三，其一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规则上的差异，其二为时间上的差异，其三是空间上的差异，这构成了德里达所说的“分延的三重内涵” (three fold connotation of différance)。^①

结构主义的第二点优势就在于，它试图在其分析中加入一个时间的维度 (a temporal dimension)。对此，索绪尔注意到了语言的纵组合面 (paradigmatic aspect of language)，这一点在功能论中是有所缺失的，在功能论那里，研究者强调时间仅仅是历时性的或者动态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所提出的纵组合/联想的对立 (paradigmatic/associative opposition)，在功能论那里肯定就是缺乏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无论是德里达还是列维-斯特劳斯，似乎都还没有发展出有其自身理解的一种对于社会变迁的结构主义的理论。德里达实际上陷入到了历史主义的桎梏中去，否定历史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为了避开“在场的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of presence)，而对任何历史的解释都加以排斥，并且把“万物皆流”这一点强调到了极致，以至于否认静态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同样排斥一种历史的解释，认为历史的理解，不过是其他符码中的一种符码而已，这在一定意义上，阻止了在对社会变迁的解释上进行历史理解的可能性。在吉登斯看来，结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6.

主义者的思维，实际上并没有发展出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关于其自身生产状况的自我理解。^①

结构主义的第三点优势在于对历史主义的超越。在这一点上，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并没有完全错，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是结构主义对于历史主义的极端排斥造就了一种在解释上的相对主义。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强调指出，“时间上的距离”（distance in time）在某些方面可以等同于“民族志的距离”（ethnographic distance）；并认为，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时间的可逆性，这种可逆性进而可通过它们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分析而获得，即先进与落后、富有与贫困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人为的驱动。这种思考的模式在吉登斯看来，实质就是在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提出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②

结构主义的第四点优势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对于社会的整体性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显然功能主义是无法与之相媲美的，因为功能论强调的乃是社会为各个分立的部分（个体、群体以及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但是，结构主义却注意到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真实存在，并注意到了在这个系统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些特质。而到了吉登斯那里，他则进一步强调，可以对结构主义的这一点给予进一步的发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结构（structure）与系统（system）之间做出一种严格的观念上的区分。^③

结构主义的第五点优势在于对主客二元论的超越。尽管这是结构主义之后欧洲哲学的基本趋势，但是结构主义对于二元论进行了一种最为全面的消解。不再是以新的主观主义去取代客观主义，或者相反，以某种新的客观主义来取代主观主义，因为这些都无法实现对于笛卡儿二元论的真正超越。最为根本的，当然也是吉登斯最为强调的，就是把思维上的二元论转化为一种二重性（duality）去加以理解，只有这样做，所有的问题似乎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6.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7.

才可以迎刃而解。^①

结构主义的第六点优势表现在其对于人文主义的批评上，即那种过于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论调和传统。不过，在结构主义中，对于那种主体中心的消解的倾向性也要小心地对待，即不要走到人文主义的反方向上去。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有关主体中心的消解，也是对于把意识看成要么是既定的，要么是自明的哲学观点的一种逃避。因此，真正的结构主义者应该不会排斥人类行动的反思性构成。吉登斯在这里把反思性的概念纳入到社会理论的话语中来，也就是他所谓的要在社会理论的话语之中重构人的反思性，而这一点曾经为之前的社会学家所忽视。^②

第七点优势就是对于文化对象的生产的分析，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有永久性的贡献。不过，在吉登斯看来，要想使这一点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就要抛弃古典的结构主义所持守的一系列对立，它们源自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所确立的对立，即语言/言语 (langue/parole)、共时/历时 (synchrony/diachrony)、能指/所指 (signifier/signified) 等，并且，还要抛弃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观念。

在这种对于结构语言学的抛弃当中，吉登斯试图借助结构主义的坚硬内核发展出一种有关符码的理论，或者说有关符码生产的理论，这种符码生产的理论建立在一种更加宽泛的社会实践的理论之上，并与诠释学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③

第五节 迈向结构化理论

正如吉登斯所指明的，今天的社会科学明显地带有 20 世纪早期在欧洲社会发展出来的那些观念的印记。因而，今天在使用这些观念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层，即随时需要具备一种批判的眼光。20 世纪留给我们的有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7.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8.

关社会理论的遗产，大体可归为如下两种，即解释的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与功能论（functionalism）。^① 在解释的社会学和功能论这两者中间还存在结构主义，可以打个比方说，解释的社会学悬在天上，功能论落在地上，而结构主义恰恰勾连起天与地两端。借助这种解释、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勾连，吉登斯发展出跟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

对于什么是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实际上说得很明白。结构化理论始于一种空缺，也就是当时社会科学中还缺乏一种行动的理论（a theory of action）。^② 说白了，行动关注人的认识、理性、动机以及意图等。后来在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则进一步认为这就是一种“心态”，进而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③，实际都是以此来弥补功能论本身的一些解释上的空缺，这特别体现在费孝通晚年的那种对于功能论传统的社会学反思上。^④ 这种对于行动本身的关注的空缺造成的结果便是，社会学以及一般社会科学对于制度分析以及社会决定论过度依赖，而对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哲学及其意义解释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在有了这样一种觉醒之后，行动着的主体（acting subject）便成为一种有着其自身认知能力的行动者（agency），其活动是连续的，并且身处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之中。这样，意图、理性和行动等就不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团，而是不断流动着的，由此而构成一种吉登斯所谓的人格分层模式。它受到三种关系的制约，即无意识的关系、实践意识的关系以及话语意识的关系。而这中间，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乃是构成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此概念将结构与行动者联系在了一起。^⑤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 这种区分在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以及《社会与政治理论研究》（1977）等著作中都有较为清楚的说明。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

③ 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④ 参见赵旭东：《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6）。

⑤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 256.

这样，行动者的概念就重新在社会理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具有了一种新的行动哲学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与体系的概念也有类似的新意。确实，结构主义者对于结构的理解跟功能论者对于结构的理解之间的差距可能还是很大的。但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二者在使用结构和体系时的模糊性以及相互的可替代性，吉登斯恰恰想要说明的是在这两者之间，也就是结构和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一句话，结构与行动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形成这种依赖的基础是一种时间序列的存在，而这时间的序列隐含着结构，同时又为行动所实践，二者相辅相成，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吉登斯那里，我们同时也读到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这位当代德国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有关“存在”与“时间”的理解，也深刻影响着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形成。在这里，吉登斯借自海德格尔的不是其存在的本体论，而是时空坐落下的社会体系的理解。

在那一社会体系之中，人朝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走去，即死亡，而时间在其中勾连着前后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仅仅是偶然存在于空间（being-in-space）和存在于时间（being-in-time）中的，这便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中的社会构成。如果是这样，时间仅仅是多个当下（nows）的持续与延伸，并与空间偶联性地扭结在一起，那么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去理解时间为什么没有倒转回去的可能，而只有把时间理解成一种“可能的成长”（becoming of the possible），时间的“进程”（progression）才变得清晰化了。^①

不过，吉登斯并不赞同现代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这一说法，而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以及解释学的社会学都是对此举双手赞同的。在他们看来，社会跟语言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吉登斯则更为强调语言跟社会联系在一起借助的是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这一点。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之间就可以相互融通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

了，因为二者都强调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依靠的是实践（praxis）这一向度^①，而这又跟“语言的限度”（the limits of language）本身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语言不是语言本身，语言的意义完全在于其使用，是在用之中体现出语言特性，即“语言天生地融入到要做的事情上去：作为‘意义的’语言的构成跟作为连续性的实践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构成是无法区分开来的”^②。

在这里，实践就是指一种具有实践意识的实践，这种实践意识将传统社会理论中的两种二元论思维勾连在一起，即自主的二元论与决定的二元论，由此便有了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论思维的出现。还有一种二元论是意识与无意识的认知模式之间的二元论。在这些二元论的对立解释模式之中，吉登斯抽身出来，明确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背后所对应着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也可以这样说，这一概念真正应对着的乃是人的社会生活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一向度，并且社会学者为了对此给出一种解释而发展出了这一概念。由这一概念去透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就不再是社会结构本身，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涌现的那种结构，“结构既是实践的再生产的媒介，也是其结果”，进而言之，“结构同时进入到行动者以及社会实践的构成之中，并且‘存在’于生成这种构成的瞬息之中”^③。

借助如上认识，并在结构二重性概念的基础之上，吉登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的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其基本的前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每一位社会行动者都知道许许多多他或她作为其中一员的那个社会再生产的条件。”^④ 在此基础之上，理解行动的意义才变得更加有必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

② 原文：“Language is intrinsically involved with *that which has to be done*: the constitution of language as ‘meaningfu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forms of social life as continuing practices.”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

③ 原文：“...structure is both medium and outcom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practices. Structure enters simultaneously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gent and social practices, and ‘exists’ in the generating moments of this constitutio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

④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要，忽视了这样一点认识，就会像功能论和结构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一切的认识都可能是一种片面的理解。确实，人们在社会中行动，这个社会也是他作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不管他是属于还是不属于这个社会，只要他身处其中，他便会有对这一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感知，而这些方方面面的感知，成为他进一步做出反应的基本条件。^①

这样的人就被吉登斯称为“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这一社会行动者，其自身一定是有社会认知能力的，并且，他们所认知到的社会体系，又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来加以构造和生产的，在这样一种吉登斯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中，行动者的认识是依靠知识来引导的，并进而去引导其行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个人而言的知识，很多时候，并不能清楚地被意识到。比如，人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做了也就做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情况确实大量存在，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无意识的认知，是人的意识所无法真正捕捉或觉知到的，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之为“支援意识”，即不能被作为行动者的我们清楚地觉知到，但却在支撑着我们思考的一种弥漫性的、一直在持续发挥作用的意识状态。^② 总之，这种不能够为意识所清楚把握的认知能力，被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家称为“内隐的”，也就是行动者自己查找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的一种认知。^③

而在社会学的理论中，人们更加乐于将这样一种无法为行动者所清楚觉知的意识称为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无意识，即在“做但意识不到”的意义上的无意识。吉登斯在此概念基础上专门提出一种与之相对的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要求行动者能够在话语层次上加以表达。在吉登斯看来，大凡人类，都有某种程度的对于他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体系的一种话语上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

② 参见黄光国：《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87页，台北，心理出版社，1995。

③ 参见赵旭东：《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352~35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侵入，这种侵入本身就是个体对于社会的一种贡献。在这里，吉登斯特别强调的是话语的侵入是一种知识（knowledge）而非信念（belief）。这一区分实际上很重要，因为这一被吉登斯特别强调的知识实际上隐含有一种双向性，即共同拥有的知识，这是社会分析者所赖以描记的知识，一般也是不会更改的知识，是近乎常识的知识，而对于社会生活的描记便要依赖于这种知识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知道一种生活的形式，便是在理论上要能够参与到其中去。眼睛所看到的東西、耳朵所听到的東西以及鼻子所闻到的東西，实际上都是一种相互性的共同知识。这里便出现了一种借助知识的控制，这是吉登斯所称的“控制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trol）这一概念的核心，即在集体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一种介于行动者（agency）与权力之间的内在的相互关联与相互钳制。而这里的权力或权力关系，说到底也无非是指自主（autonomy）与依赖（dependency）之间的相互约制性关系。这种约制关系，一定是一种双向发挥作用的方式，被服从者便是融入到这种服从关系中的行动者或支配者有了一定的对其他人进行支配的权力。而同样的，服从者也会审时度势，尽其所能地利用周围的环境条件和资源来占有一定的控制力量，而社会体系便是在这样的权力争夺之中不断地向前演进的。

在此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至关重要。吉登斯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制作背后的文化实践，也就是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非所谓与科学相对立的象征体系的某种特例，而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义上的一种“文化霸权”（hegemony），尽管吉登斯并没有直接去援引葛兰西的著作。

在此意义上，所谓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即统治群体和阶级使他们自己的生活旨趣成为一种似乎带有普遍性的人的旨趣。这种能力转而成为统治中的一种资源形式，而揭示这种支配形式的社会学，便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学。尽管这一点早为马克思所参透，认为社会统治的媒介之一便是意识形态，但后来葛兰西则更进一步地把这一点加以发挥和延伸，最终形成了一种对于文化及其霸权的批评。在这里，吉登斯特别

强调，自己所延续的是马克思的思路，而非功能主义的思路。在一定意义上，吉登斯以这样一种彻底决裂的姿态与功能主义做了最后的告别，并特别将他的一本有关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的文集戏称为“非功能论者的宣言”（non-functionalist manifesto）。^①由此可见其彻底抛弃在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功能论的决心与姿态。对于社会学的功能论——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一派的冲突功能论的主张——吉登斯都是持一种无情鞭挞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功能论以及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论的形式，实际上都是看重行动的无意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ction），注意力也集中在并非有意的行动的结果上，这与几乎完全忽视无意图行动的结果的行动哲学（action philosophies）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②

不过，吉登斯还是认为，社会生活演变的历史说白了就是其从人类的意图之中逃离出来的历史，借助他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他认为，这一逃离的后果，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因果的关系而直接地影响到人类的行为，这种影响构成了结构的结构化的出现。与之相反，功能论则是为了社会项目再生产的存在，而将这样一种折返回来的影响力，翻译成了一种所谓的“社会的理性”（society's reasons）。但是，依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社会系统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目的、理性或者需求这类概念的，有的仅仅是个体在行动，恰恰是因为个体的存在，才有了这些所谓的目的、理性和需求。

这也许是吉登斯开始反省功能论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分离点。从这里出发，他开始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的探求和建构。其中他所坚信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一种对于社会再生产的解释，如果是说社会系统有着一种目的论，那它一定就是一种无效的解释”^③。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将我们的眼光引到了作为行动者的具体的人那里去。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7.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7.

第二章 结构化与社会再生产

在本章第一节中，著者以法国的德里达以及英国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为开端，描述吉登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如何被这二者激发，从而构想出一个结构化理论的。在吉登斯看来，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在理念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对于结构主义的超越却并不相同。相较而言，吉登斯似乎更为推崇维特根斯坦的理念，并据此对德里达有关分延的理论做出了批评。在第二节中，著者论述了吉登斯在试图化解西方世界有关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认识论困境时所采用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为此，他转向更为关心人本身的问题的“解释学”，以一种有意的拒斥和不得已的接受来理解解释学，并借用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主要涉及语言、历史等维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学是吉登斯建构新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在第三节中，著者论述了学界围绕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所进行的争论。对此，吉登斯反对结构主义者对这一哲学公式所做的解构，认为某类实践性的以及情境性的知识绝非像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意识的。随后指出作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作者的书写，与仅仅作为语言的生产的文本之间存在一种分野。理解文本，需要将之放入其存在的社会情境之中，也不能忽视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理解。而社会理论的迫切任务，是在不陷入主体论的前提下推进“主体的复苏”。在第四节中，著者论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的核心意图之一是要把人的行动的观念与社会分析中的结构解释结合在一起。在解读行动与结构时，象征互动论、功能论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行动哲学各自采用了不

同的策略。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就是建立在一种更关注行动展开的过程及其后隐含着的权力的行动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并在其与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化理论之间，寻找到某种结合的契机。随后他还提出了社会活动的三个面相理论，即社会活动是时间性的、实用性的、空间性的三种区分的瞬间完成。在第五节中，著者主要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建构的基石——结构、系统以及结构化这三个概念做出解释。随后，吉登斯区分了制度与社会系统，并把制度放置于社会生活的时空背景中，从而使其得以重构。这种重构，隐含了一种制度的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结构通过编码了的符号意义而得以体现。最后，著者分析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其他理论流派的交锋、融合与发展。

可以这样说，结构化理论自身包含着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也被吉登斯称为一种“控制的辩证法”，即社会如何再生产自身的一种运行机制。借助这一辩证法，吉登斯试图去超越西方既有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结构功能论的局限以及解释学解释路径的固有限度。在此种超越之中，法国的德里达以及英国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刺激了他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发挥，他试图在一种有着人的认知参与的灵活的实践范式中，发展出一种更加具有变动性的、可以解释更多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结构化理论。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德里达和维特根斯坦有着不一样的对于结构主义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可能是激发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构想的一个重要契机。

第一节 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

吉登斯有意把德里达与维特根斯坦放在一起谈，核心目的是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实际上可以帮助纠正结构主义者自身所具有的弱点，这种优势在德里达的身上也一样显露出来。^① 而吉登斯特别指出，德里达所批判的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而他所发展的一种解构的技术（technique of deconstruction）跟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在理念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二者实际上都认为，把意义或者所指，看成在某种方式上与言说相伴而生的一种事件、观念或者心理过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彻底抛弃。

德里达的哲学中一再强调的分延，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而言，也并不陌生，因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所强调的意义的产生与维持，正是基于“‘运用中的’差异玩味”（play of difference “in use”）。不过，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有所不同，前者并没有发展出一种清晰的观念，即把差异作为一种否定（difference as negation），而后者则明确地在这个思考方向上做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33.

着努力。^①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差异的系统，而词语的意义，并非通过一个个孤立的声音或者标记的性质来构成，而是通过作为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中的一分子的分化（differentiation）来获得一种认同（identity）或者同一性而实现的。而认同的获得与维持，借助的又是不断的重复（repetition）。在语言意义的获得过程中，时间被整合到这一意义之中去。也就是说，词语的意义从来就不体现（present）在言说之中，而仅仅存在于生活形式中间所实现的连续过程之中。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过去西方形而上学过多地关注对于虚幻本质的追求，也就是对于符号本身意义的追求，但是，符号并不表达符号出现之前的意义或者概念。换言之，词语或者言说，并不包含观念，而语言的意义实际上是跟实际的生活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②

因此，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中，他会更多地谈论到“语言的限度”（limits of language）这一问题，也就是去追问：哪些是我们所不能够言说出来的（what cannot be said）？什么东西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什么情形下，呼之欲出的意象无法脱口而出？这些都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思考中孜孜以求的东西，他实际是在追问语言和社会乃至和文化之间的关联。但这里需要提醒的则是，不能说出来并非就是不能够说，而是究竟可以说些什么，特别是在散文体的格式下以及在世俗的言说之中，究竟可以说些什么。因此也就意味着，语词的意义与“构成生活形式的实践”（practices that comprise forms of life）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而这样一种认识，在吉登斯看来是社会理论对于结构主义取向最为重要的超越。在此意义上，“所不能够言说出来的”内容跟精神分析所谓的无意识有着类似之处，也与德里达所说的书写造就的差异或分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③ 由这一点认识出发，吉登斯对于德里达关于分延与书写之间关系的看法曾经给出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4.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34 - 35.

了自己的评论。

吉登斯认为，德里达强调“书写表达了分延”（writing expresses *différance*），它创造了一种空间分化，而恰恰是这种空间分化，使得言说成为可能，换言之，差异便是一种言说形式，即从时间和空间上给出了一种因为差异而确定下来的言说。但关键的问题是，分延又是一种不可说，它发生在言说的行为之前并赋予言说以形式。显然，形式的结构先于言说行为本身。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德里达意义上的所谓书写的空间化（spacing of writing），最终还是使得索绪尔语言学自身的偏见从后门溜了进来。因为，德里达所说的这种“书写的空间化”，无非是把时间的维度注入到了索绪尔所说的语言（*langue*）形式差异的空间化之中去，分延就成为以结构化来加以解释的语言，它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种对接，即“所不能够说的”（what cannot be said）与“已经做的”（what has to be done）之间的对接。

因此，德里达所谓的分延就是一种“能指的空间化”（the spacing of the signifier）。在吉登斯看来，语言是“情境性的产物”（situated product），是在标记与标记的痕迹之间并置的产物。当然，这也是在重复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即语言这种情境性的产物融入了语言游戏的时间、物质与社会的空间化。^① 上述这些评论构成了吉登斯对于德里达理论的第一点批评。

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知道了一种语言便是拥有了作为某种实践关系的一个客体世界（an object-world）的知识，词语与世界的构成体现着一种对应性。与此同时，了解一种语言，就能够参与到承载此种语言的生活形式中去，语言在其中得到了表达，语言同时也在表达生活。语言还有着一种空间分化的能力，这是在分化的社会时间的组织之中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在能指/所指关系的抽象秩序中表现出来的。这便在语言的分析与解释学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在这里，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而言，解释学即是指“作为语义学秩序的语言的游戏媒介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media-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5.

tion of language-games as semantic orders), 因此, 意义的获得就体现在了生活形式的关系系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德里达发展了胡塞尔在谈论超验现象学的还原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 时所谈到的互为主体性的意义获得。他比胡塞尔更为清晰地指出, 书写是一种纯净化了的结构化 (purified structuration), 它使语言的背景和语义丧失并且无法恢复。而对于书写下来的文本的解构, 就是在有意地彰显文本的生产性 (productivity) 能力, 但是这样一种生产除了“纯粹差异” (pure difference) 的游戏之外, 其本身又是空洞的。在德里达看来, 书写就是一种跟所有东西的决裂, 但是书写本身又可以将书写下来的文本与客体世界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种决裂由书写的空间分化而来, 这种空间分化构成了书写的符号, 而在德里达看来这一点在所有的语言中都能得到发现。^①

在德里达看来, “符码的内在认同” (internal identity of codes) 保证了这些符码自身与所有的参照内涵相分离, 但是, 这又必然引出索绪尔语言学的老问题, 即把差异看作纯粹形式的那种看法。在吉登斯看来, 德里达没有注意到的是, 即便是一个符码的认同, 它也指涉了某种指涉要素, 而德里达在谈论符码或者书写时, 认为它们都是由其“内在认同”所构成的, 这完全消解了参照的关联性。由此, 书写的空间分化就成为周而复始、没有尽头的重复劳作, 是一种在缺失中的重复。在对于“作为意义本质的观念的‘在场’” (the “presence” of the idea as the essence of signification) 的谴责之中, 德里达从所指退回到能指之中去, 但却并没有极端到否认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

但是, 在吉登斯看来, 如果维特根斯坦对于意义的解说是正确的, 那么,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分就必须被彻底地抛弃掉。因此, 语言或者意义是无法用这样两分的观念解释清楚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关注能指本身的问题, 关键的一点倒是, 任何类型的物质形式都可以参与到指号过程 (semiosis) 中去, 即能够承载意义。这里, 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核心问题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6.

乃是，所指因为从物退缩出来而进入到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差异的游戏中去，这无法实现一种对于所指的关注。而维特根斯坦强调要回到实践中去，回到表达与被表达的语词使用中去，这样一种转向不是寻求词语的意义，而是要注意到词语的使用，特别是在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获得。维特根斯坦在最后提醒到，能指、概念与所指的客体是融入了构成生活形式的实践的，而这一点，在吉登斯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有可能超越原有结构主义的局限认识的根本所在。^①

第二节 吉登斯与伽达默尔

吉登斯试图化解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西方社会认识论的困境，并采用了其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的做法，避开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人行动这样的两极，把焦点集中于结构与行动这两者的互动与勾连之中。这种互动与勾连的具体形式就是我们现代人借助于“一种扩展的反思性”而建构出来的有关世界是什么的理性化的知识体系。^②

与此同时，吉登斯对“解释学”（hermeneutics）的观点也抱有一种同情之心，因为解释学更为关心人本身的问题，而非把注意力集中于借助方法来达成真理的实证论上。^③谈到解释学，必然会联想到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这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哲学标志着一种“本体论的转向”（ontological turn）^④，这种转向是对吉登斯所谓的“正统的共识”（the or-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p. xxi.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xx.

④ See Hamish F. Dickie-Clark, “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Jon Clark, Celia Modgil & Sohan Modgil, eds., *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0, p. 146.

thodox consensus) 的一种反抗^①。而这种反抗又是对人的存在的非理性层面的探求和解释，恰恰在这一方面，科学主义者流露出一种对人的理解的欠缺。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归纳起来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首先他强调有一个由意义组成的传统的存在。这些意义是先于经验和解释的，因而是一种预设或预先的判断，先于任何审慎的反思和客观的思考。这些预设和预先的判断，会经由社会对下一代的养育过程而得以传递。并且，其后的传统变迁都会以这些意义为基础，对任何面目全非的所谓传统的理解，最后都离不开这些预设和先前的判定，在这个意义上，偏见是先于判断而存在的，恰如其所言，“远离于其判断的一个个体的偏见，才是其存在的历史现实”^②。因而，理解不是无预设 (presuppositionless) 或者说与价值无涉 (value-free)，而是保持与延续到今天的在过去以及现在情境下的作品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

社会存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历史性” (historicality, geschichtlichkeit)，这种历史性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过去缘何在今天仍很活跃，且具有效力。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是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的一种历史的产物，属于并融入一定的社会传统。

这种历史的情境性 (historical situatedness) 的观点，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在我们准备给出理解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视角使得主客观的二元论的区分变得毫无说服力。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过程就是在特定情境中的解释者与其固有传统之间的对话，由此而造成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特别的交融，这种交融使得行动者能够参与到社会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中去，从而构成一种当下的社会生活。

人的社会存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语言的使用。强调科学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对于语言的精确性和工具性不会存有任何疑问，并且会把语言看成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35 - 238.

② Hans-George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J. C. B. Mohr, 1975, p. 261.

达成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极为有益的工具。但伽达默尔却不这样认为，他强调，恰是语言的使用，让我们更加属于某个传统以及某个历史的情境。因为，语言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某种传统遗产和当下经验世界的大门。进而言之，语言扩展了我们理解的视野，并由此而超越了我们最初社会化时的种种限制。因而，语言并没有让我们成为一种固定的世界观的囚徒，而是让我们脱离开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的局限。^①

现在我们来，吉登斯是在什么意义上借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可以说他是在一种有意的拒斥和不得已的接受中理解解释学的。他一方面指出了解释学在一般意义上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应该有一种“诠释取向社会理论”（hermeneutically informed social theory）存在。^②或者说，解释学成为吉登斯建构新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或支援意识^③。

伽达默尔对于社会存在的上述三点认识，都可以在吉登斯的理论叙述中找到痕迹。先来看语言的问题。吉登斯和伽达默尔都认为，语言是达成人类理解的基础。因而吉登斯说，“理解是跟语言联结在一起的”^④，所以不应该把理解（Verstehen）看成“社会科学所独有的进入到社会世界中的一种专门方法，而要看成由其成员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条件”^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对于语言的理解是何等相似！

接下来再看吉登斯对于历史的看法。在伽达默尔喜欢使用“历史性”

① See Hamish F. Dickie-Clark, “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Jon Clark, Celia Modgil & Sohan Modgil, eds., *Anthony Giddens: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 pp. 146–14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ed.,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2, pp. 5–8.

③ “支援意识”概念是由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1964）一书中所提出的，黄光国曾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从事学术创作的时候，必须先熟悉西方社会科学中重要的各家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志于从事本土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更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冶于一炉’，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再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从他在本土社会的生活经验中找出他想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成为他‘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中苦思竭虑的焦点。”黄光国：《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87页。

④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 55.

⑤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 151.

(historicality) 这个词的地方，吉登斯则使用“历史感”(historicity) 这个词。在吉登斯看来，所谓历史就是通过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而使发生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结构化。^① 他还认为，在研究和书写“时间段中的事件”(events in their duration) 上，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之间只有劳动的分工，而无逻辑和方法上的分别，因此，“历史研究便是社会研究，反之亦然”^②。伽达默尔将历史放置在有着一定传统的时空坐落中来加以理解，并认为时空坐落、行动者的同时在场以及反思性的觉知，对于互动流的控制极为有意义。吉登斯实际上接续了这一看法，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与在场和缺失之间的彼此交替相联系。^③ 这同时也是理解作为过去的历史以及作为现实的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角。

在过去如何进入到现在这一问题上，吉登斯与伽达默尔也有着一致的看法。伽达默尔喜欢用这样两个词来描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其一为“有效力的历史意识”(eff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其二为“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前者一般是指过去总是对现在发生一种有效力的影响的独特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在流传至今的传统与依据当今的际遇而对这种传统所做的批判之间，保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过去的影响在今天便具有了一种效力或影响力。这种对传统的质疑，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偏见，并在一种“永远没有完成的过程”(never-to-be-completed process) 中超越我们视界的局限并使之得到扩展。因此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套用伽达默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天的视界，没有过去就根本不可能构成”^④，而且“把这种融和的成就，指定为是有效力的历史意识的任务”^⑤。这才可谓一种对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具有灵动性和完备性的理解。

而吉登斯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当然也没有跳出这一灵动而完备的观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 362 – 363.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 357 – 358.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 132.

④ Hans-George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p. 289.

⑤ Hans-George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p. 290.

点之外。他强调，历史意味着变迁以及运用历史的知识去改变历史。这可谓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突出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在这一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吉登斯是在解释学的意义上使用“传统”这一观念的。在这里，吉登斯特别强调一种“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主张有一套由信仰、预设和偏见所组成的所谓传统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会传递给后来的人，从而保证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秩序井然，这由一种传统与现在之间的“相互性知识”（mutual knowledge）而构成。在这一方面，吉登斯的“双重诠释”和“相互性知识”的概念，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传统的知识在再生产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在更系统化、更技术化的知识发展中去理解社会本身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①

吉登斯是在摧毁“主体的帝国主义”以及“社会客体的帝国主义”的双重意义上将解释学借用到社会理论之中去的，这一借用的目的是把社会研究的视角引向“在空间和时间上排序的社会实践”^②，这种视角需要各种社会要素的融合。因此，才有吉登斯所谓的“解释取向的行动者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是对“在空间和时间上排序的社会实践”加以研究的学术旨趣的必然要求。因而，吉登斯选择解释学作为隐藏于其理论建构背后的弥散性支援意识是有其学理上的根由的。因为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强调一种“视界融和”，直白地说就是对看似不相容的观念进行整合与调和。而吉登斯社会理论背后的折中主义选择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解释学的传统有了一种暗合。^③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无疑也让吉登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方法论机会主义的包袱，对于吉登斯本人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难以卸下的包袱。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p. 158 - 159;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p. 284, 374.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 2.

^③ See Hamish F. Dickie-Clark, "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p. 154.

第三节 主体中心的消解与文本

就一种主体的理论建构而言，作为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对此有过极为精到的分析，并影响了后来有关主体的理论的发展。不过，吉登斯的分析与之有所不同，在这一方面他更加强调一种“主体中心的消解”（de-centring of the subject）的社会过程。^①

在结构主义者的论著中，人文的特征受到极端的诋毁与排斥，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对意识或者主体性（subjectivity）本身缺乏一种信任。这种不信任预先就隐含在了结构主义鼻祖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特别是他那种语言（langue）先于有着个人化、主体性特征的言语（parole）的认识。此外，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不信任还受到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他们都对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主张有激烈的批判，特别是对笛卡儿所谓“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一哲学公式中的“我思”（cogito）的批判。

笛卡儿哲学中所谓的“我思”，实际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提问，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探寻，是对于自我意识超越性的一种自信。但是，结构主义者统统解构了笛卡儿的这一哲学公式，使主体意识的神圣性遭到瓦解，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为主体性基础的意义实际不过都是由语言构成的。对这一点，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15）说得再明白不过，那就是认为“我思”的活动是空的，需要将符号以及对这些符号的解释作为媒介物。^② 这样，一种真正结构主义的看法就是，不把意识看成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强调对于其产物给予一种发生学的解说；意识也不被看成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8.

^② See Paul Ricoeur, “The question of the subject,” in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244, from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8.

是一体化的，或者本质上无法分割的，而是看成分裂的以及碎片化的；而大写的“我”（I）是通过所谓“他者的话语”（discourse of the Other），也就是通过意义化（signification）来实现的，结构关系在其中得到显现。^①

先前提到，克里斯蒂娃试图借此来超越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以及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她所强调的是“一种对于意图性意识的现象学处理”（a phenomenological treatment of intentional consciousness），并借助于对“主体的定位”（positioning of the subject）的诠释来超越早期结构主义的观点。但是，吉登斯对于克里斯蒂娃的批评是：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对行动者（agency）这个概念给予一种恰当的让人能够明白的行动哲学的理解，她的“有预期的主体”（predicating subject）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超出“无意识与意识”这一二元对立太远，体现出来的依旧是笛卡儿哲学的影子，依旧是结构主义对于主体的语言学关系的理解，即“我思”表达的是一种语言结构，此种结构先于或者处于自我意识或主体的反思性能力之下。而所谓人之主体性，无非就是有意义的结构之间的交叉所导致的一系列运动，但反思性的、活动性的主体，在此类分析中，却再也不见踪影了。克里斯蒂娃确实强调了人的言语行动应该被看作赋予意义的实践，广而言之，乃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动（signifying activity）。但是，结合了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吉登斯要指出的就是，“不存在赋予意义的实践；应该把意义理解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整合要素”^②。

这是把笛卡儿的“我思”（cogito）重新加以强调的做法，也就是“我思”是先于意识中的主客关系的。在这里，吉登斯的社会学要重新强调的不仅是笛卡儿的“我思”这一向度，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把存在（being）与行动（action）连接在一起来理解主客体关系的那一向度。

吉登斯实际是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而注意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行动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conduct）本身就构成了社会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8.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39.

生活反映的时间性特征。如此，理性和意图就不再是隐含在社会行动之下的确定性的当下呈现，而是在此行动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出现的示例。在吉登斯看来，不应该把人类行动的意图性特征看成是断裂的以及分离的，而应看成在时间上有连续性的意图之流；并且，也不应该将其看成是伴随着行动而发生的一整套意识状态，而要将其看成是在话语中被有意识地重新构造的意图。与此同时，把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与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联系在一起，我们就会理解，日常话语能够表达出来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往往是不精确的那一部分。此类实践性的以及情境性的知识，绝非像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意识的，语言在这里就是一种媒介，是沟通人与社会实践的媒介，这便是所谓的知识的实践性的一面。尽管在社会生活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们掌握这些知识技能的熟练性导致了它们似乎是无法被觉知的，但绝对不是无意识的。^①

因此，作为具有主体性意识的作者的书写，与仅仅作为语言的生产的文本之间便有了一种分野，这一点是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的现象学所共同享有的一种认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可以说最适合于做这种结构性的分析了，因为很显然，神话是没有作者的，并且，只有在传统中，神话才能够得到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文本自身便具有了一种自主性，其借助书写与交流之间的分离，来使文本与其作者相互分离。这便出现了对于文本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是作者创造了文本的核心意义，因此，对于文本就没有了一种阅读，而是有多种的阅读。^②

如果是这样，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便有了一种新的视角。一般的文学批评或者思想史对于文本的解读，大多隐含着一条假设，认为人的意图或目的决定着文本的意义，或者文本经由人的意图的解释而获得了意义，也就是少数的对于规则的特定解释决定着对于意义的解释。但规则是对应于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0.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1.

实践而言的规则，这些实践又是散漫的、并不确定的社会生活的表达，而这些散漫的社会生活，一定不会固定化地受到某一条规则的约束，这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能够提供给社会学理解的最为重要的一点认识。

此种认识，实际上启示了我们要重新去看待社会实践的问题，也就是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这一连续过程中，社会实践的本质并非表达社会行动者的意图，也不是行动者的意图在决定着社会实践。依照吉登斯的解释，人的“意图仅仅是在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之内构成的，反过来，它仅仅是在与没有得到确认的条件的结果结合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①。

这样的认识便使得文本回到了一种其存在的情境之中，回到了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我们对文本的意义也就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这一点显然是结构主义的解释所真正缺乏的，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文本就是有着自身内部结构的文本，而且是一种将参照系剥离掉的文本，因此他们就不会注意到在语言游戏的活动中人们的参与以及这种参与对于意义的修补或更改。这一参与的过程是一种互为主体性的过程，也就是互动双方相互构建一种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根本上是没有确切认知能力的，是由文本分析所默许下来的一种假定，而非理论化的认识。因此，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作为关系形式的建构，在互为主体性的自在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从一种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待文本的生产过程，它实质上是一种类似社会实践的再生产，其并不是一种意图的结果，也不是意图的总加。吉登斯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历时性特征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因此，一个文本就是一种固化了的形式，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跟某种意图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图就是作为作者或者读者参与其中的那种反思性监控的生产的结果。此外，还要注意到行动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 of action），这不仅是指其目的性的构成，也指作为一种熟练的技能而融入到生产中来的理性与动机。如果是这样，由作者所掌握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一种默会之知，并且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即熟练掌握的一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41 - 42.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整套风格。^① 这样看来，所谓作者，说白了就是一个行动着的主体（an acting subject）。作者不是一系列意图的组合，也并非存留在文本之中的一系列痕迹。而研究文本的生产，实际上就是要去研究文本的作者的生产。作者不仅是主体以及文本化了的客体，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文本，并借助那个文本的生产过程，来建构他或她自己。因此，作者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种产物，是伴随着西方个体主义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在现代的小说和诗歌出现之前，作为文本的作品是没有必要一定跟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许多上古神话以及中世纪的传说，实际上都没有作者或者作者本身是隐姓埋名的。^②

文本的生产依赖于情境，是情境的一种产物。因此，文本的意义，也需要回到文本生产的情境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不是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如其最初被生产出来一样，纠缠在生产这一文本的社会生活的律动（flux of social life）之中。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行动的后果，会在意图客体化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背离行动者的最初意图而获得客体化。^③

以此分析为基础，吉登斯特别提出，现在的社会理论，其最为紧迫的任务不是在概念的层面上进一步强调“主体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ubject）或者“个体的终结”（end of the individual），而是要在不陷入主体论的前提下去推进“主体的复苏”（a recovery of the subject）。吉登斯进一步强调，这种主体的复苏要求的是由这一主体去拿捏在一种实践之中究竟什么东西是不能够说以及什么东西是不能够去想的。^④

在实证哲学中，反思性主体的缺失便是把笛卡儿哲学中作为大写的主体的“我”（I）从实证哲学中排斥出去。这一点同样为后来的结构主义所强化。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在消解主体上，结构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着共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4.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4.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4.

通之处。并且，更为清楚的是，作为主体受到忽视的主体中心的消解（decentring of the subject）并不一定等同于主体的消失，而恰恰是当代社会进程的一种变革趋势。

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批评就认为，当代社会个体的消失，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这绝非一种富有成果的历史性转型，恰恰相反，它为一种弥散的极权主义（a spreading totalitarianism）所淹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无疑是上述观点的总代言人，这与福柯所强调的书写就是创造出一个开放的空间，在此空间中，书写的主体在无穷尽地消失的观点形成了一种对照。^① 但是，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理论不能屈从于这两种对于主体的认识，而是要对这样的过程给出一种自己的理解。^②

第四节 社会行动与制度化

在吉登斯自己的理解中，人的行动与人的观念之间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在结构化理论建构的核心意图中，吉登斯专门提出，要把人的行动观念与社会分析中的结构解释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结合，需要有下面这样一些条件，首先，要有一种人类行动者或主体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human agent, or of subject），其次，还要有一种对于人的行动条件和结果的说明，最后，要有纠缠于这些条件和结果中的一种结构的解释。^③

这样一种提法，是跟英国乃至欧陆的哲学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之前，行动的哲学与结构的分析这两者向来泾渭分明，相互之间很少能够有

① See Michel Foucault, 1977, "What is an author?" in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Oxford, Blackwell, 1977, p. 116, from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5.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49.

所结合，进而在行动理论与制度化的转型之间，也很少能够找到一种相互的结合。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于语言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解释，已经预示了一种结构与制度之间关联的可能性。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当中，制度仅仅作为一种共识性的背景幕（consensual backdrop）而发挥作用，行动融入其间，并通过与这背景幕的互动而获得意义。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哲学丝毫没有触及任何跟社会变迁有关的议题，而其他行动哲学，也只关注人类行动的原因或意图的本质而非其他。^①

也许，在社会理论的传统之中，象征互动论是最看重人的行动目的性的一种理论，它把个人放在了社会互动的中心位置上，强调行动者的执行能力。但是在象征互动论中，社会局限于书写的人以及泛化的他者这样的一般性角色，而没有对社会分化真正给出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因此，也就谈不到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给出任何解释了。象征互动论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之中，而把更为宏大的社会转型分析留给了功能论与结构主义。

然而，在把客体加诸主体之上或者是把结构加诸行动之上这一方面，功能论与结构主义有着共同之处。对于行动的变动性，功能论采取的解释策略是提出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突显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这使得社会整体的特性有别于其个体成员的特性，并且，由此也对个体的行动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

可以说，涂尔干当之无愧地堪称这一观点的首创者。他的社会学的核心强调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其不同于单个的社会行动者的特性，并且强调了社会外在于个体成员而突显出来的特性，即每个人都是出生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构成中的，并且与其他的人生来就有了某种联系。在其早期卓有影响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涂尔干有意把社会相对于人而存在的这种外在性等同于一种规则的约制（constraint）。

但是，上述这样一种看法在吉登斯看来至少存在下面两点明显的错误：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0.

首先是把“社会约制”理解成物理性约制一样的约制；其次是把此约制看成社会或者制度的一种规范。实际上，在看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涂尔干可能完全陷入了一种社会决定论当中，社会在涂尔干的表述中成了一种约束性的环境，行动者在此环境中行动，并通过制约他们行动的压力效应（pressure effect）而获得当下的感受。在此意义上，社会事实如同一种外在的力量，对个体及其行为产生影响。^①

涂尔干在后期的表述中，对这种外在力量的性质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他强调社会事实的道德属性，以此来区分物理世界的约制力量以及由社会给予其成员的那种压力。也许正是这一点修订，激发了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去建构自己的“行动的参照框架”（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理论，因为涂尔干在后期的表述中，确实注意到了道德现象的双重性，首先是积极的激励作用，其次就是约制力。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强调了行动者的行动与某种自主性（voluntarism）之间的关联，并将这种自主性与社会系统的突发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 of social systems）相融合。此种融合是通过两个方面的规范价值观的影响来获得的，即作为人格要素的规范价值观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核心构成的规范价值观。就作为人格要素的规范价值观而言，价值观是内化在一个人的人格之中的，并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内在驱动力；而作为社会核心构成的规范价值观，则是作为制度化了的规范在发挥作用。在这里，价值观构成了一种道德的共识（a moral consensus），并借此来整合为一种社会的整体性。社会中的行动者则被看成由社会与心理双重决定的结果，而社会之所以能够支配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人的心理，主要是由于规范要素的影响和约制。这一点，恰恰成为后来吉登斯专门提出来加以严厉批评的对象，因为他认为，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在这一点上把发展出一种行动的社会理论的路给封死了。^② 换言之，没有人可以从中突围出去，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的新理解。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2.

反过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则会更加强调社会的动力性质，即强调行动的实践性以及社会的变革。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复杂性，对于马克思的解读就形成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认识取向。显然，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阅读到的马克思，跟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理解的马克思就大不相同，而后者似乎跟功能论者帕森斯的理论有着某种相似性。不过，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寻求一种对主客二元论的超越，帕森斯借用的是行动参照系这一概念，阿尔都塞借用的则是理论上的反人文主义（theoretical anti-humanism）这一概念，两人都由各自的概念而认识到了由客体所控制的主体。在帕森斯看来，行动者就是文化的兴奋剂（cultural dopes）；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行动者就是结构的兴奋剂，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就是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与功能。^①

而吉登斯提及的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帕西（E. Paci）则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后期著作中去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帕西所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有着一致性，强调作为物化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as-reification），这是一种现象学上的对于马克思理论的重新解读。在这一取向中，物化（reification）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这也是对于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所提到的对于欧洲科学中技术理性的物化倾向的批评的一种极端化。不过就马克思的理论本身而言，它依旧是启发出新的解读的生长点，特别是对于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解读。^②

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分析的行动哲学，帕西试图对人的行动的变动性和创造性给出一种解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理论建构上，行动哲学缺乏一种对于制度的理论化。而在这种理论化过程中，需要加入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一是在对人作为行动者的理解中加入时间性（temporality）这一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2.

要素，二是在分析社会实践的构成中融入权力（power）这一要素。^① 即一种行动哲学更关注行动展开的过程以及其背后隐含着的权力，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就建立在这样一种行动哲学的基础之上。

在这里，吉登斯重提他的社会活动的三个面相理论，在他看来，社会活动就是在下面这三种区分的瞬间完成的，其一是时间性的（temporally），其二是实用性的（paradigmatically），其三是空间性的（spatially），而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能无一例外地情境化到这三个维度上来。^② 单就时间性这一点而言，也许这首先是哲学家要去关心的问题，但社会学家更需要因此注意时间与行动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时间问题上，康德以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来加以应对。海德格尔进一步把康德的先验论解释为一种时间与存在之间的相互性，即时间便是物的存在，是物的表面形态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借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就是物与时间恰巧就在一个时空下存在或者发生了。

关于这一点，没有比海德格尔自己的分析更为透彻的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就是一种存有，是时间性的此时的存有。这可以引申出吉登斯有关时空关系下实用性的社会区分这一观点。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就是一种实际的时空，或者实用性的社会维度，与时间和空间一起构成三维世界。这同时还是一种横组合（syntagmatic），这一横组合既做区分，又加以延迟，是实用性所必需的。正如重视过程哲学的哲学家阿弗烈·诺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所强调的，我们对于当下的觉知，实际上浸染着一种可以预期的、生动的记忆边缘。海德格尔也有类似的表述，强调时间的经验并非一种当下的延续（a succession of nows），而是作为存在着的当下的记忆和预期的修补。换言之，时间以及对于时间的经验，都并非当下即刻的集合（aggregates of “instants”）^③，它们无疑都有自己的存在语境和历史线索。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4.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4.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5.

吉登斯认为，这样的时间观，对于社会理论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使得我们清楚地注意到了行动、意图以及理性等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行动者也不是脱离其时间的定位而存在的，即人无法离开日常行动的时间性而存在。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存在还具有一种反思性，在话语中这种反思性被唤醒，使得行动者的日常行动之流被打破，并使反思性进入其中。因此，行动者或者行动就不是指一系列结合在一起的断裂的行动，而是指一个连续的行动之流（a continuous flow of conduct）。^①

在这里，吉登斯扩展了以前社会学理论对于人与社会场景之间关联的可能性解释，最为重要的是把人的自我反思性，加诸社会行动者身上，使其具有了一种能动性。在这里，吉登斯的表述显然隐含着马克思的影子，只是所用的概念更具有一种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吉登斯还提出了一种“行动的分层模型”（stratification model of action）对其详细加以说明（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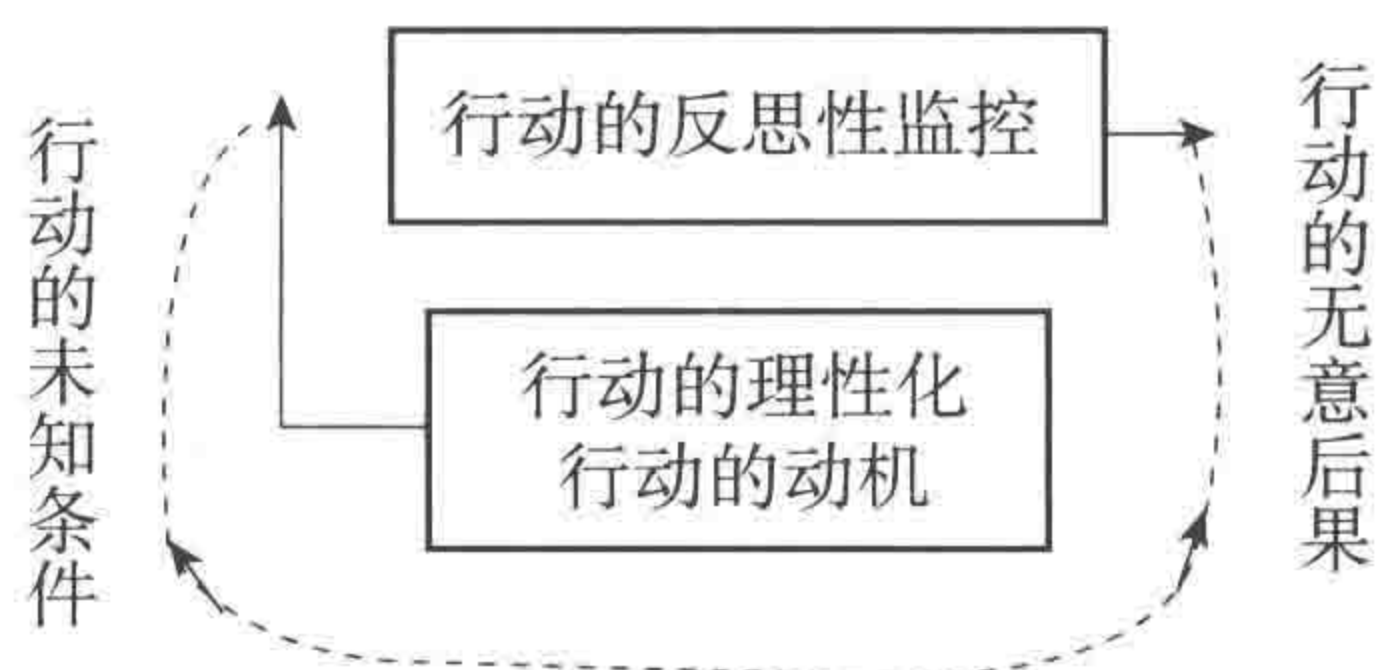


图 2—1 行动的分层模型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56.

在图2—1中，行动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 of conduct）指的是人类行为的意图性或者目的性特征，强调这种意图性（intentionality）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存在的，并且属于人类行为的常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行动者的行动过程中就带有某种意识清晰的目标。这种行为的反思性监控是在行动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action）背景下发挥作用的。这是行动者的一种解释和说明的能力，也就是他们对于为什么这么做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5.

给出一种理由，广而言之，可以称之为一种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换言之，有着自我监控能力的行动者，同时也在监控着行动者在其中的互动场景，也就是说，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孤立的，或者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相分离的，而是彼此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通过行动者对于周边环境的反思性监控而得到一种体认。^①

但是，也有一种不一致性的存在，这就是理性与意图之间的不一致，也就是行动者声称受到了某种理性的支配，实际却不是这样。这里还可以说成是行动的理性化与行动者的知识储备库（actor's stocks of knowledge）或者无意识之间的不一致性。这是实践意识中的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一方面，确实有很多知识我们自己知道，但并不能够在理性层面上加以表达，很多事情做是做了，但却不一定能说出来，即一种维特根斯坦哲学意义上的“默会之知”。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确实也不能忽视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力量的作用，比如白天发生的事件作为意识残留而在晚间的梦中表现为无意识。^② 通过无意识力量的作用，行为被合理化为一种行为的理据，无须进入意识的反思性领域就能够引导行动，而这些都成了行动的动机性的构成要素。

吉登斯认为，对一种社会理论而言，动机性的要素不可不加以考虑。因为，行动的理性化与习俗的框框（framework of convention）之间在概念的关联上，动机要素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一种动机理论，需要与行动的未知条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 of action）关联在一起，比如无意识的动机、非个体行动者所能够体认的那些动机，另外也要和行动的无意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ction）联系起来一并进行考虑。^③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7.

② 对此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无论如何，梦工作的成绩可描述如下，通常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思想，在白天形成，但没有完全建构成——它是一天的残留物，在夜间仍保留着一定的能量——由它形成的兴奋点，并且扰乱着睡眠。这种白天的残留物被梦工作转化为梦从而无碍于睡眠。”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70~171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9.

在这里，吉登斯实际是想在行动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制度化理论之间，寻找到某种结合的契机，因此他才会去注意到行动的无意后果这一点。其含义是指，我们有许多行为看起来是有意为之，但结果却是不可预料的，或者与预期不相一致。在吉登斯看来，如果功能论者无法发展出一种对于意图性行为的恰当解释，对于行为意图的解释上的缺失便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理解制度的再生产上，行动的无意后果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其行动的条件。^①

简单来说，制度跟结构之间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功能论和结构主义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功能论者看待结构，还是看重其跟功能的连接，更多地借用了生物学的类比，把结构看成功能发挥作用的基础。但结构主义者看待结构则不然，在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就是一种解释的工具，并与转型或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运用在语言学、神话学、文学或者艺术上，还是更为一般性的社会关系上的结构主义，都是要透过一种表面化的形态去窥视这形态或者现象背后的结构性的东西。

由于共同地受到涂尔干的结构功能论的影响，功能论和结构主义之间还是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的，至少下面这两点在吉登斯看来有很基本的一致性：首先，二者都强调共时与历时，或者说静态与动态之间的分别；其次，二者都不仅关注结构，而且关注系统。尽管共时和历时之分成为功能论和结构主义之间相似性的基础要素，但二者又都试图去超越这一区分。对于功能论者而言，其借用功能失调（dysfunction）这一概念来应对社会自身转变的动态性，强调社会的进程乃是由于整合与分化之间的紧张所致；而在结构主义者那里，处理共时与历时之间关系的核心概念是结构分化，也就是德里达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the structuring of structure）。^②

此外，不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功能论，二者也都注意到了结构与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在看待结构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上，两者又略有不同。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5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60 - 61.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更多地强调系统而非结构，在索绪尔看来，系统就是语言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功能论一开始便依据结构与功能之分区分了结构与系统，在功能论者的眼中，结构指的是社会关系的模式，而系统就是这种关系实际发挥出来的功能。但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区分，其实没有功能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有机体可以有解剖学上的结构与生理学上的结构之分，因此身体的结构可以不依赖于其功能而存在；但是，社会系统则不然，社会系统一旦失去了功能，它的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社会关系的模式仅仅存在于一个有功能组织的系统之中，并在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①

结构和系统通过时间性的概念而勾连在了一起，隐含有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就成为一种结构化的前提。实际上，功能论和结构主义还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对于时间维度的忽视。不过，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结构性属性 (structural property)，也就是结构的结构化属性 (structuring property) 这一点。在社会系统之中，这一结构化属性能够将时间与空间连接在一起。吉登斯使这些结构化属性等同于规则与资源，其隐含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中。而社会科学中的结构分析就是要去检验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一个社会系统就是存在于社会再生产连续性中的时空的模式排列，这是一种被结构化了的整体性 (structured totality)。因此，结构仅仅存在于社会体系构成的那一瞬间，它随着时空的延展而不断得到构建，并有着一种历史分层的结构。^②

第五节 制度、再生产与社会化

结构、系统以及结构化这三个概念，由于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观念的引入，各自的内涵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改变。它们共同成为吉登斯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61 - 6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65.

结构化理论建构的基石。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被理解为规则和资源，作为社会系统的属性被组织起来。换言之，结构是·以其·结构·属性·而·存在·的，而系统就是行动者或者集体之间再生产出来的关系，作为常规的社会实践而被组织起来。

吉登斯认为，系统本身不是结构，但是它具有结构的属性。因此社会系统就是社会互动的系统，其中包含有人类主体的情境化的活动，并结构性地存在于时间之流当中。而系统是有着结构属性的系统，但却不是结构本身。从逻辑上来看，结构必然是系统的属性，其特征便是主体的缺失。而研究系统的结构化也就是去研究系统借助于有生成性能力的规则和资源，并且是在无意后果的背景之下，通过互动而得到生产与再生产的那些方式。^①

在这里，吉登斯差不多是全部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有关规则的认识，强调规则的实践性特征，即我们所谓知道一种规则实际就是知道·如何·去·做·，而并不一定有清晰的关于此规则的界定，实际上对于社会规则的清晰界定也根本是不存在的。相对于规则与实践的对应性，资源更多地跟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中，资源占据着核心位置，这也就是在强调在一种社会理论的建构中权力概念的重要性。如果说规则不是用来描述的，而是知道如何去做的实践；那么，权力也是一样，它不是对一种事物状态的描述，而是一种能力。它建立在资源的基础之上，并借助资源施展其能力。^②

吉登斯首先把制度（institution）跟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或者他所说的集体性（collectivity）区分了开来。^③ 这里，吉登斯提到了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拉德克利夫-布朗那里，制度就是指“行为·的·标准·化·了·的·模式”（standardised modes of behaviour）^④，但是，吉登斯有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6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68 - 69.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6.

④ A. R. Radcliffe-Brown, "On Soc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70, 1940,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6.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意把这种行为的标准化了的模式放置到了社会生活的时空背景中去，也就是放在了有着日常情境依随同时又有着时间延展的进程之中，在此进程中，一种行为的标准化了的模式得到了重构。^①

行为的标准化了的模式的重构实际上隐含了一种制度的再生产，在这种过程中，结构是通过编码了的符号意义而体现出来的。跟意义的生成相关的理论可以称为意义化的理论（theory of signification）。在吉登斯之前的意义化的理论是建立在哲学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的。它一方面强调主观的理念论（subjective idealism），在此理念论之下，语言，或者更加一般意义上的意义论，就被理解为“行动者之间交流的手段或者媒介”，而符号不过就是传递出来的“信息或者意义”^②。而吉登斯接下来对这种理念论所做的批评就是，意义化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交流本身的场景的构成性特征”（constitutive feature of the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itself）而存在的，而主观的理念论在这一点上是迷失的。^③

另一种观点是语言的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就是把符号看成符号系统中既定的（already-given）构成属性。在这样的预设之下，符号（signs）与信号（signals）之间的区分没有了，符号的属性变成了固定化的，无法发生改变。

吉登斯认为，要克服上述两种大的分析模式在理论上的缺陷，就应该以二重性（duality）这一概念去取代二元论（dualism）的概念。换言之，作为关注结构的生成性属性的意义化，它总是跟“互动中的意义的交流联系在一起”，而这里的意义化就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并且是以解释性图式（interpretative schemes）的形式为行动者所触及并得到再生产的。^④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在语义学（semantic）和符号学（semiotic）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6.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7.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8.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8.

之间做一个区分。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是符号学的优先性，也就是把意义还原到主观的交流水平，但是，吉登斯把这一点反过来用，强调语义学的优先性，也就是一定要把意义理解为基于语言“使用的场景”（contexts of use）^①。同时，还要在符号与信号之间做出区分。信号实际上是一种固定化了的刺激，其引发了“一种既定的解释性反应或者反映的范围”（a given interpretative response or range of response），在此基础上，信号的运行便可以是纯粹机械性的，属于一种机械的系统。当然这并不排除它们成为意义化中的某一项要素的可能性，但是相对于符号的意义生成而言，信号的这种意义生成还是次要的，因为信号的意义是既定的，而符号却并非如此。

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是借助于编码体现出来的，编码有着多重含义，其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前后文的联系，意义才能够得到确定。而在一个封闭的、机械的系统中，交流中的意义是固定化了的，但是转换到社会互动的交流中，这种意义就不再是固定化了的。吉登斯再次提醒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确认生成讯息的预先存在的编码，因为此‘讯息’也会进入到互动中的结构二重性中的编码的重构中去”，并且，在社会的互动之中，讯息总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这些文本既会从“一种编码的多重性”（a plurality of codes）中被生发出来，也会是这种多重性的表达。^②

在结构化理论之前，社会理论家一般认为社会行动者在互动中只有两类可能性：一类是遵守规范（norms），因此他们会受到规范的约束；另外一类是树立规范或者执掌规范，使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前一种规范约束性的社会理论家中，涂尔干是其核心代表；作为后者的规范引导性，似乎并没有前者在社会学中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社会学家帕森斯确实试图把韦伯所提出的合法性秩序（legitimate orders）概念融入到涂尔干的集体良心（conscience collective）这一概念中去，并试图以此来解决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提出的在没有一个核心权力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9.

的状态下社会秩序的构建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在霍布斯那里，这样的状态只可能是一种“所有人跟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①

不过，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到了帕森斯那里就转变成了社会如何能够存在的问题，也就是面对纷繁多样的个人意志，面对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出现的“所有人跟所有人的战争”（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社会如何能历久不衰，如何能维持稳定的问题。^②在这里，帕森斯特别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而能够使个人与社会之间保持和谐的基础正在于其所谓的道德良知的内化，它是作为个体的需求倾向性（need-dispositions）而内化到个体的人格之中的，并转而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③

在这里，帕森斯把合法性概念用共同的价值观概念来加以取代，将合法性概念看成是共同价值观支配之下的群体的派别利益。但是，吉登斯则更强调合法性概念在用于社会分析时的契合性。这里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其不含有任何程度的对于作为权利与义务而实现的价值标准的认可；其次，其允许对于社会中的价值标准与局部利益之间的重叠的欣赏，这是非常清楚的。”^④

吉登斯在这里所提及的“价值标准”（value-standards）是更具有能动性的价值标准，是可以在社会互动之中被调动起来而担当起一种规范的约束性力量。在任何相对稳定的社会里，这样两种东西都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一是融入到合法性中去的价值标准，二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行动而体

① 就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关系而言，关于没有中心权力存在的自然状态，霍布斯下面这一段话即便在今天读来依旧让人感到贴切，特别是身处中国的现实处境之中：“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公正。”[英]霍布斯：《利维坦》，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② See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London, Routledge, Vol.1 - 2, 1968, form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101. 中译本参见 [美]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102.

④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102.

现出来的合作动机。^①

吉登斯强调，在帕森斯的背后不仅有对涂尔干社会学的延伸，更有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子，可以说是一种将弗洛伊德与涂尔干结合起来的产物，也就是把弗洛伊德在个体心理学层面上的人格发展的概念跟涂尔干的集体良心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一种价值的共识或者说社会的规范通过人格发展中的需求的倾向性而内化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借此可以理解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不过，帕森斯是将人与外在规范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的心理分析转化成了一种和谐的内化。帕森斯所强调的人格是“对于社会客体内化的一种组织”，这里所谓的“客体系统”，乃是社会系统中各种的角色单元，在这些角色单元之中，“个体已经被融合进其生命史的过程中去了”^②。

经过帕森斯的改造，心理分析学派所强调的人格发展中的一种本能驱力的压抑不见了，留下来的是一种涂尔干式的人格论的解释，认为人格的形成乃是客体系统（object-systems）的内化，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客体会不断地分化，而通过这种对内化的分化，个体会更加紧密地融入到一个社会之中去。

不过，吉登斯显然极力排斥这样一种过于强调内化的社会学解释，他的结构化概念迫使他必须去留意一些更具能动性的社会要素。因为，在社会行动者的行为与社会的规范之间，并不总是能融合或保持和谐。因此，合法性的问题就被吉登斯重新提了出来，以此来应对功能论在解释这种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上的偏差。他认为，“在社会系统之内，支配群体的规范整合的水平对于那些系统整体性的连续影响，可能要比大多数人究竟有多深入地‘内化’了同样的价值标准的影响更为重要”^③。

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于功能论解释上的封闭性而言，或许打开了一个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2.

② Talcott Parsons & Robert F. Bales, *Family, Socialis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New York, Free Press, 1955,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2.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突破口。因为，在吉登斯看来，什么是合法性的价值标准，只有行动者自己才能知晓，并且，这一行动者的合法性标准，对于另一行动者而言，恰恰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环境条件。这样一种看法不仅适用于社会整体性的宏观分析，更适合于局部微观的社会互动分析。也许更应该强调的是，规范与合法性之间是有相互依赖性的，并且，规范是借助合法性而得到体现的，或者合法性体现出了规范的效率。

在这里有必要首先在意义化（signification）、支配（domination）以及合法性（legitimation）这三个概念之间做出一些区分。在吉登斯看来，从根本上而言，意义化是一种结构，其体现在语言上，并通过语言来得到一种表达；而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往往又是起支配作用的那些方面，说不仅意味着做，还意味着一种命令；而包含在意义化中的编码具有一种规范的力量，这种规范的力量可以被看成是合法性的基础。而威权与分配作为支配的两种形式，也只有与有意义的以及规范性的要素结合才能被调动起来，而合法性必然包含一种意义化，并且在支配的协调形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①

为此，吉登斯特别提出一种“意义化—支配—合法性模式图”（signification-domination-legitimation scheme, S-D-L）来对制度的类型进行归类（见图 2—2）。

S-D-L	象征秩序/话语的模式
D（威权）-S-L	政治制度
D（分配）-S-L	经济制度
L-S-D	法律/约制的模式
S=意义化	
D=支配	
L=合法性	

图 2—2 意义化—支配—合法性模式图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07.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06 - 107.

正像吉登斯对于此模式图所做的解释那样，意义化、支配与合法性三者之间的连线并非指涉一种因果联系，而是表明在结构化的特征中，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一种连线的第一个字母代表的是把分析的核心放在哪里。比如当我们焦点集中在通过制度显现出一种意义化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关注象征性秩序（symbolic orders）以及话语模式（modes of discourse）的分析。但是，需要清楚的是，这些象征系统以及话语模式，又是与支配以及合法性的诸多形式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对于这些交织形式的把握是进行结构化分析时所不可或缺的。^①

并且，这里所说的象征，具有一种激发新的意义生成的意味，其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将象征等同于有着固定边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的看法，它无法用来解释在社会变迁中的象征性秩序的作用。总之，象征在激发新的意义的联想上有其特殊的潜在能力，这一点显然被古典保守的社会学传统完全忽视了。^②

在这方面，吉登斯所强调的是政治背后的动力特性，也就是政治的一种生成性能力。政治由此而被理解成“作为一种资源的威权动员”（mobilisation of authorization as a resource），而经济就是“分配性资源的动员”（mobilisation of allocative resources）^③。由这样的认识出发，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就成为所有社会系统的持久特性。那种韦伯意义上的把政治单单跟现代国家的涌现联系起来看法显然就是错误的，而那种把政治看成是内在地跟价值观及利益冲突的化解联系在一起的看法当然也是错误的。前一种看法强调了一种独特的政体（polity）的形成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这样的看法忽视了有国家之前的社会与有国家之后的社会在政治上的连续性，这是想当然地把政治看成现代自由民主政府的特征。对于经济向度而言，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卡尔·波兰尼对于形式经济的批判也指出，这是把经济仅仅局限在现代经济的意义上，也就是把经济仅仅跟稀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8.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8.

缺资源 (scarce resources) 联系在了一起, 但实际它并不是这样的。^①

实际上, 在考虑到制度的特征性分类时, 阶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在社会理论的分析中, 有两种看待阶级的理论, 一种是马克思的传统, 强调阶级概念的集体性和群体性; 而另外一种则是韦伯 (Max Weber) 的传统, 阶级指涉的是一种聚集的属性 (aggregate qualities), 比如在市场中的机遇以及占有的特性等。对于上述两种看待阶级的理论, 吉登斯都一一予以批驳, 他认为, 前一种理论在确定阶级的集体性时, 无法像确定家庭、学校的集体性那样容易, 结果只能是从意识层面上来确认, 强调属于某一个阶级的成员拥有共同的阶级意识 (common class consciousness)。第二种理论的困境在于, 如何在阶级的范畴与实际群体组织的形式之间形成联系, 即“经济上的阶级处境” (economic class situation) 与“社会阶级” (social class) 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明朗的。而吉登斯所要提出的是一种能够用来说明“一种‘阶级社会’的制度秩序对于集体性形成的影响”^② 的阶级理论。也就是, 在作为一种制度化形式的阶级社会理论与“一种阶级关系如何在群体的形成和意识的具体类型中得到表达的说明”^③ 之间, 建立起一种联系。

这一定又会联系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讨论。总体而言, 吉登斯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一种分离化倾向,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与政体的分离, 经济的领域与政治的治理领域分离开来, 结果是经济活动从原来直接的政治控制之中脱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特的领域。这种经济与政体的分离, 有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 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势。

这样一种从政治当中分离出来的经济组织, 其本身依旧处于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之中, 但是很显然, 它的枝蔓已经遍布于全世界了, 国家之间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多边合作便是此种状况的集中体现。^④ 在这样的制度安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8.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9.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10.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10.

排中，新的支配形式得到了一种再生产。而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在阶级社会的分析中，一方面是阶级的统治，而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安排，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般而言，制度的安排不可能脱离阶级支配的实践而获得理解，而这种实践，又是体现在嵌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的制度安排之中的。

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必要将功能论的整体性概念一概抛弃，而应有所区分地去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功能论。一种功能论是把社会整体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单元（an organic unity），从孔德到涂尔干，从涂尔干再到帕森斯，他们的理论都属于这样一种功能论，即可以称他们的理论为“规范的功能论”（normative functionalism）。

这一传统，跟马克思一派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论的解释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这两种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论的解释，又都没有注意到人自身有一种理解的能力存在，而恰恰是这种理解能力成为其行动的条件。这两种功能论实际都是把社会再生产放置在行动者的行动之后，但是行动者自身对于行为理性化的仪式活动却没有受到这两种功能论的影响。吉登斯特别指出了，一种在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中隐含有社会系统的目的论，而此种目的论的运作总是会在行动的理性化这一固定的范围之内。

行动的有意图的和无意图的结果相互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并且，任何具有连续性的社会特征，都是从这样的混合性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中来，并且以这种行动的理性化为背景。因此，社会系统与社会再生产之间有一种相互预示的关系，即社会系统预示着社会再生产的形态，反过来，社会再生产又会影响社会系统的特征，而不是一般功能论意义上的那种神秘的幽灵般的解释，以为社会系统像幽灵一般操控着其成员的行动来完成某种社会再生产。

上述这一点认识，对于吉登斯的社会理论建构而言更为重要。他曾经举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时所提到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预备军（a reserve army）的概念来加以说明。功能论者把马克思的这一概念解读为一种资本主义自身的需要，并通过系统的功能来加以满足，似乎是“系统需要”

一种预备军，预备军就出现了”，或者反过来说，“由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而导致了·一个预备军的形成，必须是这样的，因为它需要”^①。

这样一种看似简单的需求功能论的解释，在吉登斯看来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他强调这种预备军形成的历史性，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因此他强烈地反对社会学中的功能概念，甚至声称“要把‘功能’这一词汇从社会科学中剔除出去”^②。他进一步指出，以功能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再生产仅仅是一种很初步的解释，更为精致的解释需要在社会再生产的因果循环中具体呈现各个参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功能的概念隐含有在社会解释上所无法避开的传统的二元对立，即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功能的解释完全忽视了时间的维度，而功能论者更多的是从变迁这个角度去理解时间要素的，但是，吉登斯所反对的恰恰就是那种把时间与变迁等同起来的·做法，他提出了与之有所差异的看法。^③

吉登斯认为，社会的需求很多时候是虚构的，因为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社会成员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一般的东西。一个社会系统不是一个有机体，它被表述出来的需求是很勉强的，极度缺乏解释力，除非这个社会系统的行动者也能够真正感知到当下这种社会系统的需求与紧迫性，并且，还要积极主动地将这种感知融入到他自身对于系统再生产的反思性的自我约制过程当中去，只有到这时，再谈社会系统的需求，似乎才有意义。

在这里，吉登斯特别看重的是行动者的知性能力，即一种认知性的思考能力，而所有的社会再生产又都建立在这种能力之上。这种能力保证了行动者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运用不同的规则和资源来加以应对。而社会学所说的变迁，实际上只发生在社会再生产的瞬间，因为行动者是依据情境的变化，运用不同的规则和资源来做出不同反应的，社会变迁则是依这种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12 - 11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13.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13.

社会互动构成中的参与者行动的情境性而发生改变的。^①

在功能论的代表性人物涂尔干那里，社会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个体承担的角色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地对外在于他们的社会事实加以内化，使之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涂尔干所强调的是社会先于出生到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而存在这一社会事实，并且，通过一种儿童早期社会发展的社会化过程，他们能够融入到他们成长于其中的社会中去。吉登斯则进一步对这样一种社会化的过程给出了自己的修正。在他看来，有三点内容至关重要：首先，社会化绝对不是一种社会强加于个体身上的被动的印刻。因为，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一种对于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儿童是积极地参与到对于生活世界的探索中去的。其次，根本无法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来标示社会化的结束，而应该把社会化看成是一个伴随一个人一生的过程，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去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再生产才具有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后，绝对不要把社会化理解为一种标准化和一体化，因为社会化的过程从来就不是单一向度的。

之前，有许多从事人格发展研究的心理学家，一般都把社会看成是单一向度的，没有任何的分化，而把个体看成是有人格分化的，他们所研究的就是“一个无分化‘社会’中的人格的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personality within an undifferentiated “society”）。这种情况也同样体现在支配儿童心理学发展范式多年的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的研究之中。这位以研究儿童认知能力发展而著称的瑞士心理学家，在看待儿童的社会概念的获得时，单单注意到了“成为社会的人”就是一个个体满脑子充斥着一种认知发展的能力，以此来融入社会之中，当然，这还属于纯粹个体认知心理学的视角。但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吉登斯则认为，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认知层面上熟练地掌握“交往的‘对话性’情境”（“dialogical” contexts of communication）^②。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14.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29.

只有在这种交往的对话性情境中，角色的存在才真正具有意义。我们很多时候仅仅注意到了父母在呵护和教育弱小而无知的幼童时的那种主动性，却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也是为有着积极主动的活动和认知能力的幼童所塑造的。这从来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化，更重要的是还保证了一种世代的继替（*succession of the generations*）与延续。^①同时文化的意义以及社会的规则也由此而得到了传递或再生产。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29.

第三章 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社会的意义框架与独特视角，使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变动不居的转化关系。吉登斯首先对社会现象背后的变动性处境的理论解释进行了探索，他突破了既有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关于时间观的论述，关注到文字或书写背后的解释学这一线性的时间意识形态、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并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支配”“权力”与“剥削”三个概念的深度反思和挑战，从权力施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注意到“社会事实”对个体行为具有“约制”和“赋权”的双重作用，印证其结构化理论的合理性。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结构化”，其要义是“结构的二重性”，包含了结构与行动者、规范与实践这两对相互依赖的关系范畴。然而，构筑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并不稳固，面对质疑，吉登斯强调结构化理论不过是他全部作品的一个部分而已，旨在建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框架。为此，吉登斯在后期的论著如《社会的构成》（1984）中，对结构化理论进行了后续阐释。此外，吉登斯强调结构化理论在社会研究中的适用性与广泛性，可应用于失业、性别与权力等社会研究中。

吉登斯一直在努力发展一种他所谓的“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为社会学的解释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使得阐释者更有可能去关注行动者自身依情境而使自己的行为发生改变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使得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处于变动之中的结构性转化关系。在一种被吉登斯称为“结构二重性”的概念的引导下，吉登斯开始了其对于社会现象背后变动性处境的理论解释的探索，这种探索，首先是从其对于传统社会学理论所忽视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结构化的讨论开始的。

第一节 时间与空间

一般而言，在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表述中，他会更加看重社会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上的体现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试图用时间性的概念去打破传统社会学中共时和历时或者静态与动态的两分，这样一种二分法，在社会学的功能论和结构主义传统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特别是在功能论者的社会理论中，时间被看成是一种前后之间的变化，具体而言，等同于一种社会变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看不到时间存在的静态分析，这种取向所强调的是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可改变。

在功能论者的视野中，时间性是由社会变迁这个概念来指称的。功能论者以静态分析来看待当下的一个分立的社区，由此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描画出来，在这一描画之中，事物现在的样子就被认为是事物过去的样子。相比功能论，在结构主义那里，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了时间性、历史与共时/历时这样的区分的关系上。比如对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而言，在时间问题的讨论上，首先他把历史看成一种“符码”（code），其次他确认了一定的根本性的对照关系，这些对照关注到了时间与历史的问题，如他所谓的“冷”和“热”的社会之间的对照。所谓“冷的社会”往往是指小的、相对没有什么变化的社会，而所谓“热的社会”指的就是更

为发展、发达以及多变的社会。^①

依循列维-斯特劳斯的思路，历史实际就是一种符码。同时，历史无疑是一种对于过去的解释或分析，需要有某种概念的引入。但历史还有一种时间性，是发生在时间序列中的诸多事件，这一点在所有的社会中都适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也许根本的问题不只是时间，也不只是历史，而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感（historicity），也就是对于“‘进步运动’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progressive movement”），这是特定社会中社会生活的一项特征，更多的是指西方封建社会之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后，这种“‘进步运动’的意识”支配并推进着社会变迁。对于现代社会的构成而言，许多概念的出现都跟此种历史感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而这与吉登斯所谓的传统社会及文化中的“可逆的时间”（reversible time）形成了一种对照。在社会再生产的意义上，传统就是最为纯粹的以及最没有什么新花样的社会再生产的形式。一切似乎都是对于过去的重复，知识是重复，手艺是重复，操作的程序也是固定化而不能有所更改的，都是要严格依照前人操作的程序来操作的，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或规矩。

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一种传统是什么时，丢弃传统也就开始了。如果把传统仅仅理解为究竟应该如何去做，那么传统丢失的可能性就是最大的。把某种时间界定为一种传统并加以包装，就降低了这一实践在其他通过合法性手段建立起来的诸种社会实践中的地位。

吉登斯在这里注意到了文字，在他看来，文字最具有这方面的特色，特别是在文字普及之后，即文字成了社会大众的一种实践之后，文字的传统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文字局限在少数精英的手中时，实际上并不会对传统造成一种直接的侵蚀，因为由少数人所独占的文字，可以用来支持隐含在经典文本中的主张和意图。同时，文字的传统也并非一个纯粹的传统，因为书写文字的权威并非依赖于“使用和推测”（usage and pre-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ime, Space, Social Change,” 1967,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99.

sumption), 而是作为一种持久存在的物质客体, 这个客体能够跨越转变的过程,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时间的模型, 它甚至可以同时对远古的世代发表自己的意见。^①

正像吉登斯所注意到的那样, 对于文字和书写的这种认识为社会再生产之外的对于文本和书写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也就是在文字或者书写的背后隐含着一种解释学 (hermeneutics) 以及历史编纂学 (historiography), 而此二者的出现背后都隐含着一种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于解释学相对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过极为细致的描述^②, 而人类学家古迪 (Jack Goody) 则对于书写与文化的历史谱系有过详尽的撰述^③。书写及其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以及社会构成无疑是在理解有文字的社会时不能逾越的一个结构性要素, 对文字的解释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以及文化秩序的一种表达而已。

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学所关注的是对于书写材料的各种冲突性的解释, 它是从世界各大宗教对于经卷的解释中浮现出来的一门学问。这也体现出在西欧封建社会之后的一种所谓历史感的入侵, 恰恰是在此时, 解释学和历史编纂学就极为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它们的结合, 成为对于传统进行启蒙批判的一个卓有成效的部分。因为那时的启蒙哲学家们还没有达致对于过去的解释, 而只是对传统本身的那种今不如昔的原则提出了一些质疑而已。

另外, 线性的时间意识是基于书写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 而线性的时间构成了西方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征性的历史感的基础。首先, 书写下来的文字构成了一种交流方式的转变, 由于有书写, 人们可以跟远古的世代进行交流, 可以保持思想上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 物质形式上的世代的线性谱系, 即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的分离点的文字记述, 也在强化一种对于时间是序列性的延展的认知与自觉意识。

^① See J. G. 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London, Methuen, 1972, p. 255,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00.

^② 参见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③ See Jack Goody,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传统的社会中，时间不是一个单独的维度，人们并不会清楚地意识到时间如何可以逸出社会生活之外而单独存在。在那样的社会中，社会活动的典型特征就是循环，在那里时间是可逆的，也就是人们不大会注意到由生到死的单一方向的线性关系，而是二者之间生生不息的循环关系。一旦时间的观念突出出来而成为一个单独的维度，生活的循环性或者可逆转性也就被打破了，时间成了一种需要去计算的东西，并要通过分配时间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在马克思的分析看来，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核心特征，即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条件就是劳动时间的计算，随之而有“工作日”（working day）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出现。^①

吉登斯之前的社会学理论，几乎很少有把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向度看成社会理论构成的核心的，最多将其看作一个共在的时空坐落、一种行动者做出反应的环境刺激。由于有长期占据优势的功能论的共时与历时（synchrony/diachrony）之间的划分，时间便成了一种划分界限的标准，一定阶段社会秩序的稳定由此而得到体现。而在社会学理论中，忽视空间可能有多种缘由，其中之一就是害怕与地理决定论扯上某种的关系。即便把生态学的概念重新拉入到社会学的分析中来，这种忽视空间的做法依旧没有得到消除，实际上即便一些社会理论家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生活如何受到空间的影响，依旧还是从社会行动的环境来看空间的，而不是将空间的特征融入到社会活动的发生中去。^②

而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17—2011）所开创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可以说真正注意到了在面对面（face to face）社会互动场景中的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在场，在这种在场之中，操控对话的行动者同时也操控着时间和空间。不过，吉登斯则更加强调在这种面对面的微观层次互动之外的其他形式的互动，特别是在互动双方无法谋面的互动中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不是简单地在群体范围的宏观与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02.

微观之间做出划分，更重要的是要在常人方法论所谓的面对面互动与互动对方都不在场的那种互动之间做出一种区分。

所谓的宏观社会学的发展，跟社会系统自身所逐渐发展出来的时间和空间的不在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比如，在人类社会中，书写的发明就使得在人们的交往中时间的不在场成为可能。因为，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中，所谓传统不过就是通过记忆而混杂在一起的一堆事件或场景，在里面找不到清晰的时间和空间的在场；而在有文字的社会中，由文字所记录下来历史，可以使当初的身体在场的互动得到清楚准确的记录，人们通过阅读这些文本而达到与当时的人互动的目的，但是在这种互动中，时间和空间是不在场的。由于文字的发明，人类社会交往的范围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得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延展。

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则更加强化了这种“时空的不在场”，并且这种现代通信互动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现代通信不会因为空间上的距离而制约了时间上的距离。面对面的互动强调的是互动的即时性，也就是没有一种时间上的距离感。电话通信的发明使这种时间上的距离感消失，人们拿起电话就可以和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人进行跨越空间距离的拟似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而今天，越来越普及的可视电话，则可以更加逼真地模拟出面对面交流所要求的即时性和感受性。这就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今天的世界没有了空间上的阻隔，“遥远”成了现实中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梦想中的一部分，因为从感觉上它并非遥不可及。

而空间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也最为密切。在阶级社会中，空间上的划分成为阶级区分的一个主要特征。^① 在空间区域的划分上，阶级的特征得到体现，也就是相同的阶级会趋于在空间上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并且，时间的因素也会加入到这种空间上的阶级划分中来，不同的居住空间下所型构的不同阶级文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同样也会随着新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转换而发生一种实质性的变化。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06.

在空间的社会分析中，最值得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现场”（locale），这个概念跟身体的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不论一个群体的范围有多大，其日常的活动一定是在特定的现场中得到展演的。可以把传统社会的小社区看成此种现场的一个典型，这种小社区的特点就是在时空分离上的距离很短，因此，人们互动时所要完成的时空跨越也就很窄，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保持一种面对面的互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他的人也可以在一个现场中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实现性（availability）。

戈夫曼可谓分析这种微观互动的行家里手，他用区域（region）这个概念来专指空间和地点对于互动双方的意义。吉登斯称为“现场”的空间，被戈夫曼称为“区域”，借助区域这个概念，人们在现场在场的空间意义就得到了表达。如何去划分和标定空间就体现出了一种区域的差异，也体现出了一种时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家庭住房中的生活空间与睡眠空间的区分，其所体现出来的就是空间使用上的时间分化。戈夫曼最为著名的理论是将空间的区域划分成前台（front）与后台（back）。在此区分之下，一种社会表演（social performance）的概念得到了体现，在这种社会表演中体现了吉登斯所说的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这是在话语与实践意识中所特有的一种有意去控制互动场景的妥协特征，这些在社会表演的前台都是看不见的，是不在场或者缺席的。在这种互动中，价值观与规范的内化不是直接的强制灌输与接受，而是吉登斯所谓的“实用的接受”（pragmatic acceptance），也就是互动中的妥协机制，这种服从或者接受是勉勉强强、半推半就的，以玩笑及幽默来拉开相互之间的距离。互动的场景能够持续下去，所依靠的就是这种实用性的接受，这样互动双方之间的关系就不致很快地终止。行动者在前台的区域体现出来的是对于规范化的标准表面上的服从或者认可，但是实际上行动者本人可能对此标准非常不认同，甚至厌恶透顶，而这些都会在后台的区域中表现出来，平时我们所谓的背地里的不满都属于此后台区域的行为。^① 在中国人的语汇里，有一个贬义词叫“阳奉阴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08.

违”，它描述一些人的两面派的手腕^①，但是也应该留意到，这个负面的词汇恰好印证了戈夫曼所谓的前台和后台区域之间的划分是社会的一种常态，否则实际的社会互动可能连一分钟都难以维持下去。

现代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时空关系，自然已经非小的社区所能够比拟。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边界的概念重新获得了一种资源的意义，即现代社会控制边界这样的空间，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一种资源，由此造就了一种权力的分化。在吉登斯看来，对于空间控制与权力分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汗牛充栋，相对而言，对时间控制与结构性支配之间关系的讨论尚付之阙如。^②

不过，在这方面，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可能是个例外。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所依赖的就是对时间的精确控制，在资本主义支配的剥削体制中，劳动时间成为一个关键性特征，甚至今天，很多资本劳工争议的核心还是时间的问题。一方面是雇主千方百计地研究“工时与劳作”（time-and-work）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工人们巧妙的磨洋工或者随时准备抵抗。实际上这种对于时间的控制，并使其作为一种可以为资本家谋得利益的资源获得机制，并非简单的劳动时间问题，而是与历史上对于时间的控制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早期近东的历法以及随之而有的书写的发明，便已经开始了一种对于人这部机器进行剥削的历史。同样，伴随着钟表而非蒸汽机的发明，资本主义真正地与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了一起，而对于自然的分析的精致化，也建立在钟表时间的精致化的基础上。^③ 换言之，我们在创造了时间计算方法的同时，也就创造了控制人的一种方式或途径，差异仅仅在于粗糙和精致

① 参见徐冰：《两面性与真诚性——对中国人自我概念的诠释学取向的深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0.

③ 在这里吉登斯引述了20世纪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于时间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即1973年出版的《解释与预测》（*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另外，芒福德更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是《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0.

的分别，并且时间的箭头指向的是越来越精致化和细密化。

第二节 支配、权力与剥削

上述认识引导吉登斯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支配、权力与剥削概念的深度反思与挑战。吉登斯对于权力与支配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核心首先是要超越支配与反抗或者权力与压迫之间关系的简单二元论思维，从权力施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对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在吉登斯的理论思维中，权力是体现在“社会实践的例示之中”（in the instantiation of social practices）的，而这一看法便与传统的社会理论对于权力的看法有了一种实质性的分野。^①

在社会学中，论及权力（power），必然要提到韦伯。在韦伯看来，权力实际上就是行动者获得其所想要的目的或目标的一种能力。在这种把权力分析的视点集中在个体行动者身上的权力观之外，还有一种从集体层面来看待权力的观点，认为权力实际上有“一种集体性的属性”（a property of collectivities）。在今天的社会理论中，帕森斯与福柯都是持这样一种权力观的社会理论家。^②

另外，与权力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支配（domination）。而由于对权力的看法上的差异，社会理论家对于支配的理解也大有不同。在吉登斯看来，沿袭韦伯一派社会理论的学者，往往都会把“支配”概念等同于“决策网络”（decision-networks），由此支配就被看成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作为个体的决策者，其决策网络的能力大小。而这样一种基于个体决策者的对于社会中的支配的认识，在吉登斯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样一种认识无法应对这样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吉登斯所一再强调的“权力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in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r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9, 50.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49.

结构特征” (structural features of power)。反过来，强调权力的集体性属性的理论家们则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支配看成是在表达系统的结构属性，但是这种看法恰恰与韦伯学派的弱点相反，在吉登斯看来，其过于强调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结构是在人的行动之中并通过人的行动来得到体现和运行的。^①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上述两种对于权力的看法各自所走的极端，而吉登斯的权力理论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弥合的可能性。这种弥合的媒介就是资源 (resources) 这一概念，资源在这里被看成是系统的机构属性，并为个体行动者所获得或者分配出去。在这种借助资源的互动之中，自主与依赖的社会关系得到了再生产。在此意义上，支配就是在一种自主与依赖的权力关系中获取资源的种种结构性不对称 (structured asymmetries of resources)，这是一种制服的能力，即一种制服他人以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的能力。^②

不过，这样的看法有可能让人们对于支配的概念形成一种极为负面的印象，以为权力就是一种制裁的力量，其最终引起的是冲突。并且，在社会生活的构成中，过去许多社会理论家们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生活中权力的弥漫性上，并且将这种弥漫性的权力想象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而社会生活的核心就是似乎人人都在“为权力而挣扎” (struggles for power)。福柯显然抗拒这样一种对于权力的看法，吉登斯转述了福柯在《性史》中的一段话作为证明：

[他询问道] 若权力除了压抑便从来就没有其他的内容，若权力只是说不，而无所作为，你会真的认为，我们就应该去服从它吗？使权力掌控其所有、使权力得到接受的东西不过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它不仅是像一种只说不的力来加以衡量的，而且它还会有所挥霍，会造就物，会导致愉悦，会形成知识，会产生话语；必须将其看成一种生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0.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0.

产性的网络，这一网络穿越了整个的社会机体，远远不是功能在于压抑的那种负面情况所能比拟的。^①

实际上，福柯在这里指出了权力运作的双向性：一方面是压抑和制裁；另一方面，也许在吉登斯看来是福柯的社会理论中最具启发性的内容，就是权力的运作具有一种产生性的力量，它使得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得以维系和延续。吉登斯把福柯所说的产生性力量附着在了社会行动者的身上，认为这是体现在人类社会行动者身上的一种转化性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这种能力构成了社会生活中“双向的解放与产生性的力量”以及“压抑与破坏性的力量”的根源。^②

吉登斯所说的这种转换性的力量所借助的是一些媒介，在社会系统中，媒介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转化性的能力借助这些形式而使社会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互动得以实现。

因此，转化（transformation）与媒介（mediation）这两者就构成了多种社会关系形态的基础。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结构自身的转化能力。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是由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s）这两者所构成的。而结构的转化能力所依靠的就是规则和资源这两者，这二者的相互借用也构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核心。而吉登斯则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一步推到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上，认为实践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特征。这是在一种非决定论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的，也就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得到了认识，一切把人看成是被动决定的客体的主张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与此同时，“自由主体”（free subjects）的概念也需要被抛弃。因

① 原文：“If power were never anything but repressive [he asks] if it never did anything but say no, do you really think we should manage to obey it? What gives power its hold, what makes it accepted, is quite simply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just weight like a force which says no, but that it runs through, and it produces things, it induces pleasure, it forms knowledge, it produces discourse; it must be considered as a productive network which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social body much more than a negative instance whose function is repression.”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 86, in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p. 50, 5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0.

此，吉登斯关注的焦点最终还是人，即有着社会经验或者认识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社会世界，另一方面，他们的行动也会为他们自身所创造的世界所约束与限制。^①

这样，劳动这个概念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因为这是实践概念在社会生活中最为清楚的体现。但是，吉登斯试图回溯到黑格尔那里，去重新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深意。因为在吉登斯看来，黑格尔是在一种本体论的意义上理解劳动概念的，但是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很多时候却是跟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混淆在一起的，并且由此而带来了马克思在物质决定论上的对黑格尔的“劳动”或者更为宽泛的“实践”概念的误读。吉登斯试图去纠正马克思过于强调“历史的唯物主义者的概念”（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的做法，从结构分析的角度重新将实践的概念拉回到结构分析的视角中来。

吉登斯首先区分了结构分析的三个层次，即依据抽象水平由低到高，有三个层次：首先是“结构化的要素/轴心”（elements/axes of structuration），其次是“结构组（结构）” [structural sets (structures)]，最后就是“结构性原则”（structural principles）。

这三个层次中最为抽象的就是结构性原则，结构性原则的构成体现了制度分析中的最高层次。这种制度分析的前提是将社会看成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再生产，这是通过构成社会的制度分化（differentiation）和连接（articulation）来实现的。由于社会形态的差异，各个不同社会的分化与连接的模式也就有了区别。并且，结构性的原则归根结底是一种组织原则，其具体体现在一种时间的深度与空间的广度上。这种时间与空间组织原则上的差异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形态特征上的差异。相对结构性原则而言，由规则和资源构成的结构组所包含的范围并没有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原则所包含的那么广泛，它更多的是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一种转型（transformation）或调解（mediation）的作用，具体可以体现在规则与资源之间的可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4.

转换性 (convertibility) 上。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金钱，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金融的制度性规则使其能够保持一种资本运行中相互咬合在一起的循环，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描述的“资本的循环” (cycle of capital)。第一个层次的结构化的要素是最为具体的制度化的实践。比如在阶级社会中，劳动分工就是阶级结构化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化要素，它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分工来实践和固化下来的。^①

在吉登斯看来，不论是对于支配还是对于权力的分析，都应该在这样三个不同的抽象水平上进行。如果我们要分析支配背后最高抽象层次的结构原则，就要去关注在一个长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产权和权威之间的整体性关联。而在中间层次的支配结构的分析中，我们需要关注在最为抽象的结构原则之下的相互分离的转型与调解关系的组合。同样，在对支配的最为具体的结构要素分析中，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结构化的主轴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就特别值得关注。

在吉登斯的这种结构性分析中，一个事物的两面性特别受到强调，这种两面性是经由时间的维度而渐渐得以体现的。比如跟支配和权力概念密切相关的宰制 (sanction) 这一概念，就具有这种时间维度上的两面性。宰制体现在社会互动之中，而社会互动是依随性的或者偶联性的反应，有来才有往，这是社会互动最为基础的特征，单方面的宰制从来都不会发生。这应了那句很通俗的谚语，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显然，每一位行动者的每一次活动，对于另外一个行动者而言，都可能是一种宰制，这一点涂尔干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他注意到了“社会事实”对个体行为的约制作用，并且，很多时候是在一种不知不觉当中发生这种约制作用的，即我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好像自然而然就该如此。不过，吉登斯也明确地指出，涂尔干社会学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了社会事实一方面具有负面的约制或者制裁作用，但另一方面还具有赋权 (enablement) 的作用，也就是具有激发起行动者行动动力的能力。结果，在结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p. 54, 55.

性原则之下，结构既具有涂尔干所强调的约制的能力，同时也具有赋权的能力，而后一点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所没有真正意识到的。吉登斯的理论正建立在这样一种觉醒之上，即行动者并非一个没有意识而任由制度和结构宰割的主体，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规范的宰制，行动者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算计的态度（calculative attitudes）或者操弄的态度（manipulative attitudes），以此来规避宰制或者利用这些规则的宰制来为自己服务。^①因此任何规范制定并实施的后果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正面的宰制功能，另一方面就是被宰制者利用它来谋得一己之“私”，或者说被宰制者因此被赋予了某种行动的动力。

这一点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吉登斯自己所提出的结构二重性概念的合理性。因为，在宰制的运作之中，一方面是约制，另一方面是赋权，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行动—权力—结构（action-power-structure）关系的一种表达。赋权使人有一种行动的冲动，具有了一种诱惑的心理驱动力；而约制则具有使人的行动受到抑制的作用，其造成了一种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制裁的结果。因此，宰制由负面的威压（coercion）和正面的激励（inducement）这两方面构成，而非如涂尔干所说的是由单向度的约制所构成的。^②

而与支配和权力的关系最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exploitation）问题。马克思在谈及剥削（exploitieren, ausbeuten）的问题时，很多时候都是跟谈阶级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在没有阶级的部落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不很发达，也没有太多的剩余产品，因此，不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是大家所共同拥有的。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生产力的扩大，阶级才会逐渐出现，因为生产力的扩大带来了产品的剩余，这些剩余为并未参加生产的统治阶级所占有。在这个意义上，有阶级出现和存在的社会一定就是带有剥削性的社会，因为统治阶级的生活依赖于被统治阶级所生产的剩余。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p. 57, 58.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的阶级，而在资本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形态中，与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同的是统治阶级直接占有剩余劳动。比如在封建社会中，便是由封建领主占有奴仆的生产，这种占有往往是公开且直接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形式却迥然不同，并且不为人所察觉。而马克思就是想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发现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再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即一方出卖劳动力，另外一方付出此劳动力的成本。工人成为表面看来自由的拿工资的人，但是，不仅资本家凭借手中的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工人在其生产过程中还为资本家生产了超过其使用价值的剩余价值，而由资本家来榨取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所在，这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特征。^①

尽管有上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深刻认识，但吉登斯还是认为，马克思的理解过于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吉登斯则更加强调整剥削的普遍性，至少不像马克思一派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剥削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下的产物。因为，至少可以达成这样一些共识，即在阶级制度出现之前，剥削就已经存在了，另外即使是在有阶级制度的社会中，也并非所有剥削形式都可以依据阶级支配来加以解释。

基于以上这两点认识，吉登斯认为，尽管阶级关系内在地隐含着剥削关系，但是剥削的含义一定是超越于阶级制度本身的。实际上，剥削更直接的关联性概念是支配与权力，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剥削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支配，这种支配就是对于局部利益的利用或者驭使，比如对于自然或者人类的利用与驭使，便是这样一种支配。^② 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由此启动了一种意义的结构，使得支配群体的局部利益被合法化，换言之，也就是使得剥削性的支配（exploitative domination）合法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5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0.

化。结果——

所有的支配形式，都能够依据下面的情形来加以判定，即在多大程度上它们驭使了特殊的社会范畴、集体——或阶级——的局部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服务于它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为广泛的共同体或社会的普遍性（能够加以概括化的）利益。^①

这是一段较为抽象的概括，吉登斯试图借此来超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进而提出一种可能适合于所有社会形态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建立在吉登斯所说的局部利益（sectional interests）和普遍利益（universal interests）的相互关系之上，并且，这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依赖的。

这种彼此依赖，同样体现在吉登斯对于权力和控制的讨论上。他所坚持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在分析自主与依赖背后的权力关系时，首先要去分析“权力的制度化调解”（the institutional mediation of power）与“控制的调解”（the mediation of control）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吉登斯看来，这是分析权力关系的两种模式。^② 在这里，吉登斯试图重新去强调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trol）。此辩证法建立在下面这一前提之下，那就是并不存在某些持续、有效且完善的行动者对于另外一些行动者的控制，这是行动者与权力之间不断选择与再选择的过程，不存在绝对没有选择能力的被动的行动者。因此，控制的辩证法保有一定的浮动，行动者和权力约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互在做着策略性的改变。^③ 后来政治学者斯科特（James Scott）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从经验的事实上说明了这种控制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④

吉登斯提出的有关控制与权力之间变动性的理论，出发点在于人本身的认识能力上。这种变动性，归根结底在于作为社会再生产主体的人是一

①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1.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3.

④ See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种情境依随性的动物，因此，人的每个行动或者实践，都是依随另外一个行动和实践而发生改变的。与此同时，人还是有认知能力的社会行动者，这种认知能力，即所谓的“knowledgeability”，是在社会互动中得以体现的。这种认知能力使得我们有了两种社会实践，一种是需要付出努力或者认知判断的实践，另外一种则是无须付出认知努力的实践，后者更多是指约定俗成的惯例或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惯行性的日常生活。在吉登斯那里，这两种实践依旧处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中，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赖与转化的关系。在其中，我们付出认知努力的实践，将外在的共同的价值观内在化，成为我们行动的信条，并逐渐失去反思性的认知努力，使之日常化为一种合理合法的意识形态，以此来规约我们的行为。这种行为也造就了社会既有秩序的合法性，当没有人去反思既有秩序的合理性的时候，合法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结果是在某个特殊社会中，日常社会再生产中大多数人无须付出意识努力的惯行性的实践，与由支配群体或阶级所施加的规范性宰制的全面的、象征性秩序的建构之间有了一种区分。因此，上下之间、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在文化的精致性和世俗性上获得了一种区分，这一点不论是在小型的原始社会，还是在阶级分化的复杂社会，大约都是一样的。^①

在吉登斯看来，这实际隐含着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在借用了英国哲学家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所做的“知道如此”（knowing that）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之间的区分后^②，吉登斯为实践意识的内涵注入了一种新的意义，那就是实践意识不仅是“知道如此”，而且要“知道如何”。在一个支配与剥削并存的社会中，我们不仅要“知道如此”，还要知道剥削的支配是如何被合法化的。不仅要知道高高在上的、掌控着文化霸权的群体如何维持自身的生活与意识形态，同时还要知道，那些处在被支配位置上的人或者行动者如何限制或者抵抗那些高高在上者的支配和霸权。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7.

② See 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 1949, p. 27, in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8.

换言之，意识形态中的观念或者意义天然地就融入了人们的所做之中，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景之中。因此，在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信念之中，意识形态的动员并不一定卓有成效，相反，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通过把日常生活组织起来的各类形式来发挥其作用。对于这一点，吉登斯是深信不疑的。^①

第三节 结构化理论

可以说最能够突出代表吉登斯对于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性贡献的就是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他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此理论有详尽的阐明和应用。许多评论者，不论是批评者还是赞同者，都有一个共识，认为结构化理论代表了吉登斯对于社会学理论的一种新的综合，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的建构。^②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结构化（structuration）这个概念最为核心。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结构化这一概念的要义是指一种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这是跟社会生活自身的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特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结构（structure）与行动者（agency）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吉登斯对于结构二重性有这样一种界定：“对于结构二重性，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既是构成那些系统的实践的媒介，又是其结果。”^③

这是一种不在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之间做任何区分的理论建构。在此结构化的理论中，结构不仅是约束性的，而且具有一种能动性，而社会理论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要去研究操控这两者之间互动的社会系统的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Domination, Power and Exploitation: An Analysis,” p. 68.

② See Rob Stones, *Structuration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③ 原文：“By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I mean that the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social systems are both the medium and the outcome of the practices that constitute those systems.”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69.

织存在的条件。

基于这样一种联系，行动者主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与社会中的客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之间会保持一致。结构由此同时构造了人格（personality）与社会（society），但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保持一种独立性。其中的原因在吉登斯看来有下面两点，一是存在着行动的无意后果，二是存在着行动的未知条件。每一个行动的过程，都是一种新的东西的生产，而与此同时，每一个行动又都跟过去的行动处在一个连续体之中，而过去的行动，会为未来的行动提供启动新的行动的手段。

由此，吉登斯进一步强调，不要把结构看成行动的一种障碍，而要将其融入到生产之中，即便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情况也是如此。不管是极端破裂的社会结构，还是极端稳固的社会结构，在时间的延续之中都存在着一种结构化，即结构的转变。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后结构主义者的所谓解构（de-structuration）的概念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因为本来就没有所谓结构的约束性这一单一的维度，能动与约束、结构与自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①

因此，吉登斯强调的是结构的二重性而非结构的二元对立，这一点至关重要。结构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在互动过程中，规则和资源这两项结构属性既可以为行动者所利用，也可以为其所重新构造。结构因此也就成为在社会再生产中表达其自身的瞬间与整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这里体现的不是功能论者所谓的个体与群体、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协调，而是一种时空当中的存在与缺失之间的辩证法，这是通过在结构二重性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实际结构差异的秩序而得到一种再生产的。^②

在此再生产的过程之中，结构化的形态（modalities），即一种关系的结构，代表了结构二重性的核心维度。因此，结构化的形态是由行动者在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70.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71.

社会互动的生产中做出的，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关系形态。与此同时，它亦是一种互动系统的结构构成的再生产媒介。形态代表的是被作为社会互动系统的制度特征的规则与资源。形态是行动者具体活动时所启动的状态，它被看成一种知识的储备库、一种资源，依靠这些，行动者作为一种娴熟的、有认知能力的个体而进行活动。应该清楚的是，互动中的意义的交流离开权力关系的运作，或者离开规范的制裁的情境是无法发生的。并且，单单依据某一条规则和某一种资源来解释某种社会实践是不大可能的，这里更多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影响，是多种规则和资源共同发挥作用的一个结果。^①

吉登斯认为，对于具备一定任务的具体行动者而言，其结构化的形态依靠的是存在于头脑之中的解释性的图式（interpretative schemes），这是知识储备库里标准化了的要素，它们一定会被行动者在互动的生产中加以实际应用。这一解释的图示，构成了互动中的相互性知识的核心，并成为互动过程中相互持守的一种共同意识。这种意识是能够加以说明的，这种可说明性是跟语言的使用的场景（context of use）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在互动的意义生产中，行动的场景不仅是语言使用的环境（environment）或者背景（background），还是人身处其中的一个即时场景。

吉登斯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互动的背景是作为一种沟通性邂逅的互动中那一有机组成部分而被塑造和组织起来的”^②。对此，吉登斯做了进一步解释：在此种互动之中，一种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得到了启动，这种反思性监控会自动触及物理的、社会的以及时间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保持着一种可说明性的意义的存在。

与此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吉登斯强调了一种行动反馈的机制，也就是行动者在对活动场景的作用过程中又会使这些要素得以重新创造，并融入到此场景中去，成为此行动者行动的相关性要素，成为相互性知识中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2.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3.

一部分。换言之，在社会接触中，得到运用并重新得到构造的相互性知识，担当的是一种媒介的角色，借助此媒介，语言中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便有了一种可以被表达的秩序。^①

另外，人还有一种记忆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在社会的互动之中，意义的交流不仅是当下的即时性信息的交流，而且是在当下的交流和接触当中所隐含的对之前发生的事情的回忆，当然还有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期。每一次的互动和接触都应该是一次线索的启动，因此也隐含有一种德里达意义上的分延（différance）之意，另外，还是一种什么是可说的边界的提醒。人们说话一定是依赖情境的，离开这种情境说话，其意义就会发生改变，相互性知识的意义也会因此发生一定的改变。

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再一次受到了质疑。因为，正像吉登斯所提醒的，我们确实无法把说话的情境跟说话的内容分离开来。比如，我们能够理解某人说“桌子上的一支金笔”，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能够理解某人说“1978年5月9日上午11点30分在剑桥的米灵顿2A号后屋桌子上的一支金笔”，尽管两支笔实际上就是同一支笔。这是因为它们各自所启示出来的背景线索大不相同，实际上要是没有对后一支笔的背景性知识的理解，要真正理解对于这支笔的描述就变得十分困难。以此类推，要理解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人们总能说上几句，但对于在特定时空下的某个特殊的人，人们可能就一无所知了。

借此认识，对结构主义在意义获得上的那种抽丝剥茧式的还原论，吉登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还原意义到言说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或者反过来假定，言说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跟对意义特性的说明毫无关系。^② 在这里，吉登斯继续强调他的结构二重性的概念，也就是跟交流的意图有关联的意义与在语言的实践中由分延或者差异所造就的结构意义之间的结构二重性。^③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4.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5.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5.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还包含另外一对核心范畴，那就是规范（norms）与实践（practices）。吉登斯特别予以强调的是，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并非是实质性的，更多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在互动中，意义的交流所能获得的是一种规范性的认识，比如对于一种行动的说明就意味着能给予说明，这特指行动理性化的规范性这一方面。在互动双方中，规范是依随行动者的行动而被激发出来的。行动是依循一定规范的，这种规范体现在行动的规范制度当中，但在启动这些规范的同时，也在帮助行动者施展一种权力，并使其获得一种资源。对于这种双向的过程，帕森斯以双向偶联（double contingency）来称谓^①，也就是互动双方的某一方是依随于互动双方的另外一方或者另外几方的反应，来做出反应的，这种反应相对于后者而言，实际上又是一种潜在的约束力或者制裁力，由此构成了一种相互性影响的双向偶联。结果，一方面是行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权力自身也经由行动者在此过程中得到了一种施展或体现。^②

这种规范性的约束，或者制裁，乃是生成权力关系的一种资源类型。在吉登斯看来，互动的规范性构成就是“权利的实现”（actualization of rights）与“责任的实施”（enactment of obligations）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就是在社会接触的流动之中，规范不断地得到维护，同时也会不断地得到新的生成，这一观点成为结构化理论的一个核心。这样可以避免结构功能论所专门主张的由外而内的单一向度的“内化了的规范道德共识”（internalised value-norm-moral consensus），这是一种很机械地看待规范在社会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做法。实际上，在吉登斯看来，规范作为一种约束力或制裁力是可以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或者说可以由互动双方协商完成的，这是约束或者制裁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协商特性，也就是意义的生产与一种规范秩序的生产之间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一方面是行动者的计算与协商，另一方面则是服从与接受，这些都是特

^① See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951,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6.

定的情境中得以发生并相互产生影响和作用的。^①

那结构化理论又是如何看待权力的呢？其依旧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权力的，一方面是权力融入制度化的互动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借用权力来实现策略性的行动的结果。^② 行动在逻辑上是跟权力的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权力的概念本身具有一种转化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在行动哲学的讨论中，这一点变得极为突出，这里也体现出行动者能动性的那一方面。不过，在吉登斯看来，从权力的视角来分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文献，可能更多忽视了从社会学角度对权力关系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往往都会采取一种目的论的立场，其中权力被界定为行动者想要获得所渴望的结果的一种能力。

西方社会与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霍布斯、韦伯等，大都属于此目的论的代表性人物。而另外一种看法可以被称为“共同体论”，强调权力就是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属性，具有一种外在的集体性，借助这一属性，一种共同的旨趣，或者阶级的利益，会由此得到实现，而哲学家阿伦特以及社会学家帕森斯等，都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③ 这两种视角都曾经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占据鳌头，引领时代的思想进程，但是，在吉登斯看来，二者显然都存在不完备之处。这两种看法实际都指出了权力结构究竟是如何构成的，并由此提出了权力与支配之间关系的两种分析视角。前一种目的论的视角，把支配看成一种决策的网络，以此来抗拒未曾受到检验的制度背景。后一种共同体论的视角，则把支配看成一种制度的现象，也就是不把权力看成跟行动者积极主动的作为有关系，而是把权力看成是为制度所决定的。^④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非决定性的，比如暗自不知所接受下来的一些规则以及从来也不会去进行反思的那些实践活动。因此，分析权力的问题，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8.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88, 89.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89.

首先要超越结构与行动者二分的模式，权力不单单是由清晰的结构所制约，也并非是将结构进入到权力的实践当中去。要从结构化理论出发，借助结构二重性的概念来进行理解。应该清楚的是，权力的实施不是一种行为的类型，相反，权力是作为一种常规的以及例行性的现象而体现于行动之中的。因此，权力与资源是不同的，把权力本身看成一种资源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资源乃是一种媒介，借助此媒介，支配的结构得到了再生产。^①

在吉登斯看来，权力这一概念是指一种转化的能力，行动者自身的行动能力由此而被特别看重；同时，权力还是一种支配，即强调权力的结构属性。这二者都是在借用资源来实现和落实权力。有着转化能力的权力，借助于资源构成了一种在社会互动的例行性过程中的力量，也就是人们无须反思就能够照此按部就班地去行动；与此同时，资源本身还是一种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性要素，随着它们被利用而得以重新构建。在转变的能力与规范的支配能力这两端之间，权力乃是一种关系的概念，仅仅通过利用由支配的结构所生发出来的转变的能力来发挥作用。^②

同时，权力具有一种转化能力的特性，使其不可避免地跟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吉登斯批判了行动哲学中那种简单地将权力跟个人的意图或者意志联系起来的做法，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天然的联系。这初看起来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解释，因为，实施一种权力如何能没有背后的行动意图和想法呢？但吉登斯否定了二者之间有必然性的关联。

吉登斯认为，在上述这二者之间，实际上缺乏一种逻辑上的联系。其中最应该避免的就是既有的权力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学看法认为，决策一定是跟行动者所追求的目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问题是，权力只有在互动中才变得真正有意义，在行动者双方的互动之中，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2.

参与者有能力使那一互动得以持续下去，而且，在此过程中，互动还会受到参与者双方的影响。参与者之间的自主与依赖的关系就是在此互动之中得到再生产的，而权力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生产能力。

吉登斯强调，权力的关系一定是具有双向性的，不管权力关系中某一方的权力有多么小，双向性的关系都是得到确证的，而且权力的关系无疑还是一种自主（autonomous）与依赖（dependence）之间的关系，因为即便是最为自主的行动者，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处在权力关系中的行动者，即便是最具依赖性的行动者，也会有些许自主性。^① 这里再次体现了吉登斯所谓的一种控制的辩证法。

作为权力媒介的资源，吉登斯认为可以有下面两种：其一为权威（authorisation），它是指一种能够对人产生命令的能力；其二为分配（allocation），它指的是能够对于客体或者其他物质现象产生命令的能力。^② 而权威与分配又分别对应于两种约制形式（modes of sanctioning）中的一种或两种，一种为威压（coercion），另一种为激励（inducement）（见图 3—1）。这两种约制形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可以以多种形式组织在一起，比如奖赏可能以一种惩罚的姿态出现，而对于威压的逃避，又可能成为一种诱惑或者激励。^③

资源	约制
权威	威压
分配	激励

图 3—1 资源与约制关系图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93.

在吉登斯看来，这样一种区分至少可以克服两种社会分析取向的缺失，其一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社会分析的缺失，其强调支配与分配性资源（al-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0.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94.

locative resources) 之间联系的优先性。这样一种社会分析的视角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威权还可以作为一种资源,即一种权威 (authority)。在这派学者的眼中,威权不过是分配的衍生品。由此而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这种理论从有缺陷的角度去看待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因此无法涵盖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威的本质。另外一派社会分析的观点是所谓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theory of industrial society),其中威权不再被还原为分配,而只是把分配看成威权的一种特例而已。

在这里,吉登斯不是有意地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对立起来,正相反,他想尽各种办法去缓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强调在任何工业化社会中,威权都是实际存在的。这样,分配就顺理成章地被理解成威权的下属类型,或者是把从分配中衍生出来的权力看成只有在古典的或者初创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支配结构中才占据重要地位。^①但是,在吉登斯看来,上述两种社会分析模式表面上虽有差异,实质却是共同的。二者都很看重“废除财产权” (obsolescence of property) 这一点,前者强调的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而后者则强调通过逐渐的演化。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它们又都低估了在连续不断地造就出新的支配当中分配这一要素的重要性。^②换言之,“废除财产权”可能是一种虚妄,但是制造出新的财产关系的可能性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第四节 对结构化理论的批评的回应

吉登斯在回应一些人对于他的结构化理论的批评时,特别强调结构化理论不过是他全部成果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建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框架。吉登斯认为,他所说的本体论意味着“一种对于人类行动、社会制度以及行动与制度之间相互关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00, 10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01.

系的本质的概念性研究”^①。

作为学院派现代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登斯的问题意识来自古典社会理论。在试图对古典社会理论加以阐述和评价的过程中，吉登斯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吉登斯终究不是一位固守一义的注经学家，而是一位尝试对古典理论进行一种扩展式阐述的社会学理论家。如果去追溯这一理论，便会发现在1973年出版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吉登斯首先便提出了结构化（structuration）这一概念，但那时，他尚未意识到此概念在社会理论中可能具有的一般化的重要意义。^②吉登斯借用这个在法语学术界中很流行但在英语世界中却少有耳闻的词汇，最初就是为了强调在不同社会中阶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与变异性的本质。

阶级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而在一个群体的形成之中，阶级关系是最为基本的。并且，阶级关系保证了群体构成中的一种结构性分化。这种结构性分化，一方面激发了对于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对于阶级意识与客观存在的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但是，吉登斯特别注意到，与单单注意到了阶级关系的主观方面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所不同的阶级觉知（class awareness）这一概念更加看重行动者的即时知觉，即在此此时此刻的行动者是否直接意识到了他们所属的阶级，或者在日常的交谈之中，是否真的使用了阶级的概念。因此，吉登斯所说的阶级觉知更多的是指“表达阶级区分的认知形式”。这样一种认识，打破了那种僵化地看待阶级，将其看成一种阶级内部共同知识的阶级意识的看法，而积极主动地去看待阶级意识形成的主观方面及其过程。并且，有关阶级意识的知识是作为一个构成性的要素渗透进社会关系中去，因此也就无法在主观的意识和客观的知识之间严格区分出一个界限来。^③

①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hristopher G. A. Bryant & David Hary, eds., *Gidden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A Critical Appreciation*, 19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 20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01, 202.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3.

吉登斯借用“结构化”这个概念，试图对社会再生产的本质有一个比较完满而抽象的解释。因此，结构化的理论是关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ontology of social life）的，在吉登斯看来，这样一种本体论，应该对于行动的本质给出一种细致入微的理解。之前对于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以及对于这种方法的反对都在吉登斯的批评之列，在吉登斯看来，坚持结构化理论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理论在建构之始，不应该以个体或社会为出发点，而应密切留意“不断发生的社会实践及其转型”（recurrent social practic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①。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就不单单是涂尔干一派的社会学家所惯常注意到的社会的规则和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这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注意到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如何再生产或者创造出这些制度。换言之，制度对于行动者产生约束以及行动者在此约束中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系统或制度，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不可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对于这一点，吉登斯在其《社会的构成》（1984）一书中有极为细致的阐述。而之前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1976）以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1979）两书中，也有大篇幅的文字在论述结构化理论。在《社会学方法的新准则》一书中，吉登斯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引入解释学的视角到社会理论之中，试图借此将意义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放在各个层次社会分析的核心之中。并且他专门指出，社会学不可能完全是解释性的。而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一书中，吉登斯更多地集中于对结构主义者以及后结构主义者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更多得益于维特根斯坦对于差异的理解。这引发了吉登斯对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范畴的反省，这种反省同时也是其结构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处理现代性问题时，吉登斯遭遇了历史的概念。他注意到了社会科学无法避开历史学的探索，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本身都是历史学的。当然，吉登斯不是简单地去承袭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要

^①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3.

么是发生的事件，要么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而是对于历史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加以深入剖析。在此，他把时间性（temporality）的概念引入到他对历史的理解中来，如其所言：

我所要表明的是时间——以及空间——的概念，如何被带入到社会理论的核心之中以及接下来对于理解历史可能性的意义是什么。这一努力有一部分意味着，在书写时间性的历史之时，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空间，是如何在社会系统的差异性类型之中得到操弄，并由此而进入到它们的构成之中去的。^①

在此意义上，时间—空间就成为能够体现行动者行动能力的一个社会系统，这个系统隐含着时间与空间的规则。同时，这些规则也在不断受到新的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着改变。因此历史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变迁问题，历史的书写（writing of history）与作为历史的事件（events-as-history）合在一起作为一种隐含有时间性的存在而进入到人为的事务中，并影响到这些事务的过去与未来。因此，书写的历史本身就是现代有记录的历史成为可能的一种时间性的展现。^② 或者是一种之前和之后延续的证明，书写的历史在前，有记录的历史在后，共同构造了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谱系。

与此同时，时间性成为记录现代世界变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它自身也是现代性构成的一个核心特征。不可否认，社会学的核心在于对现代性的研究，而现代性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转变，特别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形态的改变，即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与此同时，社会学的研究本身也成为现代性的内在反思性（intrinsic reflexivity of modernity）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吉登斯认为，在所有社会之中，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一种自动化了的反思性监控的，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有类似的一种监控。这是现代性成长的一种必然结果，即在一个现代性发达的社会之中，它会不断地吸纳有关行动者行动状况的各种新信息，并以此作为使这些状况发生改变或

①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5.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6.

者对其加以重新组织的手段。而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反思能力又是跟启蒙运动的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新的知识论，个人的行动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知识的循环（circularity of knowledge），由此而保证的是最大限度的对于各种疑惑的生产而非对于确定性的生产。

换言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伴随着知识与信息的大量涌现，我们的生活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晰然后可以依循，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出现，甚至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样，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开始为各种新鲜的生活观念所瓦解。这实际上是知识不断进入到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社会又在不断产生新的对于知识的追求这样一种循环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再有所谓不可撼动的神圣性知识，“知识大爆炸”这个流行语对这种神圣性知识的存在是一种绝佳的讽刺，任何对于知识的主张，从原则上都必然面临随着某种新信息的涌入而被不断修改的命运。^①

这种知识的循环，快速地使人脱离开既定的生活轨道，也就是离开传统的生活越来越远。知识的多种主张以及知识不断改变形态而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一过程，影响和塑造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和安排，致使今天对社会生活的分析就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分析，而是要看到知识形态的多维性。这种看法，体现在其对于现代国家成长的社会历史学的分析之中。在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一书中，吉登斯特别强调了在制度的层面上，现代性如何表现出这种多维的特征。

这在一定意义上批评了一些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于现代社会本质的分析中简单地从一种主要的制度秩序入手的做法。^② 比如，资本主义与工业化（industrialism）之争就是其中一例。受马克思影响的研究者会认为，资本主义是推动现代世界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而工业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成长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而持相反看法的人认为，使今天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8.

生活脱离传统生活的核心动力在于工业化，而资本主义不过是工业化的一个分支类型，是现代工业化秩序出现的早期形态。这样一种争论，在吉登斯看来，都是有误导作用的，并且在认识上，也是有偏差的。他认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工业化，都部分是现代性的两个独立的维度，相互虽有重叠，但却是两个可以造就不同后果的独立部分。这两个维度，又进一步造就了超越其自身的第三个维度，如吉登斯所言：

就“资本主义”而言，我认为它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包含有货品与劳动力二者在内的竞争性市场。相反，工业化指的是生产中对无生命的能量资源的使用，并与再生产过程中的机械的核心作用相结合。现代性的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反过来又无法与信息的控制或者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中的行政力量媒介的“监视”分离开来。国家以及其他组织所能够造就的行政权力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直接后果，也不是工业化的一个直接后果，而是有赖于主体人协调一致的监督。^①

伴随着现代性而发展起来的监视还发展出一个单独的领域，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暴力，这是跟战争的工业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领域，被吉登斯称为现代性的第四个维度，其掌控着现代社会中施展暴力的手段。而这一维度在古典社会理论的讨论中是比较缺乏的。

与国家的监视能力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个核心力量就是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随着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军事力量发展的独占以及工业化不断从军事工业的生产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军事力量在今天的社会中变得极为重要，它成为国家强盛与否的一个标志。不过，这种力量的发展本身也会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无疑可以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安定感，但是，由军事力量滥用所导致的人类的灾难也可谓不胜枚举。两次世界大战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心灵的创伤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是安全（security）与危险（danger）并存的

^①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08, 209.

社会，用时下的社会学用语来说是信任与风险并存的社会。在吉登斯看来，信任（trust）这一概念是直接跟时空分离（time-space distancing）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现代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在于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活动场景中抽离出来，这种现代性的抽离化（disembedding）机制，曾经被吉登斯不厌其烦地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性的后果》等书中不断地加以阐发。在吉登斯看来，抽离化意味着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融入之中脱离出来，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上加以重新结合的过程。在这里，“抽离化依赖于信任，而这里，信任被界定为对于一个人仅仅拥有有限知识的系统或者过程的运行怀有（某种）‘诚信’（faith）”^①。这种信任，使得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于特定领域知识的追求，进而也就从此领域之中脱离了出来。

因此，我们会对本来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抽象系统给予极大的信任。这种系统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超出了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时空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了一种体现此种抽象系统的时空范畴，并使我们对于其运行和安全抱以一种极大的信任，尽管我们可能对于这一抽象系统究竟是怎样运行的所知甚少。当然，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银行系统。今天的银行系统，尽管仍是存储和信贷的一个机构，但是其内部运行的复杂性已经远非昔日的小银行或者钱庄所能够比拟。金钱成了一种真正的抽象系统，我们投以信任的是不断周转并且不论在哪里和在任何时候都不发生性质改变的金钱，而不是每次金钱交易背后的人。由此，金钱可以超越不同层次的时空关系而成为一种真正全球化的物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我们一般不会对其运行良好产生真正的怀疑。尽管有间歇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但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不大愿意去相信，这个抽象的全球金融系统有一天会发生运转失灵，这种信任可能要比对于某个个人的信任来得更加稳固，但很显然，这种稳固的信任是建立在一种脆弱的银行体系或者制度之上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社会中的抽象系统并非只有金融系统这一个，

^①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09.

而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都被这些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抽象系统覆盖了。甚至连我们非常私密的生活也无法避开这些抽象系统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逐渐地被这样的抽象系统取代或者覆盖，如生育、饮食、居住、出行等。对这些现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曾经以“生活世界为专家系统所殖民”（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by expert systems）这一观念来描述这种存在状况。但是，吉登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吉登斯认为，说白了这是一种日常活动愚笨化（deskilling）的过程，即指由专家不断地去发明知识，而与此同时，外行的行动者总是在不断地接纳新知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张，造就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愚笨化。而且，这种紧张关系，根本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之中的。这种反思性最终要求我们反求诸己，对自身的自我认同因为新的知识而表现出一种怀疑，进而去追求那种对于自我的新的认同。这是由于现代性观念支配下的自我观念面对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多重选择，在不断地转换地方性的时空联系之中，人们也在转换着对于自我的认识与理解。在今天，“追求一种自我认同”已经不再是先锋派呐喊的口号，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究竟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如何出行等问题，已经成为要不断去追问然后做出自己抉择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概念在不断地得到强化，同时也在受到新的信息的影响而改变着这种自我认同。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世界不单单是个人为非个人的制度所淹没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个人生活的本质正在发生着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型。^①在我们抛开传统的、地方性的亲属制度关系所建立起来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之后，我们实际上对于自我的界定就变得不是固定化的了，我们要不断地通过交往的实践来强化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因为每个人在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社会中总是会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寻求他人的开放与诚信，相互的自我闭锁，反而导致自我的存在成为一个最为值得怀疑的问题，成为一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11.

种需要通过反思来获得的对象。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我们必须为自己日常的生活做出一种抉择，这种抉择是否妥当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认同。在此意义上，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新的政治主张的角逐场，吉登斯称此为一种新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其与现代社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解放政治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追求，希望自身能够从一种受压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自我的解放或救赎。在解放政治中，总是会有“他者”（others）的存在，所谓与富人相对的穷人、与白人相对的黑人、与男人相对的女人等。但是，在生活政治中，这种“他者”却是无法找寻到的，因为生活政治所面向的是社会乃至世界上的所有人，希望的是使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和满足，因此也就无所谓对立的他者存在与否了。^①

换言之，在生活政治的世界中，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地泯灭，我们实际无法找寻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的存在。在一种全球视野的普遍主义的情怀之下，我们开始追问一些与我们的生活实际更加休戚相关的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下活动对于未来的影响、身体的控制以及再生产的能力、人居环境的美学等，这些都不是地方性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全人类以及全球都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都属于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的一种。^②

第五节 结构化理论的应用

吉登斯从来也不怀疑自己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在进行社会分析时的适应性。他特别强调，结构化理论中所提出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几乎可以应用在社会组织及其转型分析的所有领域之中。^③ 吉登斯还专门列举了三项他认为延续了他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而开展的实际研究，第一项是波尔曼

① 关于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详细讨论可参阅本书第五章第四节的内容。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12.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13.

(Patrick Burman) 有关失业的研究，第二项是康内尔 (R. W. Connell) 关于性别与权力的研究，第三项便是丹德克 (Christopher Dandeker) 有关监视、科层制、权力以及战争之间关系的研究。^①

首先，波尔曼的研究关注的是 1982—1983 年之间发生在加拿大一个地区的高失业率问题。^② 波尔曼认为，之前有关失业问题的研究很多都是高高在上的空谈，许多研究都是通过大范围的人群来进行问卷式的调查，然后得出一般性趋势的判断。这是一种从远距离去看待失业问题的研究，将具体的失业问题，转化成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各种属性和功能的解释，离实际的失业者自身的问题相去甚远。在此类被波尔曼视为成问题的研究中，见不到实际的失业者，更见不到这些失业者作为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在经历了多种生活经验之后成为失业者的种种人生履历。在波尔曼看来，这是一种不以主体为中心的研究，而主体是一个有着自身感受的行动者，在逐渐失去工作的过程中，这些人的自我感受也在发生一种转变。在此过程中，失业者会感受到生命的无意义以及为社会所愚弄，有些人会因此而沉沦，但也有很多人会开始重新寻找生活的中心，寻求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以及物质生活条件。在对这些失业者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波尔曼借用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 (the duality of structure) 概念。因为波尔曼所研究的对象是周期性发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recurrent social practices)，并且，其关注的核心是启动某种实践如何影响到大的系统，同时如何改变宏大的程序化的秩序。也就是所谓的个体、家庭、小群体以及朋友之间这样的微观社会领域 (microsocial sphere)，如何与失业组织、地方性联合会、地方性企业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这样的所谓中间的共同体领域 (intermediate community sphere) 以及包括国家的科层制在内的更大的组织这样的所谓宏观社会领域 (macrosocial sphere) 相互交叉互动。在这中间，波尔曼特别关注在这些失业者的生活世界中，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安排是如何被组织起来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13 - 218.

^② See Patrick Burman, *Killing Time, Losing Ground*, Toronto, Wall & Thompson, 1988.

的。结果他发现，失业不仅在改变着失业者对于时间的感受和体验，也在改变着分配时间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全职工作的人，是以一种相当固定的方式来安排时间的，每周、每月、每年的安排都很有规律。但是失业者的时间观念和时间安排则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时间可以说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一种有序的结构安排，这是与他们没有固定工作的状态相匹配的一种时间安排，这些人要去上补习班、做义工、满足业余爱好或者是做家务活，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无所事事，靠睡大觉、看电视、去公园闲逛等来打发一天的时间，这种无所事事也是失业者的一种时间安排，尽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康内尔的研究所处理的主题是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尽管康内尔对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所批评，但他还是借用了吉登斯所提出的行动者/结构 (agency/structure) 关系的解释框架。^① 在这一点上，康内尔基本上延续了吉登斯的主张，强调“结构和实践的积极呈现以及因实践而有的结构的行动构成” (active presence of structure and practice and the active constitution of structure by practice) 这两方面。^② 借此洞见，康内尔详细分析了在结构背景下的性别关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性别意识形态凭借话语、句法以及象征性的力量而得以表达，这是权力区分的一种表达，在这个过程中，男性的支配得到了再生产。由此研究可以看出，所谓的男人性 (masculinity) 和女人性 (femininity) 这样的概念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而大多是在权力分化的背景之下不断得到重构和改变而实现的。雇主和秘书之间预先设定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等就必然会造就接下来的一种性别角色上的分化。还有很多看起来很迷人的表达都在暗自传达着一种男性支配的霸权，比如流行杂志、电影、电视中对于英俊男子的描绘，它们不仅在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在传达一种性别分化的姿态，那就是女性的从属地位以及边缘人角色。

① See R. W. Connell, *Gender and Pow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② See R. W. Connell, *Gender and Power*, 1987, p. 94, in Anthony Giddens, "Structuration The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 215.

丹德克的研究在解释现代社会的行政权力的本质上有独到的见解。^① 尽管丹德克对于现代监视 (surveillance) 的研究源自福柯的洞见,但他还是延续了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的诸多思路,如监视与现代国家对于军事力量的控制,进而这些又延伸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领域中去等问题。现代军事力量的增强及其规范的科层制模式在其他行政领域中的扩展,都为现代科层制度的发展以及控制力量的提高提供了一种可资复制的模板。丹德克的研究还进一步指出,以监视力量逐步增强为特点的现代国家,不仅做到了政治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相互分离,而且使得政治和经济领域与军事组织分离。现代工商业监控能力的加强使其脱离国家的直接监控,这不仅强化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监视与被监视关系,而且使市场的运行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种监控。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个人依附于非人性化的规则控制变成常规性的、正式的法规约制。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强化人与人之间团结和融洽的管理模式,比如日本的从人际关系出发进行管理的模式也在发挥作用,而这些又都可以与企业自身的搜集、整理和加工信息的监视机制相分离,各自发挥其作用。并且,通过反馈机制,各类组织所储存的档案资料,又反过来通过现代信息系统那极为快捷而有效的提取机制进入到实际组织的运行中去,并影响到组织运行的未来。另外,在各类组织的不同等级上发挥作用的各类技术本身也在担当着监视者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中,掌握了某类专门技术,就意味着在权力体系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专门的技术便和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最近的研究中,吉登斯开始试图广泛地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全面地运用他的结构化理论,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于气候变化这一新的世界政治议题的讨论上。^②

^① See Christopher Dandeker, *Surveillance, Power,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② 参见赵旭东:《以梦想取代噩梦——克服“吉登斯悖论”的一条出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7-20。

对人类而言，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萦绕人的脑际，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噩梦。我们恐惧气温上升，恐惧由碳排放而形成的温室效应，我们还会恐惧当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人类将如何生活。当然这还不包括由核燃料、流行病、瘟疫以及食品安全所带来的各种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危机和风险。这些都如恶魔一般困扰着我们的实际生活，我们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所看到的都是这些负面消息，似乎对于“好消息”失去了乐趣，尽管我们从本性上都在渴望好消息的来临。但是新闻媒体的制作者们并没有什么兴趣去报道好的消息，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将失去崇拜他们的读者群而不是读者本身。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不断地放大“坏消息”的来源以及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天气的些许变化就可能使我们像妄想狂般地联想到“人类的末日”，尽管我们并不排斥人类的美好未来，但是，我们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夸大其词的媒体语言所包围，现在真的一下子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末世论者。

对于这些疑问，吉登斯在他最新出版的著作《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给出一种全新的理解。^①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上的这一困境，为此他提出了一个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悖论，即“吉登斯悖论”，在这悖论背后仍能见到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影子。他是这样引入这一悖论的：

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再去临时抱佛脚，定然是太迟了。^②

这一悖论可能也是人存在的一种悖论，人们不会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特别是年纪轻轻且身体健康的时候，去构想自己可能死亡的噩梦，但是，当有一天不健康的身体真的到来时，已经是不能够挽救的了。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中国古代的扁鹊去见蔡国的桓公时践行的就是这个逻辑。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1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② [英] 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2 页。

开始，他指出了桓公身上微小的病症，认为尚可医治；但是，桓公不大理会，认为是无稽之谈。但到后来，桓公真的病倒，扁鹊自己也跑得远远的，倒不是他不想给桓公医治，只是那时病人骨髓，像扁鹊这样的神医也没有办法了。因此，“吉登斯悖论”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我们两千年前的古籍上就有记载。问题可能是，既然称之为悖论，就一定有其中难以解决之困难。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一个四十几岁正血气方刚的人，告诉他死亡即将来临，那是不会有什么真正提醒的效果可言的。而最为根本的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依旧在延续这样一种悖论，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结果造成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末世论调，认为这个地球由于人们的恣意妄为而面临着无数的风险和危机。

那么，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姿态去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可能是吉登斯提出“吉登斯悖论”的初衷所在。因为，我们今天气候变化的政治，太多的是在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之中寻求气候变化速度的减缓，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是，人们在口头上接受低碳的生活方式，而在实际生活中可能进一步加重了甚至强化了碳的排放。比如为了消除碳排放而增加的新的形式的碳排放。

或者说，今天气候变化的政治，实际上在助长而不是抑制末世论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绿色看成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的东西，这本身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种把自然的自然变化跟我们的生活处境联系在一起的新意识形态，它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政治的新支配形式。原本和外部政治并没有直接联系的家庭空间将会因此而成为这种新支配形式的演练场，餐桌上的绿色食品，电视屏幕下方滚动着的雾霾天气的橙色、黄色预警，都在提醒我们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那些需要时时注意并加以服从的方面。实际上无人能够逃脱这种支配，因为它声称是有助于你的健康和生命的。但要知道，对人类而言，在绿色之外，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比这种在全球得到认可的绿色政治更为重要的、影响我们大众生活的问题，比如化石燃料的枯竭、核能源使用上的风险以及各种侵蚀人生命的不治之症，而这些单单依靠绿色的政治经济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越来越多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风险，我们并没有像扁鹊那样的神医来指出这些风险存在的真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夸大了某种风险，就是轻视了另外一种风险。对于一种风险的认知，完全变成一种依据主观感受的自我判断。这种心理认知上的偏差，随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而成为一种风险神话在社会中盛行。从本性上而言，这种神话不是以一种梦想实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以魔鬼缠身的噩梦形式表现。今天，伴随着沟通媒介的发达和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拓展，我们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加有意义，而是越来越陷入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噩梦循环中去。这些噩梦的造就，不能不说跟社会中的一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绿党分子自我意识密切相关，他们实际是在单方面的过度强调某种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可能执意为了说明气候变化可能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一味地去夸大跟他们的想法相近或可以拿来佐证自己先入为主的信念的正向证据，甚至因此有意忽视或者掩盖并不支持他们观点的假设以及否定跟他们那些假设相反的信息和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当这些人的话语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的主导话语时，整个社会似乎也就没有了出路。大家，即我们日益觉醒的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完全生活在一种被这些人制造出来的噩梦之中，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和来势汹汹的全覆盖，似乎这个世界之中无一人能够幸免于难。

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如果噩梦能够唤起人们生活 and 行动的勇气的话，那么承担噩梦给我们生命的耗费所带来的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是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吉登斯非常睿智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不去呐喊“我有一个梦想”，而是反过来说“我有一个噩梦”，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于他，为他的理想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一点的反省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选择的立场，否则我们可能将失去使未来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建设者和追随者。

可以这样说，人的生存困境之一就是人无法确切地预知，他将在什么时间离开这个世界。因此，任何在他认知经验范围之外的预言都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对他们而言，都可能是空洞无物的。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为自

己的未来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梦想。这梦想也许就是一种人们可以因此而得到转变的生活契机。吉登斯这位社会学家一再强调风险与机遇并存，那并非社会学者的喃喃自语，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理论的含义，它告诉我们，任何不切实际、一味强化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带来厄运的做法，只会使人陷于噩梦的无助之中不能自拔，而处在这种无助之中的人们，更可能采取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来摆脱这些噩梦，如果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真正可以看清方向的出口，那结果可能就是，产生一种范围极为广泛的社会紊乱，并导致人们的自我毁灭。

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聪明而睿智的政治家，在管理一个成功的社会时，一定是为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每天都可以做醒来就有可能实现的美梦的社会机制。如果缺少了这样一种社会机制，社会的失灵可能是其他所有失灵的总前提，因为，不能否认，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所组成的，没有为这些人制造出一种类似心理学家所说的“安慰剂”的社会药剂，那么，所有的社会规划都可能成为人们噩梦的来源。

今天，一方面气候变化像恶魔一般笼罩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家似乎并没有真的相信，这些恶魔般的神话会真正发挥它们恶的效应。在诅咒雾霾天气的同时，人们为了舒适照样购买高排量的越野汽车，照样不参与到切实可行的碳交易中去，照样过着一种碳排放量很高的生活，因为他们不仅看到身边的其他人在这么做，同时也没有真正见到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他们所身处其中的气候变化究竟有什么实际的影响，甚至有人还会饶有兴味地注意到，气候并没有因此而变暖了，而是变冷了，尽管气象学家在“气候变化”的新幽灵之下想尽办法去自圆其说，但是对于气候变化的非因果决定性，他们似乎只能拿狡辩来做一种搪塞了。

总之，人终究不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就像一种纹饰品一样，在为人们原初的赤裸裸的生活提供各种意义的伪装，这种意义掩饰了人们实际生活中的窘迫和不安，使得人们能过没有不安全感的安宁生活。这种意义还会通过人们不断为自己设立的美好梦境来不断地自我固化，成为我们思想中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在今天，一个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就是，

没有哪一个人愿意生活在噩梦之中，人们从小就希望实现的是自己梦想中美好的东西，而这成为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也正是吉登斯在书中所一再标明的“气候变化的政治”这一主题的核心意旨所在，也是他的结构化理论在真实世界中的直接应用。他在这方面不遗余力地介入到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中去，试图在个体的自我和现代性的改变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这便是下一章所要论及的吉登斯有关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理论构建，它的基础还是这一结构化理论。

第四章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本章主要讨论现代性的到来对社会的全面影响。首先说明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定义及其特征，再阐述现代性对个人自我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总的来说，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使社会变成了一个风险社会，这个现代社会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它是人为制造的且难以控制。这就造成现代人必须具有反思性思维，于是怀疑精神成为现代人普遍的心态。个人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时，对以往的经验 and 知识不再持“一蹴而就”的心态，而是强调不断地更新自我，以便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人身上的这种变化（根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方法论）必将导致制度也具有反思性。但是人越来越多地和抽象系统而非活生生的个体打交道会逐渐让个体丧失生活的意义，同时形成一个多元自我。在这样的环境下，纯粹关系仿佛大海上的一根救命稻草，变得无比重要，但是这种基于亲密关系的社会联系同时也十分脆弱。不连续的现代性同时带来了时间和空间的抽离，事物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又在一定的时空内完成了重嵌。最后，本章讨论了传统、绝对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

现代性的问题在今天或许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值得人们去深入探讨。它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改变了我们的传统意识和社会理念，重写了宇宙秩序的古老神话，总之，它成为我们当今社会所有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一切的变革、一切的觉醒乃至一切的重建都可以与这一概念建立起某种联系，或者说由这一概念而受到启迪。吉登斯在努力澄清着现代性概念的真正内涵，试图使其跟我们当下生活方式的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在现代性的招牌之下，我们社会中的很多机构都在改换着自己的门庭，重新组织和命名自己的生活，作为生活于其中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人们在为现代性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和社会的生活，包括他们对于自身的种种认识。

第一节 现代性与风险社会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呢？吉登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集中在他 1990 年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这本书中，在那里，他对现代性这一概念有较为详尽的说明。^① 简单来说，所谓的“现代性”指的就是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方式，大约出现在 17 世纪以后，后来其影响开始遍布整个世界。^② 如吉登斯所言：

何为现代性，首先，我们不妨大致简要地说：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③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 页。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1.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1.

这一段话已经明确地向我们揭示，现代性是欧洲社会的产物，是伴随着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欧洲以及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其制度性的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吉登斯曾经总结过现代性的四点特征，分别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化（industrialism）、监视（surveillance）以及军事力量（military power）。^①

在吉登斯看来，作为现代性制度维度之一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一个最为核心的特征，它体现在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之中，在这种体系中，核心就是资本的私人占有与无产者的工资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关系，由此构成了一种阶级分化社会的主轴。而作为现代性四种制度维度之一的工业化，其核心的特征是物品生产过程中物力的使用和机械化。这是一种借助非个人的物质力量而对个人之间社会互动关系的一种安排和控制，以此来使人的活动、机器的生产以及物质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这种工业化在今天也同样适用，在今日的高科技之中，电力成为唯一的动力来源，而微电子电路替代了传统的机械装置成为新的机械化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工业化，不仅影响着人们工作的场所，而且影响着包括传输、通信以及家庭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②而且，作为现代国家独特性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使现代性的第三个维度得到了一种突显，这就是以领土边界监控为基础的监视能力的增强。这种监视能力，最开始是从行政体系的政治监督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不断扩展到监狱、学校以及工作场所等社会场景中去。最后，现代性的第四个制度维度是对于暴力手段的控制，也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军事力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成长。^③

在图4—1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所绘制的现代性的这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在这四维度所构成的一个循环之中，靠左边的这部分为竞争性劳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p. 55 - 60.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56.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p. 57 -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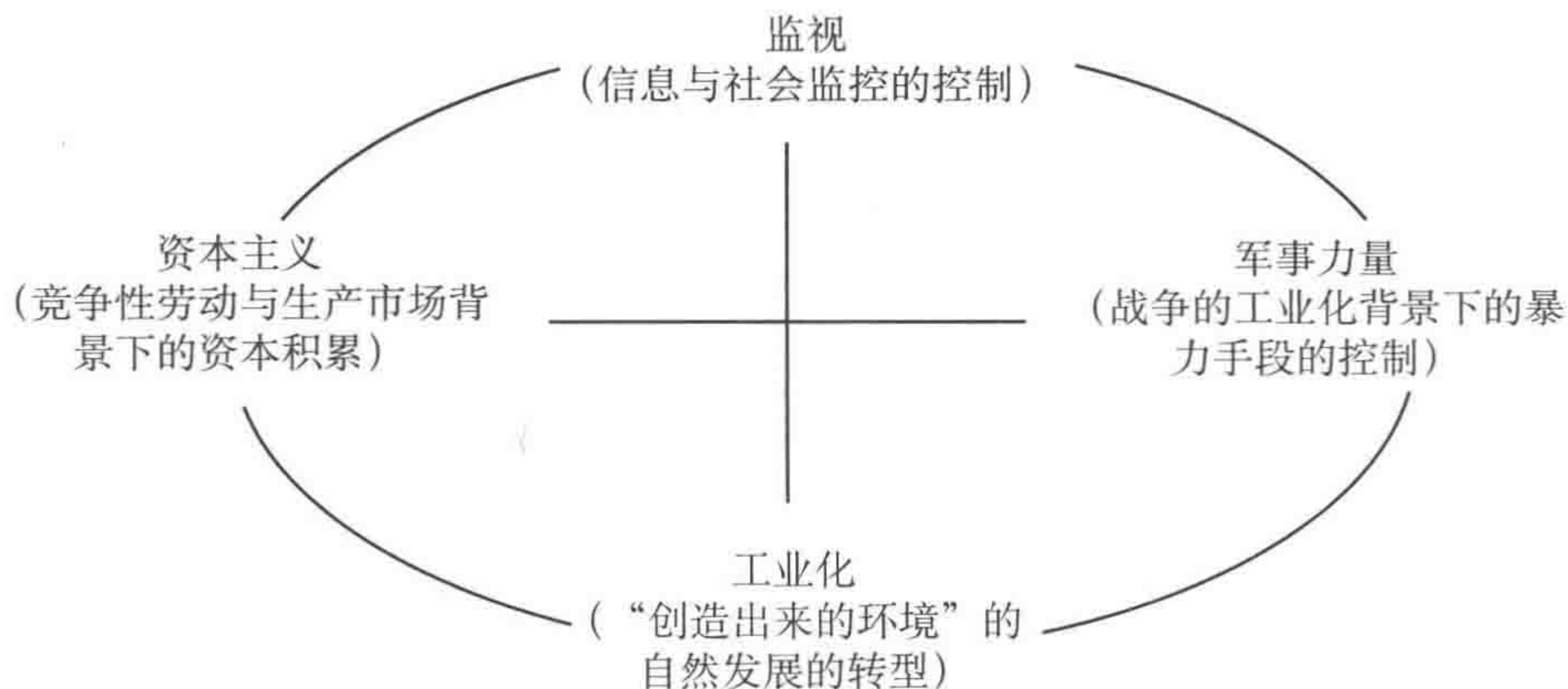


图 4—1 现代性的制度维度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 p. 59.

动与生产市场之间的隔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隔离。但是，监视能力的发展反过来又是跟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发展，这又进一步与作为警戒的军事力量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惩治社会中越轨行为的新的犯罪法案的实施，民族国家可以通过监视的手段，来强化其军事力量对于暴力行使能力的独占。军事力量的成长对内是一种支持力量，特别是从国家对于市民生活的合法性支配而言，而对外则是一种对于邻国及其他国家的威慑性力量。^①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话语乃是牢牢地建立在个人的自由（freedom）与自律（autonomy）的概念之上的。依照吉登斯的看法，可以把现代性定义为：“首先是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建立起来的制度与行为方式，但是到了 20 世纪，它已经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影响。”^② 换言之，现代性出现于 17 世纪，并在 18 世纪积聚力量，逐渐形成一种向全世界发展的趋势。

在现代性的话语中，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对立，这是从这一话语自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p. 59 - 60.

②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4 - 15.

身当中生长出来的，即“自由的实现”（realization of liberty）与“自由的削弱”（undermining of liberty）这两者之间的对立。^① 结果，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叙事（discourse narratives），一为自由的话语（discourse of liberation），二为惩戒的话语（discourse of disciplinization）。自由的话语处在了现代时代的最开端处。它可以回溯到科学革命的时代中对于科学自主的追求上去，还可以回溯到政治革命时代的对于自我决断的诉求上去，甚至可以回溯到在一个绝对主义国家的监督与约束之下，经济活动逐渐从其中解脱出来的那个时代里去。

过去，对于功能上有序的社会这样的观点，大家一般都是持肯定的看法，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在，这已经失去了其广泛的力量。由这样的思想脉络来看，有些观察者注意到了，社会秩序出现了一种趋向瓦解的倾向。更进一步而言，对于制度上的安排与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无法统一的经验发现，现在都有了很多的报道，而这些，都无法单单用功能这样的术语来加以调适。在目前的阶段里，对于秩序的强调逐渐松弛了，自由的话语完全采取了一种“对于个体化给予褒奖”（a praise of individualization）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②

在吉登斯看来，21 世纪之初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性的问题。^③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现代社会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我们个人的经验。因为，尽管现代性首先是从制度层面开始的，但确实是经由每个人的实践而得以完成的，在此意义上，由现代制度所带来的改变，自然也会深入而直接地影响到个体的生活，进而还会影响到个体对于自我本身的认识。现代性在两个极端上都在发挥着一种影响力，一个极端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向外拓展性（extensionality），这特别表现在全球化的影响上，现代性的拓展性使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拓展到了

^① See Peter Wagner,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5.

^② See Peter Wagner, *A Sociology of Modernity: Liberty and Discipline*, p. 6.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 1.

西方世界以外；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不断向内延伸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这直接影响到了个人的心理倾向性。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之间的相互性影响构成了吉登斯在撰写《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时最为核心的一个出发点。^①

而能够将制度层面的现代性的安排与个体的自我认同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概念就是吉登斯专门使用的“现代性的反思性”（modernity's reflexivity）这一术语。这一术语的基本含义就是，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制度以知识的形态进入到我们的反思性中去，并由此来影响我们对于行为的引导。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各种治疗方法以及生活指导手册之类的自我服务性质的帮助，都属于这类知识的范畴，它们进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并使我们在其中有所选择，而做出这种选择的基础就在于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本身。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生活一个无法避开的特征就是，借助某种旨在分离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而使时间和空间得到重新组合。正如前面一章所提及的，这种抽离化机制的核心就是要使具体的社会关系从特定的地方性中脱离出来，并使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距离上得到某种重新结合。而此种重新组合，外加一种抽离化机制，就使得既有的现代性制度化的特质变得更加极端化和全球化，并进而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内容和本质。^②，无一人可以真正从中逃离出去。吉登斯曾经断言，“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③。这种状况是人为了适应自然的约制而不断积累适应性经验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此适应的过程中，命运的概念首先会被打破。

可以肯定地说，在前现代的文化中，其宇宙观或者哲学范畴中一定都会包含有某种形式的命运的观念，这种观念引导着人们对于自然存有一种敬畏，人们会有意地把个体的生活与宇宙中所发生的事件直接联系在一起。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2.

③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2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比如在希腊的思想之中，命运（moira）这个概念是指厄运与死亡的携带者，它被看成比最古老的神还要远古的一种巨大力量。^①

这种命运理念与中世纪后期的那些命运理念之间的一个主要联结点便是运气（fortuna）这个概念，这个词最初源自罗马文化中“幸运”（fortune）女神的名字，并与那时主流的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神圣自然力的理念，显然是一种命运的观点的反映。但是，韦伯却指出，基督教为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引入了较之传统的希腊和罗马宗教角色更为灵活的角色。^② 教会开始对这位女神表现出一种不满，因为“运气”含有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不必作为上帝的工具为之工作便可以获得的某种荣耀，而这显然是向来为教会所排斥的一种观念。^③

吉登斯认为，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出版《君主论》便是一个转向的标志，这意味着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运气含义中那无法抵抗的命运之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对于自然和生活环境的驾驭和控制。^④ 在那个时代，马基雅维利的语言具有一种诱惑性，人们开始有了对于自我潜力的清醒觉知。马基雅维利是这样表述他的主张的：

有许多人现在仍然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以某种方式由运气和上帝所控制的。而且，人是不能够凭借他们的睿智来控制它们的。正相反，人们对它们来说丝毫的改进也没有。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断定对这类事情不必有过多的辛劳，而应让它们随命运去摆布……我断定正确的看法是，运气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但是她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对另一半或几乎是一半的控制……我说的是某个人看见一个君主今天荣耀有加而明天又垮了台，从这里并没有看出他的性格或他的特质有什么改变……一个完全依赖于运气的君主在遇到命运变化的时候便会倒台；我还相信，君主的行径在顺应于时代的

① See Liz Greene, *The Astrology of Fat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4.

② See 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1963.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26 页。

④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26 页。

特征的时候，便会成功，而他的行径与时代不合拍时，便会大祸临头。^①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马基雅维利在使用“运气”这个词时跟传统意义的背离，在这个过程中，人从融于自然之中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像斗士一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做着各种努力和拼搏。此时，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的概念被去除，取而代之的是“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或者说是某个个体改变自己命运的多种可能性。随着克服命运折磨的努力的经验积累，人们在面对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或者在要做出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的时候，总会去请教某种专家，这里专家便是一个中介，通过这一中介，某种特殊的情境才被宣称为是富有命运特征的。并且，对于确保个体本体论安全而言，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也构成了一种威胁性的力量，它在试图打破由自我的本体论安全所构筑的一个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的自我保护壳。它们在不断地引诱着个体，让他/她必须重新开始一些新的事情。^②

但是，在此新事情的启动过程中，风险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尽管积累了最为丰富的控制和驾驭自然的经验，但自然的变化无常，也使得人们难以完全加以抵抗，这便是现代风险社会出现的可能性前提。它是高后果的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所带来的一种对于社会组织的影响。不同于中世纪宗教所宣扬的末世论调，高后果的风险相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是一种独特的风险类型，它是在现代世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吉登斯甚至断言：“半个世纪以前，人类尚未受到这种威胁的煎熬。”^③

如果说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那么知识就是足以体现这种理性探索成果的积累。但是，吉登斯特别注意到，与传统社会的知识有所不同，伴随着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不断增强，知识的不确定性被发展到了一种

① 转引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27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31 页。

③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40 页。

极致。最初由笛卡儿所倡导的怀疑精神，不仅在哲学家的思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开始蔓延和渗透，并成为当下生活世界中一个通俗化和普遍性的存在维度。换言之，一种怀疑精神所造就的种种新知识进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供人们选择，同时人们的生活也必须在这些知识之中加以选择，生活才被认为有了一种安全感。

在吉登斯看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就了一种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的增加。由于知识被看成是不断发展的，任何完美和精确的知识都被看成仅仅是暂时性的，随着新的科学发现的增加，旧有的知识就成了一种过时的甚至应该予以抛弃的知识。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开始接受现代的知识理论，认为求知过程就是一个验证假设的过程，因此，许多假设可能会同时存在，它们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并通过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而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在无形之中增加了知识的多样性，当然也会使人的选择有所增加。超市应该说是这样一种人的选择性图景的最佳范本。在超市里，同一类的物品便有多种形式，并且，每一样东西都有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含有自身的知识证据。比如鸡蛋，不仅有普通的鸡蛋，而且有无污染的“绿色”鸡蛋，甚至还有专门培育的“双黄”鸡蛋。对于消费者而言，其究竟选择哪种鸡蛋去购买，这不仅是一个消费偏好或者经济学的问题，还是在他的营养和膳食知识储备库中，对于这些加进了人的知识创新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不同形态的鸡蛋的知识积累以及是否愿意对这类商品加以接受和消费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会称现代社会之后的社会为“高度现代性”或者“晚期现代性”的社会。这种社会不同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制度的设计需要经由一种人的自我反思性的努力来实现。而这种自我反思性之所以可能，基础恰在于知识存在的选择和可能的多样性。因此，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而与之相伴的就是信任和风险概念的广泛应用。^①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3.

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属于人格发展中的一种特质，并与获得一种早期的本体论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紧密相关，这是儿童及其看护者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信任在此意义上有一种“保护茧”（protective cocoon）的作用，它使一个人在日常的活动中免受危险和威胁的困扰。在现代社会，个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被转化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信任关系，也就是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跟一个抽象系统发生联系，在这个抽象系统中，传统信任中的日常交往是缺失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跟抽象系统之间的抽象交往。由此，吉登斯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现代性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风险。如其所言：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比之以前惯常的生活更为危险，因为对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由外行行动者还是由技术专家来组织社会世界，风险概念都是基本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借助知识环境的反思性组织，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入现实之中。现代性条件下的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拓殖。但这种拓殖本质上不可能是完全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的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价时，风险的考虑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价要求精确，甚至量化，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价是不完备的。由于现代制度的变动特征，伴随着抽象系统可变的且常常引发争议的本质，大多数形式的危险评价事实上都包括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①

换言之，现代性无法根除风险，一些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特定种类的风险，也许会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减少甚至消除，比如干旱导致颗粒无收的农业风险就因为电力和灌溉技术的发达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现代性也会引入之前时代闻所未闻的新的风险种类。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这些风险是来自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现代性的社会体系，因此属于高后果的风险，这也是吉登斯称当下的世界为“晚期现代世界”（the late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3.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4 页。

modern world) 的主要原因, 这种高后果的风险因此也是难以精准预测和为人所把握的。

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个晚期现代世界之中, 风险不仅可能导致某种灾难的发生,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有许多风险是以前的人闻所未闻的。吉登斯的预言也许在不久前发生过的 SARS 病毒、禽流感以及甲型 H1N1 流感病毒等接二连三的流行性传染病中得到了清晰的验证, 不仅这些疾病的真正原因现在不得而知, 即便是知道, 对于哪个原因是根本性的或者决定性的, 也众说纷纭,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这些病毒肯定是以以前人们没有听说过的, 是全新的。

另外, 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制造的知识的创造一直也没有真正停止过, 因此与这些武器的新形式的发明和使用相伴随的全球性风险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世界性的有关核武器的谈判也就不可能有一个终点。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人类可以在瞬间对自己的同类加以种族灭绝性的攻击, 这种攻击曾在二战后期广岛的核爆炸中得到体现, 而那次爆炸相对于今天世界上所拥有的核武器而言只是一次威力很小的爆炸, 但即便是这样也已经造成了一个城市的毁灭、二十万人的死亡以及数代人都无法忘记的灾难记忆。而由现代技术所造就的自然的“终结”也许更加骇人听闻, 我们所谓的“自然”, 几乎已经全部为各类新技术所取代, 在人可以主导世界的口号之下, “自然”被人的种种有意为之的行为扼杀和破坏了。在此意义上, 生态环境遭到一种近乎灾难性的破坏, 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无法清楚地辨认出, 究竟哪些属于真正的自然灾害, 哪些又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自然灾害。

还有经济的全球扩展所带来的各类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不论我们如何小心地避免, 经济危机终究会间歇性地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 而这个过程, 又是与跨越国家界限的超级国家的成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远距离的危机事件的发生, 对于近距离的个人日常生活以及人们对于自我的看法, 都造成了一种实质性影响。通过电视报纸或者网络, 一个身处偏僻乡村的村民就可以了解到在世界另外一端每天所发生的事件, 比如空难、水灾、海啸以及暴力冲突等, 人们的生活以及

对于自身生活的反思，也会因此而受到一种激发并得到调整，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非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来，那么在维持自我认同的方式上的转变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观测角度。在传统社会中，自我认同的维持是一种沿袭，也就是对之前时代人们生活 and 思维方式的学习与模仿，这里不需要有太多的反思能力去进行创新和改造，只要依照传统并承袭传统即可。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知识和文字的广泛使用以及显而易见的教育普及为这种广泛性提供的制度保障，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使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行为，所依赖的就不是某种守旧的传统，而是一种反思性能力的知识创新，人们以此来确认自我思考和行动的方向，在此分析基础上，吉登斯会说“自我认同成了一项借助反思性来加以组织的事业”^①。

在这里，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中，自我是通过外在的影响来加以构建的。维持一种自我认同，也就是在维持一种对于自我的不断的建构，这样一种自我建构，在吉登斯所谓的具有高度现代性的“晚期现代世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面对由现代知识所构成的抽象系统中，多重选择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每天人们都需要为选择一种有益于自身及家人身体健康的食品而做出一些必要的决策，人们还会为哪一种房子会带来更大幅度的增值而进行选择，如此种种的选择性的实践都规定了当下世界中生活的样态。

就如同做交易一般，每个人都需要和自己的欲求对象进行不懈的协商，以获得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多重选择，其基础是建立在今天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受到了社会的容忍和赞许之上的。同时，社会也在使自身变得更加开放，以此来接纳多样性的生活方式。而与之相伴成长起来的，就是，人们行动场景的多样化以及权威模式的多元化，这些进一步强化了在人们的自我认同中对于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依赖。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5.

第二节 现代性与自我的重构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需要直接去面对一种社会选择，因此，如吉登斯所言，一个人该去做什么？如何去行动？未来成为谁？这些问题一下子都成了生活于晚期现代性场景中的每个成员生活中的核心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对此做出回答或行动上的选择。^①

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如何去把握自己的生活，如何合理地生活，这是一种不得不去面对的抉择，这其中，正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包含着各种风险，因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到各种由自我的开放性所导致的危险。

在这样一种处境之中，个体必须准备跟过去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形成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以此来摆脱旧的习惯对于新的思维的影响。想一想电脑打字和手写时代的差异，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朗了。而在此过程中，一种自我的断裂开始出现，这是自我与过去的习惯之间的断裂，目标一直指向的恰在于未来。可以这样说，在前现代的时期，不存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对于个体性的强调。个人潜能的实现，也不为前现代的文化所特别关注。在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而言，与认同相关的世系、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其他诸多社会特质，都是比较固定的。只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伴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有着自我实现追求的个体”的观念才逐渐成为社会舞台上被过度宣扬的核心价值观念。^②

当然，个体性的张扬，确实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差不多在所有的文化之中，对个体存在和价值的欣赏及赞美都并不缺乏，对一些伟人所做的传记性描述，都属于这种个体性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不过，在现代性的时代里，反思性更加突出地成为个体性构建的一个核心机制。在吉登斯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80~81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85 页。

看来，传统之后的现代世界，就是通过一种自我反思性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社会。在这一世界中，“时空的重新安排使地方与全球获得重组，自我经历巨大的变迁”^①。在这种自我的变迁之中，如前所述，核心的转变就是日常活动的基本成分变成仅仅由选择所组成。选择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选择也造就了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因为，现代性逐渐使得个体开始遭遇到种种复杂的选择，并且因为其中并无特别的原则可以去依循，因此，人们进行选择时其实无法获得任何实际的帮助，这使得后果的不可预期性变得更为突出。

因此，吉登斯认为，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下，人们不仅追求一种生活的风格，并且，追求生活风格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作为，也是为了这种风格而做出的一种不懈的努力。实际上，生活风格这个术语，并不适用于传统文化，因为它实际隐含着在多种可能的生活选择中的某一种选择这样一层含义，即它是为人们所采用的，而非通过传统承袭下来的。结果，我们的生活转而成为这样一种状况：

生活风格是惯例化的实践，这类惯例会融入到衣食习惯、行动方式以及为与他人会面而设计的舒心环境中；但接下来的惯例就会依据自我认同的变动性而反思性地接纳改变。个人每天所做出的每个小小的决定，吃什么、穿什么、如何工作、晚上与谁约会，对于种种惯例的形成均有影响。所有的这些选择（以及更大、更为重要的选择），不仅是有关如何行动的决策，而且是有关谁在做出这些决策的选择。个体所生存的情境愈是后传统的，生活风格就愈多地关涉自我认同的真实核心，即它的生成或重新生成。^②

在这种开放性的选择之中，人们确实能够超越既有约束的限制，但是也落入到了多元生活风格的选择的风险之中去。生活风格的选择和生活规划不仅是在社会能动者的日常生活之中，或者是其建构的因素，而且也在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85页。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85页。

塑造着其行动的制度场景。每个人都在这种多重性的选择之中获得了一种觉知，并试图从压迫情境中把自身解放出来，以拓展自己对于所偏好的生活风格的选择范围。

即使是社会地位最为低下之人，比如生活在贫民窟环境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同样是为现代性的制度因素所充斥的。在其中，自我认同的反思性建构中的每一点，也都和更为富有的阶层一样重要，也同样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强烈影响。吉登斯曾经举例说，像有着几个孩子的单亲家庭中的黑人妇女，她也会知悉改变妇女普遍生存状况的种种因素，并且其自身的活动也会受到那种知识的影响而发生自动的调节。即使其所处的社会场景并不具备所要求的条件，她也不得不去努力探索与孩子、性关系以及友情等有关的行为模式，并试图去改变既有的生活模式，形成新的家庭生活模式。这种探索本身虽然不是话语性的明确表达，但也隐含了一种自我认同的反思性塑造。^①

吉登斯还注意到了现代社会中的性亲密关系与友谊的新变化。随着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人其时空范围的不断延展，一个人生活中的伙伴就变成在多种可能性中自愿做出的一种选择。除了日久生情的邻近性原则还在持续地影响着一种亲密关系的发展之外，新的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人们心理上情投意合的表达提供了一个社会空间，人们不再为找不到与自己兴趣相一致的伙伴而发愁，也不再有一个人孤独生活的忧虑，今天的网络发展，使这样一种选择变得更为轻而易举。网上聊天转化为私下幽会的时间之短，是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并且，我们也在为这样一种轻而易举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改变着自身，特别明显的是在身体外形的改变上。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某种类型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明显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在许多前现代文化的场景中，外貌的标准化主要是依据某种传统的标准。例如，面部装饰或穿着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个体化的手段，而个体化的可能性或期望程度经常是有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98 页。

限的，外貌主要标志着社会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当然，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并且穿着仍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穿着模式不断受到团体压力、广告、社会评价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标准化而非个体生活的差异性。与此同时，个体必须依照特定场景的可觉察要求而调整其外貌和举止，这一事实致使一些人推测，自我在本质上已变得四分五裂，即个体倾向于发展出一种多元的自我，因此自我再也不具有某种自我认同的内在核心。^①

这再一次体现了，在吉登斯所标定的高度现代性的后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为举止，都不再是一种应该如此的给定物，它们可以有多种的选择以及多种的自我重构。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身体直接参与到了建构自我的原则中去。换言之，身体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部分，这是身体的生活制度和感受性向一种隐含有多种知识可能性的自我反思性全面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个结果也在个体的层面上促进了一种风险社会的出现。

第三节 亲密关系的转型与经验的封存

在此种对于风险的焦虑之中，自我认同被创造出来。在此过程中，一种吉登斯所谓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得到了确认，这是一种并非有赖于外部社会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互动之间也存在一种吉登斯所谓的“亲密关系的转型”，种种转型体现的便是亲密关系所具有的自身反思性以及自身内在参照秩序的形式。而与高度现代性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纯粹关系是双向的。它们为根基于自愿奉献和一种强烈的亲密行为之上的信任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机遇。当获得了一种信任并且相对又较安全时，它在心理上就是稳固的，因为在基本信任和照顾者的可信度之间存在一种很强的纽带性关系。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12~113 页。

与纯粹关系的出现相伴而生的则是心理治疗的出现和普及。吉登斯认为，心理治疗的核心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种纯粹关系越成为主宰，那使得某个人感觉到自己“是良好的”深度理解，便越是至关重要。然而，纯粹关系以及被卷入其中的亲密关系，对自我的整合来说则产生了大量的负担。由于这种关系往往会缺乏一种外部参照系，人们只能通过一种“可信性”而从道德的意义上加以动员，这里所谓的“可信之人”，就是一方面了解自己，另一方面又能在行为的领域中随意地向他人袒露襟怀之人。与他人形成一种可信任的关系，能为一种道德支持提供一个主要的来源，这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关系与基本信任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联合。

但是，切断了外在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以及在其他生活转变的时刻，纯粹关系作为安全感的源泉，便有其弱点了。更进一步地说，纯粹关系含有内在的紧张甚至矛盾。从定义上讲，它是一种随时可以中断的社会关系，只有当它能够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这种关系才得以维系。一方面，它需要奉献，不仅需要奉献于其他的个体，而且需要奉献于社会关系本身。对于纯粹关系来说，奉献应是内在固有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能够自愿地被打破，双方都要认识到这只是“在改变之前的好关系”而已。

与此同时，多种生活风格的选择，并未使人们更加信赖于外部世界，恰恰相反，反倒会更加依附于纯粹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或者吉登斯所说的“内部指涉”。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似乎这个世界就是为这种亲密关系下的两个人所准备的，双方相互需求和依赖，却又无法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等级和差异，冲突经常会导致有着亲密关系的双方很快解除相互之间的纯粹关系。而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的人在不断地呼吁“多给世界一点爱”这样的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求。同时，各种传播媒体也在试图为个人获得一种他或她所真正渴求的亲密关系而给出一些知识上的帮助。这些知识，在个人信任的场域中，为自我认同的反思性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亲密关系中，纯粹关系的建立所要求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无须外部

力量的介入，这就使得双方都要为对方的信任提供一种回馈性的奉献，以此来维护这样一种信任，一旦这种奉献因为其中一方难以承受而中断，就可能使一种纯粹关系发生解体。^①

今天的社会，确实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使我们的个体经验与抽象系统之间有了更多的联系。不仅是纯粹关系的私密生活领域，而且包括更为广泛的生活与工作场域，这种联系都可能存在。简单地说，伴随着与知识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系统的不断涌现，为了使个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与这些抽象系统保持一种相互适应，重新获得这抽象系统所要求的技能或知识，便成为一种在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小到通过刷卡机刷信用卡，借助网络预订飞机票，大到对于银行运行系统、飞机内部运行系统的掌握等，由于这些极为复杂的系统伴随着新的知识和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更新，一劳永逸地运用某种技能，在今天似乎已经变得不大可能了。获得新知识意义上的“充电”成为表示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储备的一个新名词而得以流行，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再技能化(reskilling)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再技能化之所以总会发生，原因就在于专家知识的不断更新以及专家之间在看法上的不一致。^②

随着当今新的知识和技能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去，作为新知识应用场域的抽象系统遍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要学会更新电脑的系统软件，学会更换手机应用程序，我们还要学会使用新的银行软件来获得网络银行的许可，进而方便而高效地进行实际的理财操作，这样的学习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因此我们几乎不再有一种依照寻常的习惯去生活的那些简单的原则，自我反思性在多重原则之间进行各种形式的选择，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都会受到此种自我反思性的影响。

如果从自然与人工的对照之中去审视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清楚地看

^①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 [英] 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173~202 页；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p. 6-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7.

到，过去所谓自然的身体，也就是由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给予，而新的整容技术从医疗空间向日常生活空间的转化，以及各类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使得身体的内部属性越来越少，而身体的由外部所给予的属性却越来越多了。今天的技术发展，完全可以依照社会对于美和漂亮的标准来“整治”或“治理”我们的身体，使其既符合自我反思性对于身体形态的选择要求，同时也满足于社会现代性的指涉目标。

而与这种社会目标相伴的是各类生物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和医疗领域的应用。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成熟和扩散，作为个体存在的属于自我的身体，已经变得不再完全由个体自身来支配，而是变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其中的逻辑就是：有某种身体类型的存在，它是一种理想和健康的身体，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需要或者必须使自己的身体发生某种形式的适应和改变，而这种适应和改变的目标就是社会所界定出来的那一种理想和健康的身体。

在此逻辑的影响之下，个体自我的身体经验变得越来越疏离化，似乎一下子就被封存起来，人们不是向内去问自己的感受如何，而是更多地向外，即从外部世界中，从外在于自身的科学和技术那里寻找一种我们认为最为满意的身体模式，我们在审视着自己，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只是没有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因此，对于今天的社会而言，吉登斯如下的精辟分析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来说，在我所谓的经验的封存方面，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念，还有在科学观中排除了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念都已是老生常谈了。然而，我力图依据晚期现代秩序的制度价值来重构这些难题，而这些制度价值通过内在参照性才得以发展。现代制度的全部内容在于创造行动的环境。在其中，秩序的保证依据的是现代性自身的动力学，而它切断了与外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制的因素之间的联系。虽然有许多例外甚至相反的趋势，但日常生活却变得与“原本”的自然以及与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方面的诸多经验相分离。疯子、罪犯

和重病患者都要在肉体上与正常人隔离开；而“情欲”则为“性”所取代，退到后台再也不能登临大雅之堂。对多数人而言，经验的封存意味着个体与事件和情境的直接接触变得稀少而肤浅，而这些事件和情境却是能够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道德性及生命有限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的。^①

在这一段话中，经验的封存（sequestration of experience）指涉的是一种人的经验受到了隔离的状态，这必然是跟现代社会的抽象系统的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抽象系统使得一种跟主体自我紧密相连的生活经验相互隔离开来，人们所感受到的经验不再是经验本身，而是由工具性和制度性的建构所构造的一种离人的感知很遥远的经验。借助阅读、媒体、图像和文字，我们实际上可能越来越远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同时我们眼中的真实世界也越来越不再是我们所直接接触到的那个世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电脑屏幕之中的虚拟的外部世界。而离开原本自然世界的那种“经验的封存”，使我们的生活开始承受由此“封存”所带来的对于生活意义的追问以及试图对人的存在的困境的摆脱。

在这种追问和摆脱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现代世界无法再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意义，因此在现代性的时代里，特别是在高度发展的晚期现代性的时代中，个人的无意义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困扰而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其中有许多人，特别是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试图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这变成了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自我的反思性在不断地设立自我发展和实现的目标，而这种反思性反过来又会被理解成对于自我的现代性的控制系统（the control systems of modernity to the self），而由于这些系统自身跟道德意义的疏远，个人的生活的无意义感又会因此认识而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对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工具性控制，使得人们因为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没有答案而产生了自我压抑，

^①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8.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就导致人们开始去寻求一种在所谓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 上的参与, 这是在人们寻求自由的解放政治 (emancipatory politics) 逐渐完成并消失之后的一种对于自我实现的带有普遍性的主张, 即更加关注自我生活的政治主张的宣扬。^①

第四节 抽离化与虚空

吉登斯从“不连续性” (discontinuities) 这个概念入手来分析现代性。这种不连续性, 首先是指历史的不连续性, 因此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吉登斯认为, 人类历史并非平滑而无间断地发展, 而是存在一定的不连续性。同时, 恰是这种不连续性把传统与现代区分开来。因为, 我们无法在现代的社会机构中找寻到传统社会秩序的影子。

具体而言, 首先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化技术的发展, 使得变迁的步调 (pace of change) 远远大于传统社会。其次, 从变迁的范围 (scope of change) 来看, 在全球的不同地域通过现代传媒技术而相连成网之后, 社会转型的风浪便会席卷全球的各个角落。最后, 来看现代机构的内在本质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modern institutions) 这一点, 其与前现代的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连续性。至少我们可以说, 下面一些所谓现代社会的形式, 在先前的历史时期是无法也不可能找到的, 比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 比如依赖于非个人化权力资源的产品倾销方式, 再比如产品和有酬劳动的彻底的商品化, 等等。^②

现代性的问题, 实际上跟资本主义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而, 它也是古典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比如马克思就认为,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 阶级矛盾会日益加剧, 随之而出现的阶级斗争, 使得现代性的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对立。强调社会功能论的涂尔干则以为, 随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 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6.

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展，会建立起一种和谐而又丰富的社会生活，这样的社会是通过社会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而整合在一起的。韦伯则是从制度约束与个人自由丧失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的，并坚信，物质进步的实现将以消灭个人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科层制的扩展为代价。

吉登斯不想仅仅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脉络里去做一些补充解释的工作，而是试图从一种新的分析视角来重新思考现代性的问题，由此考虑出发，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被拉了进来，并作为其解释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向度。因为，在传统与现代的不连续性历史中，时间和空间都相应地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一般来说，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时间上的可累加的形式。比如，历法与文字的产生一样是前现代农业国家的显著特征。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口而言，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the time reckoning）总是会把时间和地点相互联结在一起，并且，通常这种计算都是不大精确的，而且有一定的伸缩性可言。在这类传统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志来说出一天的时间。因而，一个人说“在什么时间”的时候，一般总要连带说出“在什么地方”，如“早起村口见”。或者是由有规则的自然出现的现象来加以确认，如我们一般会说“太阳出来之时”“月圆之时”“吃过午饭以后”等。而机械钟表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千家万户的普及，使得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分离成为可能。我们此时再说某一时间时，只要说几点即可，因为钟表所表达的是时间的一个单一维度，即数字，因而时间在这里变得如吉登斯所说“虚空”了，只留下了表盘上或屏幕上的数字符码。我们还把日常模糊的时间段做了精细的划定，以此来实现时间刻度的量化。^① 而所谓“时间的虚空”（emptying of time），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空间的虚空”（emptying of space）的一个前提条件，并且，有着一种因果上的优先性，即先有具备时间刻度的抽象时间的出现，之后才有脱

^① See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 - 1918*, London, Weidenfeld, 1983.

离时间而存在的空间。实际上，时间的同一化是空间控制的基础，这可以依据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的分离来理解“虚空空间”（empty space）的发展。本来，“地点”必然是依一种“地方的观念”（the idea of locate）而获得概念化的，因此，一个地点就是指社会活动的物理或地理上的情境。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在前现代社会中，空间和地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许多方面，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是由“现在”（presence），即当时当地的活动（localised activities）所支配的。而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推进，空间与地点之间被撕裂开来，“他者”开始缺席，虽在当时当地，却远离了一种面对面的情境互动。^①

在现代性的状况下，地点日益成为“变幻莫测的东西”（phantasmagoria），即完全是由社会影响塑造和渗透的场所（locales）而已，其已经远离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地点。而场所的结构，也不再是呈现于场景上的东西；此时此地的“可见形式”（visible form）隐匿了决定其特性的距离性关系。^②

不过，空间和时间的脱节，并非与统一的测量方式的出现紧密相连。“虚空空间”的发展主要与两套因素有关：首先，空间的表征无须参照而构成一种独特的优势点（a distinct vantage-point），这成为一种有着其自身独特空间的场所；其次，不同空间单元的替代性成为可能，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空间，可以独立于任何特殊的地点或区域而单独存在，相互之间无须依赖或关联。^③ 此种时空分离的观念，对于理解现代性的动力基础极为重要。因为，其首先构成了一种“抽离化”（disembedding）过程的前提条件；其次，它也提供了现代生活独特性的启动机制，即理性化的组织。而在传统社会当中，几乎不可想象存在连接着当地与全球的那种组织。这里所谓的“抽离化”是指，社会关系从当时当地的互动背景中“游离”出来，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1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19.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19.

并在不确定的时空延伸上加以重构。^①

吉登斯认为，可以粗略地区分出两类“抽离化”，一为“象征性标记”（symbolic tokens），一为“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的建立。所谓象征性标记是指，不必考虑交流双方各自的特点，能够自由随意地进行传递的媒介，比如金钱、权力和语言等。^② 而专家系统是指，控制着我们今天的生存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各类技术和专业的信息系统。^③ 对于这一点，仔细想一下制衣业的变迁就会明白了。传统的制衣业一般讲求的是量体裁衣，即这是一种把人放到人自身的位置上去的做法；而现代的制衣业则相反，其所追求的是大批量的生产，从而达到有更多大众来消费的目的。后一种生产形式的前提条件便是，要将人的身体分成各种号码，简单的如大、中、小号之类。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概念转化成了符号代码，这里不是符号适合于人，或者说衣服适合于身体的长短，而是反过来，人要适合于大、中、小号衣服之类的符号体系。换言之，人不再被放置到人应该有的位置上去，而是要适应被人为分类所分离出来的大中小三个号码，否则便是社会中的另类，考虑一下特殊体型的人难以买到合适的衣服这个情况，就能理解这一点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概念的核心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拉开距离”（time-space distancing）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时间和空间变得“虚空”（empty out），变得更加抽象；而在此虚空中，人变得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无以定位”，或者被完全地抽离了出来（disembedded）。比如，城市中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棋盘式的布局，这些都算是现代城市的标志，在这样的城市之中，公路两旁的广告宣传标语充塞其中，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连锁品牌符号，使城市变得越发抽象，这比起传统城市的熙熙攘攘、街道弯曲、房屋鳞次栉比来说，自然显得空空荡荡，这种空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还是抽象意义上的缺乏人与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22.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27.

空间的紧密结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越来越多实体店铺的倒闭，这种人与空间的虚拟性的关系存在会变得更为强烈。换言之，在现代性出现之前的城市当中，空间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具体的空间，而非人们匆匆走过或者过眼云烟一般的抽象的空间。

溯本求源，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似乎与先前的新达尔文主义传统，即斯宾塞、哈贝马斯以及帕森斯的传统有着一定的连续性。这一传统认为，现代性主要是一个结构分化和功能整合的过程。而上述的这种新的范式（paradigm）亦能在涂尔干和莫斯的早期作品中见到。他们都考察了从部落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并认为，这一轨迹有着一种相类似的“抽离化”与虚空的过程。对于涂尔干和莫斯，特别是对于莫斯而言，现代性中变得虚空的东西就是人们把世界据此加以分类的那些范畴（categories）。并且，他们似乎也指出了一种“时空抽离化”（spatio-temporal disembedding）的过程。比如，他们追溯到的时间现代性的一条发展路径便是：经由部落社会的以季节的节律来划分的时间，到像中国人的生肖那样以动物象征（animal symbols）来划分的时间，再到现代的所谓可累加的时间（calculable）观念。这可以说是一种时空抽离化不断发展的谱系。^①

这种日益变得抽象的时空观念，使得市场能够扩张国家的界限，最后到达国际的范围中去，而客体本身也在进行着这样的循环。这恰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论及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主体与客体的那种循环。确实，这些客体在日益使意义成为虚空、使感情内涵变成虚空，这是通过几个世纪的现代性追逐过程而实现的。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客体危机”（crisis of object）不是来自交换价值的支配性，而是由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这一主张意味着，由于使用价值自身的支配性，意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客体中抽离出来。在莫斯式的礼物关系这一传统社会的象征性交换（symbolic

^① See Emil Durkheim & Marcel Mauss,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dney Needh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3/1963.

exchange) 中, 所交换的客体充满了类似上帝与魔鬼的社会、政治乃至法律的关系。当功利主义占据优势时, 客体的功能主义从其象征意义中警醒过来, 与此同时, 特殊化了的象征就已经从客体自身之中抽离出来了。^①

然而, 针对当代政治经济中的客体而言, 使其虚空的不仅是象征的内容, 也有物质的内容。在日趋增加的生产中, 所产生的可能并不是物质客体本身, 而是一些符号。这些符号主要有两种。一是认知上的内容, 即后工业或信息产品; 二是一种广义美学上的内容, 这主要是指后现代的物品。这里所出现的不仅是组成实质美学要素的非物质客体的增殖 (如流行音乐、照相机、杂志和录像带等), 而且也在物质客体上增加了符号价值或印象的要素。这种物质客体的美学化能够在生产中或这类物品的循环和消费中得到生产。

在生产中, 设计构成了物品自身价值日益增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而专门的劳动过程对于附加值的贡献显得并不重要, 与之相反, “设计的过程” 在商品的生产中渐渐变得更具有核心的地位。这可以从日渐增加的企业“研究与发展” (research-and-development) 或“设计集约” (design-intensity) 中看出端倪。这种所谓的设计集约, 实质上最为重要的是其美学应用的性质, 从服装、鞋帽、家具、手机、电视以及汽车造型等方面都可发现这一点。另外, 物品的符号价值的属性, 还会通过“品牌”的过程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 市场营销策划和广告创作人员会把形象通过设计和创意放置到物品上去。这一般是通过商业服务的“象征性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而非生产者的“象征性暴力”而引发的。不过, 它也可能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合谋以及共同旨趣而发生。比如, 旅游从业者就是把服务与经验转化成某种符号价值, 并通过一种转换性的语义工作来使旅游者去消费。在这个过程中, 旅游从业者把最初并非美学的客体美学化, 即把作为一种指示物 (referents) 的旅游地转换为符号价值的能指 (signi-

^① See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72/1981.

fiers) 本身。旅游从业者的这一活动只是其中一种“需求上的语义工作”(demand-side semiotic work), 它赋予当代的日常生活以美学化的特征。^①

可以这样说, 吉登斯所撰写的每一本书都在强调这样一个核心主题, 那就是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断裂。就现代性的动力及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的程度, 还有其全球性的影响而言, 吉登斯认为, 现代制度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都迥然有别, 它完全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即便是在个体的自我认同上, 这种改变也是极为明显的。在紧跟着《现代性的后果》一书而出版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 吉登斯长篇大论地谈到有关自我的问题, 但这绝非一本社会心理学的著述, 其所关心的更多是自我认同赖以出现的种种新社会机制。这些新机制, 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 另一方面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

在吉登斯看来, 社会科学都应该是“现代性制度反思性”的内在因素。不仅学术研究, 而且所有形式的手册、指南、治疗著作等, 都有助于一种现代性反思性的形成。因此, 吉登斯采用了大量实际的“生活指南”作为其分析的对象, 其目的不是为确定的主题提供具体的证明, 而是把它们作为他寻求发现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某种征兆。它们不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著作,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除了其制度性反思之外, 时空重组的深刻过程赋予了现代社会生活以特征。这是吉登斯最喜欢谈论的一个问题。吉登斯认为, 可以把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分为“有面子承诺”(facework commitment) 和“无面子承诺”(faceless commitment) 两种。前者是指在大家都在场的社会关系情形下, 相互之间所维持或表达的信任关系。而后者关注的是对象征符号或专家的信赖的发展, 因此可以将后者统称为一种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②。这是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抽离化机制的拓展, 并通过广泛的时空分离而对其加以重新组合。在此意义上, 时空重组, 加

^① See Scott Lash & John Urry, *Economics of Signs &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 13 - 1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 80.

上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一种深度转型。

另外，与抽离过程相反的还有一种所谓重嵌（reembedding）的机制过程，即把一种抽离出来的社会关系又重新放回到地方性的时空中去的过程。在这样的分类体系之下，吉登斯认为，抽离和重嵌的过程，与有面子承诺和无面子承诺之间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其中跟陌生人的交往过程，足以说明上述分类体系。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之前就比较敏锐地意识到，陌生人的概念伴随着现代性的兴起正在发生着一种意义的变化。在以地方性社区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与文化中，陌生人往往是指从外面来的某一位令人觉得可疑的人。这是由社会所划定的界限，在此界限之内的就属于熟人或共同体的成员，反之则属于陌生人。^①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一个整体人（whole person）的陌生人的概念转变成了一个整体人群（whole people）的陌生人的概念。比如，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我们总是出于某种目的，要去与许多我们并不认识的人打交道。这种交往往往都是匆匆而过，没有持久的信任作为基础，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我们眼中的陌生人。

而这种状况，只有在一个匿名的现代社会中才会出现。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说的“有礼貌的不关注”（civil inattention）这一社会互动的情形。在城市生活中，两个人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相互不能盯视，亦不能装作看不见，而是都要控制自己的眼神，若即若离地在身旁陌生人的脸部迅速扫描一遍，随后再把目光迅速地移到周围其他人的身上去，这种不关注，并非是无兴趣或冷淡，而是一种有礼貌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或者用戈夫曼的话来说，就是相互都“把光线弄得暗淡”（dimming of the lights），不至于因相互注视而导致惊讶。可以说，有礼貌的不关注是包含在现代性情境中的与陌生人接触的有面子承

^① 参见 [德] 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468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诺的最为基本的一种形式。它在传达着一种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中相互信任的基础。因此，有礼貌的不关注并非一种背景性的噪声，而是人与人相互约束和控制的社会节律，并构成戈夫曼所说的“无焦点互动”的核心特征。^①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降低了生活中的风险性，但不可否认，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在这些参量中，就包括“高后果风险”一项，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中，自我认同变成了一种由反思性组织起来的·活动。与此同时，个体经验和抽象系统之间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联系。当涉及个人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或者要做出富有命运特征的决策时，个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使自己不断地再·熟练化。然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再熟练化总是不完善的，它会受到专家知识自身“可修正的特性”及专家之间的论争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里，对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形式的专门知识，普通人之间的观念也有很大的差异：既有对这些技能和知识的崇敬，也有对它们的冷淡；有赞同，也有焦虑；有热情，也有厌恶；等等。而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家的著作中，这些观点上的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体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性的特点。自我反思性，连同抽象系统的影响，对身体以及心理过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身体的外在“给定”，即身体在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之外发挥作用，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还会借助反思来使身体成为自我动员的一个实体。

吉登斯强调说，当今社会对体形的大规模“自恋式的”保养运动，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对身体加以“建构”和控制的主动关怀。在锻炼身体与追求特定的养生之道这类生活方式的表现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结。还有在生物的生殖领域，由于种类繁多的基因工程和医学方法

^① See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London, Allen Lane, 1971.

的干预，身体逐渐变成了一种要去不断选择的现象。这些做法不仅影响到了个体，而且在身体发展的个人性方面与全球性的因素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应用的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在人身体上的实施，关于身体的生物技术和知识，逐渐进入到了人类反思活动领域之中，成为人们可以主动去做选择一个方面。

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一种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需的道德源泉之间的分离。个体的反思性规划创造了自我实现和自我把握的方案。但只要这些可能性被理解为主要是自我的现代性控制体系的拓展，那么它们就缺乏一种道德的意味。“可信性”不仅变成超凡的价值，而且是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表现出一种道德发展迟缓的过程。

在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以前暴露得更为赤裸，并且，其负面后果也更为明显，因此出现了许多形式的反向作用。这其中越来越明显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地方性与全球性交互关系的情境中引发了一系列道德难题。我们不能把它们仅仅推向其中的某一方，而是每一方都可能是难题的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难题的制造者。这些愈加突显的生活难题在召唤种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它们由新的社会运动所预言，并且借助这些难题的困境而引发出来。比如由人人受其所害的雾霾天气所引发的人们对于环境治理的种种关注乃至抗议。而一种“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的种种努力，开始从原来的对他者负责的“解放政治”所投射的阴影中突显出来，成为一种生活之中的政治主流。

第五节 现代性与民族国家

现代性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兴起以后，在社会管理的性质

上有别于前现代，即传统社会，而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针对政治而言，现代性的问题就集中在新的遍及全球的国家形态，即民族国家的治理模式上。正如吉登斯所断言的那样，“民族—国家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①。

并且，如前所述，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更为根本的特征就是一种不连续性，或者他常说的断裂，也就是现代社会脱离过去全部类型社会秩序的轨道，而构建起来的内容全新的生活形态，尽管前后的联系并没有被彻底打破。这样一种看法是跟社会进化理论做彻底决裂的一种姿态，也就是吉登斯试图抛弃一种习以为常的看法，即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处在所有社会的顶端的这样一种社会认识论，他转而强调现代社会，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以及与其他社会存在的平行性。在其中，民族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便是这样一种断裂的核心体现，这是彻底有别于他所详尽描述过的传统国家形态的一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间阶段的绝对主义国家，既在有些方面像传统国家，又在大部分方面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建构起来的基础。

这样一种现代性的面相，跟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反思性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的国家体系”（reflexively monitored state system）的建立。此种国家体系借助各种知识、数字、个人资料的注册登记以及专家系统等来实施一种强有力的对于个人以及群体的日常生活的全面监控。这种国家的能力是传统国家所不具备的，它是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时期逐渐建立起来，并在民族国家时代臻于完善的一种社会控制能力。这种能力的建设开始于对领土之内的国民身份的界定，也就是对于民族的识别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权利的授予。而由公民观念上升为民族认同感的民族主义，在吉登斯看来，都属于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并且是孕育权力的最为杰出的权力集装箱（power container）。^②

①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45页。

这种身份的确认，在民族国家社会中要比在以前的传统社会表现得更突出，也更为重要。这是与民族国家所强调的边界清晰对应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社会的边界是清晰的，而在传统的阶级分化的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y）之中似乎便没有这么清晰。不论是领土还是公民的边界都是以模糊为特征的。因此，有边界并非所有社会都必须具备的特征之一，而这显然是“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形式的产物”^①。在这种社会边界的确定中，不单单是物质的生产和占有比较重要，公民信息的搜集和储存也同样重要，这是实施有效监控的必备条件。同时，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合理而有效地对民族国家之内的人民施以一种严密而又理性的监视。由此带动了民族国家内部清除异端的“内部绥靖”的开展，也就是相比阶级分化的传统社会中边陲地带的越轨与混乱的地方秩序而言，民族国家所追求的是举国上下都存在着一致性的安定的社会秩序以及随处都有充满安全感的信任关系，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所无法真正实现的，其中的原因也正像吉登斯所概括的那样：

在传统国家中，政治中心对暴力手段相对不稳固的掌握，意味着几乎没有可能实行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意味着老是潜含着针对中心的武力挑战，意味着强盗、劫匪、海盗以及城乡地区形形色色帮派的广泛存在。^②

现代民族国家为了消除这些作为异端的社会秩序，往往会采取一种空间隔离的措施，使那些带有异端标签的人物受到种种规训，并使他们的行为得到调整和规范。医院、监狱、贫民救济院，其最初在17世纪的欧洲大范围蔓延的原因，都跟此种消除异端的内部绥靖活动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现代的集中营，可以看作这种绥靖过程的一种极端表现，其司空见惯的形式便是可以集中施展一种行政权力的专门化的工作场所，比如学校、医院、工厂甚至监狱。

①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45页。

②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23页。

在这里，现代性的面相又一次体现出来，即强调普遍性的知识以及规则的整齐划一。在传统社会中，所有的知识都不以普遍性和标准化为其终极的追求目标，而是强调地方性知识存在的合理性。而在以监视和规训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知识的普遍性和实施的标准化，对于营造一个特别的空间来达成目标至关重要。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国家形态，也就是遍及全球的民族国家的形态，是西方现代性自启蒙运动以来逐渐成长和不断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从传统国家经由中间阶段的绝对主义国家而向民族国家演化的既连续又断裂的形态。

无疑，今天全世界许多的地方都接受了一种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并以此来构建国家统治的机构。这样一种观念特别强调通过国家而建构起来的主权、领土边界以及边界以内的公民这三项要素。而这样的一种建构过程，最初又肯定是跟军事力量的成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对于传统国家军事力量发展过程的梳理中，吉登斯看到了战争在传统国家统治中的特殊地位，这种战争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种武力威胁，借助这种威胁，传统国家的税收可以得到保证。除此之外，传统国家并不具备今天所谓的对地方社会加以治理的现代“政府”的内涵，而更多地以不介入的姿态来容忍乡村或者地方社会中的各种看起来有些越轨的行为。那时的政治组织，仅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以及城市中心内部的冲突。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军事力量在传统国家中存在，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缺乏对于其管辖区进行“直接管理”的手段。^①

在这个意义上，位于中央的传统国家，与位于边陲的地方社会之间，并没有一种直接的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存在，很多时候，相互之间是分离的。所谓“天高皇帝远”，基层的苦痛不是高高在上的皇权所能直接面对和处理的。很多时候，恰恰是层层盘剥和没有得到信息反馈的治理，使下层社会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传统国家的这种上下裂变的性质，决定了其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13 页。

国家机器并不能维持其上下贯通的行政权威，结果就出现了传统国家大多是有边陲而无国界的有限度整合的局面。这样一种局面，使得传统国家内部的异质性要远远大于现代国家，那是一个由“众多社会组成的”社会。^①比如早期的法国乡村社会，就是由这样的多种社会所组成的，那里可以长期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团伙和争端，而国家机构对此一般都会持一种容忍的心态，不会去做过多的干涉，任由乡村社会依据自己的习俗去处理一些事务。^②

在这种武力威胁之外，传统国家并非无所作为的一个空壳。在皇权之外，尚有以官僚阶级为核心的阶级分化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意识形态。这些都是以世袭制为核心的皇权所不能完全控制和掌握的。特别是通过韦伯所归纳的俸禄的三种形式中的“封地”形式，有官职的人员从统治者那里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由此可以将地方性的民众笼络在这位官员的周围，而不是在作为统治力量的皇权周围。在这个意义上，此种传统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阶级社会”之间便有了一种实质性的分别。

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主导社会变迁的并非阶级之间的冲突。即便有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并不能够真正撼动既有的统治与服从的阶级分化秩序，并且，由于阶级之间的相对独立以及相互距离的遥远，这种撼动也几乎不可能转化成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即便有远在乡间的农民因为极度饥饿而造反，但那也只是短暂的，并不能真正对统治阶级构成一种实质性的威胁。因此，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属于地方性的叛乱，并且，大多数的命运也都只是昙花一现，随之便会被平抑下去，秩序得到再一次的恢复。^③

总之，在吉登斯看来，传统国家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整体结构上的裂变性，上层统治借助暴力和武力，但那些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威胁或者暂时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63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 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84 页。

的征服，考虑下层民众生活改善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并不存在，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理念存在的必要。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公民权与主权的概念开始逐渐突显，并且，随着普遍知识观念的深入人心，绝对主义国家开始将政治的治理深入到基层社会中去，进而开始了高度密集的行政管理。绝对主义国家虽然是民族国家的前身，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差别。绝对主义国家也可以翻译成专制国家，在吉登斯看来，它只存在于欧洲资本主义早期差不多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其含义就是指“一种君主、帝王或王子统治下的政治秩序，人们必须接受既定的政治权威，包括对暴力手段的控制权威”^①。

这样一种绝对主义，使得欧洲国家内部的巩固措施得到强化，版图的边界得到扩充和明确。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不是靠提供商品和强征贡品的传统外交而确立，与此同时，“新型的国家体系开始形成”，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绝对主义国家的体系，不仅依靠战争来维护其国家的稳定，而且会“依赖于国家之间相互承认对方拥有合法的自主性领土”^②。更为重要的就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基础的“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的国家体系”得到确立，国家主权成为国家内部事务而被讨论。在一国之内，国王有权授予或者撤回某种权利，并且，在一国之内，国王代表国家的一种排他性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权力。^③ 在此过程中，原来处于长期争端中的边陲转变为界限清晰的边界。

在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成长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其海上力量的扩张。在此过程中，欧洲诸侯国之间进一步整合，最后实现整体意义上的“欧洲”称霸海上。而且，正如吉登斯所断言的，“大多数伟大的航海发现以及对地球各大陆的主要地理形态的认知，都恰好发生在绝对主义时代”^④。这样一种认识极为重要，因为，以前欧洲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还没

① [英] 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18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②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07~108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11页。

④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14页。

有超越“地方性”这个层次，而在欧洲的绝对主义的时代，对于地球的整体认识，强化了他们对于世界认识的普遍性关怀，是一种从欧洲人眼中看去的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的蓬勃发展，而与之相伴而生的海上贸易以及凭借普遍性知识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便是这种普遍性世界认知的一种自然结果。^①

但是，最值得指出的是，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依旧是一个阶级分化的传统国家，但又与其他类型的传统国家有所区别，区别之处就在于主权（sovereignty）这一观念。^② 主权的原意乃是一种君权，是一种统治者个人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一开始，“君王”这个词在欧洲并非指一个人独揽权力的统治形式，而是许多的贵族都可以享有的称号，后来才转变为一种可以无君主存在政体以及共和制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下的主权话语。这是绝对主义国家时代将“个人拥有无上权力的主张同对国家权力的更普遍化解释糅合起来”，进而在空缺国王和君主的情况下，政府的原则照样可以实施。这是伴随着公民权（citizenship）的观念而出现的一种超越于城市公社强调主权而非君权的政治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绝对主义国家开始向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民族国家迈进，其中“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财政管理模式的交替运用”，成为这个时代政治普遍性追求的三点核心特征。^③

在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换中，资本主义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动力，尽管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会有多种样式的理解。但是，在资本主义与国家发展的联系中，商品化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特别是针对土地和产品的商品化，吉登斯有这样的清晰表述：

土地和产品的商品化，就是说，由交换价值所浸透的经济活动领域的大规模扩张过程，含有几个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巩固过程相联系的因素。第一，受到保障的、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的产生——这允许并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18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16 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16 页。

保障着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契约性权利和义务。第二，国家权力所调控和认可的货币制度的发展。第三，中央集权的税制的形成。^①

中央集权的法律秩序的诞生，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而言极为重要。在此之前，法律是地方性的，是通过地方性的制裁手段来确保交易成功的。在这里，很少见到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把计算和契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现代法律的存在。在欧洲，这种法律的出现如韦伯所声称的那样，是跟在16世纪以后讲求计算的罗马法的恢复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联系。^②

不过，在吉登斯看来，重要的还是由主权观念的扩张而衍生出来的产权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产权观念如何在国家执行法律手段的强化中得到增强。这实际上与韦伯的观点相左。韦伯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展，带来的是法律对于经济活动的支配权的减弱，但是，他忽视了产权观念背后强制性法律实施的意义，而这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当地产成为一种商品以后，中央集权下所制定的法律在维护私有财产权上就变得异常重要，正如吉登斯所言：

在那些大多数财产是基于地产的地区，习惯和法律通常共同保障着所有权，几乎总是那些声称拥有这些所有权的人们，凭借直接占有暴力工具，来维持着他们的所有权。可是，在财产已转变为资本的那些地区，即便是地产，所有权也不能只靠“租用占有权”予以捍卫。当“私有”权已不再是土地所有权的“明显的”配备形式时，由有效的强制手段予以维护的一系列集中于中央的法规，看来是“私有”权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③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集权的力量是占重要地位的，也正是因为有中央集权，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够有所保障，私人财产权才能够得到有效率的巩固和积累。当然，接下来的货币经济的普遍化，也是使商品化能够有

①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85~186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87页。

③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89~190页。

效率地进行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黄金和白银这类“商品货币”的出现，“当根据物理单位估算的货币量与基于指定的价值量的货币量保持一致时，商品货币也就出现了”^①。后来这种货币转换成了一种信用制度，其不依赖于作为货币基础的稀缺物质资源的实际数量，而是“依赖于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信任，它由这些组织缔造出来并通过它们来流通”^②。

在此过程中，同样是国家机构在确保信用货币得以流通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跟“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的国家体系”在全球的扩张密切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是商品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换的前提条件。作为信用货币之一的纸币，其发行不仅是对商品货币的一种超越，也是对时空关系的一种超越，因为，人们由此便可以不用顾及商品货币的时空限制而进行货币的买卖。这跟以资本核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扩张联系密切，而且跟后来以信息交换为基础的电子货币的发展一脉相承。^③ 而延期支付的信贷形式，更强化了时空的延展以及减少了商品货币对于时空的依赖。人们凭借信贷就可以靠在未来交易的预期中可能获得利润来获得借款，甚至最后将此货币的信贷形式“结构化入商品的流通之中”^④ 去。

由于现代国家的行政权限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官场的规模也在日趋扩大，税收成为国家开展公共治理的资金保证。与此同时，税收同样也是一种控制的手段，是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它迫使人们拼命地工作、合理地消费以及增添人口。^⑤

国家、货币和税收这三者并非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跟产品的商品化密切相关。其中征税和税收支出成为货币化的主要动力，是在国家领域内使货币成为通货的担保者和管理者。^⑥ 就欧洲历史的发展而言，国家中央税

①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1页。

②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1~192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3页。

④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4页。

⑤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5页。

⑥ 参见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5页。

收的发展以及货币化的过程，瓦解了某些特权阶层以某种借口对税收的规避，同时为商业资本主义的进入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并受到了这种空间的强化与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村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中，农村的劳动力从原有的土地束缚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在新型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并与管理和统治他们的阶级构成了一种对立。不过，在这种对立中，统治阶级并非靠暴力来进行统治，而是靠一种吉登斯所谓的“双重”监控的模式，“即监控模式既成为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又成为国家自身的关键特征”^①。

换言之，如何监管劳工的工作状况，不仅成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一种特征，而且成为从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

^① [英]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97～198页。

第五章 自然的终结与生活的政治

本章分为五部分，即自我的牢笼、自我认同的精致化与存在的焦虑、经验的区隔、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以及晚期现代性的世界。人在征服和创造自然的同时发展出一种文明，却又为自己创造的文明所限制，现代性就突显了这一控制与反控制。在现代社会，自我认同感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尤为重要，个体间基本信任的建立则是自我认同的精致化，而在自我认同的维持过程中，文化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现代社会借助制度化把某一社会群体从日常生活中区隔出来，即经验的区隔，不仅如此，经验的传递也受到区隔，某些经验只有某些专业人群才能接触到，这种经验及经验传递的区隔使公共领域的范围逐步缩小，也使得自恋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解放政治就是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打破经验的区隔，正义、平等和参与是其所追求的目标和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而生活政治则是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与个人自我实现的意识和目标紧密相连。晚期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地方不再具有自我封闭性的世界，它存在四种两难困境，即联合与分裂之间的矛盾、无力感与占有之间的矛盾、权威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以及个性化与商品化之间的矛盾。

现代人随着现代性一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自我的反思性能力，这种能力的成长使得现代社会专门把“人”放置在了“自然”之上，或者至少是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对立起来。近代以来，我们人类开始强调要凭借我们的理性去拓殖自然，结果，我们离开自然的存在状态却越来越遥远。我们的经验随着我们本体安全的保护壳的稳固而变得愈加区隔化，在我们日常的社会之中，也许再也见不到罪犯、精神病人以及患者这些异常的人存在，他们都被界定为不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类人而被闭锁在一个被专门发明出来的空间之中，这些空间的名字分别可以叫监狱、精神病院以及诊疗所等。在此过程中，我们社会之中的道德经验“被封存”起来。生存变成了一种需要不断良好地顺应于社会支配的活动，至于生存本身的问题，实际上则成了一个极为次要的问题而被制度压制到极窄的空间之中，诸如寺院或者心理诊所。在此意义上，我们的生活在不断地受到一种区隔，我们的经验也变成了一种有限度范围内的自我反思；反过来，我们实际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座“自我的牢笼”，使自身困顿于其中且不自知。上述这些言论，都可以在吉登斯有关自然终结与生活政治兴起的论述中得到体现。

第一节 自我的牢笼

人对自然进行的控制和征服的开始，也便是自然的“终结”或“末日”的开始，这一点成为吉登斯讨论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不仅在于让世界服从于人的支配，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突显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控制，而这种控制的核心就在于，让自然服从于人的意图，让人去不断地拓殖未来，或者通过对未来的规划方式来实现这一控制。^① 在这里，一种福柯意义上的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并接，使这种控制变得越来越深入和细致，在此过程中，世界真正成为—种整体意义上的被感知的对象而进入到我们的感知世界中去。而吉登斯恰恰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69 页。

是在此意义上来谈论所谓“自然的终结”的。在吉登斯看来——

“自然的末日”意味着自然的世界在很大范围上已经变成了一种“被创造的环境”，组成人类的结构性的制度的驱动力，源自社会中有组织的知识主张，而不是源自外在于人的活动的那种影响力。^①

想要对这一看法有深入的理解，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吉登斯所谓的自我的反思性这一概念上去。吉登斯所提出的这一概念，极为明显地跟现代性的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系统之中，自我的反思性是不那么被人重视的，真正被重视的只有按部就班地去生活，昨天的生活轨迹、今天的生活轨迹乃至明天的生活轨迹之间，似乎并无什么根本性的分别，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可以看成此类传统社会的代表性特征。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的反思性却被强调到了一种极致，这实际是因应着快速的社会变迁和转型而发生的一些生活历程的转变。在这种转变历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个体与其世代之间交流的中断。在传统的时代里，一个个体的存在是通过其在世代谱系中的某一个位置而得到确认和认可的，世代之间的差别成了时间估算的一种方式。一代人产生一种集体的记忆，在此记忆之中，个体为自己找寻到了一个可以存在于其中的空间。同时，个体也从前人的集体记忆中获得了一种可以不断传承下去的生活经验。但是，这些在今天的代际之间，都不过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年代上的差别，其间再也没有了一种世代延续的道德和传统上的认同，每个人都成为自我的主宰或者自我的参照系，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同时，自我反思性也造就了人跟地点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通过现代性中人跟环境之间的抽离化机制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生活在某一个地方，不是出自非自愿的安排和先人的给予，而是越来越和自己独立的人生规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人们今天显然要比过去更易于离开自己的故土，在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环境中生活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显然不是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69页。

在适应自然的供给，而是通过在这个星球之上四处移动和迁徙来实现一种适合于自己生存的理性选择，并认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吉登斯看来，自我反思性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影响的第三点表现就在于，个体逐渐脱离开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相互依存的外在性联系，越来越独立地去追求一种自我的实现。在此过程之中，原来无法离开的家人、亲戚、朋友等，即在传统社会之中对于塑造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极为重要的那些个人，都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会因为自我反思性的提高以及内在参照系的丰富，而不再依赖于这些人的帮助，或者不再与这些人保持一种外在的、表面化的相互联系。最后，随着自我反思性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经验越来越变成开放性而非封闭性的，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新的经验和机会，很容易冲淡个体旧有的经验积累和交往范围，在人生历程的每个转换阶段，由于这种自我反思性的增加，个体认同的危机也只为个体本人所清楚地认识到。^①

这种个体越来越依赖于自我反思性的过程，也被吉登斯称为“经验的封存”，这种经验的封存进一步使个体的内在参照系得到了丰富，同时，也使得其与外在世界的隔离进一步加深。吉登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生活不断变得抽象化的过程，并且，随着现代性的日渐成熟，这一抽象化的程度也会变得越来越深，由此社会系统也会发生一种朝向于抽象化的安排，并越来越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内在自身的参照系，从而脱离于外部各种组织化的系统来保持其独立。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又是跟现代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这一事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吉登斯曾经专门归纳过自我的反思性如何影响到了一种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对人加以控制的制度的几种发展方式。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的发展，首先从方式上就是对于人的监控进程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种行政权力的扩大。也就是说，伴随着现代监控能力的扩展，一种行政权力也逐渐扩展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1~174 页。

到了对于个人而言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控制上去，这其中就包括人的生育、饮食、住房以及出行等，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某种制度自身的反思性能力，使其自身的支配性的权力得到巩固。而现代制度通过信息或知识的编码这样一种监督机制，把社会制度从其外在参照系中直接切割下来，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阻断，并允许其向更为宽泛的时空段扩展，社会代替自然而非自然融入社会。此种监督的机制还使得那些不能被融入到制度中去的行为，直接转变为或者被界定为异端或零乱的行为，这一过程也被吉登斯称为“粗边的平整”（smoothing of the rough edges），即一种标准化和模式化，由此而不期望出现棱角分明的存在体。^①

另外，在吉登斯看来，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重新划分，构成了现代制度实施控制的一种独特方式。在此控制之中，市民社会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而影响着当下的社会组织形式。吉登斯曾经指出，市民社会的建立，直接与现代国家形式的出现密切关联，因此在参照性上就与其联系在了一起。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皇帝与老百姓的生活本来没有那么多的关联，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特别是在传统皇权无法直接接触到的农村地区。在传统的乡村那里，大多数地方性的社区，是依据其自身的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来进行治理的，对大多数的私人活动形式而言，行政机构一般不大去做干预。但是，在现代社会形态中，这种来自外部国家的干预开始变得多了起来，而且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更为紧密地相互关联在一起，使得社会的日常生活形态发生了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变。

吉登斯甚至认为，所谓的“市民社会”的概念也不过是现代国家力量兴起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后而建构出来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本身都不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社会系统，而是共同属于一种有着自我指涉意义的内在参照性的制度，这是一种由现代性所建立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6 页。

起来的反思性系统。^① 而与之相应的就是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严格区分，一般而言，公共领域指的是国家的领域，而私人领域是指对于国家监控活动的干预予以抗拒或排斥的一个领域。但是，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一种公共领域的公开性以及到什么程度上可以体现出一种私人领域的私密性，还是一个需要不断去追问的问题。至少在吉登斯看来，单单依据传统社区的公共领域的瓦解去解释私人领域的兴起，显然就是不适的。

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曾经在他的《公共人的衰落》一书中明确指出，今天意义上的“公”和“私”的概念，都是比较晚近的一种发明，“公”的最初含义是指共同拥有财产和物品，而“私”则是指一种统治阶级的特权。^② 直到18世纪，在西方的语境之中，这两个词如今的含义才逐渐突显出来，其中的“公”便与选民区的“公众”相等同，所指涉的是可以完全公开的那一生活领域；而“私”的领域，恰恰是与此公共领域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领域。不过，吉登斯在这里更强调由一种私密关系的转型所带来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分野的出现。这种分野建立在一种现代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出现之后，也就是人们从之前在熟人社会里的私密的亲戚朋友间的交往，转化为凭借一种共同信任而出现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一种所谓的城市陌生人的冷漠感，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一种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长。^③

现代制度的监控能力的发展以及逐渐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做出的一种明确区分，造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结果，就是集体羞耻感的突显和自觉，而这在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则是一种负罪感。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负罪感和羞耻感之间的区别，吉登斯曾做过如下表述：

负罪感含有道德上犯罪的含义：这是一种在一个人的行动过程中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7 页。

② See 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8 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8 页。

所产生的、对不能满足特定形式的道德规则的失败感。这是焦虑的一种形式，这种焦虑在社会行为由固有的道德戒律，包括像那些由传统所确立和赞许的戒律来支配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较之负罪感来说，羞耻感直接而广泛地与基本信任有关，因为负罪感关心的是行为和认知的特殊形式，而不关心这类威胁到自我整合性（the integrity of self）的事情。与负罪感不同，羞耻感直接地对自我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安全感造成伤害。自我认同越是变得具有内在参照性，在成年人的人格中，羞耻感就越会起着根本的作用。个体不再主要靠外在的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自我的反思性安排来生活。^①

如果说负罪感还多少跟一种外在指涉的参照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羞耻感则更多是一种内在的指涉性，是通过建立在自我认同基础上的自律来实现的对于自我思维和行为的一种控制。

弗洛伊德在论及现代文明时，也注意到了这种非负罪感的羞耻感。他强调，现代文明不是在对自我欲望的克制上打转转，文明不仅使社会的组织变得更加复杂，而且造就了一种羞耻感的增加。^②可以说，这种羞耻感逐渐增加的过程，也是对于身体自身潜能逐渐予以剥夺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文明的秩序中，任何不正当的、越轨的行为，都会受到一种限制和攻击。弗洛伊德在其有关文明的讨论中也承认，现代文明的生活，较之原始的生活更有一种安全感，不过，这种安全感是建立在对于人自身行为严格限制的基础之上的，人在此过程中，由于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似乎变得更加不自由了，做任何事情都要思前想后，举步维艰，因为，这背后所承载的是一种文明与道德良知的不断地拷问。在这个意义上，相比早期的社会秩序而言，吉登斯更乐于将现代文明下的社会秩序看成“一种道德的事业”。因为，伴随着这样一种道德事业在社会中的施展，“受文明所压抑的攻击性行为以及爱欲的冲动，都缩回到一种苛刻的道德良心形式的自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7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See Sigmund Freud,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Hogarth, 1950.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0页。

我当中去”^①。

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观察就显得极为敏锐，在他看来，今天的文明是在一个具有弥散性的超我的监督之下所完成的一项事业，它使得现代人愈加清醒地意识到，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又是不应该做的。这是一种文明化意义上的自我觉知，在此文明化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种自我可以加以精确控制的羞耻感和负罪感，但是，我们也因此而失去了一种自我可能有的愉悦感。^② 这种对于个人欲望的控制，在韦伯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的解释中得到了某种验证。吉登斯认为，韦伯所讨论的这对关系，背后透露出来的是现代性之下的“一种良心形成的机制”^③。在韦伯的表述中，我们看到了资本家通过克制欲求来积累财富，而这种积累财富的方法，也在无意之中激发了现代制度的成长。^④ 换言之，也可以断言，积累的现代观念成就了资本主义。

但是，到了现代性的晚期或者其成熟阶段，资本主义还会像其早期阶段那样去尽其所能地克制欲望吗？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这里，从不同角度去强调压抑欲望的弗洛伊德和韦伯都面临一种解释上的困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以消费为动力基础的后工业化的消费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度消费或消耗的社会。吉登斯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而向社会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过去的道德约束会不会为当今的一种享乐主义所取代呢？还有，相比于过去的负罪感与文明的成长之间的关联性而言，今天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这两者之间的松解或者背离呢？人们试图逃向的正是现代人苦苦追求的负罪感、良心、道德以及文明的反面，这背后的动力基础何在呢？这些都是吉登斯在深度思考中试图去回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0页。

② See Sigmund Freud, *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 71.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0页。

③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1页。

④ See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6.

答的。

在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解释上，吉登斯最终还是回到了他自己的概念上去，那就是认为，在这些转变之中，最为核心的还是一种由外而内的道德参数的转化机制，这使得今天的人们在逐渐地远离一种负罪感或羞耻感，这是跟韦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初期的道德良心机制的形成过程恰好相反的一个过程，这一相反过程的结果，在吉登斯看来，也是自我反思性逐渐增强的结果，这同时还是因应着传统的东西逐渐被打破而造成的一种结果。一般而言，这种东西打破得越多，自我反思性就越会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克服此种打破而发挥其自身作用的途径。与此同时，吉登斯还特别强调，在这种变化之中，根本上还是发自内心的羞耻感，而非由外部强加上来的负罪感，在逐渐占据我们的思考，影响着我们的判断以及社会生活。^①

如果做一种社会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今天的社会中，想要找到一个“坏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大的都市社区之中。如果说过去“醉鬼”算是一种“坏人”的话，那么在相互熟悉的社区中很容易了解到人们中间究竟谁是醉鬼，就是在街上闲逛也会发现或者指出某一位擦肩而过者可能就是一名当地的醉鬼，而现在要想找到这样一类人，已经变成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了，原因就在于通过一种内化了的自我的反思性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社会输送到了文明的轨道中去。

在这个意义上，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座牢笼，即我们通过对于自然的征服和开发而发展出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反过来要求人必须去服从这种文明的所有规则。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因此而变得更加有教养和知识，我们也因此而获得了之前社会的人们梦寐以求的自我独立与自由，但是，我们的这种独立和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一句话，今天的我们，类似笼中之鸟。在笼中的鸟儿可以充分体验到安全、自由和舒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1~182 页。

适，但是，要想飞出这笼子，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大可能了。

第二节 自我认同的精致化与存在的焦虑

吉登斯在谈论自我的反思性这一概念时，实际在谈论的是心理层面的自我觉知，这种觉知，也是人类行动的普遍特征之一。不过，吉登斯比一般心理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像心理学家那样注意到了有认知能力的人类行动者在觉知意识中的话语意识，另外还明确地指出了融入日常生活行动者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种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与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相互融合，构成了一种并不能在人的心智中得到呈现的意识，这成为行动者专注于手头事务的一个基本条件。^①

这种实践意识，恰恰保障了一种本体安全感的实现。人们因此不必在忙于手头事务之时还要专门留意外部环境的威胁，这是人在进化过程之中为自己营造出来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会逐渐地去依赖于这种人造出来的环境氛围。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默许的一种环境认可，一旦某一方脱离这种共同的认识，交往活动就会遇到阻碍而无法再继续下去。如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17—2011）的现象学社会学中的日常语言“实验”，就触及了人类存在的相互性认知的基本特征，这是一种双方能够保持顺畅互动的基础，即不要轻易地去挑战演说者内在的自我肯定性和顺畅性。^② 而保证这样一种顺畅互动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所谓的“基本信任”。在一定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认同的精致化，同样也是认同他人和客体的精致化之条件”^③。

这种自我认同的精致化也可以说是一种顺畅化，这首先来自儿童与看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39 页。

② See Harold Garfinkel,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ned Actions,” in O. J. Harvey,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3.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39 页。

③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46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护者之间的互动，这为儿童将非我纳入到自我认同之中提供了最为初始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儿童逐渐获得了一种对于他者的基本信任。这可以说是通过对于本来不习惯的非我的习俗和惯例的把握来实现的，人通过这种学习的过程来把握一个外部的世界，并对其给予一种信任。这种信任通过仪式性的互动来得到表达，人们在这种互动仪式的信任表达之中，为一种没有对象可以寻找的个体的焦虑提供了一种伪装，人们至少在此时可以暂时忘记这一焦虑。因此，吉登斯在论述中，会特别强调信任、焦虑以及社会互动的日常惯例这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不能单方面地去理解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同时，日常生活的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的应对机制，这种仪式性的互动，不一定真的有某种降低个人焦虑的功能，却是通过社会来控制焦虑的一种途径。吉登斯专门引述了戈夫曼对于街上行人之间的所谓“市民冷淡”行为的分析，这种行为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公共场合维持一种一般化信任的仪式性互动。这种仪式性互动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实际上是因为它建立在由参与者所制定的相互认可和保护的内隐契约（implicit contract）之上，也就是大家不声不响地相互接受各自伪装起来的自我的表演，这也是“市民冷淡”的社会得以出现和持续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相互保持一种互不干涉与宽容的心态，但却造成彼此之间在情感关系上的一种冷淡和疏离。吉登斯曾经比较了在现代社会公共场所的这种“市民冷淡”与传统社会中此类情形之间的区别，如其所言：

个体在街上遭遇另一个体，通过有风度的一瞥，表示对方值得尊重，然后通过调整目光显示自己对对方没有威胁；对方也是如此。而在传统场域中，“熟人”和“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个体不具有“市民冷淡”的仪式。他们或者避免凝视对方，或者盯住对方，而这种方式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会显得粗鲁、富于威胁。^①

在这一方面，吉登斯试图从更为深层次的本体安全的角度去重新理解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2页。

戈夫曼，即他所讨论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信任与策略的仪式性行为。在吉登斯看来，这些仪式，不仅是在保护自身的尊严以及他人的尊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控制身体的体态、面部的表情、目光以及通过使用语言等这些仪式性的活动，人们可以获得自身最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在这里，吉登斯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仪式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之上，而是把我们的视角引向更为深邃的区域，即人必须做出应答的存在的领域。在这一点上，吉登斯接受了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教导，认为存在就是“在世界上存有”（being-in-the-world），并且在“过”（doing）日常生活时，所有的人都要去“回答”生存的问题，这种回答就是一种行为，即要在行为层面给予的一种回答，也就是回答什么是生存的问题。^①

在这一维度上，吉登斯把哲学领域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讨论融入到社会学的讨论中来，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企图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去面对和解决人的存在的困境或者存在性矛盾（existential contradiction）的问题。在吉登斯看来，这首先是跟人自身的觉知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种觉知能力就是一种对于自身存在限度的自我意识，即从无生命世界分离出来的人，猛然地觉知到了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这也就是后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dasein），这是人的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不仅有其生存和死亡，而且能觉知其自身死亡的限度，即是一种对有关“非存在的存在性”的觉知。这种觉知激发了人类能意识到的其“面向死亡的存在”（being-un-to-death）的时间本质。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一种迫切性，这是一种个人对于自己终有一天会迫近死亡的清晰觉知，并因这种觉知而尽其所能地去做他目前所在做的事情，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存在的迫切性。^② 这种存在的迫切性，或者说是一种困境，成为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焦虑的一个来源，并且挥之不去。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3 页。

^② See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 Blackwell, 1962, pp. 143 - 145.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5 页。

在这种自我觉知之外，还有他人的存在，但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主体，如何去理解他人的存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彻底否定了这种对于他人存在的认知上的可能性，在“我思故我在”的二元论哲学引导下，笛卡儿曾经断言，人也许能够了解他人的身体，但是绝对无法了解他人的灵魂，因为，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存在，是无法去真正接近他人的意识的。后来，现象学家胡塞尔对笛卡儿的主张进行了一些修订，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自身所明确意识到的移情式推理（empathic inferences）去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地觉知到他人的感情与经验。

而在吉登斯看来，胡塞尔的这一修订，仍旧是一种自我的超验哲学，最终的结局可能是滑向一种唯我论（solipsism），因此，也就无法为关注外在社会的社会学提供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空间。而吉登斯则试图借助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去克服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中最终无法克服的一些困境。在这里，之所以借用维特根斯坦，是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他本人特别注意到了自我意识对于他人的觉知没有第一性，即不是自明的，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语言在其中发挥着沟通自我与他人的作用。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并不认为互为主体性源自主体性本身，而认为与儿童的早期经验密切相关，在儿童习得语言之前，他就已经对他自身以外的世界进行了一种探索，积累了经验，并明确意识到了有他人的存在或在场。在这种儿童的早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一种信任他人的体验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信任他人就是体验稳定的外在世界和完善自我认同感的源泉”^①。

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他人的可靠性和统一性的坚定信念。这种最初在跟看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信任，会逐渐在未来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互为主体性的一般性信任的基础。每个人都凭借这种信任而认可了一种惯例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遵循着日常生活秩序的安排，拒斥更多的因情境变化而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改变。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7页。

人们不仅会形成一种对于他人存在的认识，而且会反过来形成一种对于自我是什么的界定，这种界定就是一种自我认同。显而易见，在有关存在的困境中，自我认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认同体现了一种联系性，由此作为自我的存在可以得到确认或识别。在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社会学家中，美国的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在“主我”（I）与“宾我”（me）之间所做的区分最有影响力。米德认为，“宾我”是儿童明确意识到的“主我”的外在化，这便是一种社会认同。其中，“主我”是属于个体本身的，并由它来控制作为社会联结的“宾我”。尽管吉登斯赞同米德对儿童自我发展历程的精妙观察，但他还是认为，“主我”和“宾我”之间的区分不过是一种语言上的分别，而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别，因此，吉登斯断言：

“主我”是个语言转换器，它从术语的网络中获得其意义，而借助这个网络，主体性的话语系统得以形成。运用“主我”以及其他相关的主体性术语的能力，是自我觉知突显的条件，但并不由此限定自我觉知的意义。^①

换言之，人对于自己的认知，是依赖于其周围的环境条件的，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化对于“人”这一概念的界定，一个文化中的人观（personhood）成为一个人不断地去修订自身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准，而“主我”在一定意义上担当着这种把文化里的人观真正纳入到“宾我”的话语表述中去加以反思的角色，这同时也可以看成一种自我的检视，以此来衡量由“主我”控制的“宾我”离开一个文化中的人观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在这种对于自我认同的分析中，吉登斯还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在保持完整的自我认同者与自我分裂或自我认同残缺者之间做了一种对比。自我认同感缺失的个体，会明显地表现出诸多本体不安全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种个人经历连续感的缺乏，由此也就难以有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8页。

对于生命连续性意义的持守；另外，他似乎还会存在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并非活着。由于这种无法获得的连续性经验，时间的经验也被切割成一些无法连贯起来的碎片，而与之相伴的则是由此种断裂所引发的各种焦虑。其次便是个人对于外部可能存在的风险所表现出来的忧郁之情，久而久之，就会因自感无力去应对或反抗这些风险而为这种忧郁所麻痹。因为缺乏一种与之相契合的自我保护机制，个体又会产生被这些外在的风险吞没的感觉，很多时候，个体会随波逐流，迎合环境，以此来使自己免受这些风险的吞没。最后，这些缺少自我完整性（self-integrity）的个体，也很难再发展出一种与他人之间的相互的信任，即便有一定的信任可以发展出来，维持这种信任也会变得极为困难。^①

吉登斯认为，正常发展的自我认同感恰恰是上述这些特征的反面。一个拥有合理而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能够自我觉知地感受到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并将此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事物而加以接纳，以此来与他人进行沟通。个体还会通过早期信任关系的确立建立起一种个体自身的保护带，以此来免除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中威胁到自我完整性的那些风险。这种自我认同的维持，所依赖的是在与他人的良性互动中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知识和经验。而在这中间，文化的因素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至少会影响到自我认同的内容构成，并且也会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发生一种改变。^②

第三节 经验的区隔

吉登斯把今天的社会看成一个“经验的封存”的社会，这种所谓“经验的封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的区隔，也就是把本来属于社会中一分子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日常生活的程序中区分出来，成为一个自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9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60~61 页。

成一体的单元，比如疯癫、犯罪、疾病和死亡、性以及自然现象等，在现代社会中都属于此种区隔的对象。^①

这是一种借助制度化区隔的方法，将本体论生存困境上的问题逐步加以分离，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可以观察到的区域。在这方面，像监狱和医院这样的现代机构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借助组织机构的对于经验的区隔，结果造成在日常的社会之中再也无法见到这些特殊人群的存在和表现，他们可能会永久地生存在这些被严格界定并区隔开来的机构空间当中，比如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精神病人以及艾滋病病人等。

吉登斯注意到了此前福柯有关于此类问题的大量论述，但他认为福柯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此类问题背后的细节中去审视现代理性成长的问题。在这方面，他注意到了罗思曼（David J. Rothman）的研究，认为罗思曼对于美国精神医院产生的研究，实际上是有一定普遍应用性的。^② 通过吉登斯的转述，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现代时期之前，人们把精神错乱、犯罪以及贫穷这类现象看作人的存在的外在特征，而非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便到了18世纪晚期，有此类特征的个人或群体，也没有被看成个人或集体过错的一个指标。再具体一些可以去看“贫穷”这一概念的演变。在18世纪早期，“贫穷”这个词的含义具有多样性。而界定贫穷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原则，其中寡妇、孤儿、病人、老年人、无能力者和精神错乱者都可能被包括进来，他们都是社会中的某个特殊群体。^③

监狱是接纳此类特殊群体中的罪犯这一类人的地方，人们最初的想法往往是通过监狱的建立并通过监狱生活的纪律与严格的管教，而使之成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形式，也就是通过把犯罪行为从其周遭不良的环境当中移开，来使人得到一种改造，并获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重生。因此，在吉登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2 页。

② See David J. Rothman, *The Discovery of the Asylu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转述自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59 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3 页。

斯看来，“监狱成了一个社会改造的实验室”^①。实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社会有许多环境建构都没有脱离这样一种模式，生活在现代社会空间里的人似乎都有一种压抑感，他们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并不断会有人提醒你的行为不合乎正常的规范，这些在吉登斯看来似乎都属于监狱这一“社会改造实验室”的翻版。

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便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对人的改造。在先前的时代，患有精神疾病乃至疯癫的人一般会继续留在社区之中，并获得熟人社区一定程度的生活照顾。而在今天，专门的精神病医院的建立，使得生活在熟人社区中的精神病人已不多见。从病原学上来讲，精神错乱本身实际上更多地属于身体疾病，不过大多数类型的精神错乱又会被归因为社会情境，因此，通过一种治疗来控制这种行为，就成为产生预期治疗效果的一种主要手段。精神疾病诊疗所因此而诞生，把一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囚禁”在这一专门空间的区隔之中，通过情境本身的特殊安排和对精神病知识的应用，来使病人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并会辅之以一定的药物或治疗技术来实现上述目的。精神病院中所采纳的对于病态人格的矫正，酷似监狱中对于犯人的改造，其中有明显的道德矫正的意味，其所凭借的就是严格的监控以及纪律的约束。

在追溯精神病人诊疗史的过程中，吉登斯与福柯又有所不同。福柯将这种诊疗史限定在了一种封闭的惩戒制度的建立上，以规训和惩罚来改造社会的异类。吉登斯则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整个社会的变革或转型，也就是通过这样的制度空间的确立，通过对于这些特殊群体的社会性无能（social incapacity）的不断界定，来发展出一种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效应的反思性的自我控制。^②而这种跟现代理性的成长无法脱离干系的反思性的自我控制，同样被严格限定在了一个专门的空间范围内，同样是一种经验的区隔，这空间就包括监狱、医院以及诊疗所等，而在其中，所有跟社会常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5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7页。

规行为相左的那些行为都会因此种区隔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使一些行为怪诞，乃至思维脱离常规之人通过一种分类并闭锁起来的方式而销声匿迹，形成了吉登斯所谓的一个有着内在参照或指涉系统的空间范围，其中，越轨（deviance）便成为此内在参照系统的一个部分。由此而造成一个结果便是，原来属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犯罪与疯癫的问题，被重新界定为某个特殊领域中的特殊问题而被区隔出来，并由此而远离了一种日常的生活空间。显然，在今天的社会中，由于收容以及城管的制度，我们已经很少再见到沿街乞讨者、满街乱跑的精神病人以及四处流窜的罪犯了。这种一般人所谓的“成绩”或者“进步”显然是一种现代理性下的产物，是一种对原来难以被细致区分的人群整体做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清晰界定之后的监督、治理与控制技术。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医院制度的建立，使平时生活中的病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中逐渐消失。在吉登斯看来，过去的医院，差不多可以看成现代监狱和避难所的前身，各种社会的另类患病人群，都被收纳到这些前期的医院或者避难所里，在使这些人得到救治的同时，也会实施一种道德上的教化和纪律上的约束。在此基础上，社会才慢慢发展出一个集中于关心人的身体问题的独立而又相对隔离开来的医疗机构，因此可以说，现代医院的发展，跟医学的逐步专业化之间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在医院这个空间场域中，随着医疗技术和知识的增加，医疗的专业化也在快速地发展。与此同时，与监狱和诊疗所一样，医院本身也成为一個被区隔出来的场域，即一个把那些不太适合于参加所谓正常社会活动的人“区隔”或者“封存”起来的地方。通过这种区隔，某种原本属于社会的经验，便被孤立开来，自成一个体系，比如病患和死亡的经验，就不再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这类经验已经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界，即不再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转变成为发生在医院这一特殊空间中的稀缺经验了。在此意义上，疾病和死亡都成了一种隐秘的事件，甚至对于死亡的判断，也不再是家庭成员可以独立做出的，它纯粹成为医疗中的一种专门的诊断技术，凭借这种技术，一个人才能被

判定为活着或者死亡。^①

同时，一种被称为激情的私化（privatisation of passion）的性行为，也在悄悄经历着一种社会意识的转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性实际上使性行为逐渐隐匿起来，它因此而成为一种私人的财产。而最为重要的是，这种性行为的隐去，并不意味着性是在一种性的内容重构或某种新出现的亲密行为的领域中隐藏起来，而是在性自身的知识发展以及性的满足形式上隐藏起来，更多变成亲密恋人之间的能力和知识技巧的表达或自我投射。而有关性的流行话语通过各种社会传播媒介而构成了一种需要让人自身不断去思考，以寻求某种自我反思性的存在，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如何去建构两人世界的内在参照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来源。性由此而变成了自我实现与亲密行为表达的一个媒介，并逐渐失去了与广泛的传统和伦理道德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失去了与代际传递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尽管性依然是我们生活经验中的核心构成成分，但这种经验可谓一种加了引号的经验，它成为一种跟我们赖以生存的经验并无直接关系的被区隔开来的经验和参照系。它至少不再与生殖和社会的继替密切联系在一起，而纯粹成为个人之间欲望占有和满足的形式与技巧。^②

最后就是对于自然经验的区隔或封存，因为这种区隔，人跟自然之间的距离被无限地拉开。实际上，人们一般的认识已经注意到了，现代性的核心是把自然看成工具性的，进而将其看作实现人类意图的一种手段。但是，吉登斯显然要比这种理解走得更远一些，他用自然的社会化（the socialisation of nature）这一概念来指涉现代性的这种对自然加以利用所导致的后果及其背后深邃的含义。在他看来，自然的世界依照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的安排而变得更加有秩序。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自然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然，它是在接近其存在的“末日”或“终结”。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生活在所谓纯粹自然的状态之下。首先，随着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89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0~192 页。

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一种人造的建筑环境之中，人们生活的辅助设施，如水、电、煤气等，也越来越依赖于某种外部的供给，人的居所开始彻底与自然相分离，人们的生活则主要体现在由人自己所创造的空间之中，只有特意到乡下、到野外，才能重新找回自然存在的那份感觉。其次，今天的世界，许多本该自然发生的事件的自然性被剪除，结果是其变得越来越受到一种外在的社会化的影响。于是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事件，有很多都已经不再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是经由各种新的传播媒体，二次传送给我们，这包括许多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新闻或事件报道。^① 所有这些信息在今天都可能是我们通过点击手机屏幕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亲身前往而体验到的。这便是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区隔开来的一种极致状态，人因此而生存在虚拟但却实际的生活之中。

上述这些被吉登斯统称为经验的区隔的方面，不仅使我们的个人经验变得单纯，而且使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安全地带得到了保障。不言而喻，这一安全地带的发展，对于本体安全感的维持至关重要。不过，尽管有此安全地带的建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比过去时代的安全更为可控制和可预期，但是，今天把与社会不相融合的经验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分离出去的一种经验的区隔本身，却使本体安全性的架构变得不是更加牢固而是更加易于破碎。因为，本体性安全的保护壳，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常规生活本身的一贯性。这是建立在符号化意义上的抽象系统之上的有序，但此类有序背后的规范，大多缺少一种道德的意义，结果是，行动者要么感受到一种日常生活无意义的虚空的实践，要么体验到一种过度沉重的生活压力。由此，行动者在特定的生活压力之下体味到了此类抽象系统对于人的存在的无意义感，并借助一种对自我认同高度的反思性控制而表达出一种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以失落、焦虑以及生存困境等形式体现出来。^②

在经验被不断区隔的过程中，经验的传递也同样受到了阻隔。显然，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3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5 页。

现在能够与死亡和重病这类经验有直接接触的只有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平常人是很少有机会去亲历“现场”的，人们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是通过第二手的阅读，或者影视纪录片的介绍。但即便如此，了解到此类真实经验的可能性也在变得越来越有限，因为各种对于传播媒体中社会舆论的限制，使得这种真实记录的二手经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得。但是，确实今天这个时代里，人们了解暴力、性以及死亡这类的生活经验，大部分是通过这些经过文学和艺术加工的科幻小说和纪录片。甚至在今天这种各类媒体极度发达的时代里，人们要远比自己的先人更加熟悉这些富含日常生活意义的场景，只是这些熟悉不是基于第一手的观察，而是经由媒体加工之后的经验的传递。在一些叙事细腻、环境渲染炽烈的电视和电影的故事讲述中，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一种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宣讲，但这些实际上都可能是虚幻的，在现实生活中也都无法找到某种对应，但反过来，恰恰是这些虚幻的现实——用一个当下流行且易懂的词汇来说便是“穿越”——却在日益取代着日常生活的真实，并主导着日常生活形态的内容。通过这些由媒体所传递出来的语言和意象，观看者便能够获得远比日常所能获得的经验更为广泛而又遥远的经验。确实今天，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民，通过家里的电视或者网络，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发生在中东、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地的一些危机事件，也能了解到2008年发生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些见闻的获得在今天这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显然已经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们生活之中的经验的区隔，实际上使得公共领域的范围在逐步缩小，尽管资本主义的兴起激发了公共领域的成长，但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之后，伴随着一种吉登斯所说的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无法完全脱离开来的自恋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的出现，一种个体私人生活的公共领域面临着衰微和死亡的困境。吉登斯认为，这种公共领域的衰微，实际起源于传统权威的衰落以及一种世俗性的资本主义城市消费文化的兴起。换言之，资本主义自身在发展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不同需要的消费者，而世俗化的正当性表述，将传统的延时性满足的道德转变到一种即时享乐

的道德上来。在这里，与他人不同的个性或者人格的张扬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而这种人格的培养被认为是发自个体本身的。这在一定意义上组织了个体对于社会的参与热情，而这反过来也会更加强化一种自恋文化。^①

这种自恋文化明显地表现在一种对于自我的关怀上，在无法真正对宏大的全球化的危险或灾难提出一些看法之后，人们会变得更加关怀日常生活中自我存在的安全，尽最大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尽可能远离日常有他人存在的生活，而把更多的活动建立在一种私人化或者个体化的生存策略上，以此来忘却较大的危险场景。比如雾霾来袭之时，更多的人戴起了口罩自保而不是去考虑雾霾的真正源头，有些人即便意识到了，也会觉得离自己太过遥远，随口发几句牢骚也就过去了，这种生活实践使人们放弃了去控制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的希望，退而求其次地回归到对于自身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改善这样纯粹私人的关怀中去。^②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在推波助澜地使这种自恋文化得到发展，因为通过消费的标准化以及个性品位的塑造，自我张扬的信念得到了一种固化。通过传媒和广告，自恋者对于有魅力的、漂亮的形象以及个人名望等的追求，都因为广告的暗示而被给予了一种期许的满足。而各种咨询专家的出现，则逐步取代了先前的家庭权威的位置，这也进一步影响到现代社会中自恋文化的出现。自恋者找到了新的自我可以去依赖的对象，而咨询专家也从来不会去客观评价自己的治愈能力，他们借助各种媒体传播的形式，像资本家兜售商品一样去兜售自己的咨询经验，以证明其效验和权威；而反过来的情形便是，依赖于这些专家也成了这些去接受咨询的自恋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以此来克服自身在面对强大外力影响上的一种无力感，并借此关系来加以摆脱。^③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 页。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00 页。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01~202 页。

第四节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

吉登斯在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于“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这一主题有过许多论述，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反常状态（anomie）的危机是与人类对于环境不断的知识建构紧密相关的。^① 与埃里亚斯所提出的“文明化过程”的理念^②相似，吉登斯同样认为，随着现代理性及其技术产品将人与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分离开来，人与自然之间原本无法分离开来的互佑关系便宣告终结，这种由人与自然的异化所带来的“自然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相伴而生，如此而构成了晚期现代性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挑战，这种挑战同时也型塑了“生活政治”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并在一定意义上与伦理和存在的问题重新扯上了关系。

当然，其中不乏一些反对者的声音，他们试图问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真的终结了吗？许多研究者，特别是女性主义者的研究发现，人的身体实际上成了展示男性权力的虚假的和表面性话语的一种社会建构，而恰是这种社会建构的知识，使人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自然中独立的现实存在已经不再可能了。^③ 而同样的，对自然的身体持一种实在论的学者则会坚持说，哪里有什么“自然的终结”，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身体，不是依然如故吗？物理的以及化学的身体结构，不是跟以前一样完好无缺吗？这怎么能说是自然的终结呢？因而，在他们看来，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之中，更该问的问题可能是身体究竟是如何被医学化的（medicalised），也就是要关注，在一个由男性医生占主导的情境下，正规的科学如何能够使生育过程的机械化（the mechanisation of the birth process）得以发生，以及妇女是否有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1991. 中译本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② See N. Elias, *The Civilis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78.

③ See Peter Dickens, “Life 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imits of Sociology,” in Martin O’Brien, *Theorising Modernity: Reflexivity,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Giddens’ Social Theory*, Sue Penna and Colin Hay, eds., London, Longman, 1999, p. 107.

权利发展出对于她们自己身体的理解和控制。^① 这样的看法，在吉登斯看来，都属于一种名为解放政治的范畴，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

对于解放政治这一概念而言，吉登斯认为自现代早期以来，现代制度便刺激了人的解放（emancipatory）观念的发生，同时也反过来受到了这一观念的促进。最开始便是人从传统与宗教的教条专制中被解放出来。人们以为，通过把理性理解运用到科学和技术领域以及人的社会生活中去，人的活动就会从先前所存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政治学中存在着激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这三种政理解的视角，它们虽然十分不同，但都共同受到了一种解放政治的支配。在党派政治中，自由政治与激进政治一样，都是在追求使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更为完全地从先前的实践与偏见的束缚中尽早解脱出来。在解放政治的观念看来，自由需要通过个体不断的解放并与自由国家相联结才能获得，而难以通过谋划一种革命性巨变的过程来实现。而“保守主义”对现代性解放政治则采取了一种极为怀疑的态度，保守思想构成一种对激进和自由思想的拒斥，并且对现代性的疏离化倾向给予了一种严厉的批判。

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这其中包含这样两个因素，其一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背后隐含着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外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这可以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的养成，目的在于使社会向着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去发展，结果带来的是人对于其自身生活场景的日益增强的社会控制。这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彻底打破，以此来实现一种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自然的控制。

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强调，解放政治自身的他者性，就是这种政治

① See Peter Dickens, "Life 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imits of Sociology," p. 108.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47~24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他者”基础上的政治学，也就是使他者臣服于人的控制之下。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以及权力的等级：

解放政治是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在此，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能力。一些关键性的概念以及方向性的目标都特别富有这种政治的特征。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实质上，不同的学者对这些概念都有着不同的界定。一般说来，剥削是指一个群体（比如说与工人阶级相比较的上层人物，与黑人相比较的白人，或者与女人相比较的男人）非正当地独占被剥削的群体所不能获得的资源和必需品。不平等指的是任何拥有稀缺资源上的差异性，但其中，在获得物质报酬上的差异构成了现代性的生产机制的那一部分，并且因此在理论上（当然不是在实践中）能够随心所欲地被转换。压迫则是被某个群体用来限制另一个群体的生活机遇的一种权力分殊的问题。与解放政治的其他方面一样，把人从受压迫的境遇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含有对道德价值观加以接受的意味。只有当分殊权力在道德上的表现是不正当的时，“正当的权威”（justifiable authority）才能够保护自己以承担反抗压迫的责任。^①

在吉登斯看来，与解放政治相伴而生的有这样三个概念，即正义、平等和参与，这些是解放政治所追求的目标和必须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正义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在帮助人们确定究竟什么才算是一种剥削，这同时也确定了究竟在什么时候一种剥削的关系可能成为一种在道德上说得过去的权威。

比如在某些思想学派中，如何推进社会的平等被看作一种首要的价值而为解放政治所追求。但是，在许多自由主义思想中可能会隐含有认可社会中某种特定的不平等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这是社会发展中自然出现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48~249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的一种现象，比如经济发展上不均衡的物质占有被看作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解放政治追求克服剥削、不平等以及压迫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个人的情欲受到了限制，个体或群体都是在一个受到束缚的限定框架内来发展他们自身的潜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就意味着“通过让个体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在其社会生活的环境中自由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来把集体的生活组织起来”^①。

但是，有了这样一种解放，并不意味着个体有了某种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尽管通过解放政治，个体从形式上已经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束缚中得到了松绑，但是，另外一种约束性关系，又被加到了从解放政治中获得了解放的个体身上，这就是在社会中，行为的行动者的责任感的提升，在这种责任感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集体性的义务。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选择，通过这种选择，人们形成了一种遵从社会规范的生活态度，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却强化了一种逐渐离开解放政治本意的“生活政治”的抬头。

“生活政治”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吉登斯自己独立的发明，他试图用这个术语去解释，在当下世界的主流生活方式与过去解放政治之下的生活方式之间，所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差异，在他看来，前者更为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从对个体自身的束缚之中解放出来，而后者则更为强调我们获得这种自由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即以追求个体解放为其目标。换言之，生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选择的政治，是对于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或者如吉登斯所概括的那样，“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②。在这方面，生活政治便特别紧密地跟一种个体行动者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结合在了一起的，是由这种能力所调动起来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新秩序。这同时还是一种通过反思性而获得自我实现的政治，这种反思性可以把一个人的自我和身体与全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0页。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球范围内的系统连接在一起。相比解放政治的活动领域而言，在解放政治的反思性活动领域中，权力是产生式的而不是等级式的。因而在吉登斯看来：

生活政治关涉的是在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①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跟个人自我实现的意识和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个人的生活目标也会反转回来，影响到整体的社会发展方向和追求。这种方向和追求，又极为密切地随声附和于个人对于生活方式的各种选择，而这些选择构成了一种生活的决策，这一决策也影响着一个人对于自己社会生活的规划。可以说，这种规划是建立在一种地方性与全球化交织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自我认同的叙述在与迅速变化着的社会生活情境的关系中被形塑、修正和被反思性地保持下来”^②。在此过程中，个体需要以一种合理而又连贯的方式，有机地把对未来的种种设想与过去的经验相互联结在一起，以便能够把得到传递的经验的差异性中所产生的信息与当地性的生活统合在一起。在这里就需要有一种自我指涉的内在可信性的发展，如前所述，这种可信性对于某一个体而言，属于一种基本信任的框架，依靠这种自我建构起来的基本信任框架，可以使个体把对生活历程的某种理解完全放置在变化着的社会事件的背景下去加以想象和理解。在这里，自我反思性的概念，再一次被吉登斯用来解释内在可信性能力的发展，这种能力使得有限的生活历程有了一种对于个体而言的内在可信性，即无须实际经验的自我知识的指涉。同时，人们还会将这种可信性付诸一种实际的生活安排。表 5—1 是吉登斯用来解释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两种生活形态之间特征差异的表格，缀录在这里作为参照。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2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3 页。

表 5—1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特征差异的比较

解放政治	生活政治
1. 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 2. 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所关心的是权力与资源的差异性分配。 3. 服从于正义、平等与参与的伦理所具有的独断。	1. 从选择的自由和产生式权力（作为转换性能力的权力）中得来的政治决策。 2. 在全球化背景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 3. 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伦理，并抗拒存在性问题的背景。

资料来源：[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2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在解释生活政治的具体形态时，吉登斯还特别指出了如今个人的身体如何与生活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一个为现代性所左右的社会之中，身体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学上的实体，而是通过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性成了“一个互动、占有与再占有以及将反思性的组织过程与系统化的有序的专家知识联结起来的场所”^①。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成为一个可以容纳各种实验性知识的加工厂，跟身体有关的生活安排也不再是一种常规性的活动安排，而成为需要不断由专家来指导的一个生活领域。因此，今天保健、烹饪、美容、运动、恋爱等方面的专家生活指南和实际操作手册这类生活指导，伴随着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深入地侵入我们的生活。与解放政治有所不同的是，在生活政治的场景中，身体不再是一个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存在，而是从解放政治对身体的一味掠夺之中挣脱出来的，由一种保持独立的自我认同来掌控的对于个人身体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以最大限度地脱离社会规则以及传统性期望的约束为其根本目的，并以此来重新界定身体存在的意义。^② 接下来，身体的“所有权”的问题，便开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突显出来，这种突显，密切地跟抽象系统以及自我反思性的双重卷入相关联。它使得个体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发展状况和规划做出一种选择，在这一选择中，就包括如何对自己身体的产物以及身体的各部分给出一种得到自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6 页。

② See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9, p. 123.

我认可的处置。^①

这方面，在吉登斯看来，最明显地体现在人的生殖领域。原来更多倾向于自然生殖的领域，现在已经逐渐地为现代性知识的内在参照系统所侵入，换言之，这里成了一种跟各种生殖技术相关的知识发现的实验场。在这个场所里，自然的生殖已经因为这些生殖技术知识的侵入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由此，原来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真正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生殖，在此过程之中，“抽象系统抽去了生物性的生殖并通过自我的反思性而加以重构”^②。随着几乎有百分之百成功率的避孕技术和器械的发明，加之人们自身对于性生活的自我反思性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渐渐培养起来的主动选择节育和绝育的生活态度，生殖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多重选择。^③

那些曾经批评吉登斯的“自然的终结”的论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吉登斯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所谓“自然的终结”这一非常严肃的问题的。吉登斯敏锐地注意到，作为“自然的终结”的一种映射，“自然生殖的终结”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这种蔓延显然要“归功于”遗传工程概念的引入和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知识的应用，使“自然生殖的终结”一下子变成一种社会现实。这同时也是一种自然过程再生产的彻底瓦解，我们在今天似乎已经无法再找寻到真正属于自然过程的自然延续，以生物进化为基础的种族生命的延续，也不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生殖成为决策的领域，是由个体行动者借助一种自我认同参照系统而做出的选择。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技术的发展，生殖不再是一种必须跟异性的性经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身体能力。这样的一种物种繁衍与异性的性行为之间的分离，造成了人依赖于这些生殖技术的结果，这样的生殖技术，与未来可能有的不确定的后果和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7 页。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7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7 页。

风险社会的不确定的后果之间是有可比性的。^①

另外，从起源上而论，生活政治的出现可以说是深受现代性制度压制的道德与存在问题的一种回归，并非像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或者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论者所宣称的那样，在当代社会的情境下，道德问题的讨论已经变得完全没有了意义。因此，后现代性概念本身，确实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今天，为什么道德问题的讨论又重新回归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来，人们并没有因为后现代的去价值化而忘记了价值或者道德感的意义。不过，在吉登斯看来，跟过去的道德问题的讨论有所不同的是，在生活政治的情境之下，抽象系统成为人们获得和分析各种可能信息的重要来源，人们依赖于由专家发明并予以建构的抽象系统，因为被解放政治打破的道德约束，又被道德研究的专家重新予以评估，并捡拾起来，以激发社会中人们对于道德缺失的重新关注，使之成为人们在解放政治之后对于道德和存在问题关注的一个核心主题。由此，一种让生活再道德化的呼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生活政治必然的讨论核心，人们试图借此抛弃在解放政治中发展出来的抽象的以及技术的理性，并直接回归到解放政治之前的对于社会道德和自我存在问题的讨论中去。^②

在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中，随着抽象系统的不断扩展以及自然过程社会化的快速演进，生活政治的问题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这迫使在生活政治时期生活的行动者，必须发展出一种比较完备的对于某种自我偏好的生活方式加以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这本身天然地就跟道德与存在的问题相互制衡，如何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世界必须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的结尾之处，吉登斯试图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58～259 页。这种风险可能是直接跟财产纠纷联系在一起的。据说是中国首例因为“代孕”所引发的监护权纷争已经在 2015 年 8 月开庭审理。而代孕在世界乃至在中国并非极少数的案例。在这方面的隐性危险也不幸为吉登斯所言中了。关于中国这一纠纷的报道可参见 <http://www.kankanews.com/a/2015-08-10/0017018941.shtml>, 2015-08-10。

②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62 页。

也可能就是我们普通人一样要去追问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对社会生活予以再道德化而又不致落入偏见呢？如果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伦理原则的话，那么人性如何能够用无暴力方式应付‘真正信仰者’的冲击呢？”^①

想要对此类问题做出回答，我们有必要再回到吉登斯所描述的所谓今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晚期现代性的世界”，看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

的世界，这对理解当下的生活政治的种种表现而言极为有必要。

第五节 晚期现代性的世界

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跟先前历史时代的意义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尽管每个人依旧过着一种地方性的生活，即人们生活在某个时空背景下的地方或地点之中，但是地点的转换以及人的活动会使远处的干扰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并由此而获得一种其他地方和存在的间接性经验，那么行动者自身所居留的特定地方的世界，也因此而有了极大的改变。换言之，尽管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当地化的生活，但却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了，现今互联网快速的扩展和便捷的使用，使这种世界性的图像更加容易在地方性的世界中得到一种清晰的显现。

在此过程中，地方性已经不再具有前现代社会中的那种自我封闭性，而是受到远处文化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度浸染。在此过程中，“所有的个体都主动地（虽然不会总是以一种有意识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把许多被传递的经验要素纳入到他们的日常行动中去”^②。在这个外来经验的传递过程中，当然会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同样的一种外来信息对于某些人而言有着明显的影响，而对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没有什么影响，这是对信息的有选择性的借用。这种排斥外来信息以保持自身封闭性的认识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70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2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建立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 (Leon Festinger, 1919—1989) 所提出的“认知不协调”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的假说之上, 即人们总会去有意地规避与自己之前的认知不一致的信息。^① 吉登斯则认为, 在此认知不协调的过程中, 人们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保护壳, 使自己不会受到纷繁复杂的外来信息和经验的干扰, 以强化自身本体论安全的自我认识。但是, 这种保护自身安全的存在状况并不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 人们会因此受到批评, 在被认为属于是一种复古和封闭之后, 人们开放性地接受外来信息的大门就有可能被打开了, 因此“不协调”成为一种近乎常态的生活状况。这也属于吉登斯所描述的“活在世上”的晚期现代性景观, 在这种景观之中, 行动者的自我成为一个主角, 自我在独自承受着这个晚期现代性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独特的紧张和艰辛”, 这种“紧张和艰辛”也被吉登斯称为在现代世界中存在的人自身所必然面临的两难困境, 为此吉登斯曾经总结出四种生活于晚期现代性世界中的存在上的两难困境 (见表 5—2), 这些困境的解决, 成为行动者保持一种自我认同的内部一致性叙述的前提条件。^②

表 5—2 自我的两难困境

<p><u>联合与分裂</u>: 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吸纳了许多背景性事件和被传递的经验的诸多形式, 但也必须从中刻画出个人发展的道路。</p> <p><u>无力感与占有</u>: 现代性所提供的许多占有机会, 使生活方式的选择成为可能, 但也产生了无力的感觉。</p> <p><u>权威与不确定性</u>: 在没有终极权威的情境中, 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必须在信奉与不确定性之间把握一个方向。</p> <p><u>个性化与商品化</u>: 自我的叙述必须在个人的占有为消费标准化的势力所左右的情境中得以建构。</p>

资料来源: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235 页,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对这四种困境可分述如下。第一个困境就是联合与分裂 (unification versus fragmentation) 之间的矛盾。正如吉登斯所注意到的, 现代性具有两面性, 它既是分裂的, 同时也是联合的。联合能够保证对于自我认同叙

① 参见 [美] 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② 有关这四种困境的详细讨论可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222~236 页。

事的保护与重构。在吉登斯看来，“外在的”世界并非一个天然地异化并压迫个人的系统，也不是一个在范围或广度上与个人的存在疏远和对立的社会系统。这就可以使我们很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对我们而言，似乎在远方发生的事件，比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件还要让人熟悉，甚至比直接面对面的影响力还要大，而这种远距离的影响也确实在日益深入地融入到个人自我的生活经验的框架中去。在今天，正像吉登斯所一再提醒的那样，我们对下面的景象已经不再有什么特别的陌生感：一个人可以在电话里或网络视频中与千里之外的某个人闲聊家常，而此时此刻，打电话者以及上网者与远方之人的关系，肯定会显得比坐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实际在场的其他人更为密切。而同样，随着电视机以及网络的大众化，我们今天对于某个世界级领导人的外貌、性格以及政策的熟知，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对自己邻居的熟知。有很多人，他们对于与自己一墙之隔的邻居可能一无所知，但是，对于世界上的政治风云人物、电影明星或者体育明星却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甚至有很多人每天都生活在这些虚拟化了的偶像崇拜之中。还有，随着有关气候变化的大量报道以及相关主题的研讨会的召开，人们现在可能对于全球变暖的争论有更多的关注，最后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各类争论以及相关的概念，甚至要比对家里水龙头漏水的原因还要熟悉。^① 这些知识的获得和熟悉，使个人更加认同于超越地方性的全球问题，这种把对象从其背景中抽离出去的做法，使人们可以特立独行地去谋求这样一种使认同能够落实下来的并且超越地方性存在的生活方式，人们可能会在一个环境未受污染的地区选择一种只有在污染地区才会看到的生活方式，以此来获得一种使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得到保障的观念上的自我认同。

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世界中的第二个两难困境是所谓无力感与占有（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之间的矛盾。这种困境，实际上是一种“个体在联想到一个差异如此广泛的社会世界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力的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23 页。

感受”^①，即一个人无法真正面对和理解一个近乎陌生的世界。可以说，在传统的世界中，个体可以有意去控制影响他们实际生活的外在因素；而在现代社会之中，人们实际上是把这种控制交付给了外在的中介机构或行动者（agencies），其中有很多都属于吉登斯所谓的抽象系统，即这些中介机构或者行动者的运行机制是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这与马克思所谓的异化（alienation）概念有相近的内涵，即不是由人来控制机器，而是由机器来对人及其生活安排加以控制，这种转变，从根本上来说，也带来了一种人的自主性的丧失，这同时也可以看成一种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占有或挪用，因为面对越来越抽象的社会系统，人们似乎也越来越失去了一种自主的控制能力，就好像这种能力被他人占有或挪用了一般。

吉登斯所提出的生活在晚期现代性世界中的第三个两难困境，即所谓权威与不确定性（authority versus uncertainty）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一困境是针对高度现代性的现代世界中权威的多样性而言的。权威的多样性，实际带来的是非决定性权威的存在，这种找不到核心权威之人的状况，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之中，传统不再是唯一的权威，而仅仅是社会中的多种权威之一，而且，它也并非固定在任何具体的制度中，而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许在现代，某些传统的权威还一直存在，而有些权威，比如宗教权威，并没有随着现代性的增强而消失，反而有一种复苏乃至复兴的迹象。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当下社会中的权威与过去的传统权威之间还是有着极为根本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权威的性质发生了一种转变，这种传统权威的核心支配性在今天逐渐地消失了，更多地变成了以专家面目形式出现的多种权威中的一种。而今天，作为一种独特人群的专家或专业人员，其与传统权威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之前的权威，最重要的作用是所谓的答疑解惑，尽管今天的专家仍然有答疑解惑的作用，但是今天真正的专家，实际上要不断地受到各类疑惑本身的激发，然后凭借自身的专业的知识来寻求对此疑惑给出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25页。

一种解决。因此，不断出现的疑惑，便成为专家系统需要解决并用来扩充其专家系统知识储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知识来源，这些知识进一步激发出新的不确定性疑惑，并等待着专家去进行解决，这跟传统社会中权威知识的固定性以及确定性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了。而一般的社会行动者，都只是将一种信任交付给这样的由专家系统所构成的抽象系统，社会行动者的疑惑便因此得到了一种初步的解决。^①但是，在当今的社会中，这样的权威与疑惑之间的困境，总是因为专家的好奇心和工作上的成就动机而变得异常纷繁复杂和不可控制。

最后，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世界中的自我，吉登斯所归纳的第四个困境就是个性化与商品化（personalized versus commodified）之间的矛盾。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为自我的投射或者外在化开放了一个空间，而物质的商品化以及生活的标准化，成为这种开放性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吉登斯曾经指出，“抽象商品的创造，可能是作为整体生产系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最基本的要素”，并且，“只有当使用价值脱离商品生产、销售和分配以及服务得以实现的那种机制时，交换价值才可能会出现”，因此，一句话，“交换价值允许经济关系超越时空范围的局限”^②。这种超越时空范围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不仅是一种使物质商品化的过程，同时还是资本主义市场不断得到扩张的过程，这个过程作为一种驱动力而对传统构成了一种冲击。

不过，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晚期现代性世界中，获得高度发展的自我的反思性投射，构成了商品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获全胜的最为致命的阻力，自我认同中的个性张扬的普遍被接受，使商品需要不断地改变自身的形态以迎合作为消费者的社会行动者的品味，这实际上延长了社会通过商品化而使其标准化的时间间隔。这里同样存在着吉登斯所说的“控制的辩证法”，也就是商品化本身所寻求的是普遍化和标准化，这样可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28~230 页。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1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以使其有更为广泛的市场空间以及丰厚利润的回报，但是个性的自我表达，使得这种普遍化和标准化极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结果就是使商品化和个性化总是处在一种对立与制衡之中。比如在服装的生产中，市场上既要有大宗的标准化的服饰以满足批量化商品生产和销售利润的获得，同时还必须有强大的设计力量来保证标榜个性的新潮服装不断出现，以满足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自我认同中的一种对于个性张扬的追求。^①

在吉登斯所总结的上述困境中，它们发生的一个共同背景就是吉登斯所谓的内在参照系统的普遍流行，这同时也是个人无意义感得以产生的大背景。在此意义上，“自我的投射不得不在一种有技术能力但道德上贫瘠的社会环境中被反思性地获得”^②。由此，人的自我存在的困境依旧无法得到解决，最终导致一种个人无意义感（personal meaninglessness）的浮现。这种在现代城市中更加易于观察到的无意义感，在吉登斯看来，是跟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的抽象系统不断向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蔓延这一现象联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较之大多数前现代情境中的生活更加具有理性和可计算性，但是这种理性和可计算性的一个无意后果就是，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丰富多彩，而是变得越来越常规化和程序化，而原来所有困扰人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又都通过一种由人自身所发明出来的内在指涉系统对于自我的控制而被消除掉。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才会指出，“在现代社会，控制替代了道德”^③。换言之，我们现代人学会的是控制的技术而非道德内化。

此外，吉登斯在这里所强调的这种取代道德的自我控制，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人自身生活安排和生活方式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前提就是，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差异性的存在予以结构化，使之成为人们对其投以基本信任的内在自我参照系。人们在逐渐地远离纷繁复杂、变化多样的自然的世界，而自我则卷入到由人所创造和发明出来的只对人自身存在意义的世界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5 页。

②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6 页。

③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7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之中，它可能是虚幻的，也可能是现实的，但绝对不是自然的，人们出生在这样一种人造的环境中，最终也会老死于其中。但是，人的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个人生活的无意义感，伴随着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加而愈发突显，最终积累和聚集为一种社会的问题。^①

^① 参见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7 页。

第六章 走出极端政治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与传统的功能论的对话中得到了明晰和发展。对于默顿的功能论，吉登斯认为它把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或理性与行动者的行动所实现的功能对立了起来，去寻求与行动者自身的意图或理性不同的一种社会背后的理性与需求，而实际上，功能论的这种所谓社会系统中的理性或需求是不存在的。吉登斯认为默顿混淆了行动的无意后果、信念与行动的理性。对于社会的变迁，吉登斯主要探讨了两种社会变迁的类型：一种是所谓增量的变迁，这是由再生产中的行动的无意后果所造成的；另外一种变迁来自外部的影响，结果带来了一种日常生活常规化的解体。吉登斯认为，今天的世界纠缠于各种政治理念的选择之中，并为这些选择的结果所左右，而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吉登斯认为那些极端化的政治理念会逐渐失去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提出了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于拯救受伤的世界，吉登斯提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受伤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需要极度的拯救”这一口号式的语言，并提出了相应的具体主张。对于全球化的世界，吉登斯探讨了全球化对极端政治的影响，并对“风险”“抽离化机制”以及“社会反思性”等概念进行了探讨。

在我们开始关注极端政治的未来的同时，极端政治本身也在发生着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变迁就是一种在诸多不确定性的知识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在今天世界发展的快速转型期里，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社会变迁的真实意义。相对于变迁而言，系统的稳定仅仅是社会连续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概念，这个概念把我们引向超越个体层面的世界体系层面，引向影响世界运转的全球化概念。这些都首先是从吉登斯对于社会变迁的功能论解释的批评开始的，他所要做的就是有意地去打破这一曾经影响和支配社会学理论的解释框架。

第一节 潜功能与连续的结构化

稳定和变迁的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从来都不忌讳谈论的一个话题，但常常为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所遮蔽，而吉登斯在提出其结构化理论之初，就试图去打破功能论社会理论中一直强调的共时/历时（synchrony/diachrony）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对于这对关系的立场，也决定着—位社会学家究竟如何去看待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发生在每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场景中，并影响着对于变迁本身的理解。^① 在功能论者看来，共时是一种对于社会横断面的理解，是对一种前后没有连续性的横断面的社会功能的描绘，而历时则意味着一种变迁，社会似乎随着时间在自发地发生一种演变，这在吉登斯看来是最为不可思议的，因为这种连续性功能论者忽略了一些变化着的小插曲，而这些小插曲又进一步固化为一种连续性本身。在此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对这样的一种看法做出回击和反抗的时候到了。

在功能论的传统中，很少给予变迁以实质性的分析，总体而言，功能论的社会学家更加强调稳定，而这也可能是一种对于变迁的解释。美国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ime, Space, Social Change,"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210.

功能论理论家默顿 (Robert King Merton, 1910—2003) 曾经为此而特别将社会的功能区分为显功能 (manifest functions) 与潜功能 (latent functions) 这两种, 在默顿看来, 社会分析的核心任务就是去发现社会的潜功能。^①

但是, 在吉登斯看来, 默顿的功能论把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或理性与行动者的行动所实现的功能之间相互对立了起来, 径直去寻求与行动者自身的意图或理性不同的一种社会背后的理性与需求。不过, 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看来, 功能论中这种所谓社会系统中的理性或需求,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而这恰恰构成了功能论社会学的一个极为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根据行动的结果对那一行动的存在加以解释, 而没有顾及这种行动的结果对于行动者而言是一种有意图的、可预期性的行为, 还是一种无意图的、偶然的行为。如果行动者的行为是无意图的、偶然发生的, 后来又经过固定化而成为一种持久的行为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难解释这一行动的真正原因了。^②

换言之, 在默顿那里, 社会就是某种潜功能。对于这一潜功能, 默顿乐于列举的例子就是霍皮人的祈雨舞蹈。一般的理解会认为, 霍皮人的祈雨舞蹈根本就是一种“迷信”, 或者“非理性的生活”, 因为, 如果一种社会的行动无法体现其表面上的目的时, 一般人都会倾向于用缺乏智识 (lack of intelligence) 这一偏见对其加以归因。对于霍皮人社会中的祈雨者而言, 即便通过这种仪式得不到雨, 他们也不会停止此项仪式, 而是会持续地去做, 那么, 旁观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 这是一种迷信、无知或者缺乏理性的表现。但是, 默顿却并不这样认为, 从对潜功能的追溯上他做了如下表述:

一个人如果把他自己限定在显 (目的的) 功能是否出现这一问题上, 那祈雨仪式就不是社会学家的问題, 而是气象学家的问題了。无

① 参见 [美]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106~199 页,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1.

疑，我们的气象学家同意祈雨仪式不能产生降雨，但这是不切题的。我只是说这种仪式没有技术上的用途，这种仪式的目的和实际后果不相符合。但是，运用潜功能概念，我们就能继续探索这种仪式对于该群体（而不是雨神或天气）的功能。这里可以发现，也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这种仪式确实具有许多功能，但是这些功能都是未预期的或潜在的。

通过提供一个定期的机会，使分散的群体成员集合起来从事某一共同活动，仪式就会实现加强群体团结这种潜功能。如同涂尔干以及其他许多人很早指出的，这样的仪式为集体表达情感提供了一种途径，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情感是群体团结的一种基本来源。所以，通过系统使用潜功能概念，就时常可以发现明显非理性的行为对群体具有的正面功能。^①

不过，对这种功能论的辩解，吉登斯的批评也异常尖锐。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祈雨仪式，最终可以让分散开来的大众集合在一起，这确实是表面上的祈雨行为的一种无意后果（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是与祈雨仪式本身的显功能所不同的潜功能效果。但是，吉登斯进一步强调认为，这种潜功能的分析，“对于为什么此种活动会持续没有任何解释”，我们无法在祈雨仪式和大众集体情感的养成之间寻找到一种直接的联系，这里似乎没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或者更进一步说，根本就不存在某种社会需求要去给予满足。吉登斯对默顿的批评是，他把两种东西混淆在了一起，其一是行动的无意后果，其二是信念与行动的理性（rationality of belief and action），在吉登斯看来，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②

对于非洲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与魔法有过极为精细的民族志描述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没有去考虑

① [美]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17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译文依照英文略有改动。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1.

一种社会行为得以持续的背后的社会需求，而是对信仰的理性基础做了独辟蹊径的分析。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默顿想问的问题可能是，明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某种信仰和某种行为之间的联系是错误的，但人们依旧会乐此不疲地去从事这种行为，其中的原因何在呢？类似的疑惑还有：庙里进香的香客，有不少人知道他们所做的进香行为与他们所要祈求的东西之间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去寺庙里进香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学家的默顿与作为人类学家的埃文思-普里查德，他们所给出的解答是完全不同的。默顿试图到现象的背后去找并未表现出来的社会的目的、意图或者需要，而埃文思-普里查德则更多是从一位西方观察者的角度去审视在一种异域的文化场景中，人们的行动与其信仰之间的关联。默顿认为，社会理性存在于行动的无意后果的这一潜功能那里，但是作为中介者的行动者本身是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完备或缺少理性的；而埃文思-普里查德恰恰相反，他把关注点放在了行动者的理性之上，通过实际的材料证明了，这些当地异文化中的行动者并非没有理性的行动者，而是有着他们自身的理性存在。^①

最后，吉登斯显然站在了看重行动者的理性的埃文思-普里查德一边，而非强调作为潜功能的社会理性的默顿一边。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似乎更加乐于接受人类学家的解释，而非他身处其中的社会学的解释。整体而言，在理论的建树上，埃文思-普里查德显然胜过默顿一筹，因为在吉登斯看来，默顿未能指明为什么祈雨仪式会得到持续，而埃文思-普里查德却确实指出了，为什么用“迷信”或者“非理性的生存”这样的语汇来谈论阿赞德人的巫术是荒唐的。因为，对于阿赞德人而言，在他们既有的传统信仰的脉络之下，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如此行动的理性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表述，对于理解稳定的社会再生产如何发生极具社会学的启发性；相较而言，默顿的仪式潜功能的分析在这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3.

一方面就显得较为薄弱。吉登斯实际是把默顿的问题意识反过来讲述，认为在追溯行动的无意后果的社会约制作用之前，先要去研究这样的实践如何被再生产出来，而这显然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而非默顿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默顿在分析霍皮人的祈雨仪式时，确实很有价值地提到了他们行动的意图，也就是祈雨舞蹈这一行动的意图，那就是祈雨仪式可以用来产生雨水，但遗憾的是，默顿将之等同于一种非理性现象，即认为土著人的认知建立在一种错误的意图之上。但是，在吉登斯看来，霍皮人持续不断参与进去的祈雨仪式，属于一种公开的表演，但并非等同于他们真实的意图，即那是在前台所呈现出来的公开的表述，而非真实意图的本身。^①

也就是说，默顿在注意到了潜功能的同时却忽略了显功能，对于显功能的社会学意义，他所说甚少。因此，对于人们为什么会持续地做出某种行为，默顿的潜功能概念，似乎并不能够给出比较明确的解释；反过来，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解释，倒更具有有一种启发性。埃文思-普里查德是从本土人的行动的理性化这个角度去解释制度形式的连续性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埃文思-普里查德的问题却是没有将其在小地方所观察到的这一行动的无意后果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场景中进行推演，当然，这样去要求一位以微观描述见长的社会人类学家也许有些过分。

作为一名有着一定心理学训练背景的社会学理论家，吉登斯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人的行动的无意后果，并将其放置到了对社会制度持续性的原因的解釋上去。吉登斯认为，在对社会系统中社会再生产的稳定与变迁的解释上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在所谓行动的理性化的背景之下，特定的行为如何在一种制度中得到再生产。在这里，行动者是制度的生产者，但同时这一制度也再生产了行动者自身的实践活动。在这一点上，行动者是有着清晰意识的，所有的行动者，在他们互动的过程之中，都会知晓他们正在做什么，而与此同时，又有一大堆的事情他们其实并不知晓，那就是他们的行动的条件和后果究竟是怎么样的，而对后者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4.

不知晓会影响到整个互动的过程。

这里自然引出第二种解释模式，那就是关注到行动的觉知这一层面，也就是吉登斯所一再强调的反思性的自我约制（reflective self-regulation），通过这种约制，个体行动的理性化便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的特征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里包含了一种行动者的自觉意识，在这种自觉意识中，行动者的实践便受到了外部环境中社会系统因素的影响，在行动者与社会系统之间，通过人的意识构成了一种反馈式的联系。这种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的行动者，结合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而言的对于行动后果的清晰觉知，造就了默顿所谓显功能层面的核心内涵。^①

在社会的稳定与变迁之间，依靠的是连续性（continuity）这个概念的连接，而与这种连续性相对的就是一种社会的革命。这代表着一种社会连续性的终结以及相应的社会转型。

今天，在整个社会学界，有一种大谈这种不连续性的倾向，强调变迁、断裂以及转型，在吉登斯看来，这是对于之前社会学所信守的进步的进化论（progressive evolutionism）予以排斥的结果，而同时又是对社会学中静态观点的一种抗拒。不论是稳定与变迁，还是连续与不连续，在吉登斯看来，都没有准确地反映出社会行动的时间性维度，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社会系统仅仅是通过在时间的历程中其连续性的结构化而存在的：正如我此前所言，在社会分析中，不存在去结构化这个术语的空间。”^② 在这里，吉登斯所持的观点已经再明确不过了，在他看来，所谓的社会转型或者断裂，都是在时间序列上的再结构化，而非孤立的转型与断裂。即结构发生了扭转，而非结构发生了断裂或转型。

社会往往都会以不连续性为始，而以某种连续性为终，这成为社会秩序问题的一种新的探索方式。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构成了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的一个核心。在这一点上，吉登斯并不否认他与法国社会学家布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15 - 216.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7.

迪厄之间的相似性，他们只是各自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布迪厄更为强调客观结构乃是历史实践的产物这一点，并强调这一产物会再由历史的实践所改变，这样的再生产过程离不开实践这一向度。^①

而作为实践者的行动者依靠布迪厄所引入的惯习（habitus）这个概念在个体的动机和社会的价值标准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habitus”这个不是很容易翻译成为汉语的法文词，吉登斯的解释是，“由一个群体或者行动者的共同体所共享的习惯”（habits which are shared by a group or community of actors）^②。在这里，吉登斯又进一步提到了帕森斯，作为在社会学理论中处理“秩序的问题”的先驱人物，帕森斯并不认为习惯或者习俗背后有什么动机性的因素，而是假设，在一个社区或者社会之中，社会活动最为核心的特征，也就是最具有动机驱动的行为特征，是通过人格动机构成的价值观的内化来实现的。而与帕森斯的这种内化观有所不同的是，吉登斯特别强调的是行动的认知基础，而非由确定的某种动机来推进行动。在此过程中，行动的连续性是通过再生产本身来加以保证的。这可以以语言的再生产为例来加以说明。作为构成言语交流基础的语言再生产，它本身不受动机驱使。因为说一种语言，也就意味着一种语言的再生产，这是跟言说者需求与否没有直接关系的，言说者只可能是实现这样一种言说的中介，每个言说某种语言的人，都有兴趣去再生产这种语言，因为言说即意味着一种语言的再生产，但是使这样一种语言的再生产得以延续下来的东西，却不是存在于这些语言的言说者中的某种动机性的力量。

吉登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常规化的行动（routine action），也就是不加以反思而照着惯常做法去做的行动。这种常规化的行动建立在一种不用自我反思的信以为真的行为基础之上，它同时也成为人们构建一种本体论安全的基础。常规化行动的维持，是常规化的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它所需要的是密切地与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安全联系在一起。互动的双方也会

① See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83.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17.

以这样一种基本的本体论安全作为相互性的知识，而无须进入到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中来，这如同一种无须思考便知道如何去做的类似风俗习惯的东西。这是一种比较稳固的行为反应，背后所依靠的是一种由传统来加以制裁的社会控制机制。但即便是在控制极为严密的小型传统社会中，变迁也还是会发生的。

这种变迁按照类别大体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增量的变迁 (incremental change)，这是由再生产中的行动的无意后果所造成的。对此，吉登斯还是以语言为例来加以说明。因为在使用语言时，每次再生产出来的语言都可能潜在地包含某种修改，这也就意味着某种变化。而且不仅是语言，社会中更是有此类变迁模式，每一个社会行动都可能隐含与前一次行动的差异，也就是变化。另外一种传统社会中的变迁来自外部的影响 (external impact of influences)，结果带来了一种日常生活常规化的解体。

为了描述日常生活常规化的解体，吉登斯用了一个词“de-routinisation”，大略可以直译为去常规化。在吉登斯看来，去常规化的状况，更多是跟现代工业化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此所给出的定义是：“任何与日常互动中不假思索、信以为真的特征相背离的作为的影响。”^① 这同样是差异产生的来源之一，是连续性乐曲中的插曲或变奏。

在这里，常规化意味着某种实践的连续性，它一般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的。但是，任何影响都有可能使传统的影响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影响还可能会带来某种巨变。吉登斯专门区分出三种在他看来比较重要的、对于传统社会或者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冷”的社会产生改变的影响。

首先是外来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传统实践的一种取代，或者是由另外一种传统实践来取代原有的传统实践。由机器化生产来代替手工艺作坊，也许是这种替代最为合适的例证，由于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和低廉的价格，当其被接受、引入并替代传统手工艺制作的时候，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0.

传统的制作也就可能逐渐地消失了。第二种影响是对于既有规范的有分歧的解释。特别是随着文字的发明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文字的读写能力，对于既有的社会规范的解释就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性的，甚至是相互之间有分歧的，这是导致传统社会常规化的生活发生转变的一种潜在可能性。^①

吉登斯所强调的第三种使传统社会发生转变的影响要素是对于传统作为一种合法性形式的拒斥，这样一种观念在吉登斯看来是专属于西方社会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发明，这种发明成了他所谓的当今社会去发生常规化的最为深厚的一个潜在根源。^②

在这一点上，吉登斯与韦伯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认为这种去常规化是现代社会的所谓去魅（disenchantment）的结果，这种“去魅”指的是对于传统权威神圣性的怀疑带来了一种自我的觉醒。尽管吉登斯并不否认韦伯意义上的去魅可以带来传统支配的消解，但是他更愿意用作为历史意识之一的历史感的支配优势（ascendancy of historicity）来说明一种去常规化的过程。这种历史感的支配优势是指，“在追求它们自身转型中社会形式的积极主动的跃迁”^③。并且，吉登斯不否认，这种历史感的支配优势在西方社会的胜出，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特别区分出两种施展支配的集体存在形式，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一种是所谓具有法律理性的组织（organization），一种是世俗化的社会运动（secular social movement）。在这样的集体性背后，都有一种意识，都是社会中一种有意识的发明，但是，韦伯在提出传统型的支配（traditionale herrschaft）与科层化这两种支配类型时，似乎都没有指出这一点，而是一概以常规化来做说明，这一点是吉登斯最想要指出的。他所要表达的是，即便是约制极为严密的现代科层制，也不完全是一种常规化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1.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1.

生活，而是存在随着时间的延续出现新发明的可能性，这跟传统的社区类型有一种质的区别。^①

吉登斯强调过，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延展，而此种延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感的提升以及去常规化的实践。^② 这样一种历史感是指对于传统的不断重复的时间观的否定，并彻底接受了一种不断向前演进的时间观以及历史进步意识。这样一种时间观和历史意识在 19 世纪以后的欧洲逐渐占据了一种支配地位，形成了一种在理解变迁问题上的展开模式（unfolding models）。吉登斯认为，这种在解释变迁上的展开模式是指，“把社会变迁当成某种特定的社会类型所渐进涌现出来的特质，这被设想成一开始便是其自身所拥有的特质”^③。

在这些展开模式中，最核心的一种借用了生物学的类比，也就是把社会发展上的成熟看成与有机体的成长相类似的过程。社会学理论中的功能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为典型的代表。不过，拿有机体来类比社会的旧功能论已不多见，今天更多的是从社会系统或者制度的功能性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s）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运行机制的，这被看成一个渐进式展开的过程。这样一种新的功能论，注意到了作为一个整体性过程的社会发展，在此种功能论看来，它不是断裂的，不是充满矛盾冲突的。这在浅层次上依旧是在借用有机体的比喻，认为这种发展是跟有机体各个部分的发育类似的协调发育的过程。而这样一种新功能论，是吉登斯在其社会学理论中最强烈地加以拒斥的一种看待社会发展的视角。^④

第二节 连续的插曲与蛙跳效应

在试图超越这些新旧功能论的努力中，有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解释取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2.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3.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3.

向是从外部的影响来看社会与文化变迁。在这样的社会中，传统持续而稳定地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着作用。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中，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史学派所强调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外部的影响力，特别是现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而晚期中华帝国这样一种稳定的社会形态显然受到了这种影响并逐渐趋向瓦解。^①

不过，在吉登斯看来，这种外部（exogenous）影响的解释取向，从根本上说，并没有离开内部（endogenous）解释的展开模式这一取向太远，仍旧是把社会看成一个内部自我封闭起来的系统，这个系统因为受到了外在力量和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或者不发生改变，比如美国的社会理论家尼斯伯特（Robert A. Nisbet）在批评那种以有机体成长来类比社会发展的理论时，确实注意到了“内在固有的因果关系、连续性、分化、必然性以及协调统一论”这样的概念在功能论的“成长”类比中的广泛使用，并认为要从外部的影响去看待社会的变迁。^② 他提到了“入侵、移民、新贸易通道的开放、战争、探险”等诸多的外部影响，但是尼斯伯特所提到的这些外部影响，在吉登斯看来，根本上都还是内部的而非外部的，因为这些所谓外部的现象，都可能有其内部的起源。^③

在这一批评中，吉登斯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更为深刻的对于内部和外部解释的批评上去。在他看来，不论是内部成长的视角还是外部冲击的解释，似乎都存在概念上的不适用性，其中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一是简单地把社会看成统一性的整体（unified wholes），二是没有注意到空间（space）要素在社会分析理论化中的核心重要性。^④ 就第一点而言，由于把社会与文化看成统一性的整体，因此才有自主和依赖、内部和外部这样的区分，但实际上，社会与文化都处在多样性的冲突与紧张的氛围之中。

对于空间的问题也是一样，它同样存在内部和外部的的问题。本来所谓

① 参见 [美]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② See Robert A. Nisbet,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251,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82.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23 - 224.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4.

的“内”(inside)与“外”(outside),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并且具有跟特定的情境相匹配的特殊性,但是许多的书写表述,都是在模棱两可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在很多的空间场景中,内和外是针对人自身而言的,需要有切身的内和外的空间感受,才能论及外部的影响以及内部的对于此种影响的感知。基于这样的认识,吉登斯强调,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于它们影响的结果,而是要把空间看作一个社会的场景,其不仅容纳了由个体所构成的集体,而且,对于当代社会而言,这种容纳根本就是一种对于空间的控制,其所借助的是现代民族国家所树立起来的一种固定的、有疆界的领土概念。在这里,内和外是直接对应于国家行政统治的中心与边缘的。^①

在现代社会的变迁研究中,这种空间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自主(autonomy)与依附(dependence)关系成为一对核心的分析性概念。相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疆土边界(territoriality)使得变迁的内外资源得到了区分,国家牢牢地掌控着内与外之间的边界,并使属于这个边界之内和之外的人民得到了一种严格的区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我们如果能够注意到自主与依附这对关系的话,就会理解与民族国家的掌控相背离的另外一种试图去逃离这种掌控的力量或趋势。因此,一种国家名义下的集体性,通过边界的划分而被囿于民族国家之内,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归属;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跨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互动中去,却可能是实际在发生的一种社会互动形态。沃勒斯坦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概念,便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的讨论中展开的。^②

吉登斯将自主与依附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分析现代社会变迁的第一对重要关系概念。他曾经在《发达社会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提出,在现代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结构的核心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的结盟,也就是经济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经济和政治之间缺少了一种绝缘体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4.

② 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的保护，二者的分离不再可能。同样的情况可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分析。沃勒斯坦研究的是自15世纪便在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如何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伴随着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也随之形成。这种世界经济，从根基上说就不同于先前帝国时代的经济形态。帝国时代的经济是一种赋税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核心是政治的。国家通过层层的赋税征缴，来体现帝国中心的政治以及对依附于中心的周边社会的行政管理，因此经济的关系是一种依附于政治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帝国时代的政治支配经济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经济的关系转而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关系，而政治关系的身影退缩到了仅仅掌控法律以及对于武力手段的控制和使用。国家不干预经济的神话只可能在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政治退缩的现代民族国家中被制造出来，因此，在吉登斯看来，沃勒斯坦的断言依旧没有过时：

在这里我不是要论证古典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国家不干预经济事务为基础的制度。完全相反！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政治实体使经济收益分配到“私人”手里的同时，又不断关注经济损失的基础之上的。我所论证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经济因素在比任何政治社会所能整体性控制的范围更大的场域中发挥作用。^①

除吉登斯所提到的自主与依赖这一对关系之外，社会系统之内的区域之间不均衡的发展，也是理解当代世界社会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向度。尽管被列宁发挥过的马克思有关区域之间不均衡发展可以带来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在吉登斯之前就已经很流行，但是，吉登斯在谈论区域之间的不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p. 348. 中译本参见 [美]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46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译文与中译本略有不同。另外，吉登斯像批评尼斯伯特一样批评了沃勒斯坦，认为他过分夸大了世界经济的外部组织的影响力，而忽视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内在构成。并且他特别指出，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一种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更为重要的是处在一种世界军事秩序（world military order）之中。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6.

均衡发展时，所指涉的更多是在政治和经济形式上的变迁的分化速率（differential rates of change）以及在不同区域中的定位（location），因此，吉登斯在这一问题上会更加看重时空路径（time-space paths）上的非均衡表达，而非带来一种革命性巨变的非均衡发展。吉登斯由此进一步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基本分化形式，即阶级（class）、族群的分化（ethnic differentiation）以及领土的争端（territorial claims），此三者_{在吉登斯看来}，都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区域化倾向（regionalized in time-space）。^①

区域（regions）这个日常概念，在吉登斯的表述中，更多还是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不仅可以被应用到吉登斯所分析的面对面的互动中去，而且完全可以应用到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现象的解释上去。阶级在时空上的分化现象，就是吉登斯多次提及的一个分析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的分化也是不同阶级在区域性的活动时间上以及驻足停留的空间上的一种分化，在这一点上可能再没有比城市的居住空间以及工作时间的安排这两种阶级差异的分化更为明显的了。

但是，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也许更加突出的一种分化还是族群之间的分化，许多区域性的冲突，实际都跟这种分化的极端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这种族群的分化会叠加到原有的阶级分化之上，进一步加剧原有的阶级分化。而领土的争端，实际上又密切地跟族群分化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路径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可以用区域这个分析性概念来加以解释的。^②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实证论者和反实证论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毫无意义。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依据行动者的理性（agents' reason）来对人的行动给出一种解释。而与此种做法相对的就是，像自然科学中所通行的那种做法一样，依据普适性的法则对行动给出一种解释。

吉登斯强调了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而言前一种做法的重要性。因为，个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7.

体是作为有着社会意义的行动者而进入到历史中去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正由于他们有着一种“社会的意义”（societal significance），他们才进入到历史之中去，这是西方历史学中著名的“亨佩尔—德雷之争”（the Hempel-Dray）中德雷本人的观点。^①但是，吉登斯试图对这种个体存在的“社会的意义”给出更为具体的界定，并对于为什么要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分析历史的合法性基础给出了他自己的一种说明。

另外，在吉登斯看来，“亨佩尔—德雷之争”乃是行动的理性化与人类行动的法则之间的争论。而这根本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这个历史是相对于个体行动者而言的历史，是有关其行动条件的知识，借用吉登斯的术语来说就是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与行动的理性化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意义被凸显出来了，任何社会的规律或法则都是历史性的，一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再生产出来的，是人类行动的有意的和无意的结果的总和，这个总和构成了时间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规律或者法则又是不确定的，是会伴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情境性的因素对于历史的解释就变得极为重要，而这是“亨佩尔—德雷之争”所没能特别给予关注的。换言之，在吉登斯看来，我们不仅要去关注行动者的理性以及背后的逻辑，也就是关注为什么的问题，同时还要特别去关注展现此种理性和逻辑的情境的限制性因素究竟是如何发生和构成的。^②

这就很自然地延伸出吉登斯所谓关键期（critical phases）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在吉登斯看来，具有方法论的以及实质论的含义。就方法论而言，这引发出社会理论对于插曲研究（episodic studies）的关注，在这里，“插曲”意味着在平缓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突显出来的事件或过程。任何社会发展和演进都一定不会是平缓的，不断地有插曲出现是一种常态，这便

^① See William Dray, “The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f actions reconsidered,” in Sidney Hook,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 Symposiu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05;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3.

是连续性的插曲概念的意义所在。

一般对于社会变迁的问题，社会学家会关注这样四种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插曲”，其一是快速的工业化过程（rapid processes of industrialisation）；它又会导致其二的政治革命，不必把这种政治革命看成是瞬间完成的事件，而是之前的旧制度的摧毁以及革命之后的社会重新组织的一个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其三是制度衰败或崩溃的过程（processes of institutional decay or disruption），这是由传统的文化与现代发达社会的帝国主义经济之间相互碰撞所引发的；其四同样是一种制度的衰落或崩溃的过程，但却是由战争所引起的。^① 在一定意义上，第三点的提出最为重要，它体现了今天社会变迁的常态性特征，当然，也不能否认其他三点的存在。

在这里，关键期这一概念的实质性内涵体现在一种二元区分的对立观上，这是自笛卡儿哲学在欧洲大陆被普遍认可以来便逐渐突显出来的一种认识论观念。而在看待社会变迁上，影响着变迁的演进模式形成的最为突出的一个二元对立观念，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区分。到了19世纪，身份与契约、共同体与社会以及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等都是这样一种笛卡儿式的二元分立观念，而且人们频繁地借用这样的观念去理解当时发生在欧洲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由西方的工业化所引起的那些社会变迁。这类理解持续到了20世纪，并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于社会变迁的认识。在这一对立之中，插曲得到了表达，而不断地表达甚至是冲突性的表达便构成了一种插曲的连续。

在社会学理论中，帕森斯便是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变迁实质论的核心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Gesellschaft）之间的二元区分，并将此区分作为其模式变量（pattern-variables）的理论建构的基础，由此把欧洲19世纪社会发展的特质转述成了具有人类社会普适性的特质。^②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29.

这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在美国社会学界的翻版。但它却着实影响了一代社会科学家去从事他们的实地研究。

吉登斯所提及的最后一个理解社会变迁的概念是借用“蛙跳”来做比喻的所谓蛙跳效应（leapfrog effect）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这是一种在开始的某个时期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抑制或阻止了后来的发展的一种变迁模式。在这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可以作为例证。在19世纪后期，英国作为最先开展工业化的国家，其触角已经伸展到了世界各地，并从这些英国本土以外的区域获得了由帝国主义的世界支配所带来的种种利益。但是，到了今天所谓后工业化的时代，英国工业化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先前的荣光，与后起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比较而言，已经没有获得一种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了。^①

这种效应模式似乎也可以间接地拿来说明中国近30年来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可以说，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依靠扩展世界殖民贸易的势力范围来提升我们的发展速度，而是通过转换激励人们行动的价值观念而实现自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转型。在这些转型的背后都设定有一定的引导生活与事业的价值观念，而作为一种社会的引擎，它在一定意义上符合吉登斯所概括的“蛙跳效应”，这使得观念在提出之时可以快速发展，在发展遇到阻碍之时又会有新的观念出现。这在特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的关键。

无可否认，今天的世界处在一种变动之中。世界各地的社会与文化秩序似乎在一种变动之中得以构建或重构，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吉登斯的社会变迁理论实际上在不断地告诉我们，变迁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在

^① 甚至，在吉登斯看来，还可以把这种蛙跳效应进一步引申，使其跟现代世界发展背后的历史感（historicity）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对于历史的觉知意识的历史感构成了现代历史的一个核心特征。这种历史感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社会去常规化（de-routinization）的一个根源。在此社会变迁的蛙跳效应中隐含有一种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觉知意识，使得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要使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再在未来发生，也就是以此来使某种历史的重演得到抑制，也就是在一种对于未来的预测之中实现对一种可能世界的回避，生活在未来就是生活在一个过去的可能性得到了规避的世界，人们所追求的所谓未来的世界就是一种清除了过去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的世界。此一论述细节可参见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0。

怎样的处境中发生的。这些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及其变化来说可谓根本性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吉登斯所强调的，世界并非像结构功能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历时而不变的僵化的结构与功能，变迁乃是由一系列的插曲所构成的。这一点便提醒我们，与吉登斯提出这点之时相比，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在今天可能变得更为迫切了。

随着新知识、新技术、新物质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新观念越来越多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使得我们生活中的小插曲和各种变奏也层出不穷。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小插曲拆分得几乎成为一些碎片化的时空存在，时间与空间跟生活世界的嵌入性关系在慢慢解体，原来一种时空坐落下的场所已经经由社会的诸多抽离化机制而变得越来越虚空。

但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失去某种社会与文化的秩序，我们在通过一些新的途径把这些看起来碎片化的生活插曲又相互缀连成一首首完整而连续的交响曲，这可能恰恰是吉登斯的社会变迁理论所真正暗示给我们的当下生活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吉登斯的理论在预测社会发展路径上的一种前瞻性和判断力，这是今天一般社会科学所缺乏的。它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或者当“事后诸葛亮”，但社会科学的魅力更在于预测未来。这也是吉登斯作品的吸引力所在，他的作品往往会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变化趋向做一种自我的判断，且不乏睿智的洞见。比如他对于政治上超越左和右两种极端主义的前瞻性认识，无意之中就指向了当下的世界政治，因为极端主义已经不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所认可的一种政治行动理念了。

第三节 拯救受伤的世界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世界实际上纠缠于各种政治理念的选择之中，并为这些选择的结果所左右。在这多种选择之中，最为核心的当属左派与

右派之间的论争。在此过程中，社会中的右派势力从来都是占据上风的。但是，政治上的“右派”又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右派（the right）这两个字的含义可能都不大一样。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所谓右派更多是指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而新自由主义俨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右派——保守主义之间有了一种实质性的分别。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强调对于传统的持守，强调过去所遗留下来的智慧，而新自由主义追求的则是市场的不断扩展，结果带来的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变迁过程。

在此意义上，原来被看成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一下子转变成了激进的左派，而原来属左派的却需要通过采取保守的策略，才能够为其保留住一份福利国家所留存下来的公共利益，因此一转而成了右派。^①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当下的左派，对于传统是怀有敌意的，市场的推动力以及本身就带有攻击性的个体主义这两者合并在一起，并且在为了发展这一合法性目标之下，传统被毫不留情地铲除掉了。但是，新自由主义又并非脱离传统的，很多时候要借助传统来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比如在民族、宗教、性别以及家庭问题上，又是亲近于保守主义的。

这种不是太稳定的混合的保守主义形态，使得保护传统变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激进主义，之前为了使社会有秩序而保卫传统的激进主义，强调的是借助传统来实现一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激进主义，一方面在不断地扩展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也在维护着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混乱，恰恰可能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深入人心而引发的，比如由市场观念所带来的家庭伦理的衰落。与新自由主义相对的则是强调社会福利的社会主义政治。这是建立在控制论模型（cybernetic model）之上的一种社会建构模式，此种模式更加强调通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来使社会和谐且有机地运转。这是一种机械式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 9.

下级对于上级安排予以服从的制度，其中个人的反思性能力控制则是在一种比较低的水平上。^①

相对于以福利国家理念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初以保守主义为开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有了更强劲的影响力。新自由主义相比之前的保守主义更加灵活多变，实际上，在民主口号下的新自由主义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很难划分出边界。今天的左派和右派都面对着一些世界性的共同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所引发的环境资源枯竭的问题，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吉登斯一直在强调的由现代性的反思性所造就的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问题。另外，之前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所设立的以一种政党选举体系为基础的国家运行模式，在面对自我反思能力日益高涨的新公民社会的全球化趋势时，已经显得有些无法适应，因为，有许多的社会冲突，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国家自身的界限范围。这些新的更大范围的冲突以及可能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的自然与社会风险，似乎都在为后现代主义的论调提供某种共鸣的声音，即放弃一切启蒙思想的追求，由此来使社会重新回到文明未开的时代中去。

但是，吉登斯却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去看待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这些新的社会现象。他特别提出，今天的人们要有一种新的中世纪精神（new medievalism），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外在于我们的那种强大力量，他的一句口号式的语言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受伤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需要极度的拯救。”^② 吉登斯为此种拯救提出了如下六点主张，在此分述如下。

第一点是必须对受到损害的社会团结加以修补。这需要有选择地对于传统加以保护，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有某种新的传统的发明。这是面向全球的一种修补，这种修补的核心是将个体与群体再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个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吉登斯看来，这并非今天的左派在提及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时所意味的那种连接。这种修补最为重要的作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8.

^② 原文：“We live in a radically damaged world, for which radical remedies are needed.”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0.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用是重新使个体与集体之间产生一种秩序，并在社会发生分裂与无法整合之处提供一些新的能够造就社会团结的方法。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重新评价当今社会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本质，在吉登斯看来，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在盛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之下，个体主义被赋予了一种极高的价值，它是一种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行为方式。在今天这个具有高度社会反思性的时代里，一定程度的自我独立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的根本，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多的互惠、合作与依赖。如何在自主与社会团结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在传统已经消失的现代社会中，开始有新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使社会的团结在新的时代里得到真正的实现。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积极主动的信任（active trust）的建立，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对于他人的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回归。吉登斯强调，此种积极主动的信任是一种需要去赢取的信任，而非来自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性别角色的关系。并且，积极主动的信任容纳了个体存在的自主性，是在当今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稳固的社会团结的力量来源。^①

第二点是必须正视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出现及其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左派所一直追求的那种解放（emancipatory）乃是人自身自由的获得，这种解放的含义后来被不断地扩展，并可被宽泛地界定为各种从束缚当中的挣脱，如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专制的权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物质条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等等。因此，解放政治实际上是一种使个体的行动获得了自主性机遇（chance）的政治。但是，生活政治与此不同，它并不是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的政治，而是一种有关生活风格（life style）的政治。^②可以说，这种政治是建立在一种选择之上的，在纷繁复杂的有关个体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该如何生存的问题上，需要有人自身的决策参与其中。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4.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4.

由此而引出的第三点即吉登斯所谓的生成政治（generative politics）的问题。这一政治生存的土壤就是在有着高度反思性的社会之中，人们相互之间依赖于积极主动的信任来建立起一种社会关系。这是把国家与社会中的反思性动员（reflexive mobilization）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空间。生成政治是指在现代国家职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降低到最低限度之后，个体或群体被激发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事情发生（make things happen），而非被动地去等待事情发生。总体而言，这也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去捍卫公共领域的政治的做法，但不是像传统做法那样有意地将国家与市场或者国家与社会直接对立起来。此种政治的基础在于不论是在政府机构之中，还是在各类社会团体之中，都要去建构一剂积极主动的信任，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在吉登斯看来，尽管不能说生成政治是一剂万能药，但是它的根本仅仅是提供物质条件以及组织框架，而对于生活政治的决策权而言，它终究是掌握在老百姓自己手里，对于这样一种生成政治而言，这可能是当今以及未来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等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①

第四点是社会对于极端的民主化形式（radical forms of democratization）的进一步需求，这是从西方所经历的自由民主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之后，在面对全球化以及反思性的社会秩序之时所激发出来的一种需求。这样一种民主更加强调对话，即采取一种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的形式。而在此之前的民主，则更多地强调民主是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它是由利益的代表性来得到体现的。但是，还有一种民主，其所要求的基础是公共空间的创造，从理论上而言，这种民主形式主张，所有的争论不是通过既有的权力形式，而是通过某一公共空间，也就是通过在此公共空间中的对话而得到解决的。后面这一民主形式就是吉登斯所谓的民主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of democracy）的一个重要组成步骤，随着这种对话民主的加强，民主的民主化历程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对话民主会首先在某些情感性的领域得到推进，比如在私人生活领域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5.

中的亲情、恋情和友情上，对话民主都会得到一种强劲的发展。吉登斯将此称为“情感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这是通过讨论以及交换观点，来增进和保持相互之间具有积极主动的信任的私人关系的发展，而并不会借助某种专断的暴力来实现。这种有关个人之间关系的对话民主的良性发展，为更为宽泛的社会关系中的一位公民应该具备的义务以及责任提供了一种在个体认知水平上的相互比照。进而通过自主群体以及社会运动来推进整个社会的对话民主的发展。这类社会运动，都属于群体声音的表达，这种表达对于提高地方性的以及全球的社会活动的反思性能力会有所助益。吉登斯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社会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或者归属于某个自愿性的团体之中，而非成为某个政治党派的成员。这种趋势使得这些团体所主张和实践的民主精神能够得到体现，先前曾经被忽视的或者采用传统方式来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现在会通过对话的形式而得到解决。甚至政府机构对于事情的界定，人们也可以提出质询，进而实现比较公允的解决。^① 这是一种带有全球趋势的民主化运动，它不是通过国家或者国际机构，而是通过不同团体的互动与对话来实现的。

如果是这样，作为第五点主张，吉登斯认为，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福利国家的制度，特别是在面对全球范围的贫困时，这种反思显得尤为必要。^② 许多保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通过对福利国家的保护来抗拒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不过，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是极为尖锐的，因为，今天的福利国家制度似乎在整体上减少了贫困，但对于平衡社会大范围的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效果。另外，福利国家的科层制已经变得越来越僵化和不讲人情，而福利依赖所导致的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也必然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在社会大范围内异常有吸引力。而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的途径可能不再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利益分配，而是尽其所能地去消除社会中两极化的倾向。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为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7.

不确定性的发生，使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从源头上而言，福利国家制度的发明，目的在于克服可能落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幸，但很多时候都事与愿违，不幸不仅未能幸免，还使得更多的人依赖于这些福利本身。吉登斯为此而特别提出了一种积极福利（positive welfare）的概念，希望由此使人们更加关注把自我的自主性跟个人的以及集体的责任紧密地联系起来。^①

最后一点是关于暴力（violence）问题的。在吉登斯看来，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新自由主义者，都未能对暴力的问题提出比较适切的政治理论。原来右派的主张，更加强调暴力对于一个社会以及人类生活而言的不可或缺以及与生俱来，因此，许多的社会都会发展出一些基本的针对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引起的社会冲突的解决途径。吉登斯将此归为如下四种。其一是地理上的隔离（geographical segregation），即在不发生接触的情况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文化，就可以同时存在而不会发生冲突，因为发生此类冲突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二是采取退出（exit）的方式，一方忍受不了另外一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避开或者退出，以此来避免双方直接冲突的发生，古代的隐士，堪称此种化解冲突方式的典范。^② 其三是比较积极的对话，即通过对话来化解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各种误解，这是一种有助于冲突双方增进交流和理解的冲突化解途径。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用“更好地理解他人导致更好地理解自身或自己的文化，也导致更深的理解以及相互的理解”^③ 这样的语句来表达这种对话交流，而费孝通后来用“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④ 这十六个字来表达同样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8.

② 关于隐士的研究，特别是中国社会早期传统中的隐士的生活，参见 [澳] 文青云：《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③ 原文：“Understanding the other better leads to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oneself, or one's own culture, leading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ity.”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9.

④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意思。当然，最后一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直接诉诸武力或者暴力。前两种化解冲突的方式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用了，伴随着交通和传媒的发达，地理隔离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大可能，退出的做法对于个体也许还偶尔适用，比如一对男女无法生活在一起，他们便会寻求通过法律上认可的离婚程序来加以解决。而对于后两种途径，即对话和暴力，吉登斯显然更加鼓励用积极的对话来消除相互之间的冲突以及消除由冲突所导致的直接暴力。而这可能是避免当今世界范围内激进主义升级的唯一途径。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极端的激进主义，人们为了一种自我的独立而一味地坚持一种主张，并拿出全部精力去捍卫这种主张。比如被称为大男子主义的“性别激进主义”（gender fundamentalism）认为，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和暴力乃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即便是这样一种极端的主张，也是可以通过更多的自我理解和交流而得到化解的。这种办法也适用于以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文化的激进主义，即可以用对话和沟通的途径来取代暴力的使用。^① 以上便是吉登斯的社会学试图调和传统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两种极端主义政治的一种折中的主张，亦即他所谓的“中间道路”，这个概念也成为吉登斯政治学流行于世的一个标签。

第四节 中间道路的选择

1972年，法国人类学家郭德烈（Maurice Godelier）曾经在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所编辑的文集《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中撰文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命题，他认为，这根本是一种“功能上的不相容性”（functional incompatibility），对此郭德烈试图给出一种更为清楚的阐述。^②

尽管吉登斯对于郭德烈所给出的精彩论述多有赞许，认为其试图对马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20.

^② See Maurice Godelier,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in Robin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Fontana, 1972.

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矛盾”概念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说明，这种努力特别值得称许，但是，吉登斯随之也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功能论者的论述持一种彻底的批判态度。吉登斯向来对马克思思想中的矛盾（contradiction）概念的功能论解释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认为不应该仅仅从功能论的立场出发去考虑问题，在这一点上要坚决地反功能论。^①而对于马克思的矛盾概念的非功能论解释，也使得吉登斯最终选择了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道路，即其后来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认为，如果提到马克思的矛盾概念，就不能不提及黑格尔这个人，因为矛盾的概念源自这位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是一种逻辑上的否定，而是一种正反合的辩证统一，他以此去克服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的异化（self-alienation）。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基本上抛弃了黑格尔在认识论上的理念论的思路，因此，在理解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时，不可从黑格尔理念论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所谓的逻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当然，马克思也没有完全抛弃黑格尔，至少在对立的统一（a unity of opposites）的概念上，他彻底承袭了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立的双方是结合在一起而成为历史变迁中的一种驱动力的。这是马克思后来提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这一命题的思想根源所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矛盾的概念似乎就等同于冲突（conflict）这一概念。但是，吉登斯却认为，这样去阅读马克思的作品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一种社会理论而言，在矛盾和冲突之间做出区分绝对是有必要的。^②

矛盾这个概念，在吉登斯看来，是指两种结构性原则存在于一个社会系统之中，而且这两种结构性原则是相互依赖的，同时又会对彼此加以否定。在此意义上，社会整体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的被结构化（structured in contradiction），其中既包含对立双方的融合，也包括相互之间的排斥。这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nd.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3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1.

是一种辩证地看待社会中的结构性原则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之下，任何社会形态，不论是部落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会存在一个被吉登斯称为首要矛盾（primary contradiction）的矛盾主轴，而在不同的社会之中以及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之中，也会存在与主要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次要矛盾，此类次要矛盾大多会存留于此种社会类型的时空边缘，将不同的社会类型联系在一起。显然，吉登斯是在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取代传统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此意义上，矛盾就变成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属性，与冲突概念有所区分。冲突在吉登斯看来首先是指个体或者集体之间的利益上的对立；其次，冲突还表现为个体或者集体之间的实际的斗争（active struggle）。^①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特别强调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驱动力的根源。在社会的结构属性上，马克思专门指出了私人占有（private appropriation）与社会化生产（socialised production）之间的内在矛盾，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变得异常突出。当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论述并非吉登斯最想去重新加以阐述的，他的根本目的在于，借用马克思的矛盾概念来为社会理论寻找到一种新的生长点。因此他提出了“存在的矛盾”（existential contradiction）这一概念来回应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主张。吉登斯认为，存在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今天整个人类所承受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不协调关系。

受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吉登斯认为，作为此在的人，源自并消失在其所存在的世界之中，即自然界之中。但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作为有着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行动者，其存在便是对于无生命存在的一种否定。

在此意义上，人类社会就成了人的存在的矛盾性格的中介者，人类通过生活于社会之中并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而使自身获得了其“第二性”（sec-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2.

ond nature)。在传统的社会，特别是依照自然形态和节律而生活的社会中，处理和表达此种存在的矛盾的机构大多是宗教、巫术和神话。在那样的社会之中，我们无法真正区分出这些机构跟日常生活之间的不同。特别是在部落社会中，神话调节着人的存在的矛盾，借助大量的神话，人被理解成源自自然的一部分却又不等同于自然的存在。人的这种存在的矛盾性借助神话而得到了表达和排解，即神话“作为‘非个人的故事讲述’（impersonal story-telling），通过乱伦、性以及生与死这样的主题，把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的时间和存在，与此在的限定的时间性联系起来”^①。

而在没有太多阶级分化的部落社会中，人类存在的矛盾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表达的。而与此做法不同的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这种存在的矛盾的表达是通过一种外化（externalization）的机制来得到体现的。具体地说，“此种外化就是国家”，即是借助于超越个体之上的国家来实现的。吉登斯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看法：“在除部落社会外的所有社会中，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矛盾性格的核心。”^②

在阶级分化的国家中，国家会人为地将城市与乡村区分开来，而人的存在的矛盾会集中体现在城乡关系之中。在以农业为本的国家中，两种对立形式的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一种是乡村社区（rural community），另外一种是以城市为基础的机构（city-based institution）。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并非专门表现在经济上，它也有着与部落社会一脉相承的存在的矛盾，即声称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的主张，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主张而已。在此意义上，国家以宗教的形式来缓解人们对于存在的矛盾的担忧。传统国家的皇帝、国王以及储君，他们宣称自己代表着神或上帝的意志，并凭借这种合法性来担任统治者。这不是一种虚饰的权力支配，而是社会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为国家所独占。^③

①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6.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②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7.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7.

国家与社会之间本来的矛盾性关系，经由宗教式的表述而被改写为上下一致的国家与社会的一体。社会的矛盾尽管会以社会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一种社会内部的矛盾，而且并非经常发生。即便发生了社会的冲突，也多属于矛盾的时空边缘性的体现，即发生在社会的边缘，这种矛盾的时空边缘性特性，将不同的社会类型连接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还会进入到它们自身的内部构成中去，由此而成了一个社会之中多种矛盾交织重叠在一起的状况。阶级分化社会的出现预示了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动力机制要比单纯部落社会所具有的内部社会系统更具一种动力性。

在吉登斯看来，可以把社会的矛盾看成结构性的错误线路（structural fault-lines），沿此线路发展，就可能积聚起某种冲突。依循主要的错误线路，发展出来的就是阶级冲突，比如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或者是与衙门官吏之间的斗争。因此，吉登斯认为，此前包括韦伯在内的社会理论家们，他们问问题的方式可能都是成问题的。也许我们不应该去问究竟是什么使罗马、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发展到了有一定阶段时就停滞了，而没有接着再发展出后来出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吉登斯认为，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之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由阶级斗争而造就出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样一种趋势，因此，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跟此社会中的矛盾相关联的其他类型的斗争，可能要比阶级斗争更加具有持久性和历史的重要性，比如在时空边缘的阶级分化的社会与部落社会之间的摩擦碰撞以及农业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等。^① 即这种发展的停滞不一定是因为发生在内部，也可能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所致。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例外，它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使得时空关系商品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商品化把社会发展的矛盾从其自身存在的矛盾根基中分割出来；或者是，存在的矛盾为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所压制。在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就是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8.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生活与自然的杂糅不可分的状态之中分离了出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断强化着人对自然加以利用的一种工具性的关系，这种不断加速的发展模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性特征的错误线路的一翼。一方面通过资本私人占有的积累以及商品的定价来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要求的高度社会化以及分工协作，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矛盾，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任何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都不曾出现过的结构性矛盾，并且，吉登斯还特别指出，在此种矛盾中，国家在其中占据着一种核心地位。^①

在这样的分析中，吉登斯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固有存在，而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可能。不过，吉登斯更关注的是在现代世界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双重的含义，它一方面是一系列存在的现象，另一方面是一种未来的可能性。^②

第五节 全球化与走出极端政治

1999年，当时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吉登斯，曾经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演讲，依据这些演讲，吉登斯出版了一本名为《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的小册子，后来又做了一些修订，于2002年再版发行。^③在修订版序言中，吉登斯对于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及修订的原因做了一些交代。他认为，自己在BBC的演讲试图集中讨论的是全球化对于我们生活的一种转型性影响。^④

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似乎今天没有哪一个带有技术语汇意味的词能够像“全球化”这个词那样传播得如此广泛。在他发布演讲的20世纪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 239.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11.

末，反对全球化的声浪还空前高涨，但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两座摩天大楼在遭到恐怖主义者控制的飞机撞击后轰然倒塌，此后全球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我们必须去面对的社会现实。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对于全世界的经济都产生了影响，不仅包括欧洲，也包括亚洲、非洲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已经不再是一个虚拟的对未来的想象，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力量。

吉登斯对于全球化概念的讨论，超过许多对全球化发展持保守态度的理论家。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对于全球化便有很深入的探讨，并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他看来，完全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致密化”（intensification of worldwide social relations），这种关系的致密化使一些发生在远方的事件在日益影响着一种地方性的生活，甚至可能使地方性的生活完全受其左右。与此同时，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发展，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的情感，但是地方性的或者区域性的民族主义情感反而会因此得到加强。^①

21世纪之初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确实可以说不仅应验了吉登斯之前的判断，同时在人类灾难史上也可谓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了今天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相互成为敌人的潜在危机和危险。日常运送旅客的飞机，由于安检的疏忽而成了恐怖主义者手中的攻击武器，而代表现代化成就的摩天大楼在一瞬间倾覆为一片废墟，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下世界格局的大转变。这同时也是对于遍布世界的民族国家的一种挑战。可以这样说，自从“基地组织”发动了这场攻击，再没有什么国家的力量可以真正去藐视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的威胁力量对于民族国家一体性和安全性的威胁。除了1941年12月7日美国海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4 - 65.

军基地珍珠港遭到了日本战机的袭击之外，在将近三百年里，美国的领土未曾真正受到过外来力量的袭击，而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使得西方人的自信心大为降低。如果说日本人在60年前对于美国人的攻击还属于一个强势国家对另外一个强势国家的袭击的话，那么到了2001年，“基地组织”的攻击就是一种广泛的对于世界支配力量进行反抗的开始，甚至扩而言之，这可以看成整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直接面对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却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性恐怖力量的开始。

不仅仅是“基地组织”，也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反美以及反对西方的情绪遍布世界各地，今天所有的贫穷地区，似乎都笼罩在一种仇视西方的情绪之中，西方的政策被看成导致贫穷与不发展的一个根源。^①这一点也并非没有依据，非洲今天的贫困，跟西方长期的殖民影响不无关系。此种情绪迁移到了新的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当中。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会议受到了抵制，这也标志着新的对于西方仇视的开始。自此之后，世界许多城市对于全球化的抗议，都是这样一种仇视西方社会的情绪的延续。在这里，也许我们最该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才是全球化？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标示着一种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这种转型的影响。但就是这样一种转型，一种表现为全球都在受到其影响的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概念，却在之后的一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全球化的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并且这种全球化可以切实地为人们所感受到，正像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的主题所宣称的那样，我们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这在以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今天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2008年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不能不让人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同一性和相互的连带性，也不能不让人清楚地意识到，梦想也可能变成梦魇。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in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19.

这样一种对全球影响的看法，被吉登斯称为极端论，这跟怀疑论者对于传统民族国家的维护以及地区贸易的强调形成了一种对立。显然，吉登斯自己明确地站在了极端论者这一端，他强调金融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趋势，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金钱的流动不过就是计算机里的符号传输，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使得这种传输很容易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当下的这种世界经济的格局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只要基金、银行乃至公司的操盘手、数以万计的独立投资人轻轻地按动鼠标或者轻触手机屏幕，大量的资本就会在一瞬间从世界的这一端传输到世界的另一端。^① 这样快速的传播速度，其出现的年代离我们今天可能也不过 20 几年。据说，现在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有上万亿的美元在快速而便捷地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地流动着。在这个意义上，金融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一个新名字就叫“互联网金融”。

但是，也正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是对于全球化持怀疑观点的人还是持激进主张的人，都仅仅把全球化当成一个经济问题来看待，但是全球化恰恰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应该说，全球化乃是一种政治的、技术的以及文化的问题，当然同时也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② 从 19 世纪中叶曼彻斯特肖像画家摩尔斯（Samuel Morse）传输了世界上第一张通过电报传输的画像，到 1969 年人们开始使用卫星来传输各种信号，再到 1999 年在通信传输领域彻底取消摩尔斯发明的摩斯电码（Morse Code），这中间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是，异地传输技术已经得到了一种空前的发展。今天的即时电子传输，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最为重要的是，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场景。今天的我们，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熟悉某位电视明星可能甚于熟悉自己的邻居。这种状况肯定是跟传输技术的改进和方便获得密切相关的。电视这种新的媒体，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及其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10.

范围，我们似乎一下子变成远视眼了。通过这些新传播技术的发明，我们无疑看得更远，知道得更多。我们熟悉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远胜于自己身边的事情；我们关心远在异地的同胞，远胜于近在身边的亲戚；我们关心美国的股市，远胜于身边的物价。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发展的状况或结果。

而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也意味着一种全球风险的不可避免。据说，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们并不知道风险（risk）这一概念，并且，吉登斯相信，其他的文化在那个时代也一定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① 风险概念的出现是跟欧洲 16、17 世纪的探险家们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词经由西班牙语或者葡萄牙语进入到英语之中，其意味着在没有海图标记的水上航行。^② 因此这个词一开始多指一种空间上的风险，后来才转用到时间上，即广泛地应用在银行和投资这类需要投资者计算的行当上，后来再进一步用在所有那些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之中。最后，风险的概念最为重要的是跟概率以及不确定的状态联系在了一起。一说到风险，就是指一种没有十分把握的不确定，是要计算一定风险概率后才做出的一种决策。如此，风险社会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对于当下时代的准确概括，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启示了我们今天所需要去做的实际事情。这一切又都跟知识界的发明创造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创造了新的知识，也在不断地造就社会中的各种新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正在使这个世界变得失控，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远离那些有着自我参照系统的知识领域，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抽象系统，这反过来使我们对于它们的控制变得愈加困难。而这也许是今天的世界最值得担忧的，因为人人都在其中，无法逃避。

而吉登斯对于极端政治的厌恶，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他在美国所感受到的各种极端政治对于社会秩序建构的破坏性影响。被吉登斯称为“幽灵”（spectre）的极端政治，寻求在社会中实现“真正的自由”（truly free）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2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p. 21.

理想，到头来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empty reveries）。^①

就思想史的脉络而言，政治极端主义（political radicalism）最初是跟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极端主义者多以一种跟过去决裂的革命者的面孔出现，他们寻求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界限的两边相互不产生任何联系。而且，极端主义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要带来社会的变迁，而根本是要去控制这种变迁，使其不断向前演进。^②应该说，所有的极端政治，都有此种控制社会变迁的雄心，这种雄心曾经也确实带来了世界性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变革。不过，随着1989年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被推倒，人们对极端政治的未来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或不乐观的预期，这些都在引领着人们对极端主义政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批判的态度，反倒使原来反对极端主义的保守主义又变成了一种新的极端主义，而原本的极端主义倒似乎蜕变成一种新的保守主义了。

这种新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了对于既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维持和保护上，因为，这些制度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侵蚀而趋向于一种自身的解体。另外，这种新的保守主义也在通过新的社会运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保护、争取和平以及人权等，来重新界定自己变革社会的努力，并逐渐从原来宏大的控制历史变迁进程的努力中退缩出来，进入到对于社会状况的短期改进目标的追求上去。那种掌控未来发展的宏大目标，受到了20世纪后期诸多不可控因素的打击，原来信奉的“人们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够控制这个世界”的信念，已经被颠覆或瓦解掉了，人们不再去相信知识的增长可以使自己成为命运的主宰。现实的不确定性以及各类风险出现的可能性，都启示了左派力量对于未来构想的不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处在了“一个失控的世界”之中。世界似乎是在跟人的智力开着玩笑，即我们越是想着要通过知识以及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改造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确定性，就越加深入地被卷入到一种对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1.

于未来以及社会生活的不可预期性之中去。^①

在吉登斯看来，这属于一种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这种人为的不确定性，使今天出现于生活之中的风险不同于过去时代的风险。人为的不确定性造就了一种人为的风险，这种风险又是由人对于社会生活条件和自然的侵扰所造成的。这是一个由现代制度的长期发展和成熟所造成的必然的结果。在这里，有三个概念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二是传统（tradition），三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

吉登斯所称的全球化，并非单单是一个经济学的现象，而是跟一种世界体系的出现有关的一种现象，即是指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space and time），这是一种“在远距离的行动”（action at distance），实际上又是指“即刻的全球沟通与大众传输”（instantaneous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transportation）^②的开展。吉登斯认为，对于全球化的关注，一方面要留意宏大体系的创造，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到地方性的以及私人情境的社会经验的转型，即私人生活如何因为全球化的影响而发生时空安排上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概念也在发生着转变，一种被吉登斯称为“后传统社会秩序”（post-traditional social order）的秩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这不是一种传统消失殆尽的社会秩序，而是传统改头换面，转变了形态。传统变成了需要对其自身加以解释和言说以及需要面对一种诘问和质询的形态。因此，今天的所谓传统，已经不再是过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静默的传统，人们必须通过给出理由来使其他人接受一种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变成了一种自我的捍卫。这种捍卫极端化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现代性掩盖之下的激进主义的主张。它以传统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立场，拒绝任何对话，欣赏自身教义中教条的纯洁性，强调自身行为的唯一正确性，等等，这些都隐含着这种极端的激进主义会因为全球秩序所强制要求的对话和公开交流而导致暴力行为发生这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3.

②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4.

一可能性。这种激进主义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宗教领域，还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族群、家庭、性别等，这是一种需要做出判断和抉择的传统，而非一种自然传承的传统。^①

如果传统都成为一种需要做出抉择的事情，那么，恐怕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难逃这种抉择了。这是与现代社会的社会反思性（social reflexivity）的增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在传统不断地得到解构，同时不断地得到重构的现代社会中，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而言，他们最为急迫的任务就是从迎面扑来的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信息中进行过滤和筛选，以此来选择出一种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情境，而这样的个体每天都会例行公事地为这种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情境不断做此种选择和筛选的工作。连续不断的选择的生活实践，也在帮助人们建构一种对于现实的认知，现实因此在这些个体的眼中就成了一个多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知识和控制之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人们必须“聪明地”生活，否则就会遭受到现实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打击。

在传统变得不是很确定的后传统的秩序之中，人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秩序下的活动范围，这种活动范围的扩展，又跟专家知识向社会的蔓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专家知识被限定在一个小群体的范围之内，比如家族。在后传统的社会中，专家知识不仅高效，而且会快速地向社会中的外行人领域蔓延，并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日常生活，电脑的日益普及足以说明这样一种倾向。而信息时代也意味着一种后福特时代（post-Fordism）的来临，它使得企业的运转变得更加灵活多变，这种灵活多变建立在了企业自身借助对信息技术的快速把握而赚得利润这种新的企业运行方式上。在吉登斯看来，这些都是建立在社会的高度反思性之上的，由此而使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运行的灵活性。这种社会的高度反思性，也使传统的科层制以及整体的政治领域的运行模式，发生着一种根本的改变。原来为增进组织运行效率而建构起来的科层制权威，在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6.

今天高度反思性造就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发展迅速的社会中，这种科层制权威已经显得有些尾大不掉，无法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了。

今天旧的科层制组织的生存状况，正像吉登斯所说的那样，已经像冰川季时期的恐龙一样在逐渐消亡。而在政治的领域中，国家也不再将其公民看作臣民，他们不再是国家的统治对象；以消除腐败为理由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使政治组织得到不断重构，人们对于正统的政治运行机制越来越表现出不满，这些都建立在日益增加的社会反思性之上，这是现今社会的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①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p. 7.

第七章 社会理论的未来

作为一名致力于在社会理论方面做出贡献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的社会学家，吉登斯对原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批判。他认为在现代性的观念之下，社会学家应该关注社会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审视和理解马克思成为一件无法忽视的事情。无论是在矛盾、权力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还是在意识和意识形态方面，吉登斯都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对于未来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他归纳出如下九个主题：“社会学将日益扫除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思想的残渣余孽”“能够给予社会学的争论以一种更新的连贯性的理论综合将会出现”“要对社会学分析的主导对象有实质性的再思考”“对于相互连接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进行研究”“使社会科学内部原有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更多地回归到对于大范围的、长时段的社会转型的关注上去”“让社会学更进一步地融入到对于社会政策或改革的实施的影响中去”“未来社会运动将持续地成为一种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动力来源”“如何看待社会学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同时，对于社会理论的前景，吉登斯一方面要求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要我们关注自然科学的逻辑形式，他强调行动理论要去处理结构（structure）与行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终究是一位以社会理论为自己的学术事业的社会学家，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所做的各种观念的探险，都在试图打破原有社会理论中所存在的对于当下社会转型在解释上的无力局面，他在努力为未来的社会理论在解释的范围和解释的力度上寻找一个新的空间，在杂糅多种哲学解释取向之后，他独辟蹊径地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了一片栖居的场域。这个领域之宽阔，可以让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因为他的召唤而跃跃欲试，一展身手，并希望在那里为自己找到一处安身之所。

第一节 社会学的理论关怀

在《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这本文集中，吉登斯有三篇文章都是在专门谈论由社会学家所构成的群体，讨论他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理论问题。也就是，究竟什么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和问题意识。^①在这个意义上，相比经济学、政治学而言，社会学如何能够占据社会科学的核心地位就成为今天社会学家要努力去思考的问题，因为社会科学这个领域从来都不是社会学所能够独占的，这是一个宽广的领域。社会理论为诸多社会科学学科所关注，因为它更加关注于人类行动、社会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整体性问题。在这里，社会学并非跟其他学科之间完全没有分野，至少有一块领域是社会学更为关注的，那就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它跟社会理论有着一种天然的独特联系。^②如果进一步展开的话，可以说，社会理论所研究的就是由现代性所彰显出来的社会世界及其表现形式。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世界不是一经创造便永久不变的，恰恰相反，在吉登斯看来，变多于不变，不变的社会结构，可以因为人的行动，而发生某种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这在现代性的观念之下会更突出地被体现出来。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 - 7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8.

我们可以用言语来建构我们自身，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会具有一种“反思性”，进而被应用于我们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变上去，这样一种知识与人之间的反思性，深嵌于现代性的特征之中，并影响着这个由个人所构建的社会的形态。^①

正如前面所叙述的，吉登斯在不断地强调，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学实际上就是研究现代社会世界的，这种社会世界跟传统的社会世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在传统社会世界与现代社会世界之间，便必然存在着一种实质性的断裂。这种断裂——用更为通行的说法即转型——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以及进行社会学理论研究时的思考取向。不论是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在中国的范围内，这种转型都迫使社会学家开始重新调整原来的研究取向，并依据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去重新反思既有的理论框架。那么，今天的社会学家究竟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显然是新时期的理论家必须自我回答的一个问题。

差不多 30 年前，也就是 1986 年 1 月 29 日，吉登斯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便是《社会学家究竟做什么？》。他在严厉地批评了大学制度中的学科沙文主义倾向之后，为社会学的研究划定了一个范围，在他看来，“社会学关注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特别看重由现代工业化所引发的那些社会形式^②”。而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使人跟人之间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比较的根本目的是注意到人类自身的行动的意义，因为任何人类行为都建立在一种理性之上，尽管这种理性可能并非那么清楚地为人所意识到。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无疑是研究日常社会生活的一门学问，但它跟日常的社会生活之间仍有很大的分别。日常生活里的人可能会熟练地在社会之中生活，但是不一定会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其自身的行为。实际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8.

^② 原文：“Sociology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institutions, giving particular emphasis to those forms of society brought into being by the advent of modern industrialism.”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1.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上，日常生活因此也变得不那么“日常”了，因为看起来人人都了解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可能充满了错误百出的信息。吉登斯以现代社会单亲家庭的增加这一日常生活的知识来对这一点予以说明。比如，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在今天的社会，“家庭破裂”的概率远远地高于上个世纪。但是，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单亲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今天，当然，原因可能并非离婚，而是年轻人群体的高死亡率。又如，英国罢工现象很多，但相比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又并非那么高。再如，在论及瑞典的高自杀率时，人们认为原因似乎是北欧人的独特性格及其宽容的社会环境，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原因的高自杀率，从来没有真正地表现出来过。因而，吉登斯强调，社会学的研究会作用于社会，并能够引起一种偏见和歧视的增强，甚至还可能激发人们打心眼里就希望有的一种社会变迁的发生。^①

这样一种社会与人之间的交互性作用，是以前的社会理论家所不曾给予明确指示的，很多解释都是单向度地去理解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要么是个体主义的心理学解释，要么是将人自身的影响缩小到零的社会决定论解释。这些在吉登斯看来都是成问题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也许是个例外，因为我们在抽丝剥茧地梳理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时会发现，以前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很多时候是不完全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们还没有深入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处去审视马克思的精神。在吉登斯看来，至少在历史变迁中的矛盾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上，我们对马克思有很多误解。

第二节 矛盾、权力与历史唯物主义

吉登斯反对社会学理论解释中的功能论是众所周知的，他特别强调，在社会分析中，首先需要避开单纯的功能论视角。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口号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4-5.

式的宣言：“不要去寻找社会实践所满足的功能，而要去寻找它们所体现的矛盾！”^① 而在这里，吉登斯使用矛盾（contradiction）这一概念，既跟马克思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性，同时又与其有着极大的分歧。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矛盾性的论述，与吉登斯对于矛盾这一概念的讨论和发展，正是二者的分歧之一。

谈到矛盾的概念，必然要提及黑格尔，对于吉登斯而言，当然也不例外。他进一步强调，黑格尔所谓的矛盾概念所指涉的是一种成长的普遍性（pervasiveness of becoming），这种普遍性内在于所有事物，成为其运动和成长的一个来源，并通过否定之否定（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的过程而得到体现。到了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这一否定性（negativity）的概念，被认为并非存在于真实的事物之中，而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为了体现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事物存在的肯定性（positivity），马克思最终抛弃了黑格尔所提出的有关现实通过否定性而发生瓦解与转型的看法，并将其归入理念论一类的主张而对之加以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表述：

但是，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②

在这里，马克思基本上否认了黑格尔所认为的作为事物构成的本体论存在的矛盾，而是直接将其与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阶级社会内部才存在着这种矛盾性，而资本主义将这样一种社会自身的矛盾发展到最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31.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大化。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除了阶级，才有可能超越这种阶级社会自身在发展上的种种矛盾。

而无产阶级是一种矛盾否定性的极致，这个完全被剥夺了人类属性的阶级，却承担着将整个社会从阶级社会的矛盾本性中拯救出来的责任。这样，在马克思那里，矛盾以及否定性所反映出来的不是存在的限度（finitude of being），即现实的一种普遍性的本体论状况，而是阶级社会的存在的限度，即一种过渡时期的而非普遍性的人类社会秩序的类型。换言之，矛盾所担当的角色就是一种转换能力，也就是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无阶级的部落社会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转换。^①

马克思所分析的阶级社会中固有矛盾的观点，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发挥，特别是把结构主义观念纳入到了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中来。法国的人类学家郭德烈就曾经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理解为一种地道的结构性关系。资本和工资劳动之间就是一对矛盾，同时也是一种阶级的对立，它们相互处在一种结构性对立的关系之中。这既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同时也是“一种结构的内在矛盾”（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a structure）^②。比如，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形成了一种对照。

吉登斯在肯定了这种把结构的观念纳入到对于矛盾的理解中来的做法之后，也指出了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学重新落入到功能论分析的老路上去。因此，他把社会中的矛盾理解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原则的对立或者分离”，而这些原则既“相互依赖地”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是“相互背反的”^③。为了说明这一点，吉登斯列举了同样是跟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一对矛盾，即私人占有（private appropriation）和社会化生产（socialized production）之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32–133.

② Maurice Godelier,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 in Robin Blackburn,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Fontana, 1972.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41.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而日渐突出的一种矛盾。资本主义天生所具有的这种矛盾，在一种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运行中预设了一种结构性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中包含了一种社会化的再生产，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本身而言又构成了一种否定、一种扬弃。

一般意义上，资本主义讲求的是“一种投资—生产—利润—投资的循环”（an investment-production-profit-investment cycle）。这里隐含着一种吉登斯所认为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性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政府’”（the “anarc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而另外一个对立的要素则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控制”（socialized control of productive processes）。在吉登斯看来，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并存在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① 并且，吉登斯还特别指出了矛盾背后的辩证性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冲突以及系统整合与系统矛盾绝不仅仅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存在，即矛盾只有通过系统整合才可能发生，因为矛盾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可能的系统整合。^② 显然，这仍旧是在延续黑格尔的解释思路。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发展出来的一种矛盾论被首先运用在了对于历史变迁的解释，即一种对于历史的物质主义^③的解释（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上。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物质主义的解释，被吉登斯归纳为下面七点：第一点是“一种方法论的指示”（a methodological prescription），即进行历史分析的方法。这样一种方法与理念论相对立，也就是不要去看人们在观念层次上的说和想，也不要看历史中人的说和想，而要注意实际活动着的人及他们的物质生活。第二点是“一种人的实践的概念”（a conception of human praxis），这里的实践强调的是人既不是被动的客体，也并非完全自由的主体。因此，研究人的生活就是去研究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4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44.

③ 一般译作唯物主义或唯物论，但似乎英文“materialist”的原意更接近中文里的“物质主义”的含义，以此而与理念论或理性主义形成一种对照。

跟人的需求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实践活动，而历史就是为一种有感知能力的人准备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准备的。因此而有的第三点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labou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除了作为经济活动的劳动的意义之外，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对于劳动的理解，这种理解就是把劳动看成人类的·活动·与·物质·自然·的·交汇·点，这根基于跟动物的本能生活相区别的人类文化的历史性特征。在这个交汇点上，劳动转变成一种实践，而实践又参与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由此而实现一种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这随之引出了第四点认识，也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理论”（a theory of social change）的历史物质主义。在这种社会变迁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决定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强调的是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即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随着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这些内容发生改变了，社会关系也就会随之而发生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甚至断言，手工推磨一定是跟一个封建领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蒸汽机推磨则一定是与工业化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或者生产方式又被界定为一种下层结构，而其与观念和价值层面的上层结构之间处在了一种相互的对立和联系之中。由此而引申出第五点，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一种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之间关系的功能理论（a functional the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fra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在这里，马克思是把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制度，跟作为整体的一个要素的经济制度联系在了一起，并以此来与理念论的种种主张保持对立。在这里，他一方面强调物质生产的第一性，另一方面也没有排斥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甚至进一步把人的意识也还原到了物质的层次上去，强调物质对于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于是，“一种·物质·的·还原·论”（a reductionist theory of consciousness）被吉登斯看成了马克思历史物质主义论的第六点特征。在此种认识中，人的观念没有一点自主性存在，它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状况的反映而已。由此，社会发展中以物质占有为基础的阶级划分，成为历史唯物论解释的

核心前提，也就是吉登斯所归纳的第七点，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解释的核心特征就是“一种阶级划分的核心性理论”（a theory of the centrality of class divisions）。结果，在解释社会变迁中，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一种最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并且，社会关系的许多方面都会受到此种冲突性的阶级关系的支配。^①

在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七点总结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对于这样一种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也并不都是一致的声音，以结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就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经济并非一种起支配性作用的力量。这种认识，使得阿尔都塞一方面强烈地反对马克思对于社会发展的技术与经济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反对马克思对于历史的解释。特别是在对于整体性的理解上，阿尔都塞更强调结构性的社会构成要素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在他看来，不同客体水平的结构性差异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但是，不同客体水平在其各自的影响力上却并不是相互均衡的，而是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支配。作为下层结构的经济尽管属于这样的客体水平中的一种，但对于其他的水平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会带来一种极端的社会转型的情境，这种转型是通过作为社会统一体的诸客体水平之间的不对称性体现出来的。

阿尔都塞为了避开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之间关系的旧有解释框架，专门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另外一个是结构性因果（structural causality）。他认为，在各类社会矛盾中，处在支配中的结构（structure in dominance）构成了一个整体。在本身处在非均衡关系的不同客观水平上，存在着各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反过来又会相互增加其各自的矛盾性。一旦这些矛盾被取代，社会革命性变迁的动力也就丧失掉了，而一旦矛盾得到化解，就会出现跟既有的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50 - 153.

社会构成之间的断裂。因此，非均衡的社会发展对于社会的构成而言并非什么例外，而往往都是融入其中的。^①

因此，结构性因果不是一种机械的因果，而是一种莱布尼茨和黑格尔意义上的表达性因果（expressive causality），后一概念优于前一概念的核心是在整体对于部分的影响上，表达性因果这一概念指出了“整体性的每一个要素都是整体的‘本质’的表达或瞬间”^②，或者如阿尔都塞所说，“本质的内在原则呈现在整体的每一个点上”^③。

借用表达性因果的概念而提出结构性因果这一概念，阿尔都塞想要解决的是跟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结构（structure）及其效果（effect）之间谁决定谁的问题。阿尔都塞所要指出的是，结构是通过其效果而存在的。结构不存在于效果之外，不是预先存在的东西，反过来，结构的整体性存在是由其效果组成的，或者说，结构的组成要素从根本上离不开其效果。^④ 显然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已经离开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心灵结构论很远，开始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人的行动或者实践的方面。

在这方面，吉登斯又进一步把结构性因果与作为行动者的中介者（agency）概念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有着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自我决定性，那么作为行动者的个人，仅仅是结构中的一个位置而已，他们要么是结构的支持者，要么就是阻碍者。在阿尔都塞看来，“生产关系（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能够被还原成任何人类学上的互为主体性——因为它们仅仅在一种关系、地点和功能分配的特定结构中才把中介者与客体连接起来，并由生产的客体和中介所占据和‘支持’”^⑤。而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6.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6.

③ Louis Althusser &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 186,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6.

④ See Louis Althusser &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p. 188 - 189,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7.

⑤ Louis Althusser & Etienne Balibar, *Reading Capital*, p. 180,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7.

主客体的分化仅仅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作为上层结构的意识形态把社会中独立存在的个体整合在了一起，其所借助的途径就是把作为社会构成的结构性特征的“历史的真正鼓吹者的‘支持者’”转化为“有着特定的意识和需求形式的主体”^①。在这个方面，历史在社会中得到了一种复活，并附在了某种物化的形态之上。

同时，阿尔都塞所强调的过度决定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多重决定的，而不是单一决定的。一种变迁不是单单由一种因素所决定的，而是由结构性的多重因素来决定，是多重社会矛盾融合的产物。借助过度决定的概念，阿尔都塞一方面指出了马克思在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上忽视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仅仅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指出，黑格尔在理解整体性时做出了对于构成社会整体的水平和区域的区分，并强调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紧张性。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试图通过因果的概念来理解社会的整体性，在他看来，结构往往是存在于作为整体的效果之中的。但在吉登斯看来，阿尔都塞没有能够在结构与系统之间做出一种区分，而且，因为仅仅强调社会变迁的过度决定的矛盾，强调结构性的因果，他没有把握住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二重性关系，这一点则为吉登斯所把握并得到了详尽阐明。^②

更进一步说，吉登斯所要指责的是，马克思为了抗拒黑格尔的影响，而把矛盾和否定的概念仅仅跟“阶级是社会的阶级冲突”这一点联系在一起。但是，矛盾和否定绝不是单一地对应于阶级的支配，而是有更加广泛的联系。在吉登斯看来：

在所有的社会形式中，人类存在于跟自然的矛盾关系中。人类存在于跟自然的矛盾关系中是因为他们在自然之中并属于自然，作为有形的存在而存在于物质环境之中；并且，与此同时他们还背离于自然，因此他们有着一种自身的“第二性”，而无法被还原为物理的客体或事件。^③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5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0.

③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1.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人跟自然的矛盾，是在所有的宗教中都能够看到的。这明显体现在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的有限性和表面上的时空的无限性之间的相互否定上。生命的稍纵即逝，使这样一种存在构成了对于时空无限性的否定。在这种相互否定的矛盾统一体中，此在与存在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Being）之间是由社会来作为中介的，这里依旧体现了一种结构的二重性，其使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进而，“人类存在的矛盾因此就转译为结构性的矛盾，这才是其真正唯一的媒介”^①。而这个媒介，无可避免地跟意识形态的观念联系在了一起，它会在意识中得到体现。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意识

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化有其自身的历史。无疑，马克思是这一概念最重要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其后还有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视角对于意识形态的新解释，以及曼海姆之后的哈贝马斯与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②一般而言，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伯爵（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那里，他在1801年出版了《意识形态原理》（*Éléments d'idéologie*, 第一卷）一书，在书中，他提到意识形态是一门有关“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不过，之前的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似乎比特拉西伯爵更早地注意到了这一概念。但特拉西伯爵显然更多地从实证哲学的角度去发展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因此，他大量地论证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的作品，并将培根所批评的谬见（idols）作为意识变革的基础，即借助理性来使偏见得到转变。^③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5.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5.

在吉登斯看来，意识形态观念的后期发展集中在孔德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上。孔德对于意识形态持极端批评的态度，特别是对于意识形态学家的反传统和形而上学不以为然。作为实证社会学的鼻祖，孔德试图把形而上学的观念论从实证科学中剔除出去，而沿袭这一传统的涂尔干更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中排斥意识形态的介入。而马克思则不然，他的知识背景与意识形态学家之间有着一种很深的渊源，他还深刻地受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费尔巴哈试图摆脱黑格尔的理念主义 (idealism)，而以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取而代之，因而被称为“费尔巴哈的倒置” (Feuerbachian inversion)。

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有对黑格尔加以排斥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承袭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特征。黑格尔认为，人是他们自身历史的创造者，但这仅仅是他们自我意识中的偶然闪现，需要借助人的自我反省而实现。而马克思对这一点却不以为然，认为其实可以通过一种“意识形态的诊断” (diagnosis of ideology) 的方式来超越人类行动者的意识，以此来发现他们行动的真正基础。在此意义上，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才成为可能，这种批判性分析强调历史的脉络分析，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找出形成不同种类意识形态的场景。而在这种对于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意识形态所表达的以及所证成的是统治阶级的旨趣。^①

不同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曼海姆则注意到了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处在转变之中的意识形态。曼海姆强调，对于现代社会兴起的转变而言，这是一种从专门性的 (particular) 意识形态概念向整体性的 (total) 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变。前一种意识形态是指某个党派对于另外一个党派所提出的观念的怀疑或者质疑，因为后者遮掩了前者所提出的那些旨趣。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则是指“一个群体、阶级或者历史时期的遍布整体的意识形态”。不论是专门性的还是整体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66 - 167.

性的意识形态，它们实际上都会强调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是由表达这种观念的社会媒介所造就的。但是，专门性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仅仅把对手主张的一部分看作是意识形态化的，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则对于对手一方的整体性的概念构成产生怀疑或质疑。同时，专门性的意识形态注重的是个体，是在个体心理水平上的作用发挥，而整体性的意识形态则关注群体的组织。^①

在提到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吉登斯还提到了对当下英语世界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吉登斯认为，哈贝马斯的论述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有两点，其中之一是实质性的，而另外一点则是抽象化的。首先，哈贝马斯谈到了现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其次，他在方法论层次上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在哈贝马斯看来，“意识形态的概念内在地是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哈贝马斯强调，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而出现的，实际上它还跟那一社会所造就的公开争论的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是跟一种身处其中的人可以对共同体所关心的问题展开公开争论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此政策的制定不再依靠传统和命令，而是开始寻求并依赖于理性本身。

因此，意识形态的分析，就等同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当今社会，科学和技术都紧密地跟意识形态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世俗化的过程消解了传统的合法性的形式，并以一种形式上理性化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传统的内涵。在这里，吉登斯援引了哈贝马斯在《迈向理性化的社会》一书中的一段话来予以说明：

[新的合法化的形式] 产生于对世界传统解释的教条的批判，并标榜一种科学的性格。然而，它们却保持了合法化的功能，因而使权力关系无法获得分析，也就无法达致公共意识。正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才初露端倪：表面上以现代科学为伪装来取代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69.

传统的权力的合法性，并从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中抽取出它们的正当性。^①

在这里，吉登斯显然注意到了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技术层面的独特认识，他轻视资产阶级的“公平交易”（fair exchange）这一主导意识形态，转而去强化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technocratic consciousness）。技术规则的实现，成为在政治上处于核心的合法性风气。因此，吉登斯认为，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哈贝马斯与曼海姆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因为后者所担心的恰恰是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撞。^②

在意识形态概念上，与哈贝马斯相对立的还有阿尔都塞。对于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既非资本主义社会专门的发明创造，也并非一种发生了扭曲的交流形式，而是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类型在功能上所必需的特征。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乃是每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以便去塑造人，使他们发生转变，并使他们对于存在的紧迫性做出反应”^③。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便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表达，而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借助一种意识形态，人便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而生活在了社会关系的整体之中。换言之，作为意识的主体是借助于意识形态并生活于其中的。在这里，阿尔都塞所特别强调的就是，意识形态不是观念或者信念，而是对社会行动者所经历的日常行动的实际组织。^④

面对如此众多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论争，吉登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概念的西方起源，也就是强调，意识形态跟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于传统和偏见的批评有着同一种起源。启蒙运动的核心是以理性的、扎实的知识去取代先

① Jürgen Habermas, "Technology and Science as Ideology," in *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71, p. 99, from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75.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76.

③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 p. 235,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79.

④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79.

前的思维中的神秘性知识。因此，孔德在创建社会学之初便要在所谓实证的社会学中取消意识形态的概念。^① 这延续了欧洲启蒙时代将理性与偏见对立起来的做法，进而强调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对立，并把前者看作是错误的、虚幻的，而后者则被认为是正确的、真实的。吉登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种努力就是，极力地去抗拒这样一种西方启蒙运动背景下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认为，在启蒙运动批判意识形态的偏见时，它自身也同样出现了一种偏见。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观念而言，区分的标志不是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本身也是可以经受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分析的，也是由此分析可以创造出有效的知识的，因此真正区分意识形态的标志应该是所谓“有效的知识”（valid knowledge）与“无效的知识”（invalid knowledge）之间的区分。^②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吉登斯将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由此来与其他的分析性概念构建起一种联系。吉登斯注意到了意识形态概念与旨趣、话语、生活经验以及支配之间的联系。

我们来看意识形态与旨趣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跟旨趣这一概念的联系，主要在于象征性秩序方面，也就是意义的结构如何被调动起来，以使占据着文化霸权的群体的局部利益具有一种合法性。^③ 在这里，“旨趣”（interests）一词也有“利益”的含义在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旨趣等同于人的需求，因此，在解释人的行为的原因时，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强调在某种行为的背后便有某种需求。这是功能论社会学解释的基础，但是，吉登斯特别强调，实际上有许多的人类行为是无法找到这种需求的基础的，至少有些人之所以采取某种行为，并非因为有某种需求的旨趣或利益，这一认识在吉登斯看来是极为重要的。另外一种看待旨趣的做法是，强调旨趣背后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这是权力与支配之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分析领域。第三种看待旨趣的做法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即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82.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86.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88.

认为行动的旨趣就是使人更愉悦。

在上述三种对旨趣的看法中，吉登斯选择了对于需求的亲近，也就是看重旨趣跟人的需求之间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旨趣等同于需求，吉登斯恰恰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① 在这里，吉登斯强调的是旨趣与行动者之间的密切关联，需求乃是人们旨趣的基础，这并不是说人们的旨趣与需要之间的关系为因果关系，旨趣规定了这些需要得到实现的方式，因此，旨趣一方面在引导着需要，同时又为需要所激励。因为需要是落实在活着的个人身上的，而非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旨趣则不然，它既存在于个体身上，同时又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群体之中。我们在说个体有着某种旨趣的时候，往往暗指他或她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在此意义上，吉登斯强调的是旨趣和需求之间的一种非对等性。在一个并非决定性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当中，旨趣所隐含的是“行动的潜在路径”（potential courses of action）^②。在这里，旨趣便是一个群体所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它构成了一个群体对另外一个群体进行支配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与此同时，人作为有着需求的行动者，他的一般性需求和场景性的实际需求之间是有差距的，吉登斯提醒我们，不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人们依据自己身处的场景而产生的“经验性需求”（empirical wants）预示了人的策略性行动的可能性。社会与场景的时空变化决定了参与到其中的行动者会因势利导地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行为，而在这行为的背后隐含着人的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

在这种被吉登斯称为批判的社会学的思考中，话语、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象征性秩序以及生活经验的形式等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基于这四个概念，吉登斯给我们描画出了一幅示意图，以此来表示意识形态与人的策略性行动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关系（见图 7—1）。图中的左上角反映了作为策略行动的意识形态，它是以话语的形式由上而下灌输下来的，更加具有清晰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89.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89.

的意识以及自上而下的特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是以话语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所以会为统治阶级或群体及其旨趣所操弄。^①

这种操弄所依靠的是一种区分，而这种区分则既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还可以是公开或隐秘的。特别就最后一点而言，统治群体往往善于利用象征系统的公开性和隐秘性来对受支配群体进行支配与控制。而从制度的角度去检讨意识形态，就是要去表明，象征性秩序如何在生活经验的日常情境中仍保持着支配的形式。这种对于象征性秩序的制度层面的分析体现在图 7—1 的右下角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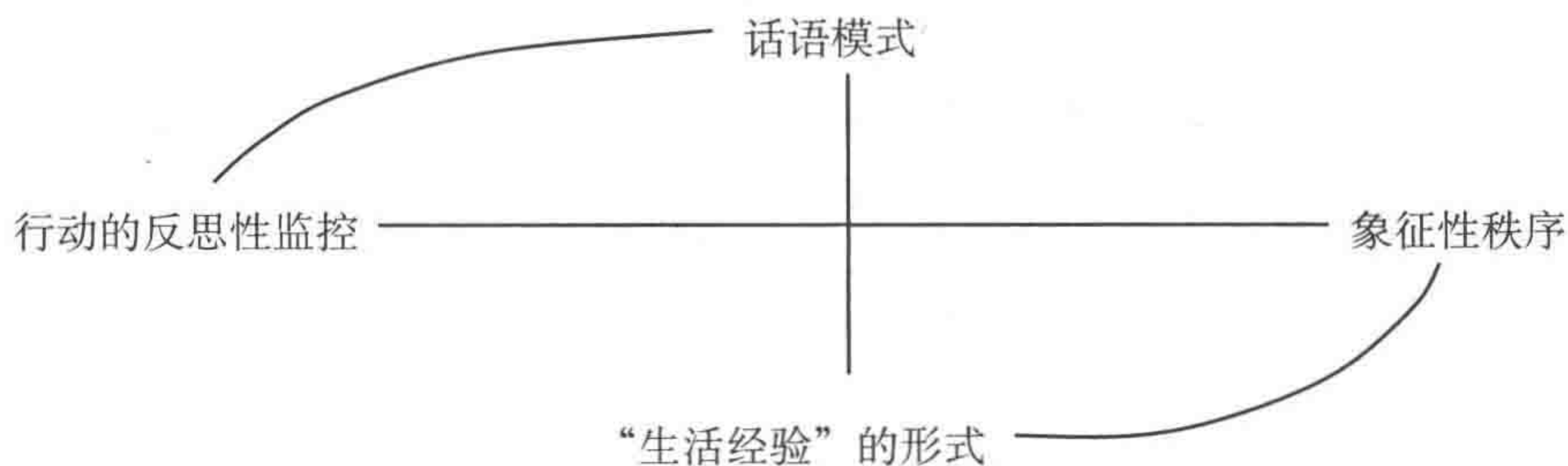


图 7—1 话语与生活经验关系图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 190.

值得指出的是，意识形态不仅是观念层面的，而且是实践层面的，是在社会中通过具体的运作而获得实现的，这具体地体现在支配的方式上。这是一种制度的分析，关注的是在策略性行动中的利益群体，如何借用意识形态来遮掩自身的旨趣。由此，吉登斯进一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意识形态模式类型。

第一种模式类型是具有普遍性的部门群体旨趣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观念就是统治的观念这一主张。而在现代政治中，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转变就是意识形态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共存。一个群体，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0.

其存在的合法性的基础转变为，它需要去主张其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利益，这成为当下政治话语的一个核心特征。共同利益成了一种新的象征主义，其或明或暗地融入到这个群体对于人的普遍性旨趣的合法性追求上去。^①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批判依旧集中在对于阶级支配的分析上，关注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支配的隐藏与显露。不过，阶级支配的形式也在发生转变，特别是在欧洲，随着一波接着一波的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福利国家的实现，人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契约的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成为受资本直接控制的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阶级统治的形态发生了转变，工人的权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今天我们也许很难想象资本主义社会跟不自由之间还有任何连接。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典分析之后所发生的巨大转变，一方面是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过度集中。而这两点使资本主义转化为一种新的存在形态。

这两个看起来有些对立的方面，今天已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而使得自由的国家（liberal state）与民主的公民权（franchise）之间实现了一种顺势而为的结合。这里所谓自由的国家，就是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民众在政治结社上的自由，而这两点，最初其实仍旧是用来满足新型企业家阶级的旨趣的，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大众赋权的可能性的实现，但是19世纪晚期的统治阶级差不多都认为，这样的赋权对于自由的国家本身而言也构成了一种威胁。^②

第二种意识形态模式类型就是对于矛盾的排斥或者是使其转变形态。即便是在今天，马克思强调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这中间的转变依旧是巨大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3.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3.

的，这种巨大的转变就是通过将政治与经济分离，来掩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强调，将公民纳入到由赋权所约束的政治社会中去。于是所有的冲突都因此转变为似乎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冲突。这实际上是把原有的矛盾加以伪装，以消解人们对于真实的阶级支配的敏感性。

第三种意识形态模式类型就是对于当下的自然化，或者所谓的物化(reification)。支配阶级的旨趣紧密地跟他们的优越地位联系在一起。一种使既有的存在状态自然化的趋势抑制了人类社会对此种旨趣的多变性、历史性等特征的宽容和欣赏。于是在社会关系的表现上所体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种固定化了的以及没有什么变异的特征，这实际也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具体化或物化。匈牙利的思想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最早谈到物化的概念。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出发，卢卡奇注意到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物化与商品之间的关联。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长文中，卢卡奇开篇就写道：

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①

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商品所反映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质，而这一点恰恰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所掩盖，即物成为商品便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属性，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感受性本身，成了一种社会的物。这种社会物本身隐含着一种社会关系，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根本上却是一种虚幻形式的关系，因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着的只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以及物与物的关系都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来界定的，是继起的。这也就是

^① [匈] 卢卡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见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43～3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形式的奥秘，即“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①。

这种虚幻的关系曾经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而卢卡奇则进一步认为，商品拜物教的问题乃是当下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② 吉登斯显然更加赞同和接受卢卡奇的这一看法，并将其延伸到了对于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解释中去。吉登斯同时也注意到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的描述，这种物化就是一种信以为真、不加思考的态度，吉登斯专门引述了卢卡奇下面这样一段论述：

正像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以及更具确定性地浸入到人的意识之中……正像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始终停留在它自己所创造的直接性之中一样，资产阶级想要意识到物化意识形态的现象，结果也是如此。有些思想家绝不想否认或搞乱这种现象，他们或多或少地明白这种现象毁坏人性的作用，但这些思想仅仅流于表面，从不试图去超越从各种客观上最后派生出来、最远离资本主义的真实生命过程的形式，即对于物化本身的基本现象而言的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③

在这段话上，吉登斯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他认为，物化的问题反映出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特征。自然主义的社会学以及对于物化的形式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而在拒斥对于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的

^① [德] 马克思：《资本论》，中文2版，第1卷，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参见[匈] 卢卡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见[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144页。

^③ 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1971, pp. 93 - 94,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195 - 196.

解释上，物化与阐释哲学之间也有着一种并非直接的关联性。^①

在吉登斯看来，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跟用科学或理性的知识来取代偏见这样的初始动机密切相连。意识形态最初所指涉的是非理性的、毫无根据的信仰的瓦解，最终则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的瓦解，或者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也就是在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强化了一种分离。

在这里，吉登斯不大赞同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的主张，而是特别强调，这样一种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有助于使社会中既存的支配关系合法化。而这一点本身恰恰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实际并未真正终结，而是刚刚进入到社会学的视野中来。在吉登斯看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任何政治话语，在其预言某种意识形态即将终结之时，其本身潜在地也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吉登斯看来，这可以看作未来社会学分析的一条基本原则。^②

第四节 未来的社会学

跟一个世纪之前的社会学家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相比，今天的社会学家似乎在自愿退缩到社会科学的边缘地位上去，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学的命运也有类似之处。但是在此之前，即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的创立者们从来没有放弃使社会学成为研究人及其创造物的核心学科的追求。^③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社会学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因应着现代世界的变化而发生的。1986年4月，“东方社会学学会”（the Easter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会在纽约召开，吉登斯曾经撰文阐述未来一二十年社会学的发展，当时他归纳出九个主题，这九个主题即便是到了今天，依旧富有启发性，因为这些主题尚无明确的解答，似乎还是未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197.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2.

来社会学需要不断去追求和探索的一些主题。^① 对这九个主题，这里不妨做一简要叙述。

吉登斯所提出的未来社会学的第一个主题就是：“社会学将日益扫除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思想的残渣余孽”^②。在吉登斯看来，作为“现代性规划”（project of modernity）的一部分，社会学的出现密切地与现代性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社会学成长的关键期在于 19 世纪，而真正的成熟是在 20 世纪。19 世纪的人们已经开始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经济，即资本主义的扩张或者工业化在全球的发展。

不过，吉登斯专门在资本主义（capitalism）和工业化（industrialism）之间做了一种区分。因为，在吉登斯看来，新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强调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在这些理论家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它为现代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动力基础，其特征是不断地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展和蔓延，而工业化也不过是这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有意将工业化和现代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家们认为，工业化乃是型塑现代制度的一种引导性力量，而资本主义仅仅是用来组织工业化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已，并且只是短暂存在的一种方式。^③

而上述这两种看法，在吉登斯看来，都深深地印刻着 19 世纪的社会思想的痕迹。对于现代性的成长而言，究竟是资本主义影响大，还是工业化的影响大，这是一个没有得到明确解答的问题。在吉登斯看来，对于现代性的成长，在资本主义与工业化之外至少需要再增加三个影响要素，其一是福柯意义上的行政权力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dministrative power）。现代世界的发展是跟信息的生产 and 组织的激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不是到了今天才进入到信息时代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信息社会的姿态呈现出来，因此，现代国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世界体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Nine Theses on the Future of Sociology,” in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22 - 51.

^②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6.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7.

系，其核心的特征就是更有效率地利用信息资源，这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行政权力的扩张与膨胀。^①

吉登斯所提及的第二个影响要素就是军事力量与战争 (military power and war)。尽管军事力量与战争自古有之，但是现代社会更加紧密地与这些要素联系在了一起。对这一点，除了国际关系研究之外的许多社会科学都忽视了，而这又跟 19 世纪的社会思想有关。19 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天真地以为先前时代的军事社会已经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所取代，并有意地将传统社会而非现代社会与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而出现的军事力量以及武装暴力的重要性，这种 19 世纪的思想显然彻底被瓦解了。吉登斯甚至断言，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传统社会的瓦解根本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工业化，甚至不是因为现代国家行政资源的高度集中，而是上述这些要素与现代手段下的军事和战争的结合所致。^②

第三个影响要素是所谓现代性的文化维度 (cultural dimension of modernity)。也就是现代性的成长是因为有一种独立而持续地发挥作用的现代文化的存在，而非像古典社会学家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认识到的那种作为“资本主义或者工业化的反映” (reflex of capitalism or industrialism) 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最重要的是去探究使传统世界彻底瓦解的那种文化上的普适性力量究竟是什么。这里隐含着一种断裂式的转型，而在这一点上，原有的那些文化分析模式就显得漏洞百出、不合时宜了。^③

吉登斯所提出的未来社会学的第二主题就是：“能够给予社会学的争论以一种更新的连贯性的理论综合将会出现”^④。这是一种在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中寻求统一的理论预言的努力，自 19 世纪以来就从来没有中断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8.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9.

④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29.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过。自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提倡自然科学哲学中的多元主义^①之后，建构科学解释的统一性语言的努力也就受到了阻碍，多元主义者认为，这样一种语言会使竞争性的观点受到排挤。在这个意义上，固有的理论被彻底打成碎片，而一种具有引领性的大理论却不见端倪，人们的研究开始进入没有理论作为引导的时代，结果研究只是为了研究，研究不再形成新的理论。

但是，吉登斯提醒说，我们还是有必要认真严肃地去对待这样一种看法，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社会学不能够脱离其研究对象，即作为行动者的人类的社会行动，去建构某种社会理论。相对于自然科学的单一性阐释（single hermeneutic）而言，社会科学更多是双重阐释（double hermeneutic），即个体的行动与规范的制度之间密切的相互影响。正如其所言：

社会学观察者依赖于能够精确描述社会过程的世俗概念；而行动者会定期地在他们的行为中融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因此会潜在地改变此行为的特征。这便在社会学的理论化中引入了一种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与有自然论倾向的社会学家心目中的“累积的以及没有竞争性的”模式有了某种距离。不仅如此，社会世界还是一个内部有竞争的世界，其中，活动者与活动者群体之间的纷争——跟分殊的世界观或者旨趣的冲突息息相关——是普遍而深入的。社会科学融入到社会世界的构成中去的联系纽带无疑意味着，这些区分倾向于强劲地去塑造社会学观察者所假定的理论视角（这不仅仅是其“客观性”不足的问题）。如果所有这些都看成与在理论的经验测试中的传统变量的重复与控制的难度相关联，那么我们确实要去怀疑，在社会学中获取一种在专业上被认可的理论和概念框架的雄心了。^②

不过，社会学终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寻求一种理论与经验事实

^① See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②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30 - 31.

之间的相互印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还是一门给出解释的学科，这种解释有别于由社会行动者本身所提供的解释。

在此基础之上，吉登斯又进一步提出了未来社会学需要发展的第三个主题，那就是“要对社会学分析的主导对象有实质性的再思考”^①。社会学声称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但什么是“社会”，在今天变得难以界定了。

社会究竟是指一种社会组织呢，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互动”，抑或是更为宏观的社会体系？可能不同的社会学家对此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理解。吉登斯认为，尽管有各种对于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模棱两可的认识，但是，今天的社会学家在指涉“社会”时，更多还是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国家有着划定清楚的边界，伴随着这一边界安排同时有行政管理的权力。并且，民族国家在构建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强化一种十分同质化的文化的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民，借助此认同而与周边国家及人民区分开来。^②

在吉登斯看来，对于民族国家的理论分析，以前的社会学显然有所忽略。民族国家不仅在生产着自身的统治结构，同时也通过一种社会的动员和参与而创造出各种新的社会控制的结构与范围。而且，民族国家内部的差异性，也非常值得社会学家们重视，包括内部的工业布局、阶级结构差异以及其他各组织类型的差异，这些都可能跟整体上的民族国家追求统一和一致的目标密切相关。尽管有民族国家整体上的对于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但是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对于这些差异，之前的社会学家似乎很少给予专门的注意，而吉登斯提醒我们，要培养一种对于地理政治性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因为这些因素确实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社会组织与社会变迁的模式。^③

今天的世界似乎一方面在变得越来越小，借助各种现代交通工具，我

①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32.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33.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 33.

们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和很多的时间，就可以从地球的这一端走到地球的另一端，这是过去的人只有在幻想和神话中才能实现的；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影响，又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宽广，通过快捷的网络，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可以从身边的世界跃迁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世界已经连接成一体了。

对此，吉登斯认为，未来社会学研究的第四个主题就是对于这一相互连接成一体的世界体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沃勒斯坦有关世界体系的研究绝对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吉登斯看来，后来有关世界体系的研究，并没有真正脱离沃勒斯坦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过分地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与此同时，世界体系的核心、次边缘以及边缘的等级性发展模式，被过分地渲染成完全由经济的力量所致。^①吉登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式，实在无助于解释在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形态独特的社会形式存留了下来，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于是它们无法与现代民族国家构成一个连续体。吉登斯在这一点上试图把世界体系的讨论重新拉回到社会学的一般性讨论中来，他更加注意作为世界体系构成的那种系统性（systemness）是怎样的，而作为社会系统的世界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依赖，并由此而联系在一起，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相互依赖的联系，又是如何经由历史的过程而得到不断演变和发展的。^②

在吉登斯看来，未来社会学的第五个主题就是，要使社会科学内部原有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再像原来那样清楚。现在的跨学科研究就是要使这种界限变得模糊。吉登斯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学科的社会学，最初是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出来的，它在社会分析的政治和经济维度之外，又添加了一个社会的维度。吉登斯的这一提醒是极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那种把社会学与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

^① See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35 - 36.

清楚地分离开来的做法，在今天似乎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必要了。^① 而如何去冲破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可能是最值得未来的社会学家去继续追求的。

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所提出的未来社会学的第六个主题就变得极为重要。那就是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社会学家应该更多地回归到对于大范围的、长时段的社会转型的关注上去。这显然是对那些试图从所谓微观社会学的角度赞同默顿所提出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的做法提出了一种批评和挑战。^② 在对社会学假设的验证性难度做了一番细致阐述之后，吉登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于现代性的特征都还没有很好的概括，对于现代性的起源也没有很好的探究，对于什么是影响到现代世界发展轨迹的重大转型也不很清楚，那么，我们即便有再多的“理论建构”和“经验的验证”，也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最终只能落到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批评的“没有脑子的经验主义”（mindless empiricism）^④ 的限制中去，不能自拔。

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在今天变得越来越紧密，许多研究者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吉登斯本人显然是赞成这样一种影响的社会学家。他在为未来社会学规划的第七个主题中就呼吁，要让社会学更进一步地融入到对于社会政策或改革的实施的影响中去。在这一点上，吉登斯显然不像一般社会学家那样表现出扭捏的姿态，而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赞同性意见。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学不仅要去发现一种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要尽最大可能性去造就这样一种新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积极参与到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上，就成了当下和未来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在社会学家的这种积极主动的涉入之中，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者去更好地理解社会世界，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专业知识，至少要比那些没有经过细致耐心的社会学研究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37 - 41.

② See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Free Press, 1963.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41 - 44.

④ C. Wright Mill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lican, 1970.

的知识更为可信一些。在这种学术与政策制定的相互影响之中，一种对话的模式是必不可少的，借助这一对话模式，社会学学者、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受到这两方影响的其他人士，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对话，会有助于建构良好社会秩序的政策出台和实施。^①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信息去激发对于自身生活世界的反思，这种反思也带来了不同于过去时代的以个体解放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而且逐渐演变成了为自我与生活世界的安全而发展出来的新的社会运动。

吉登斯认为，未来社会运动将持续地成为一种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动力来源，他将此看成未来社会学的第八个主题。无可否认，在我们今日的生活之中，各种社会运动正在快速地使社会发生转型，在过去如此，在今天同样如此。因为社会运动的目标就是实现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生存方式，因此会对既存的社会秩序及其安排抱有一种排斥与拒绝的心态。这种心态在过去可能表现为专注于劳工、政治以及宗教的社会运动，但是，在今天则可能转到专注于生态、和平以及妇女的社会运动上来，而后者更加显示出一种对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环境问题以及性别之间权力关系不对称问题的敏感和关注。^②

最后，吉登斯认为，未来社会学的第九个主题就是，如何看待社会学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社会学内部的对立还会持续下去。因为，对于同样的研究发现，社会学家所给出的解释和理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还可能是针锋相对的。这种状况曾经使社会学远离了一般人对于这门学科的期待。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也许恰恰是社会的优势所在。在这种对立之中，我们为不被普通人喜欢的解释留下了一个表达的空间，使其可以有自由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另外，保有此种社会学内部的对立，至少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得到传递，由此不会让某些人仅仅因为权力在手就将一种可能是偏执的社会学解释坚持到底，从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44 - 4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48 - 50.

而给社会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这种对立的存在，也是一种警示，它警示持有偏执观点的人，那样的一种极端的做法，在社会学内部至少是行不通的，是会遇到阻力的。^①

第五节 社会理论的前景

在吉登斯看来，今天的社会理论处在了一种“混乱”（disarray）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为一般社会科学所熟知的。^② 不论是阐释学这样的旧传统的复兴，还是像民俗方法论这样的新视角，甚至还有分属不同哲学派别的思想传统，比如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日常语言哲学以及现象学等，都在向社会理论的领域渗透，并影响到社会理论自身的构建。

今天可以说几乎很难再有统一的社会理论的脉络呈现，而更多表现为多种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碰撞。在这种多样的理论发展中，吉登斯还特别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不过，已经没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其他的理论流派做泾渭分明的区分，因为在吉登斯看来，它们之间实际上很难再有这种区分，而是相互纠缠在了一起，无法真正区分开来，如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等。^③ 另外，还有跟语言与国家相关联的社会学，如英语、法语、德语等国家的社会学等，不同的语言构成了不同的语言共同体，而在这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英语国家的社会学。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语国家的社会理论中，默顿的所谓“中程理论”曾经得到过许多社会学家的交口称赞，尽管大家的意见并非一致，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可以讨论的问题意识。吉登斯认为，在这种中程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工业化社会的理论”（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society），在美国，参与其中的理论家有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贝尔（Daniel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pp. 50 - 5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4.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4.

Bell) 以及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而欧洲的理论家有阿隆 (Raymond Aron) 和达伦多夫 (Ralf Dahrendorf)。这种理论的核心特点就是有意将传统社会 (traditional society) 与现代工业化社会对立起来, 进而认为, 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差别, 它们只是工业化社会的两个分支类型罢了。由此而得出的一个判断就是, 随着工业化社会秩序的逐渐成熟, 阶级冲突不再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力量。激烈的阶级冲突被看成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存在形式, 一旦阶级关系得到规范化的治理, 阶级冲突也就融入到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中去, 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这即是著名的“阶级冲突制度化”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class conflict) 的论断。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对于阶级斗争的规范化约制, 另一方面是对于对立的工业化的协商和政治动员领域的限制。这在一定意义上, 可能被看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就意味着, “马克思主义以及极端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形式, 统统被看成是与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初始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激烈阶级冲突具有一样形式的紧张的意识形态的表达”^①。

溯本求源, 工业化社会的理论, 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较为平稳的时期提出来的, 但是, 在经历了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冲突时期之后, 工业化社会的理论受到支持的范围也就越来越有限了。特别是在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的群体中, 工业化社会理论原来是受到这些专业人士特别青睐的, 现在这种情况在面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内部冲突时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工业化社会理论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是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其兴起跟西方那个时期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而伴随着晚近的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理论在解释新现象上的局限也逐渐地暴露了出来。

吉登斯认为, 工业化社会的理论也跟曾经在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功能论 (functionalism) 和自然论 (naturalism) 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从法国的孔德、涂尔干的理论, 到美国的帕森斯及其之后的现代社会学理论,

^①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5.

都没有偏离这两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太远。^① 正如前文所述，功能论者的思想是跟一种有关“变迁的展开模式”（unfolding models of change）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根基于生物学的成长或者进化的隐喻而出现的一种对于社会的解释取向，这种解释取向最为核心的特征就是“有秩序的进步”（progress with order）的观念，这一点在工业化的理论中同样有明显的体现。在功能论的大范围之下，还有一些细小的分支，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以及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所发展出来的人类学的结构功能论和纯粹功能论，还有帕森斯的规范的功能论（normative functionalism）以及默顿的冲突功能论（conflict functionalism）等。

功能论一个最为核心的共同特质就是，以生物学来类比社会学。因为这两门学科都是在处理系统（systems）而非聚合（aggregates），并特别强调生物系统的动态平衡在社会系统中的运用。不过，吉登斯所持续批评的就是功能论的这一方面。他强调指出，对于功能论者而言，生物学的动态平衡的概念在分析社会系统时是极其困难的。^② 实际上，在吉登斯看来，从孔德到涂尔干，再到美国的社会学，功能论的传统都是紧密地跟一种社会哲学中的自然论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试图把一种自然的逻辑等同于社会科学的逻辑。在孔德所提出的所谓科学的等级结构中，各个学科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并且上一级的学科有赖于低它一级的学科，同时此学科也有自己独立而严格的探究的实际领域（factual sphere of investigation）。如果不是像孔德那样从垂直的角度来看待科学中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平面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一种学科发展进步的历史呈现，这也是人的要素不断卷入其中的发展历程。在吉登斯看来，在科学发展的起始阶段，人的要素一定是最远离科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科学研究的最初领域一定是数学和物理学，社会的要素融入到科学研究中来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社会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一分子，那出现得就更晚了。作为一门晚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6.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7.

来的学科，自孔德开始，社会学成了一门以实证论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科学。

不过，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对于社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越来越受到多种理论视角的冲击，特别是针对功能论的各种解构主义的倾向。吉登斯认为，在这种解构主义的倾向中，可以分辨出三种比较明显的趋势：首先是对于社会理论表现出绝望（despair）或者幻灭（disillusionment）的反应。其次是追求安全，有向教条主义大逆转（a reversion to dogmatism）的倾向。最后差不多是第一种反应的反面，一反第一种绝望态度，转而欢呼多种社会理论内部的多元取向和多重声音。^① 对于过度抽象哲学化的社会理论的探求的逆反，使第一种趋势得到了加强。积极参与这种逆反的人，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些抽象的社会理论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无法从现象层面找寻到一种对应关系。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社会研究的安稳性寻求一些帮助，比如重新回归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当然，第三种趋势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一种与回归正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取向，这实际上是对于多元的一种包容。这也显露出对人类行动解释上的多样性的一种认可。吉登斯对于上述三种看待社会的理论的发展趋势持一种并不认可的态度，他更加强调如何在社会理论的系统重建上有所更新。这并非简单地以一种新的正统来取代旧的正统，而是试图在新的情境下为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平台。与那些绝望论者以及那些欢欣鼓舞的解构论者有所不同的是，吉登斯并不否认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的存在，他认为不能将这种正统共识仅仅看作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而将之忽略，根本的是要找出其中的弱点所在。^②

既有的社会理论的共识，在吉登斯看来，至少存在下面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点是关于社会学起源的共识上的不足。社会学试图比照着自然科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39.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0.

学来对自身的起源给出一种解释，而这本身是成问题的。确实没有证据可以说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滞后。自18世纪早期以来，每一代的新思想家都会说，相比之前的对于人的研究，他们自己才是对于社会中的人的研究的开启者。维科就认为，自己发现了一门有关社会研究的新科学，孟德斯鸠和孔多塞也都有类似的主张。孔德虽然认为这些前人的贡献对于社会学而言都具有开创性，但还是将他们归结到社会学史前史的范畴中去，而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为社会学找寻到了一种科学的基础。这种对于社会学研究初创性的预言，并没有因为孔德这位公认的社会学创立者而结束，马克思在述及孔德时，也重复了孔德作为社会学创立者的预言。同样，涂尔干在述及马克思之时，也再一次重复了这一预言。在吉登斯看来，这样的不断发生的后来者对之前的社会学奠基人的否定，实际上也正说明任何一位自称社会学奠基人的存在的脆弱性。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把社会学看成科学领域中的新来者的看法，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看，实际是站不住脚的。吉登斯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有其悠久性，都可以将它们上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的时期。^①而差不多在19世纪的中期到后期，社会学似乎逐渐形成了一种正統的共识，也就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而有的一种“有秩序的进步”的观念以及在社会科学和功能论解释下的自然论的逻辑框架。^②在此意义上，社会学还是一种折中，是多种视角融合后的再创造。

在社会学的发展之路上，其迈出的第一步，与自然科学获得成功的第一步，并不相同。自然科学的自然论基础在社会科学中是缺乏的，一套规范的法则，可以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得到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认可，却不一定能够得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共同体成员的认可。不过，吉登斯确实认为，社会科学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一种对于因果关系的概括。这首先触及了理论与事实的问题，科学哲学已经清楚地指出，理论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1.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41 - 242.

并非完全由事实决定。任何数量的事实积累，都无法决定是否接受某一种理论或否定另一种理论。并且，随着所观察到的事实的积累，理论会不断地得到修改。这一点特别适合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背后的规律的逻辑形式也不同。自然科学发现的规律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普遍的应用，但是社会科学则不然，在社会科学之中，因果关系总是包含着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行动的有意和无意的结果。因此，社会科学中的规律是具有历史性的，是特定的时空场景下的产物，在形式上有易变的特性。正如吉登斯之前所一再强调的，所有受到约制的社会行动，都必须从行动的未知条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 of action）、在其目的性的反思性监控背景下行动的理性化以及行动的无意后果的关系中来加以分析。

在此意义上，行动受到规律的约制，这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这种约制的条件是行动者与结构规则之间的二重性互动。换言之，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可以将这种认知能力引入结构中去改变结构的约制。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社会科学中的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或者“自我否定的预言”（self-negating prophecies）之中。^①默顿在《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篇文章中向我们讲述了一家银行即将破产的小道消息，如何最终使这家银行真正破产，这是由于大多数不问真相或者不相信真相的银行储户，疯狂地去银行挤兑自己的存款，而造成的一种真实后果，这一故事被默顿称为“一个社会学的寓言”，在文章的最后，默顿这样写道：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对于一种情形的公共定义（或是预言，或是断言）构成了这种情形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影响着情形后来的发展。这是人类事务所具有的特征。在人类不能触及的自然界

^① 此语最初出现于默顿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文，参见 Robert K. Merton,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in Anthony Giddens, “The Prospects for Social Theory Today,” 1979, p. 283。中译本将“自我实现的预言”翻译为“自证预言”。参见 [美]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633~655 页。

中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断言哈雷彗星的回归并不影响它的轨迹。但是米林维尔银行破产的谣言却会产生实际的结果。倒闭的预言导致了它自身的实现。^①

吉登斯认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与自我否定的预言，都是通过语言的预设而制造出一种使这种预言果真实现的场景。在此意义上，任何对于某一既定社会的概括或者研究的形式，都构成了一种对那一社会的潜在干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任务和目标就是去揭示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吉登斯进而认为，社会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批判的理论。^②

社会理论在正统共识上的第二点不足体现在语言上面。正统社会学对一种既有的语言观不加反思地信以为真，这种语言观尽管从罗素哲学、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逻辑经验主义那里都获得了一些新鲜的给养，但依旧经不起推敲。逻辑经验论者强调语言是一种媒介，即一种描述物理与社会世界的媒介。语言因此被看成一种客体世界的同构 (isomorphy)，即语言的结构形式，或者语言特定的基本特征，是这个客体世界能够得到描述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其早期的语言哲学，即《哲学研究》一书中，对此有过极为明确的阐述，在他看来，语言的基本单位就是现实世界中相对应部分的“图画” (pictures)。^③

不过，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却基本上抛弃了先前的看法，而是转向了一种日常语言哲学 (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转向相呼应的还有舒茨的现象学以及当代的阐释学。这些新的哲学取向，都是针对传统的语言观而展开的，也就是试图对语言是一种描述的媒介这样的看法提出一些批评。语言的描述功能，仅仅是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媒介的诸多功能中的一种。这就像工具箱里面的工具一样，语言有

① [美]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635~63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44 - 245.

③ See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72,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5.

多种功能，而对一种语言功能的使用，就类似于对工具箱里一种工具的使用。^①

但是，社会学中的正统共识所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语言观，在这种语言观支配下进行研究的学者，一般并不管日常交往中的日常语言与社会科学中技术性的元语言之间的区分。在精确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之下，社会学家发明出来的概念在面对日常语言时就出现了对应性的困难。日常语言的特征是模糊与不精确，而技术语言所要求的是准确和无异议。技术语言所追求的是一般化的、可以脱离开场景的知识，而社会中的行动者则以能够切实掌握日常生活技巧的实用知识为目的，多少有些像菜谱或产品指南那类知识。不过，吉登斯所看重的倒不是这两者之间如何产生关联性及其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是更加注意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是如何使这两者勾连起来的。日常语言和社会科学家所发明出来的语言之间是可以相互侵入并得到再生产的。因此，在日常的外行人的语言与专业的社会科学家的语言之间便有了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在吉登斯看来，“由社会学的观察者所引入的任何概念在理论上都能为外行的行动者所借用，并被作为‘日常语言’话语的一部分来加以应用”^②。

同样，社会科学的专家也可以借用日常语言的概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个被赋予新的意义的术语，就有可能被新的外行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在这个意义上，专家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之间就没有了明显的、固定的分野，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且，在这里，概念担当着一种旅行者的角色，它可以在不同的语言空间中旅行。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学正统共识的第三点不足是对于过度简化的启示模型（revelatory model）的依赖，这种启示模型依赖于一种自然论的前提假设。^③ 在西方自然科学的探求中，启示（revelatory）和揭秘（demystify-

① See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5.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8.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8.

ing) 是两项极为重要的评价科学研究意义的指标。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人的常识加以检验 (check up), 以此来证明某种常识的对错, 并从其他的常识入手, 对物质世界进行不同于外行人的更加细致入微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 科学即是挑战常识信念中的错觉的过程, 这无可避免地会遭到墨守成规之人的抵抗, 并对那些科学发现加以排斥和否认。^①

拒绝接受新的发现, 有时也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种顽症。当一种对于社会的认识在越来越多的特例面前显得解释力不足时, 社会学家们甚至还会坚持这样一种解释。特别是面对那些来自社会学外行的批评 (lay critique of sociology), 社会学家更是表现出一种其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实际上, 社会学家很少认真对待这些批评, 而是将其看成一种社会认识上的偏见。而专业性技术概念的引入, 使日常语言的概念得到了替代, 这种替代使得一部分人强有力地占有这些概念, 并借助这些概念来支配那些没有能力掌握这些概念的人。吉登斯反复提醒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外行人的看法。在他看来, 外行人的批评, 至少可以说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位成熟的社会学实践家, 他们对于自身参与其中的社会运行所知甚多, 原因就是他们参与其中, 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并在参与的实践中获得了一种学习的能力。

依据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 这些人的知识可以成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关键的要素。而既有的所谓正统的社会学恰恰在这方面会有所忽视。特别是在行动的理性化 (rationalisation of action) 方面, 在吉登斯看来, 这是为之前的社会学所忽视的社会行动的一个根基性的构成要素。并且,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行动的理性化是一种历史情境下的产物, 是与历史的场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试图去发现这些行动的理性化的历史联系。^② 在这种历史联系的发现过程中, 对于常识的信念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48.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0.

和实践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特征。我们必须在相互达成理解的知识和常识之间做出一种区分。对于社会学的观察者而言，人与人交往中的相互性的知识（mutual knowledge）并不能发生改变，而常识（common sense）则是可以发生转变的，社会科学自身所保持的批评态度使常识发生改变成为可能。^①

这就与社会学正统共识中对于一种行动理论（a theory of action）的关注缺失联系在了一起。行动这个概念对于吉登斯而言有着特殊的意味，它即是指“由部分意识到自身行为的条件的社会行动者所反思性监控的行动”^②。在社会学的功能论思想中，行动仅仅被看成社会原因的结果，尽管帕森斯在述及其行动的参照框架（action frame of reference）这一概念时，提到了一种行动的理论，但是这里的行动主要是指一种人类行动的目的性特征，是行动者在不同的目标之间的一种选择的能力。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用“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这个概念来称谓其行动的理论，这是针对霍布斯的秩序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强调人的意志的目的性和多样性如何造就出一种秩序的概念来。在帕森斯看来，借助行动的参照框架，霍布斯所提出的强制秩序的概念与唯意志论之间便达成了一种和解，即由行动的参照框架而将价值观（values）当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的人格动机的构成要素。但是，在吉登斯看来，这似乎还是无法解决人行动的理性问题，或者并没有将社会研究者的注意力转到行动者如何借助于他们行动情境的知识来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反思性监控这一研究方向上去。也就是说，在帕森斯所描画的社会行动者中，实际上找不到有能力获取知识，并借助这些知识来引导自己行为的活生生的人。^③

在这里，吉登斯在不断地坚持他一贯的主张，那就是从根本上而言，一种行动理论要去处理结构（structure）与行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52 - 253.

②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4.

对此，吉登斯从来不避讳使用他所创造和发展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这一概念去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二重性的基础就在于有着反思性监控能力的个体行动者本身，个体行动者将此反思性监控加诸社会的制度性组织的重新构造上去。作为在一个社会中适应良好的行动者，其必定是一位深谙那一社会如何运行的知识个体，换言之，一个有认知能力的个体的存在，成为了结构二重性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

这里还隐含有时间性（temporality）这一维度，其借助结构二重性使得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若离开了这一维度的考量，一种纯粹的结构二元论（dualism）的弊端可能就会浮现出来，在这些弊端之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结构（structure）与事件（event）之间的分离与对立，或者是系统（system）与结构（structure）之间的对立。这里的系统，乃是依据情境化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再生产的排序，而结构则是此种再生产的媒介与结果。而一种行动理论的提出，必须关注到这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勾连，也就是关注到使这两者勾连在一起的那种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

而在此种实践意识的分析中，权力的概念至关重要。在韦伯那里，权力被界定为行动者确保其意志实现的机会，这种意志，甚至可能是受到他人反抗的一种意志。在吉登斯看来，这是一种主观论者的方法论姿态，其最终导致的是行动者与结构之间两分的二元论，而一种真正的行动理论的提出需要有意地在这一点上进行克服。在此，吉登斯所强调的就是，在人类的行动观念中，包含着一种权力的概念，即一种转化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在这个意义上，行动就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行动者有了一种干预的能力之后或者在受到干预约束的前提条件之下才会发生和存在的，而表现的方式就是事件，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体现了行动者干预和受到干预的能力状况。在此过程之中，权力一直是跟随着事件的发生而发生的。换言之，权力融入互动的过程。而一种行动的理论要把权力跟社会的结构性特征联系起来，在这里，吉登斯所理解的权力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源（resource），是在社会互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由行动者自身来加以

利用的资源。^①

最后一点在社会学正统共识中的不足是有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分问题。正统的社会学所接受的是一种自然科学的实证论模型 (a positivistic model of natural science), 因此, 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在模仿自然科学, 追随于“在自然科学中得到认可的模式” (the received model of natural science)。特别是从实证主义向逻辑经验主义的转化, 即借助推演而达成的在不同层次上发挥作用的规则, 已经成为社会学界普遍接受的一种方法论主张。但是, 社会学的规则从来都包含一种历史性的特征, 这就注定了其不可能由此逻辑的推演而直接获得对于社会的认识和概括。对于社会学而言, 一种有效的以及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可能比逻辑演绎关系的推演和证明来得更为重要。

在这里, 更确切地说, 吉登斯一方面要求我们理解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征, 另一方面也要去关注自然科学的逻辑形式, 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这两者从来都是缺一不可的。在这个意义上, 也正像吉登斯所提醒的, 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专门分离开来加以对待, 因为, 社会学家对于科学的进展不可能不闻不问, 而同时, 自然科学的哲学反过来也会对社会理论问题的深度解释提供一些启示。^②

①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p. 256 - 257.

②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p. 259.

后 记

此书既成，倒平添了几分忧虑。在这方面，研究者不同于写作者。写作者所瞄准的自然是要读者读着快乐，要因阅读而有所受益。而对研究者来说，明白了一个道理，似乎也就足够了，落下的那些文字都是这种明白之后的一种副产品，本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从以玄妙高明自居的佛家禅宗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是种种业障，本应该以“不立文字”为生活之最高境界。这对许多不想为写作辛苦的人而言自然是一种最为迷人的说法，只可惜在世俗的生活之中，文字的交流以及文字的功绩都是无法真正抹杀掉的。有了文字，或者文字太多，我们会嫌弃它的烦琐和拖累，但要真的没有了文字，那世界的文明会是怎样的一副样子，真是不敢去猜测。

我自己研究吉登斯的社会思想自然是从对其文字的阅读开始的，显然，如果没有他写下来并公开发表出来的文字，他又何以成为一位世界瞩目的社会理论家呢？而如果我没有机会阅读到他的文字，又如何与吉登斯这个名字结下文字的缘分呢？孔老夫子的一句“学而时习之”，作为《论语》的首篇首句，实际提醒了我们阅读的乐趣究竟何在。我自然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感召而有了一些阅读的经验以及阅读之后的愉悦之感。所有这些阅读，无疑使我恍然有了一些对人对事的了悟，或者说从有成就的学者身上，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着实可以抽离出某种在意义追寻上的自我认同，并找到自己的心思之所在，使自己获得一处安宁之所。

实际上，文字写成了就算是一种宣告，即宣告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真实存在。但这种存在首先是社会乃至文化意义上的，换言之，如果没有那么多我心目中希望与之做一些文字上的交流的潜在或想象中的读者存在，我在这里费尽心力所写下的这些阅读心得又有何实际意义可言呢？我们借助文字的在场而织就了一张天下之网，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甚至有时虽然我们彼此不识，持久地处在一种关系的缺席状态，或在未来某个人身上

总会出现一种永久缺席的诀别，但我们各自所写下的那些文字却使我们不断乃至永久地现身于这张网中。这也便是文字书写所带给书写者的一种快乐和驱动力。

我想，在这里首先应该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包括我的老师、前辈、朋友、学生以及那些看过本书初稿并提出种种批评和质疑的同仁。当然也要感谢书稿的匿名评议人，他肯定了我的努力，也指出了我的不足。更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潘宇和宋义平，前者努力促成了此书在人大社的出版，后者为书稿的修改提供了一些极为有益的建议，我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这方面的合作。最后，当然要感谢吉登斯本人，虽然我与这位大社会学家的会面不过区区两次，往来的电子邮件也寥寥无几，但他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并引导我向问题的深处进发，由此而获益良多。

如果要我对自已眼中的吉登斯有个总体的评价，我愿意写下这些断言：社会科学自身会因应世界大趋势的转变不断调整自身的关注点，而吉登斯的社会学恰可说是这种强调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观引导之下的一种在西方的探索和尝试。在吉登斯社会学理论的背后，实际涌动着的是一种动力转型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可以拿来理解中国的现实以及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种种转型。由此，一种静态的社会观也就需要因此认识而做出一种彻底的转变，即需要在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动态转变之中去理解一些不变的文化内核，同时还要在一种看起来极为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洞察或审视日常生活的种种细微改变。学问可以做死亦可以做活，大不列颠的这位吉翁无疑有一种雄心，他试图使一种快要死去或者多少变得有些僵化的西方社会学产生一种起死回生的扭转，使之充满人的社会生活本来应具有的生命活力。他在不断地修订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修订自己的社会学观念，他力图在对社会的两极看法之间寻找到一种平和的发展之路。显然，对中国道路的复杂性绝非仅仅靠制度或行动那样的单一维度就能真正理解，而需要多维地去看、综合地去看以及整体地去看，当然还要求富有动态性地去看，如此才能从中看出一个真正的门道，否则只可能是雾里看花、朦胧一片了。

2018年1月18日，恰好是吉登斯教授的八十华诞，而按照中国人的习俗，2017年1月18日便是他的庆生之年，面对自己写好的有关这位思想家的书稿，总要写一点用于收场的文字。那就把下面这首《吉翁八十待贺》的小诗提前敬献给吉登斯本人，也真心预祝他八十华诞愉快，身体健康：

吉翁已过古来稀，文字等身著寰宇。
大千世界谁掌握，不负英伦此生民。
动感地带促移动，全球一体共繁荣。
双重结构新规则，转型发展识时务。
主体勾连你我他，冷眼静观俱浮华。
识得社会知大体，命运桴浮越汪洋。
先师负笈西路行，吾辈诵经辟新途。
文化自觉美人美，大同何须待后人。

赵旭东

2016年4月23日晨客居重庆永川时作并记